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張舜徽集

## □周秦道論發微

修其遊說之所蓄苦其史學三書平議作

性則石瑒古誼之修便實固今日精神文明為質文明建設  
之大而國之盛衰強弱繫焉登斯閣者僅管能明乎藏修  
是遊之旨於勤勞工作之餘喜愛養其精神俾益奮厲不懈  
競展其才以效力于國則為利之博豈有涯哉斯閣之建也  
不虛矣閣之重修肇始于一九八三年之冬落成于一九八六年之秋  
三年之內修舊補廢治垣造乎諸役費工與時視建閣為尤多  
云既前軍慶為高文記之因兼抒所感于此以為來遊者勸焉

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張舜徽撰并書



# 張舜徽集

## 第二輯

清代揚州學記

顧亭林學記

清儒學記

□ 周秦道論發微

史學三書平議

鄭學叢著

愛晚廬隨筆

ISBN 7-5622-3271-7



9 787562 232711 >



# 張舜徽集

## □ 周秦道論發微

### 史學三書平議

修史有難之所當苦其少夫惟善休息者始能盡其工作  
 性則易於古蹟之修復實則今日精神文明為質文明建設  
 之大而國之盛衰強弱繫焉登斯閣者當皆能明乎藏修  
 息遊之旨於勤勞工作之餘善愛養其精神俾益奮厲不懈  
 競展其才以致力於國則為利之博豈有涯矣斯閣之建全不  
 僅矣國之重修建築始于一九八三年之冬落成于一九八六年之秋  
 三年之內修舊補廢治垣造亭諸役費工與時視建閣為允  
 云既前重為修葺又記之因兼抒所感于此以告來遊者勸焉

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張舜徽撰并書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年·武漢

## 新出圖證(鄂)字 10 號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周秦道論發微；史學三書平議 / 張舜徽著。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6

(張舜徽集)

ISBN 7-5622-3271-7/K · 169

I. 周… II. 張… III. ①古典哲學—研究—中國—周代

②古典哲學—研究—中國—秦代③史籍—研究—中國—古代

IV. ①B22 ②K2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33199 號

### 周秦道論發微 史學三書平議

◎ 張舜徽 著

---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社址：武昌桂子山

郵編：430079

電話：(027)67863220

傳真：(027)67863291

網址：<http://www.ccnp.com.cn>

電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mailto:hscbs@public.wh.hb.cn)

經銷：新華書店湖北發行所

印刷：武漢中遠印務有限公司

---

責任編輯：張紅梅

封面設計：羅明波

責任校對：羅 藝

督 印：姜勇華

---

開本：850mm×1168mm 1/32

印張：18 字數：450 千字

版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3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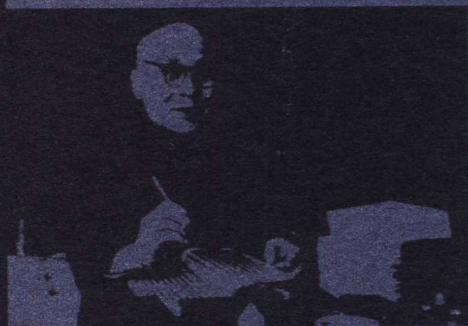
定價：38.00 元

---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向承印廠調換。



責任編輯：張紅梅  
責任校對：羅 藝  
封面設計：羅明波



定價：38.00元

## 出版說明

張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文獻學家。生前曾任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

張舜徽先生一生勤奮治學，博涉四部，在傳統學術的諸多領域造詣精深，留下大量論著。他在《八十自敘》中總結說：“余之治學，始慕乾嘉諸儒之所爲，潛研於文字、聲韻、訓詁之學者有年。後乃進而治經，於鄭氏一家之義，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學、經學爲基石，推而廣之，以理羣書，由是博治子、史，積二十載。中年以後，各有所述。爰集錄治小學所得者，爲《說文解字約注》；集錄治經學所得者，爲《鄭學叢著》；集錄治周秦諸子所得者，爲《周秦道論發微》、《周秦政論類要》；集錄治文集筆記所得者，爲《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舊書，則於《史通》、《文史通義》皆有《平議》；創立新體，則晚年嘗獨撰《中華人民通史》，以誘啓初學。至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平生致力於斯，所造亦廣。若《廣校讎略》、《中國文獻學》、《漢書藝文志通釋》、《漢書藝文志釋例》、《四庫提要敘講疏》諸種，固已擁替前驅，導夫先路。”此僅爲就其平生著述中較費心力者而言，已足以彰顯先生對學術界的重大貢獻。他的這些成就，使他成爲公認的國學大師，更是華中師範大學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學者。

二〇〇三年，是華中師範大學建校一百周年。鑒於張舜徽先生在學校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我社決定出版《張舜徽集》，以作紀念。《張舜徽集》擬分批推出，每年五至七部，四年內出齊。

由於張舜徽先生的著述甚多，各書原出版單位不同、排版不一（多為繁體豎排），現在統一改為繁體橫排，技術上有一定難度。但我們本着對作者和讀者負責的態度，忠實於作者原作，不隨意更改，僅在極個別情況下稍作技術處理。這種情況主要有兩類：一是原書中的夾注，一律加括號，注文字號同正文。二是原書中某些並列的書名號，從豎排改為橫排後，為避免誤會，作了一些必要的調整，其中又分兩種情況：一是同一部書下的幾個篇名，如《史通》之後緊接着出現“正史”、“史官”諸篇名，僅把“史通”加書名號，篇名“正史”、“史官”則不加。二是幾部書的合稱，如“兩唐書”（指《新唐書》、《舊唐書》）、“新舊唐書”（指《新唐書》、《舊唐書》），為規範計，標作“兩《唐書》”、“新舊《唐書》”；“隋唐志”（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元史”（指《宋史》、《元史》）等，為避免一個字的朝代名單標書名號，干脆省却書名號，成“隋唐志”、“宋元史”。這些技術處理，是我們的一種嘗試，但願不致引起讀者的誤解。自第二輯起，也斟情參考中華書局處理這類情況的標點方法。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十月



# 目 錄

## 周秦道論發微

前言 .....	(3)
敍錄 .....	(5)
道論通說 .....	(29)
序 .....	(29)
第一 闡明“道”與“道經”之名義 .....	(31)
第二 闡明“一”即“道”之別名 .....	(33)
第三 闡明周秦學者言主術同宗“道德” .....	(35)
第四 闡明西漢諸儒皆深識“道德”之要 .....	(37)
第五 闡明荀子及偽尚書“危微”之語皆爲主術而發 .....	(38)
第六 闡明兩書所稱“人心道心”猶《禮記》中之 “外心內心” .....	(39)
第七 闡明“危微精一”之本義 .....	(40)

第八 闡明“人心惟危”原理在南面術中之實際運用 .....	(42)
第九 闡明“道心惟微”原理在南面術中之實際運用 .....	(51)
第十 闡明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亦即危微之旨 .....	(61)
道論足徵記 .....	(63)
老子疏證 .....	(83)
序 .....	(83)
略例 .....	(86)
引用各種版本目錄 .....	(88)
引用各家注說目錄 .....	(89)
老子疏證卷上 .....	(90)
老子疏證卷下 .....	(162)
管子四篇疏證 .....	(209)
序 .....	(209)
引用各家注說簡目 .....	(210)
心術上篇疏證 .....	(211)
心術下篇疏證 .....	(250)
白心篇疏證 .....	(266)
內業篇疏證 .....	(304)
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述義 .....	(328)

## 史學三書平議

引言 .....	(343)
史通平議序 .....	(344)
史通平議 .....	(345)

內篇（卷一） .....	(345)
六家第一 .....	(345)
二體第二 .....	(358)
載言第三 .....	(360)
本紀第四 .....	(362)
世家第五 .....	(365)
列傳第六 .....	(368)
內篇（卷二） .....	(370)
表歷第七 .....	(370)
書志第八 .....	(376)
論贊第九 .....	(380)
序例第十 .....	(383)
題目第十一 .....	(386)
斷限第十二 .....	(387)
編次第十三 .....	(388)
稱謂第十四 .....	(391)
內篇（卷三） .....	(394)
採撰第十五 .....	(394)
載文第十六 .....	(399)
補注第十七 .....	(401)
因習第十八 .....	(404)
邑里第十九 .....	(407)
言語第二十 .....	(408)
浮詞第二十一 .....	(410)
敘事第二十二 .....	(411)
內篇（卷四） .....	(416)
品藻第二十三 .....	(416)



直書第二十四 .....	(418)
曲筆第二十五 .....	(420)
鑒識第二十六 .....	(422)
探蹟第二十七 .....	(424)
模擬第二十八 .....	(426)
書事第二十九 .....	(428)
人物第三十 .....	(430)
覈才第三十一 .....	(432)
序傳第三十二 .....	(433)
煩省第三十三 .....	(435)
雜述第三十四 .....	(436)
辨職第三十五 .....	(437)
自敘第三十六 .....	(438)
外篇（卷五） .....	(441)
史官建置第一 .....	(441)
古今正史第二 .....	(446)
外篇（卷六） .....	(466)
疑古第三 .....	(466)
惑經第四 .....	(469)
申左第五 .....	(471)
點煩第六 .....	(472)
雜說上第七 .....	(474)
雜說中第八 .....	(478)
雜說下第九 .....	(480)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	(482)
漢書・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	(482)
暗惑第十二 .....	(483)
忤時第十三 .....	(483)

通志總序平議小序 .....	(485)
通志總序平議 .....	(486)
文史通義平議小序 .....	(517)
文史通義平議 .....	(518)
內篇一 .....	(518)
易教上 .....	(518)
易教中 .....	(519)
書教上 .....	(519)
書教下 .....	(520)
詩教上 .....	(522)
經解上 .....	(523)
經解下 .....	(523)
內篇二 .....	(524)
原道中 .....	(524)
原學上 .....	(525)
原學下 .....	(526)
博約上 .....	(527)
博約中 .....	(527)
浙東學術 .....	(528)
朱陸 .....	(529)
文理 .....	(530)
古文公式 .....	(531)
古文十弊 .....	(532)
內篇三 .....	(534)
繁稱 .....	(534)
內篇四 .....	(535)
言公上 .....	(535)

知難·····	(537)
釋通·····	(538)
申鄭·····	(539)
答客問中·····	(541)
內篇五 ·····	(542)
史德·····	(542)
史注·····	(543)
詩話·····	(544)
婦學·····	(544)
婦學篇書後·····	(544)
內篇六 ·····	(546)
文集·····	(546)
答問·····	(547)
篇卷·····	(547)
外篇一 ·····	(548)
立言有本·····	(548)
論文辨僞·····	(550)
史學例議上·····	(550)
史篇《別錄》例議·····	(551)
外篇二 ·····	(552)
鄭學齋記書後·····	(552)
讀《史通》·····	(554)
外篇三 ·····	(556)
報黃大俞先生·····	(556)
爲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鑒書·····	(557)
與史餘村簡·····	(558)
與汪龍莊書·····	(559)



報孫淵如書..... (559)

家書二..... (560)

後記 ..... (562)

張舜徽 著

周秦道論發微





## 前 言

近世治周秦諸子之書者，大抵校勘版本、詮釋文字之力爲多，而融會貫通、暢申大義之言甚少。自清代諸儒，下逮並世勝流，作者衆矣。讎對詳審，考證精覈，使上世遺書譌然已解，其爲功固不細。然余以爲此特讀書首務耳，而非其終詣也。夫周秦諸子之言，起於救時之急，百家異趣，皆務爲治。雖各自成一家，不相爲謀；然亦有所見大合、殊途而同歸者。後人猶繹其書，但知其異而不見其同，猶不足謂善學也。余昔治周秦諸子書，而深疑道論之要，何以爲百家所同宗。反覆推尋，始悟無爲之旨，本爲人君南面術而發，初無涉於臣下萬民也。近人治哲學者，乃謂《老子》之言無爲，實欲返諸太古之無事。使果如此，必致耕稼陶漁、百工技藝，皆清靜無所事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烏覩所謂後世之文明乎？故其說必不可通。余早歲嘗爲書數種，以暢發道論之要，近復有所增益，因裒爲一書，名曰《周秦道論發微》。其《敍錄》一篇，既爲友人取去，刊入

#### 4 周秦道論發微

《中國哲學》第三輯矣。而讀者紛紛來書，索觀《發微》之全。因出其稿付中華書局印行，亦欲以求教於當世耳。此書九卷，不成於一時，故彼此取材難免複見。原欲各書單行，是以並存無嫌。今既都爲一集，仍而未改，幸覽者諒之！

張舜徽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

## 敍 錄

《道論通說》（原名《危微論》）一卷，《道論足微記》一卷，《老子疏證》二卷，《管子》心術上下、白心、內業四篇疏證各一卷，《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述義》一卷，以上九卷書，是我多年來研究周秦道論時的心得紀錄。所闡發的既是同一內容，因合編為《周秦道論發微》。這一研究工作，從1944年—1945年之間便開始了。那時正值抗日戰爭期中，隨學校轉徙四方，不能多得書。我在教學餘暇，便努力溫習周秦諸子。着重涵泳白文，探求大義。對古代道家闡明人君南面術的言論，頗有領悟。認為《管子》心術、白心、內業等篇，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有重新整理的必要，於是抽出來為之疏證各一卷。又認為西漢學者多能識得道家深處。而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又是研究古代道家學說的一把鑰匙，學者必深通其義，才有人門處。於是自抒所得，寫成《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述義》一卷。在綜合羣書、融會鉤稽的過程中，體會到《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和偽《古文尚書·大禹謨》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都是為君道而發，却為後世理學家們穿鑿傳會之說所歪曲了。於是寫成《危微論》一卷，以發揮它的本義。再博考經、傳、子、史，以及唐以前士大夫們

的議論，擇取其中足以印證古代人君南面術的一些材料，寫成《道論足徵記》一卷。近年又撰述《老子疏證》二卷，並對《管子四篇疏證》加以補充修改，成為今本。

“道論”二字，可說是“道家理論”的簡稱。它的具體內容，便是“人君南面之術”。用“道論”二字來概括這種理論，在西漢初年，便已通行了。當淮南王劉安領導一羣知識分子寫成《淮南子》二十篇後，在《要略篇》裏說道：

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

又說：

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

這“道論”二字，自然是指上文“帝王之道”說的；“萬物”二字，自然是包括“天地之理”、“人間之事”說的。其次，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介紹他父親司馬談的學術本末道：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這裏所言“習道論於黃子”，正如《史記·李斯傳》中所稱“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一樣，學習的內容是相同的。可知“道論”這一名詞的含義，在西漢學術界早已明確了。我的這幾種寫作，既是圍繞着周秦諸子中所談的南面術——帝王之術爲中心，而加以分析和闡發，來考明周秦時人所稱的“道”是什麼一回事，所

以也就採用“道論”二字標題。

我的這幾種稿子，都是早年寫的，當時避難荒陬，沒有多書可供參考。當我寫《管子》心術、白心、內業等篇疏證的時候，手頭便只有戴望的《管子校正》，因之所採取的注說，便很有限。近年由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適合撰的《管子集校》既已出版，搜採廣博，給讀者帶來許多方便。這次重理舊稿，便從《集校》中擇取了不少精確之說，豐富了《疏證》的內容。不過《集校》徵引各書，偏重在校勘方面的意見，而不是全面收羅注釋方面的說解。我所寫的幾篇疏證，却着重在理論方面的闡發。有時《集校》所沒有收入的材料，反成為我最需要的證說。所以，我所取用的諸家之言，凡是不見載於《集校》中的頗不少，都是從原著中引來的。加以《集校》所收，亦不免有遺漏。例如傅山《霜紅龕雜著》中考證《管子》的札記，羅綏《諸子學述》中疏釋《心術》、《內業》等篇的言論，都沒有收。我也從這些書中擇取其精要之義，寫入了《疏證》。

至於《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述義》、《危微論》、《道論足徵記》，都是早年的原稿，這次沒有多大的修改和加工。只是將《危微論》改為《道論通說》以求淺明易懂。原來是文言文寫的，也就仍而不變。這幾種書，既同是討論一個問題——古代人君南面術的問題，自然有它們的密切聯系性。現在就我要首先說明的幾個問題，分幾部分談談：

# 一

春秋戰國之際，百家爭鳴，那樣多的學說蓬勃興起，當然有它的經濟基礎，是客觀現實的具體反映，不是任何人主觀願望所能安排的。當百家爭鳴之時，都離不了為當時的政治服務，雖各有一套議論主張，彼此有同有異；但他們的任務和目的，從總的方面來看，却是統一的。他們的目的，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

議論主張，游說諸侯，乘機爬上統治地位，成為最高統治者周圍的顯赫人物。他們的任務，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議論主張，實行於當時，來鞏固統治者的權位，維護統治與服從的社會秩序。包括孔子在內，也自然不能例外。我們只看孔子平日所說：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篇》）

又說：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篇》）

這是何等急於求用於世的心情。他的目的，還不明白嗎？當齊景公問政於他的時候，他答道：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篇》）

這分明是要正名分，把等級制度鞏固起來，用以維護統治與服從的社會秩序。他的任務，還不清楚嗎？儘管過去二千多年間封建學者們把孔子的汲汲皇皇，周游列國，說成是“求行其道”。結果沒有爬上統治階級的高位，說成是“其道不行”。這裏面“行其道”的實質是什麼？在今天是很容易明白的。《史記·儒林列傳》說：

仲尼千七十餘君無所遇。

《孟子·荀卿列傳》說：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

司馬遷論述諸子百家的興起，率不外一個“干”字，他們當時能够爭先恐後地去干求時君世主，當然是有他們的一套本錢的。孔子的本錢比較雄厚，而以他所提出的正名分的主張，為最有助於鞏固當時統治者的權位。所以當漢武帝初年建元、元封之間，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時，便肯定：

儒者……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同樣，司馬談也肯定陰陽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墨者彊本節用不可廢，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名家正名實不可不察，這些都是從維護和鞏固統治者的權位來看問題的。司馬談對以上五家各道其短長，但取一端以為重。至於談到道家，便反覆贊歎不已。既說：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又說：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這樣的推崇道家，並且從而加以發揮，分明是從最高統治者南面術的角度來看問題的。他認爲只有道家所提供的“南面術”爲最全面，是人君臨馭天下的最原則的東西。其他各家所提供的，僅是一些片面的具體辦法而已。徒有一些具體辦法而沒有總的原則，那就使得人君勞於治事而收效不大。甚至會傷損人君的形體精神，連生命都不可長保。司馬談所以贊歎道家，便因爲道家明確地指出了這裏面的道理，勸人君不要親理庶務，要做到垂拱而治。此中關鍵在人君能够虛靜其心，收斂聰明，儘量利用臣下的才智，而不現露自己的才智，以達到“無爲而無不爲”的境地。《淮南子·原道篇》說：

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



這裏所提的“物”，是指臣下，指羣衆（猶衆論謂之物議；衆望謂之物望）。意思是說，最高統治者遇事不要先動手，儘量分任臣下去做，等到臣下們做出了成績，便成了自己的成績，以成“無爲而無不爲”之治。這自然是“南面術”的核心。也就是古代統治者臨馭天下的最高原則。這種原則，古人稱它爲“道”。《淮南子·汜論篇》說：

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  
事猶琴瑟，每弦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  
非所以爲治也。

根據這一理論，來分析《論六家要指》，那末道家所提供的  
那一套，在西漢學者心目中，便是一調不更的“道”，是最根本  
的東西。其餘五家所提供的，只是每弦改調的“事”，是比較枝  
葉的東西。無怪他們把道家理論提得很高了。由此可見，司馬談  
《論六家要指》，實是一篇政治論文，而不純是學術論文。漢初，  
道家之說盛行，司馬談曾親從黃子學習了那一套理論，所以他談  
起來頗能深入。後人研究道家學說，也必由此入門，才能窺其闢  
奧。其次，《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也說：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  
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南面之術也。（王念孫說，“君人”當爲“人君”  
之訛。）

這裏所提出的“此君人南面之術”，一語道破了道家學說的  
全體大用。給予後世研究道家學說的人以莫大的啓發和指示，應  
該算得是一句探本窮源的話。我們沒有理由不重視它。《漢書·

藝文志》，是以劉歆《七略》為底本改編而成的。其中各部類的敘論，絕大部分都是《七略》中《輯略》裏面的原文，像上面所舉介紹道家的一段話，也自然不能例外。那些話並不是劉向、劉歆父子校書時，專憑主觀臆造出來的。而是在西漢學者們人所共知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來的。西漢學者，自司馬談、司馬遷、董仲舒等都精通道家之學外，即如劉向的父親劉德，史稱其“少修黃老術，有智略”（見《漢書·楚元王傳》）。那末，劉向、劉歆家學相承，自然也懂得道家學說的主旨和作用。所以《七略》裏介紹道家學說“此君人南面之術”的那句話，無疑是西漢學者們共同的認識。劉歆既寫入《七略》，保存了這句極其實貴的名言，應該被後人看成研究道家學說的指針。

## 二

何謂南面術？這便首先牽涉到了古代房屋的建築。我們祖先造房子，無論統治階級的宮室或勞動人民的住宅，都是坐北朝南。冬天可以避寒，夏天可以迎風。這種傳統習慣，大約已有幾千年了。由於房屋都是南嚮，尊長大半坐在正中，面向南方，卑幼自然面向了北方。“南面”、“北面”的名稱，因之而起。《春秋繁露·天辨人在第四十六》說：

當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

這種解釋，自然是封建學者唯心的歪曲的說法，不足為據。不過“南面”二字見之經傳，是很早的。孔子曾稱：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篇》）

這是就古代天子言。其實諸侯統治一國，也有“南面”之稱。孔子又稱：

雍也可使南面。（《論語·雍也篇》）

何晏《論語集解》引包咸說：“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這便是諸侯可稱“南面”的例證。大約在我國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統治者，都有“南面”之稱，“南面術”便是他們怎樣駕馭臣下、壓制人民的一套手法和權術。這種術，周秦古書中，名之為“道”；古代有人把這種術的體和用，總結出了一套有系統的理論，便是“道論”；宣揚這種理論的，便是“道家”。

人們一定會懷疑到為什麼遠在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初期，便出現一種專談“南面術”的學說呢？這是由於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後，最高統治者想要以一人的聰明才力控制廣大羣衆，使羣衆無條件地服從他，得以長期鞏固他的統治地位，却不是一件太簡單的事。於是，一些知識分子爲着有所干求於時君世主，便投了這個機。針對着當時統治者們最苦惱的問題，擬出了許多成套的辦法，提供爲統治天下的方案。其中如刑罰、禮制……等一類的東西，只是一些有形的具體措施，而不是最原則的東西。最原則的東西有二：一是“主運”；一是“主道”。

所謂“主運”，是傳會五行——金、木、水、火、土相互剋制的道理，以成爲統治者“受天命而爲天子”的理論根據。這一學說的興起，當然不會很晚。到戰國中葉，齊人騶衍、騶奭，更把它系統化了。《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附載騶衍行事道：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作《主運》。

《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云：

鄒子書有《主運篇》。

《史記·封禪書》說：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史記集解》引如淳云：

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爲行。秦謂周爲  
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

綜觀以上所述，可知騶子當日闡發這種理論的文字，篇名叫做“主運”，內容便是“五德終始”。大意是根據金剋木，火剋金，水剋火，土剋水，木剋土，這些道理施用到政權變化方面來，把歷代統治者的更朝换代，說成是依照這規律在循環不息地轉移着。虞以土德王，夏以木德代替了它，殷又以金德代替了夏，周又以火德代替了殷，秦又以水德代替了周。將歷代統治者的更替相代，調配得好像上天安排好了似的。於是一個統治者代替了另一統治者取得天下以後，便馬上就“五德”中足以制勝前朝的某一“德”，偽造出反應在自然界的一些跡象和符驗，來欺騙人民，使窮苦老百姓看了，誤認爲是“應運而興”，無可置疑，而統治者的江山便坐穩了。這便是“主運”之說對支持統治者鞏固權位的實際意義。由於它不是本篇所要詳加討論的問題，所以不必多談。下面要詳加闡述的，便是“主道”。

“主道”二字作爲篇名來標題，始見於《韓非子》。由於它是

闡明做君主的道理，所以有些書便稱“君道”，見《荀子》；或稱“君守”，見《呂氏春秋》；或稱“主術”，見《淮南子》。此外，尚有不用“君”和“主”的字眼標題，而別製篇名的，像《管子》中的《心術》、《白心》、《內業》；《韓非子》中的《大體》、《揚權》；《莊子》中的《天道》；《呂氏春秋》中的《園道》；都是談的這個道理。命名雖有不同，也都各有取義。這在我所寫的《管子》心術、白心、內業等篇疏證和《危微論》中都曾加以闡明，不在這裏再說了。人們會要問：道家學說，固然以闡明“南面術”為主，為什麼其他諸子，也都有類似的專篇呢？這道理却很簡單，他們既同以干求時君世主為目的，各有一套游說進言的辦法。雖所提供的作為統治人民的具體辦法各有不同，但有關最基本的東西——南面術，自不能置而不言。這不獨《管》、《莊》、《韓》、《呂》、《淮南》諸子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和《老子》雷同的議論主張；即如孔子，也曾稱“為政以德”，又贊美過虞舜的“無為而治”（見《論語》）。墨子也說：“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見《所染篇》）這都是闡發南面術的精要之言。也就足以證明《淮南子·齊俗篇》所說：“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確是綜合諸子百家所共同闡發了的理論而得出的精闢論斷。

“主運”和“主道”，同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控馭天下的大法寶。如果說“主運”的實質可用一個“騙”字來概括；那末，“主道”的實質，便不外一個“裝”字。我們可以借用俗說“裝糊塗”一語，來揭發南面術核心部分的神祕。我們必須懂得古代專替統治者着想的學者們，考慮到人主才力智慧有限，敵不住臣下和羣衆的才力智慧，如果親自動手做事或者多發議論，不但不能藏拙，且容易顯露破綻，招致臣下和羣衆的輕視，甚至引起權位莫保的危險。所以南面術中最核心的東西，便是要人主不說話，不做事。《管子·心術上篇》所說：

“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淮南子·原道篇》所說：“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與《老子》所言“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宗旨，是一致的。照諸子百家書中所宣揚的理論來看，如果最高統治者能依他們所說實行得很成功的時候，也還可掩飾自己的無知無能。例如《老子》第二十章說：

衆人昭昭，我獨昏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

這裏所提的“衆人”，是指臣下百官；所提的“我”，是指最高統治者自己。“昭昭”、“察察”，是精明意；“昏昏”、“悶悶”，是糊塗相。平居的時候，既已如此；等到處事之際，更現神妙。《韓非子·揚權篇》說：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  
乎脣乎，愈悒悒乎！

這又裝成像酒漢大醉之後，無知無覺，不言不語。悒悒沉沉地使人莫測高深，捉摸不到他的是非喜怒，而沒有給臣下以投機取巧的機會。臣下便不敢不竭盡各人的才智來做分內應做的事。所以《韓非子·揚權篇》又說：

主上不神，下將有因。

又說：

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

這裏所連續提出的“神”字，自然包含了豐富的内容。統治者既裝成了一副糊塗相，以達到“無爲”、“不言”的境地，遇事只向臣下要辦法，而不自己首先拿出辦法，這便是“任人而不任智”的精髓。《呂氏春秋·知度篇》說：

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復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

這段話亦見《淮南子·主術篇》（僅有數字不同），自然是“南面術”的核心内容。末二語尤爲重要。“以不知爲道”，說明了人主不自任聰明，遇事以卑弱自處。“以奈何爲寶”，“奈何”是“怎麼辦”的意思，說明了人主總是要臣下提供辦法，儘量發掘他們的才智以爲己用，以收“無爲而無不爲”之效。看來那樣外裝糊塗的統治者，骨子裏還自有一套最厲害、最周密的手段和方法。如果運用得很靈活，便可立於不敗之地。南面術之所以爲周秦諸子所宣揚，爲歷代君王所採用，當然是有它的作用的。

由此可見，道家所提出的“清靜”、“無爲”，是南面術的具體内容，是專就最高統治者一個人說的，而不是就普天之下的廣大羣衆說的。過去研究哲學思想的學者們，忽略了這一點，錯誤地認爲是要普天之下的廣大羣衆都不做事，這便歪曲了“無爲”二字真正的含義和效用。特別是像胡適談到老子的哲學時，說什麼“老子反對有爲的政治，主張無爲無事的政治”，“是極端的破壞主義”，“是極端的放任無爲”（《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第三篇）。這簡直是毫無根據的胡扯。給老子哲學本身塗上了穢濁的污泥，我們必加以洗刷，以求窺見它的本來面貌。胡適之流的不能了解道家主張“無爲”的原意，便由於讀書鹵莽，沒有博稽諸子百家，做一番融會貫通的功夫，自然找不到“君無爲而臣有

爲”、“君無事而臣有事”的基本原理，所以談起來免不了支離破碎，去古人之意，也就十萬八千里了。

### 三

凡一學說的興起，絕不是、也不可能是由一個人在某一時期突然創造出來的。必然是前有所承，經過若干年代的孕育醞釀，由無到有，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由沒有系統到有系統。這從很長時期來看問題，仍然是綜合了多少人的心思才力，在集體創造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道家的學說，也自然不能例外。胡適談到老子哲學時，便認爲“老子是最先發見道的人”（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第三篇）。這一斷語，顯然是十分錯誤的。首先，在《老子》本書中，早已明白說過：“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十五章）又說：“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二十二章）又說：“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六十二章）又說：“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六十五章）據此，可知在老子以前，已有不少的人闡明過這些道理，爲他所繼承了。又何能武斷地說道家學說是由老子首創的呢？其次，我們再看《莊子·天下篇》敘述諸子學說的興起，每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某某聞其風而說之”。這說明了每一學派的出現，都是前有所承，而不是凌空起來的。他明明說過：“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可知老聃之前，還有這方面的老前輩，爲老聃學說之所自出。何可一概抹煞，將創始之功歸諸老聃？最後，我們試檢《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著錄了《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筮子》諸書，在《老子》前。可知道家學說的興起，真是源遠流長，似乎沒有理由只從老子談起。宋代學者朱熹，在這個問題上，提出了他的看法。《朱子大全文集》卷三《答汪尚書》云：



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列子》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

朱熹雖不是以研究老子哲學思想為專業，但這段話，說得非常精當。的確如他所言，《老子》中的許多話，也還在它以前的書籍中時時發現，這並不意味着老子是鈔襲，而是那種理論在當時本很流行，凡是留心治道的人，各有所掇拾，便不謀而同了。這便進一步足以說明《老子》一書，顯然不是老聃一人的創造，他不過根據舊語加以演繹罷了。即以五千言的編次而論，前後重複的地方很多，又沒有完整的系統，如果真是作者發表一家學說之書，在它的內容和組織方面，似乎還要豐富而細密的多。所以這部五千言的作品，無疑是彙輯古代道家言論的語錄。

胡適在研究哲學思想的過程中，沒有用發展的觀點去分析問題，既死板地把老聃看成道家學說的創始者，便無法處理老子以前的道家學說，很自然地產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誤解。像他所說：“《老子》之前，忽然有《管子》心術、白心諸篇那樣詳細的道家學說……若果然如此，哲學史便無學說先後演進的次序，竟變成了靈異記、神祕記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導言》）這是何等荒謬的話！可知研究任何學說思想，如果不聯系到事物發生、發展、變化的過程來看問題，便會把問題孤立起來，不可能探索出事物的真相，而因以得出正確的結論。胡適所以不能了解老子之前為什麼還會有《管子》心術、白心等篇的理論，吃虧便在這裏。

像胡適這般人，硬要斬釘截鐵地把道家學說的興起拉得很晚，說成只是老子一人的創造，當然是錯誤的。但是，像封建學者們有意識地把它推得很早，說成是創始於黃帝，拿黃帝和老子

聯在一起，稱為“黃老之學”，也是極其荒唐的。黃帝有無其人，已經是一大疑問。即使果有其人，那時候未必便已有了文字和這些理論。況且那時候是沒有階級的原始社會，不可能產生這一套統治天下的“南面術”。“南面術”的出現，必然是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奴隸社會以後，才開始有的。《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老子》以前，只著錄《伊尹》、《太公》（《老子》以下，雖尚有《黃帝四經》等書，均係僞託），不是沒有原因的。封建學者們為什麼一定要推本到世代遙遠的黃帝呢？《淮南子·脩務篇》說得很好：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間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

這差不多替周秦古書揭示了一個託古的通例。傳播道家理論的人，必託始於黃帝；和那講八卦的，必託始於伏羲；言本草的，必託始於神農；寫醫經的，必託始於黃帝；用意是一致的，沒有什麼奇怪。後人讀書，能掌握這一點，便不致爲古人所騙。

周秦諸子，每談到自己所提出的議論主張，必高遠其所從來，以求取得時君世主的重視。自然免不了在介紹他的理論時，過分地誇大它，把它說成至高無上、莫與比倫的神秘物，藉以提高它的作用和價值。例如《老子》第二十五章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這分明是誇大“道”的神秘，也就是誇大“南面術”的高妙。把它的來源，說成“先天地生”；把它的作用，說成“可以爲天下母”；把它形容爲與天、地、王並大。這樣的說時君世主，時君世主聽了這一類洸洋浩蕩的話，自然爲之動容，而想採用其說，來嘗試嘗試。結尾“道法自然”一語，更指出了“南面術”的基本原理，在取法自然界的清靜無爲。他們從自然界的外表上看，認爲山是不動的，水是平靜的，地面是安定的，空氣是無形色的，然而萬物生生不已，四時運行不息，出現了“無爲而物成”的景象。道家的理論，便要統治者效法大自然界的這一景象。成爲了“南面術”中強調人主無爲的主要內容。

但是胡適體味《老子》第二十五章的意思，却不是如此。他肯定“老子的最大功勞，在於超出天地萬物之外，別假設一個‘道’。這個道的性質，是無聲、無形；有單獨不變的存在，又周行天地萬物之中；生於天地萬物之先，又却是天地萬物的本源”（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第三篇）。這便把“道”看成爲另一物，看成爲沒有天地以前便已有了的東西。在胡適以前，許多封建學者，也是這樣理解；在胡適以後，不少哲學研究工作者，同樣不能超越這種看法。圍繞着這一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討論爭辯不休。雖再爭個幾百年，也無法得出“道”字的確解。近人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清，實以受胡適的影響爲最大，我們對胡說必須給以批判。

宋代學者朱熹，從事羣經傳注工作，投下了很大精力，因而也就看透了當時經學家們說經的通病。《朱子大全文集》卷三十五《答劉澄》指出：

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

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却無人留意。

卷五十一《答萬正淳》也說：

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略有縫罅，如可鉤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搏；則遂極筆摸寫，以附于經。而謂經之爲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

《朱子語類》卷十一又說：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這些言論，雖是朱熹針對着宋代說經家的通弊而提出的批評，但是用來衡量今天的學術界，也還有不少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學者們，也同樣患了這一類的毛病，以致闡割或歪曲了古人的原意，造成許多曲說謬解，是極其可惜的事。

由於研究周秦諸子的學者們，和研究經學一樣，不可能不倚靠前人的注說作爲理解古書的橋梁。前人的注說，有對的，有不對的；有借題發揮的，也有傳會穿鑿的。如果沒有鑑別判斷的能力，很容易形成先入爲主的見解，放在腦子裏，牢固而不可破，那便在思想上做了古人的俘虜，終身解不掉這種羈絆。特別是宋人疏釋周秦諸子的書，習慣于用他們心目中的所謂“道”，來概括和說明周秦諸子中的所謂“道”。甚至把《管子》中的《內業》，也看成和他們言心言性的理論相通，因而湮沒了《內業篇》闡明古代南面術的作用。推之理解其他諸子，莫不如此。把周秦

諸子中的所謂“道”，說成十分玄妙神秘的東西。由此陳陳相因，不知不覺地將周秦諸子所着重要闡明的主題擺在一邊，於是節外生枝，專在“道”字上翻來覆去地討論爭辯不休。近幾十年間的學者，雖較封建學者們前進了一步，填進了許多新名詞、新術語，但仍未能拔出這一窠臼。歸根到底，也還是受了或間接受了前人注說的影響，既入而不能出，把周秦諸子中的一個“道”字，孤立起來，推演出許多不着邊際的話，仍然是不能探索到問題的本質的。所以，在今天研究周秦諸子的哲學思想，由于古書難讀，開始不可不倚靠前人注說，但只能作為理解字義、校正謬文的參考。至於有關闡明理論的方面，便有必要認真仔細地涵泳白文，從許多同時代的作品中，排比鉤稽，找出“道”字在當時的原始意義，超出前人注說之外，來一次大的翻案。這對糾正過去學者們的曲說謬解，重新闡發周秦“道論”的作用，是會有好處的。

#### 四

大抵每一哲學領域內的名詞或術語，都有它每一時代的含義。即以一個“道”字而論，周秦人的所謂“道”，既不同於魏晉南北朝人的所謂“道”，更不同於宋明理學家們的所謂“道”。如果毫無區別地把它混同起來，拿後出的概念去理解遠古的書，雖推論到成千上萬的字，終不可能找到古人的真意。甚或“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越差越遠，以至傳會為另外一種石破天驚的說法，在學說思想史上，造成一個大疑團，引起長時期的糾紛和爭辯，後果是十分不好的。過去封建學者們，在這方面便犯過比較嚴重的錯誤。例如宋代理學家們讀《尚書》至僞《大禹謨》，看到其中有這樣幾句話：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恰巧和理學家們所要闡明的“存心”、“治心”的理論可以比傅，因而誤解爲堯授舜、舜授禹的“十六字心傳”。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既首發此義，他的弟子蔡沈，便在《書經集傳序》中，明目張膽地提出：

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

這真是牛頭不對馬嘴，說得多麼牽強而荒謬！但是影響至爲深遠，一直爲元明學者所緊緊抓住不肯放手，把這所謂“十六字心傳”，看成爲理學家們空談心性的傳家寶。我們今天且不計較《大禹謨》那篇文字是晚出僞品，是否有討論的價值（即使是魏晉人僞造的，但能降低時代來處理，也仍有參考價值）。即就涵泳白文，從上下文意來加推求，也不應該是那樣理解的。我們試看那十六字的前面，還有：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這和《老子》第二十二章所說：“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沒有什麼不同。都是告誡人君應以卑弱自處的理論，是南面術的核心內容。那十六字的下面，又繼以：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這和《淮南子·汜論篇》所云：“不驗之言，聖王弗聽。”

《主術篇》所云：“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道理也沒有兩樣。分明是古代人君控馭臣下的方法，是“南面術”的具體運用。那末，那十六字夾在中間，自然也是就“南面術”說的。“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指人君分任臣下各居一職，自己只總其成而已。《管子·法法篇》說：

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皋陶爲李，  
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以  
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  
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

這一段話，最足以說明人君分任臣下各居一職的道理。尹知章注云：“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這是極精諦的理解，可以拿來說明《大禹謨》中的“精”和“一”，用不着加上高深玄妙的解釋來神化它。至於“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本出《道經》，見《荀子·解蔽篇》所引。《解蔽篇》道：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  
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  
能知之。

我們再看《荀子·大略篇》所說：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  
萬物成。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工賈亦然。

將這兩段文字互證，可知《荀子·解蔽篇》所言，是描繪虞

舜“無爲而治”之效。又引《道經》“人心”、“道心”二語，來說明南面術的不易掌握。《道經》，是古代專講南面術的書籍，猶之專講南面術的理論稱爲《道論》一樣。楊倞作《荀子注》時，不解《道經》爲何物，便含糊地說爲“蓋有道之經也”，當然是錯誤的。儘管後來偽造《大禹謨》的人，把這兩句話搬進了偽古文《尚書》，並且將兩“之”字換爲“惟”字，然而意義仍爲闡明南面術而發，却是相同的。

有人問我：《荀子》書中所說“處一危之”、“養一之微”的道理，和晚出偽古文《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等語，都是指統治者的南面術說的，固然不錯，但是有所謂“人心”、“道心”，又怎樣講呢？我認爲這個疑問，也不難解答。人們只知道“心”是名詞，而沒有注意到有時它也可以用爲動詞。只知道發於形氣的叫做“人心”，發於義理的叫做“道心”；而沒有注意到《荀子》和偽古文《尚書》中的所謂“人心”、“道心”，當理解爲“用心於人”、“用心於道”。可先取《禮記》裏面曾經用過的“內心”、“外心”，作爲旁證，以考明“心”字在古書中的另一種用法。《禮記·禮器篇》說：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

鄭玄注云：“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鄭氏善於體會古人辭意，所以這種注解，最爲精諦。我們依據這一詞例，來詮釋“人心”、“道心”，那末可以肯定這兩個“心”字自爲動詞而不是名詞了。所謂“人心”，便是說“用心於人”，指表現在外面的一切法度儀文而言；所謂“道心”，便是說“用心於道”，指蘊藏在腦內的一切權術機宜而言。統治者的用心於人，惟有使一切法度儀文高不可攀，人皆望



而生畏，便不敢“犯上作亂”，所以說“人心惟危”。用心於道，惟有使一切權術機宜隱不可見，人皆莫測高深，便無從投機欺主，所以說“道心惟微”。這都是古代人君南面術的基本內容。

南面術之所以必強調“人心惟危”，這是古代道家根據“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管子·明法解》）的原理，考慮到被統治者的廣大羣衆所最害怕的是高大尊嚴，所以他們談到控制臣下，認為沒有比加強威勢還好。至於強調“道心惟微”，便是根據“凡道必周必密”（《管子·內業篇》）的原理，考慮到臣下所以不敢欺騙君主，首先決定於君主的意圖無從窺探，所以他們談到人君自處，認為沒有比深藏若虛還好。至於古代統治者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實際運用和有些什麼具體表現，我早年已博考周秦諸子以及史傳所載的理論和事實，寫入了《危微論》，加以分析和闡明了。

我國歷史上，自周秦以下的封建統治者，有不少的人在運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南面術很成功，表現在漢唐開國之初，特別明顯。例如劉邦是一個起徒步而為天子的人，沒有什麼文化程度，不懂得這些道理，經過蕭何、張良這輩人指點，他也就明白了。《漢書·高帝紀》有這樣一段記載：

七年二月，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這自然是蕭何一生的得意之作，也就是運用了“人心惟危”的原理使之具體化了（當然這僅是其中的一端），可知蕭何對於南面術是極其精通的。他對漢高帝的這一啓發，作用至為深遠。

其次，如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傑出的偉大政治家，一生得力於臣下的幫助和啓發也不少。不獨他最親信的魏徵很懂南面術，卽如孔穎達之流的書生，也都明白這些道理。《貞觀政要》卷六《論謙讓》第十九，記載了孔穎達的一段進諫之言：

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

孔穎達強調“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顯然是符合於“道心惟微”的原理的。不是對南面術深有研究的人，也不可能窺見及此。

儘管人君南面術，在古代是統治人民、欺騙羣衆的反動的東西，但它在周秦之際，經過許多學者的講求推演，倒成爲了一種弘博淵深的專門學問。它的理論，既在我國古代社會盛行過一個較長的時期，現在還成套的或片段的保存在故書雅記之中，我們便有必要把它弄清楚，使之條理化、系統化，以便進一步分析和批判它。使人們能了解到周秦古書中的所謂“道”，大半是就南面術說的，不是任何後起曲說所能傳會。在整理文化遺產的事業上，來一次清點廢物、物還原主的工作，不會是沒有意義的。這便是《周秦道論發微》的任務！

張舜徽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

# 道論通說

## 序

莊生有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篇》）《淮南王書》亦云：“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繆稱篇》）大抵古人藉語辭文字以傳久而行遠者，皆第能就其有迹者言之耳。輪扁譏齊桓公讀古書爲徒拾糟粕，豈不信然！顧故言悠邈，旨意淵深，後人循言以求其意，卽並其粗者亦不易知，往往傳會穿鑿，承譌襲謬，有歷數千年莫之或悟者，則甚矣古書之不易讀也。王充嘗謂：“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趣述故，滑習辭語，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論衡·正說篇》）烏呼！豈第五經然耶？漢儒集心力以說經，弊乃至此！王氏特取目擊者道之，其實學者疏解羣書，莫不有失實之歎，亘古今而盡然。鄭樵所謂“漢人窮經而經亡”（見《通志·校讎略》），此一語也，足以蔽注說家之失而靡遺，又不僅兩漢諸儒然矣。

然則生乎千載之後，欲明先民立言之真諦，果如之何而後

可？曰：研思陳言，詮釋大誼，務期考明時代，各還其所固有，不失其實而已。如讀先秦之書，而以今人之見折之；或論後世之事，而衡以三古之義；雖考論周洽，辨析精審，而揆諸作者之本意，無有合也。千載下儒生所爭論不休者莫如“道”，“道”之一字，在古書中隨處見之，而其含義，又各隨時代有淺深廣狹之不同。蓋有先秦諸子之所謂“道”，有孔門之所謂“道”，有兩漢儒生之所謂“道”，有魏晉南北朝談士之所謂“道”，有唐代韓、李之所謂“道”，有宋明理學家之所謂“道”，有清初顏、李之所謂“道”。學者生於後世，上窺先民立言之旨，期於不失其真，則必以先秦諸子之見還之先秦諸子，以孔門之見還之孔門，以兩漢人之見還之兩漢，下觀魏晉南北朝唐宋明清人之書莫不如此，虛心靜氣以求真是之歸，庶乎其有得也。及蔽者爲之，率操先人之見，以攻異己之論，分離乖隔，不合不公，而按之古初立言之意，去之彌遠。清儒斥元修《宋史》，不應別立《道學傳》，百喙詆譏，辭至嚴峻，然以今考之，清儒惟熟習兩漢人書，濡漬既久，乃不覺舉兩漢人之所謂“道”，以衡宋元人之所謂“道”，昌言儒林之外，不合別有道學，而於宋代之實有是物，實有是名，不顧也。此無他，蔽於知遠而不察近而已矣。若宋明人誤解“人心道心”，則又蔽於察近而不知遠，乃以宋明人之所謂“道”，上衡先秦之所謂“道”，析之愈精，離道愈遠，不啻毫釐千里，未見其有合也。

余嘗博考羣書，窮日夜之力以思之，恍然始悟先秦諸子之所謂“道”，皆所以闡明“主術”，而“危微精一”之義，實爲臨民馭下之方，初無涉乎心性。自宋明學者目爲傳心之要，而本意全失。於是浩然有志闡古義之幽，發千載之藪，舉後起一切傳會支離之說，悉摧陷而廓清之。因綜治故籍，鈎稽舊義，揭其弘綱，述其微旨，或集羣言，或徵往事，用以推明《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經》“人心道心”二語，與僞古文《尚書·大禹謨》所載

“危微精一”十六字，悉爲君人南面之術而發，要非其他曲說謬解所能亂也。分題立論，釐爲十章，名曰道論通說。凡所徵引，大抵依據周秦古書，而以後起之說足以發明舊誼者輔之，俾於先民立言之旨，有以探其根株焉。

張舜徽記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

## 第一 闡明“道”與“道經”之名義

魏劉邵《人物志》曰：“老子以虛爲道，以無爲德。”（《八觀篇》）此語也，蓋足以統釋先秦古書之所謂“道德”，初不限於《老子》而已。《管子·心術上篇》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亦以“道”“德”並舉。析言之，二字又有不同。《淮南·原道篇》曰：“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然則道者，無爲之謂也；德者，不言之謂也。故《管子·心術上篇》曰：“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老子》亦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皆兼統二者而言，其旨至明白。統言之，道既可通于德，德復可通于道。《管子·戒篇》曰：“所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可知“德”者，亦“道”之殊稱，對言有分，統言無別也。“道德”之旨，歸於無爲；無爲之用，繫於人主。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漢志》所謂“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一言盡之矣。自漢以上學者，悉知“道德”二字爲主術，爲君道，是以凡習帝王之術者，則謂之修道德（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或謂之習道論（見《太史公自序》）。推之古初所謂道家，亦實專指修南面術者而言，以其興起甚早，旨意至深邃而難知，故自漢以降，解此者稀（太史公

《論六家要指》云：道家“其實易行，其辭難知”。甚且以後世之所謂“道”，上衡先秦之所謂“道”，乃不覺相背而分馳矣。

《史記》稱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所謂言道德之意者，猶云述人君南面之術耳。後人遽目其書曰《道德經》，實即此意（以《道德經》標題，不知昉於何人。其見於今存注本者，以王弼注爲最早）。離上下篇而分標以《道經》、《德經》之名，亦必自有所本。論者徒以《經典釋文》所釋《老子》，上卷題《道經音義》，下卷題《德經音義》，而疑此種標題爲傳刻者所增入，非古人之舊。不悟顏師古《漢書·魏豹傳注》，已引老子《道經》；《田橫傳注》，《楚元王傳注》，《西域傳注》，均引老子《德經》（又《嚴助傳》、《酷吏傳注》，俱稱老子《道經》之言）；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引老子《道經》。可知《道經》、《德經》之名，初唐人已習用之，本不始於陸氏《經典釋文》，蓋爲先唐舊題，而非諸儒所妄增也。竊嘗以爲古者治與教出於一，而君與師同其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蓋三代之學無他焉，學爲君師而已矣。人既以此爲學，則必有專舉此爲教者。其術至幽眇而難知，名之曰“道”，或曰“道術”；用以教人，則曰“道論”；著之竹帛，則曰“道經”。自老子以前，其爲道經者必衆矣，而多不傳；傳者又或不以“道德”立名，而別爲標目。如《管子》中有心術、內業、白心諸篇，實歸於闡明君道，後人徒以其篇題不同於“道德”，遂歧而二之，於是羣書中之言君道者，悉晦盲而不明矣。自魏晉以迄乎唐，或以曠逸爲道，或以寂滅爲道，或以飛昇黃白之事爲道，或以清虛玄遠之談爲道，盡天下學者之心，靡有二致。相與挾一隅之私見，以上論先秦古書，不啻植荆棘於坦途，雖至平易之理，亦必釋以高奇之辭，於是諸子中之稱道經者，多否塞而不通矣。故《荀子·解蔽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楊倞，唐人，不識道經爲何物，乃

妄以意斷曰：“蓋有道之經也。”後之解《荀子》者，悉本楊說，愈穿鑿以失其真，清儒注釋羣書，長於考訓詁而短於說義理，其不能憬悟斯旨，適然耳。抑危微二語，雖亦見僞古文《尚書·大禹謨》，然僞《孔傳》出於魏晉人之手，不能識道心之道爲何物，祇得支離其辭以傳會之。迨宋世理學諸儒興，則又以言心言性專道之全，而直謂“即心是道”。朱熹爲《中庸章句序》，首明“危微精一”十六字爲堯、舜、禹三聖傳心之要，其弟子蔡沈爲《書傳》，依附引申，而古意全晦。

## 第二 闡明“一”即“道”之別名

無爲之謂“道”，“道”之名又通於“德”，已如前述矣。然博綜之周秦諸子，則又謂之“一”。道也，德也，一也，三名而實一物耳。《管子·兵法篇》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皇”與“帝”“王”既無殊，則“一”與“道”“德”亦不異矣。《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三十九章）《莊子》則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至樂篇》）可知“一”即“無爲”，“無爲”即“道”。故《管子》之言“執一”；

《心術下篇》：“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

《老子》之言“抱一”；

第二十二章：“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莊子》之言“通一”；

《天地篇》引記：“通於一而萬事畢。”

《韓非》之言“用一”；

《揚權篇》：“用一之道，以名爲首。”

《呂覽》之言“得一”；

《論人篇》：“知人之謂得一。”

皆指君道而言，猶云執道、抱道、通道、用道、得道也。“道”之所以別名曰“一”者，《韓非·揚權篇》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溼，君不同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韓非此解，蓋爲周秦時盡人而知之常識，故諸子立言，率好以“一”代“道”之名，無嫌也。以其爲人所周知，故不煩別加注說。降及漢世，猶多解此。《淮南王書》，道德之淵藪也，《原道篇》曰：“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高誘注云：“一者道之本。”）又曰：“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詮言篇》曰：“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此皆淺明易見，雖注家不言，而讀者自知之。若夫一章之中，連用數“一”字，而易致混亂者，注家必爲別白之。《精神篇》曰：“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高誘注云：“上一，道也；下一，物也。”是其例矣。夫惟漢人去古未遠，故著書能識乎道德之原。亦惟漢人解漢人之書，



爲能得其真諦，故知“上一”謂“道”。假使《淮南子注》而出六朝唐人之手，則必不識“一”爲何物，雖或識之，又不必能辨古人行文時上一與下一之各有所指也。《荀子·解蔽篇》所稱“處一危之，養一之微”。此二“一”字，實指君道而言，與周秦諸子及《淮南王書》中所用之“一”，意無不同。楊倞惟不解此誼，妄以心字釋“一”，而古意全湮。蓋探下文有人心道心之語以立訓，而不顧文義之安，是猶操方枘而入圓鑿矣。抑《荀子》所云“處一”“養一”之“一”，與僞古文《尚書》所云“惟精惟一”之“一”，義各有在，不容混爲一談，又學者所當明辨也。

### 第三 闡明周秦學者言主術同宗“道德”

吾嘗博觀周秦諸子，而深疑百家言主術，同歸於執本秉要，清虛自守，莫不原於道德之意，萬變而未離其宗。此黃老之術，所以獨爲高遠也歟！及讀《淮南王書》至《齊俗篇》有曰：“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驚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汜論篇》又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弦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則恍悟二千年前學者，實已先得我心，爲之快慰累日。以《淮南》所云，徵之《老子》五千言，固無論矣。他若《管子》之《心術》、《白心》、《內業》；《韓非》之《主道》、《大體》、《揚權》；《莊子》之《天道》；《呂覽》之《圜道》、《君守》諸篇；尤其彰明較著，悉道論之精英也。其他片言數語之散見羣籍者，更何可勝數。自漢武罷黜百家，儒者始專宗仲尼，然仲尼精力所瘁，在於贊《易》刪《書》，《漢書·藝文志》稱“道家君人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則《易》、《書》所載，原有合於卑弱自持之旨

也。且仲尼贊《易》，惟以乾坤易簡爲言；虞廷賡歌，但取元首叢脞垂戒；則又與清虛自守之旨，無勿同者。仲尼之論政也，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注：“德者無爲也。”）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歎堯之民無能名，唯能則天；稱仲弓居敬行簡，可使南面。由此論之，則孔子之言主術，亦無以遠於“道德”也。下逮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引申斯旨，意更明白（若《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之類）。荀卿生於周末，最爲儒門老師，其言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引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者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王霸篇》）荀卿廣陳人主任人而不任智之旨，以闡揚無爲之意，謂爲百王之所同，儒者之所謹守，則道德之論，由來遠矣。惟荀子薄墨子之說爲役夫之道，然今詳觀墨子之書，亦未見其不以任人爲亟。《墨子·所染篇》曰：“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以不知

要故也。”（此文雖亦見《呂氏春秋》，自是並載兩書，而非後人取《呂覽》之文人諸《墨子》內也）然則墨子論及人君南面之術，自亦原於道德之意。以荀卿所斥爲役夫之道者，持論猶如此，則其他立言之家，概可知矣。《淮南》所謂“道德之論，譬猶日月”者，蓋足以蔽先秦之書而無遺。

#### 第四 闡明西漢諸儒皆深識“道德”之要

西漢之世，儒者亦多識“道德”，後人徒驚《淮南王書》集道論之精，而不知鴻生巨儒，著書立論，以發明斯理者，正復不少也。取其顯者論之：若董仲舒所作《春秋繁露》數十篇，雖以說經爲主，然其究天人之際，窮事物之理，元元本本，無不洞徹。觀於《離合根》、《立元神》、《保位權》三篇所言致治之本，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直與道論相協，達乎政理之原，非淺見寡聞者所能窺，劉向謂董生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非過論也。其次若司馬談世爲太史，又嘗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則其學本亦不醇於儒，故推論陰陽、儒、墨、名、法五家，各有短長，而反覆申歎道家之術，采諸家所長，而無其短，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所謂“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者，乃就君道、主術而言，初非涉乎日用庸常事也。其病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以六藝經傳之言主術，所營多端，而乏執本秉要之方；所操彌黷，而無任人役智之術；不足以主持綱維耳。故其言有曰：“儒者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紬聰明，釋此而任術。”其立論之主旨，可見於斯數語矣。後人不察，不知司馬氏《論六家要指》爲最高之政論，而徒目爲辨章學術之文，已誤；不知其推崇道家，乃就主術一端而言，反病其先黃老而後六經，尤誤之誤者也。烏呼！自班固以

來，此義不白于世，蓋二千年於茲矣（《後漢書·班彪傳》，稱彪斟酌前史而議正其得失，其略論有曰：“遷之所記，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可知自班彪以來，已但視《論六家要指》為論學之文，而不知其為政論也，固特承其父說而已）。揚雄生於西京之末，嘗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法言·吾子篇》）又稱“五經為衆說郛”（《問神篇》）。其表章儒學至矣。然論及大道，則又曰：“吾於天，見無為之為矣；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問道篇》）以揚雄篤信謹守仲尼之教，如彼其專也，而持論如此，夫亦曰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不可移易而已耳。惟西京諸儒，去古未遠，故猶能識道德之弘旨，體黃老之妙用，與先秦諸子之言，若合符契。其後釋氏之教，傳入中土，學者乃竊清靜無為之旨比附之，而道德之論絕於後世。東漢諸儒雖讀學論政，亦多識道之言（如王充《論衡·自然篇》、荀悅《申鑒·政體篇》，皆于無為之旨，有所闡發），然仰視周秦西漢先儒之書，不逮遠矣。故在今日考論“道德”之旨，必廣探之漢以前書，方能有得也。

## 第五 闡明荀子及偽尚書“危微”之語皆為主術而發

凡讀一書，首必明乎作者之本旨，而的然知其所言為何事，則雖有難解之句，難釋之文，按之上下文意以旁推曲證之，十可得其八九，初不待注說而後能明。即注說家之疏解古書，舍此亦別無從入之徑，此學者所當知也。吾人今日讀《荀子·解蔽篇》，至其篇中一章有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吾

人試擯置一切注說，且平心靜氣，但求之本文，且證以《大略篇》所云：“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工賈亦然。”而譙然知危微之言，實指君道無疑也。雖危微之言亦見僞古文《尚書》，然今觀《大禹謨》篇中帝舜命禹之辭，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之外，所言甚多，其上文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是帝舜嘉禹有大功，許其終當居君位也。十六字之下，復續之以數語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是又明明教以爲君之道，意甚分曉。則彼十六字居其間，非指君道而何？《大禹謨》雖係晚出僞書，然其初亦非全無根據者。方苞嘗疑今所行《古文尚書》明暢易曉，必秦漢間儒者得古文原本，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見《望溪文集》卷一《讀古文尚書》）。方氏此識甚卓，足以解經生爭辨之紛。即令晚出《古文尚書》爲魏晉人所造，而此“危微精一”四語，亦必前有所承，而深符於道德之意，非漢以後人所能臆造也。

## 第六 闡明兩書所稱“人心道心”猶《禮記》中之“外心內心”

難者曰：“荀卿書中所云處一危之，養一之微，與夫晚出《尚書》危微精一之語，悉爲君道而發，信如吾子所論定矣。敢問人心道心，究何所指乎？”應之曰：“世人但知心爲靜字，而不知其亦爲動字。但知發於形氣者謂之人心，發於義理者謂之道心；而不知《荀子》及晚出《尚書》之所謂人心道心，猶《戴

記》中之外心內心也。《小戴禮記·禮器篇》曰：“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鄭玄注云：“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也。”鄭氏惟善體古人辭言之情，故此釋最爲精諦。今援斯例以說人心道心，則二心字自爲動字而非靜字明矣。所謂人心者，言用心於人也，亦卽其德在表之意。所謂道心者，言用心於道也，亦卽其德在內之意。皆第就馭下臨民而言，實道論之精蘊，主術之弘綱。故先民論治，反覆丁寧以言之，旨意至深遠，豈如後世言心言性者，任情穿鑿，所能夢見其涯際哉！《荀子》引《道經》作“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之”猶“是”耳（之與是古通用）。晚出《尚書》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與“是”俱語辭，分言之曰惟曰是，合言之則曰唯是（惟與唯古通用）。唯是二字連用，《左傳》中凡數見，並語助辭，故人心道心之語，兩書中雖有一字之殊，而其義固無不同。

## 第七 闡明“危微精一”之本義

危者，高也，尊也，威也，勢也。古者人君執萬物之原，居百官之上，無勢則威不立，無威則令不行，不極其尊高，則下不知敬上。《韓非子·喻老篇》曰：“勢重者，人君之淵也”，一言得之矣。上以威勢尊嚴臨下，高不可極，深不可測，則百官莫不竦懼敬服，左右前後，無敢疑貳，君尊而臣亦榮。故曰：處一危之，其榮滿側也。微者，隱也，蔽也，周也，密也。人君所以爲治之道，則又不可不密，不密則無成功。所謂密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也。人君掩情匿端，則羣下無所施其詐，而但黽勉以伏事之。君實尊矣，而不自知也。故曰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也。蓋馭下之道，勢欲其見，而術欲其隱。《尹文子》曰：“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

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大道上》）二者並舉，其來舊矣。惟其勢之欲見也，故虛者實之，卑者危之，存乎一身之妙用；此用心於人之事也。惟其術之欲隱也，故藏之惟恐不周，操之惟恐不固，繫乎此心之有守；此用心於道之事也。道論之要，不越於斯二端矣（楊倞不解危之之誼，妄謂二字當爲之危二字之倒，謬甚）。

吾讀《管子》，而得精一之真諦焉。其言曰：“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皋陶爲李，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法法篇》）釋之者曰：“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然則精一之本義，其在授官論材之間乎！證之《荀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又曰：“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俱見《君道篇》）《韓非子》曰：“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揚權篇》）又曰：“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難一》）又曰：“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主道篇》）《淮南王書》亦曰：“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斷，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主術篇》）可知因材命職，各司一事，以臻無爲之治，乃百王之所同，故諸子言治道者悉宗之（其散見他書者，不易悉數）。羣下既各分任其事，爲人主者，則但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王書》又曰：“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主術篇》）故仲尼既歎舜之無爲；又稱其好問而察邇言，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夫惟舜能無爲而治，故其言

莫從己出，而但察羣下之議，擇其可施於民者用之耳。鄭玄說之曰：“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鄭氏此釋，必有所受。證以《管子》所云：“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法法篇》）蓋操之於己，則曰執中；施之於事，則曰用中；布之於民，則曰立中，其實一耳。由此觀之，惟精惟一，謂用人也；允執厥中，謂聽言也。二語相承，意甚明白。其下復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數語，益昭昭可見矣。

## 第八 闡明“人心惟危”原理在南面術中之實際運用

馭下之道，所以必須臨之以尊高之勢者，《管子》曰：“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威勢獨在於上，而不與臣共。”（《明法解》）《荀子》曰：“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正名篇》）《韓非子》曰：“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鎗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鎗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功名篇》）又曰：“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難一》）《呂氏春秋》亦曰：“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慎勢



篇》)先秦之書，持論不異，要皆原於道德之意。下逮西京諸儒，纂輯《淮南王書》，闡發尤詳，《主術》一篇，其綱要也（所論至繁，今不稱舉）。惟主政者之用心於人，必欲其懾於威，伏於勢也，故宮室器用，務極其高大文飾。

《禮記·禮器篇》：“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此以多爲貴也。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棗禁；此以下爲貴也。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鼎俎，此以素爲

貴也。”按記文所稱貴多、貴大、貴高、貴文之事，不外宮室、宗廟、衣冠、器用，凡以壯其觀瞻，養其威重而已。故下文申其義曰：“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物理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此禮家發凡之辭，雖就貴多一端言，而貴大、貴高、貴文諸端，從可知矣。鄭玄注曰：“發猶見也，樂多其外見也。”《正義》曰：“王者居四海之上，宜爲四海所畏服，故禮須自多厚顯德於外，於外亦以接物也。”漢注唐疏，發明斯義，至爲精諦，學者自可隅反。

鄭樵《禮經奧旨·禮文損益辨》有云：“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中略）。所謂盛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於文，方以臺門納陛爲貴，吾故以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羽籥爲儀，吾故以蕢桴土鼓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罍樽著樽，而加以犧象；因其雞彝鸞彝，而加以黃目；因其四璫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鉤車大輅，而加以玉輅；於以示天子之尊，於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按鄭氏此言，足以發明禮文損益之故，與注疏舊說相表裏。

聲色藩衛，務極其華美衆多。

《荀子·富國篇》：“先王聖人，知夫爲人主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銅琢刻鏤，黼黻文章，

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於是也，故其實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於是也，故其罰威。”按荀卿此論，實爲闢墨而發（篇中闢墨之辭極詳，以文繁，故不引）。墨子之論爲上也，必衣麤食惡，與百姓均事業，共勞苦而後可。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故荀卿亟辨之。

明貴賤之等以厚其勢。

《管子·乘馬篇》：“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

《莊子·天道篇》：“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荀子·王制篇》：“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贍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嚴朝覲之儀以重其威。

《史記·叔孫通傳》：漢五年，已並天下，諸侯共尊

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然。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節引原文）按高帝起細微，不修文學，初卽位時，二三大臣，皆有布衣昆弟之心，相與輕蔑之。迨朝儀既定，乃上下有禮，無敢踰尺寸，“人心惟危”之理，可驗於此矣。

深居而簡出。

《管子·形勢解》：“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第七十八：“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爲神也。”

高令而峻法。

《管子·霸言篇》：“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

法不外乎賞罰，賞罰信則威立。

《管子·重令篇》：“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

《韓非子·二柄篇》：“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呂氏春秋·壹行篇》：“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

按此諸家，皆言治民之本，在乎明法，法明而後主威可立。諸葛治蜀，賞罰必信，史稱其循名責實，虛僞不齒。論者悉許其有法家精神。蓋諸葛亦深有悟於不峻其法不足以爲治耳。其後若唐之魏徵，宋之王安石，明之張居正，皆用是道。

徒恃法而不能得民，則威亦廢矣。得民之道，寬恕純厚，夫亦曰

法天而已矣。

《管子·形勢解》：“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天之載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載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載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

其接臣下也，則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徐幹《中論·法象篇》：“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按徐氏此言，深通乎爲政臨民之本。故仲尼論從政，宜尊五美；而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謂爲威而不猛（見《論語·堯曰篇》）。又言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乃舉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當修身之目（見《中庸》）。則夫衣冠動靜之微，實有繫乎爲政臨民之大。《管子》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形勢解》）此言足以盡之。否則無儀可象，處其下者相率慢易而不懾服。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輕之若此，而欲令行威立，豈可得耶？

肅其容貌，簡其言辭。

按古人言上之接下，既已正衣冠，尊瞻視，而容貌莊肅矣。其問答之辭，又貴能簡要也。唐人猶多知是理，劉洎嘗論之曰：“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諫詰難臣寮上言書》）李德裕亦曰：“夫帝王與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聘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王言論》）若此諸論，皆所以發明人君不貴多言之理，意至明切。亦古者主術之一端也。

御之以氣，結之以恩。

李德裕《英傑論》曰：“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爲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音帳），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畜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葷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

以繁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鬥之氣，擊刺之材，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畜之，豈有斯恨？”按李氏蓋心傷祿山爲禍之烈，由於人主馭之不得其道，故援據史實，以成斯論。

如此，則不怒而威，不言而喻，君權立矣。非第人君然也，卽在大臣，亦必以養其威重爲先。故齊桓公解管仲之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見《韓非子·難一》）墨子論治天下莫急於尚賢，而謂必爲置三本。其言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尚賢中》）觀於墨子所言，與夫管仲所請，理無二致，要在爲大臣養其威重而已。必威重先立，而後能有所施爲，斯乃治道之微權，又百王之所同。推原其本，則皆自“人心惟危”之理論引申而出者也。



## 第九 闡明“道心惟微”原理在南面術中之實際運用

馭下者之用心於人，固不厭其顯；其用心於道也，則不厭其隱。《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非此之謂乎！董仲舒曰：“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爲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春秋繁露·離合根》第十八）董生此言，得其本矣。惟人主法天之行，故君用天道，臣用人道。

《莊子·在宥篇》：“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

君無爲而臣有爲。

《莊子·天道篇》：“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

下功。”

《韓非子·揚權篇》：“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

《韓非子·八經篇》：“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任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

《尹文子·大道上》：“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于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士，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

《呂氏春秋·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

《淮南子·原道篇》：“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君靜而臣動。

《莊子·天道篇》：“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靜則無爲，無爲

也，則任事者責矣。”

《呂氏春秋·君守篇》：“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

君要而臣詳。

《莊子·天道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荀子·王霸篇》：“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韓非子·揚權篇》：“毋失其要，乃爲聖人。”

《呂氏春秋·勿躬篇》：“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

《呂氏春秋·察賢篇》：“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裳。’以言少事也。”

君之與臣也，譬諸自然，如天之與地。

《管子·任法篇》：“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

比於形狀，如圓之與方。

《管子·君臣下》：“心道進退，而刑道滔趕。進退者主制，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按刑即形字之譌。此處心以喻君，而形以喻臣也。）

《呂氏春秋·圓道篇》：“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

擬之於身，如心之於體。

《管子·君臣下》：“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

《管子·心術上》：“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

《管子·九守篇》：“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

《淮南子·繆稱篇》：“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

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喻之於物，如轂之於輻。

《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文子·上德篇》：“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

《淮南子·主術篇》：“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並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轂。”高誘注：“轂以喻王。”

《淮南子·齊俗篇》：“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

按舊義皆以轂輻喻君臣。故《老子》三十九章：“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河上本》作穀。注云：“不穀，不爲輻所湊也。”亦用古訓。

方之於天，如北辰之於列宿。

《論語·爲政篇》：“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鄭玄注：“德，無爲。”

象之於位，如中央之於四方。

《韓非子·揚權篇》：“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

是以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也。

《淮南子·主術篇》：“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

人主法天地之無不覆載，故百姓歸之。

《韓非子·大體篇》：“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

如鬼神之不可測度，故羣下畏之。

《韓非子·揚權篇》：“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中略）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

《韓非子·八經篇》：“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

《大戴禮記·少間篇》：“孔子曰：‘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

不可測度者，周之謂也。

《管子·樞言篇》：“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

《管子·內業篇》：“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

必堅，必固。”

《管子·九守篇》：“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韓非子·八經篇》：“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

所謂周者，掩其聰明，偃其智故。

《管子·九守篇》：“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開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

《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聞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

《韓非子·解老篇》：“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

《韓非子·定法篇》：“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

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

不先言。

《管子·九守篇》：“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韓非子·揚權篇》：“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悞悞乎！”

《韓非子·解老篇》：“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

《呂氏春秋·審應篇》：“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

不先動。

《老子》第七章：“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老子》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好惡藏於內。

《管子·霸言篇》：“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

《韓非子·二柄篇》：“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韓非子·主道篇》：“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因循應於外。

《管子·心術上》：“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

《呂氏春秋·知度篇》：“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貴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

督名審實，官復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

《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指》：“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

獨明獨斷，而不與臣共。

《管子·霸言篇》：“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

是以羣下竦懼，咸效其忠，夫是之謂君道。

《淮南子·要略篇》：“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達而輻湊，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道者，虛物也。得其人則存，不得其人則廢。故管子曰：“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君臣上》）又曰：“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心術上》）莊生亦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

見。”（《大宗師》）蓋其精微之所至，初未可以口舌傳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 第十 闡明莊子所稱“內聖外王” 亦即危微之旨

世之僞託理學以相標榜者，恒曰：“內聖外王。”試執其人叩以斯言之本義，茫然不知所答。又或依附後世之說，而強爲之辭，去古人原意，蓋不知幾千萬里也。考此四字，始見於《莊子·天下篇》。莊周之學，與孔、孟異趣，則其所謂“聖”若“王”，自非儒門之所謂“聖”所謂“王”也。周嘗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史記》列傳語）。《天下篇》綜論治方術者多家，而獨不及仲尼，蓋久已土苴視之，其言之不能強同也，固宜。後人不解斯理，必說“內聖”爲聖賢之聖，“外王”爲霸王之王，豈不過甚矣哉！《天下篇》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此問答之辭也。問者以神明分設，答辭以聖王並舉，然則聖王之與神明，同義而殊稱耳（聖與神雙聲，王與明疊韻。古聲韻本同，故通用無嫌）。董生有言：“人主法天之行，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春秋繁露·離合根》第十八）可知神明者，固君人南面之術也。蓋聖者，通也；道也。王者，大也；明也。君人者，掩其聰明，深藏而不可測，此之謂“內聖”。《管子》曰：“藏於匱中，謂之聖人。”（《內業篇》）《淮南》亦曰：“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詮言篇》）皆是意耳。顯其度數，尊高而不可踰，此之謂“外王”。《呂覽》曰：“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慎勢篇》）又曰：“强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强大。”（《壹大篇》）皆是意耳。善夫韓

非之言曰：“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韓非子·難三》）古者君道之經，不越於斯數語矣。蓋就其本體言，則曰法，曰術；就其布施言，曰顯，曰藏；（《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或曰神，曰明；就其德象言，曰聖，曰王。就其運用之妙言，則曰危，曰微。實一物而殊名，因所施而立號耳。烏呼！自老子始言“絕聖”，實爲君道而發，後世莫究根原，相與詆斥不休，而不知莊生言“內聖”，亦引申老子之意，以明道術之本。反強傳會儒家之義以推衍之，寧有當乎！抑老子又言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斯又莊生“外王”之旨所從出，所謂“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不可移易”者也。自周衰百家競興，異論紛起，雖皆務爲治，悉有得於道德之意。然但各得一體，不該不偏，於是“內聖外王”之道，闡然莫明。此莊生所爲深慨後世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也。莊生能知之矣，而後人不能心知其意，轉從而曲說謬解，以失古意之真，故今爲詳辨之。

## 道論足徵記

余既博稽周秦諸子，爲《危微論》以明古者君道之要。意欲取周秦人之見，還之周秦。俾世之治故書雅記者，無復以後人之所謂“道”，上衡周秦人之所謂“道”。周秦人之所謂“道”，無慮皆爲君道而發。非特道德之論，悉所以闡明“無爲”之旨，卽所揭橥“人心道心”、“內聖外王”諸語，亦無非古者君人南面之術耳。苟能平心靜氣，以直求之古人辭言之情，而不雜以後起傳會之義，則二千餘年前先民立說之真諦，庶在此而不在彼也。復思經傳子史，下逮唐以前儒先之論，足以發明斯旨而未錄入《危微論》者猶多。因以暇日稍加綜治，擇取其尤爲切要者，表而出之。亦竊附己意，爲商定焉。分條甄述，不殊札記之體，顏曰《道論足徵記》。聊以綴緝遺義，補《危微論》之所未備云。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張舜徽記。

《說文·口部》：“君，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古文，象君坐形。”按君之爲言威也。《艸部》荝下云：“讀若威。”是君、威古聲通。君之得訓爲尊，蓋受義於威。因之一切有威而能發號之人，古代皆以君稱之。故子稱父母曰君；婦稱舅姑曰君；妾稱其夫爲男君；稱夫之嫡妻爲女君；子稱父之嫡妻曰君母；妻稱其夫曰君子；皆是義也。考古者君有威義，實起於土地

佔有之制。《儀禮·喪服傳》已云：“君謂有地者也。”而鄭玄注《喪服傳》“爲君斬衰”，亦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可知古人已不啻明言“君”之得義，乃專指佔有土地者言也。古代佔有土地者，即有財產支配權；有財產支配權，即有統治權。故“君”字之引申義，遂爲一切統治者之稱矣。《易》稱：“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主家政者之得謂爲君，猶主國政者之稱君耳。古者國君臨政，主於任人而不任智，無爲而無不爲。故若有所不見，有所不聞。推之古之言治家者，亦通於斯理。《慎子》嘗引諺云：“不瞽不聾，不能爲公。”（見《太平御覽》引）《釋名·釋首飾》引里語曰：“不瘖不聾，不成姑公。”（見瑱字條）皆此意也。

《史記·孟荀列傳》稱：“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故著十二論。”《漢書·藝文志》法家，著錄《慎子》四十二篇。而其書代有散佚，至王應麟作《漢志考證》，已云：“今三十七篇亡，惟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則其書殘缺已甚，自宋以來然矣。今以所存諸篇觀之，文辭短簡，似由後人綴輯而成，非《慎子》之舊。然其行文樸厚，固非漢以後人所能爲，無疑也。觀其論及君人南面之術，有曰：“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爲善以先君矣。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則不瞻矣。若使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瞻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瞻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則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民雜篇》）此與

《管子》所云：“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君臣上》）《韓非》所云：“道不同於萬物，君不同於羣臣。”（《揚權》）《淮南》所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主術》）若合符契。而剖析入理，視諸家尤爲詳盡。學者苟能執復其言，則於道家無爲之旨，必有悟入矣。

《尚書》載虞廷之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僞《孔傳》云：“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按此言人君但當主持大綱，而不必躬親庶務，何等明切！乃無爲之宏旨也。非特元首宜爾，卽爲大官者，亦必如此。《中庸》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鄭君注云：“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可任使，不親小事也。”鄭注發明舊義，至爲精諦。蓋任大官者，屬僚甚衆，自當以君道臨之耳。《論語》稱“爲政以德”。鄭君解之云：“德者，無爲也。”足與斯義相發明。

《詩·大雅·皇矣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末二語，尤爲君道之綱。不識不知，謂聰明內藏；順帝之則，謂法天之無爲耳。至於不大聲色，則《中庸》已申其旨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中庸》又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皆與《老子》所云“道法自然”，無勿同者。《莊子·天地篇》曰：“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亦卽斯旨。

道家言主術，歸於清靜無爲。其大用有二：一則存於人君，虛心弱志，不爲物先倡，是也。一則施之天下，簡政省事，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也。《老子》於二者，皆有所發明。所謂“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絕聖棄智”，皆就簡政省事而言耳。《詩·檜風·匪風篇》：“誰能亨魚，溉之釜鬻。”《毛傳》云：“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孔疏云：“亨魚

治民，俱不欲煩。知享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毛、孔二家之言，用以箋注《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一語，殆無漏義。孰謂儒書不通於道乎？《韓非·解老篇》云：“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韓非》此解，雖甚精核，似猶不逮《毛傳》之簡要也。《淮南·齊俗篇》曰：“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實自《老子》之義推演而出。

《呂氏春秋·任數篇》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呂覽》此言，乃明古之君人者，必有所不見，有所不聞。己之聰明不足恃，而必任人之才以爲己用。徵之古初人君之所服，而知斯意固有寓諸器用者矣。《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黹纁塞耳，所以揜聰也。”《淮南·主術篇》亦有此語，則其說由來舊矣。《文選·東京賦》：“夫君人者，黹纁塞耳。”薛注云：“黹纁，言以黃綿大如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按古者人君必蔽明塞聰，乃原於清虛自守之意。《白虎通義》必謂“垂旒者，示不視邪；纁塞耳，示不聽讒”；則所見甚隘，非所以推明先民因物寓教之意也。

天圓地方之義，始發於《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觀曾參答單居離之問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盧辯注云：“道曰方圓耳，非形也。”盧氏此注，最爲精諦。後之治天文歷法者，率好取近世地圓之說以傳會之，失其本旨矣。《管子》曰：“君臣者，天地之位也。”（《任法篇》）又曰：“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



矣。”（《君臣下》）是以古之言南面術者，稱及君道，直曰天道；或曰圓道。故《莊子》之《天道篇》，《呂覽》之《圜道篇》，與《荀子》之《君道篇》，《韓非》之《主道篇》，所言皆同，乃一物而異名耳。《呂氏春秋·圜道篇》嘗發其旨曰：“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觀此所論，可知天道圓，地道方，古人實以喻君臣之異理，非他說所得傳會，固明甚。

先秦諸子之學，皆前有所承。故《莊子·天下篇》敘述諸子源流，每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某某聞其風而說之。則百家之說，悉非所自創，亦明矣。道論之興，其於夏殷之世乎！蓋必君臣之分既立，而斯論始有所傳。其不起於夏以前，無疑也（中國歷史，至夏代始進入階級社會）。顧夏殷之世，雖道論已萌芽，初但口耳相傳，至周末諸子，各述所聞，始著之竹帛耳。其說既大行於漢初，爲道者必高遠其所從來，乃上託之黃帝，因名之曰黃帝老子之學。於是黃老二字連稱，亦常見於《太史公書》。抑太史公嘗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則史遷非不知後世託古之未足據也。特以黃老之名，時俗流行已久，因沿用不改耳。觀其論及六家要旨，但稱道家立俗施事，無所不宜，而不言出自黃帝，可以窺其意趣矣。

百家言主術，同歸於執本秉要，清虛自守。《管》、《晏》、《申》、《商》、《老》、《莊》、《荀》、《韓》諸書，及《呂覽》、《淮南》所陳，固無論矣。卽孔、墨之說，亦無以異於是也。《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可知仲尼論及人君南面之術，實亦源於道德之意。《墨子·所染篇》，既發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之旨矣。而《親土篇》有曰：

“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又曰：“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此二段議論，皆言人君宜以卑弱自處，意至明白。必如此而後能親士，故於《親士篇》發之。汪中《墨子序》乃謂此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類，欲出而附之篇末，豈不悖哉！

《史記》稱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所謂帝王之術，即道德之論也（漢人省稱道論）。《淮南子·齊俗篇》曰：“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大抵古之有志用世，欲游說以干時君者，胥必明於斯道。荀卿生於周末，最為老師。於道德之論，素所講求。今觀君道、王霸諸篇所言，至明切矣。李斯從之學是術，既有成；然後西入秦以躋通顯。觀其對二世問，有曰：“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又曰：“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均見《史記·李斯列傳》）斯之此論，雖大張申、韓之術，實亦原於道德之意。太史公取老、莊、申、韓同列一傳，其旨深矣。

余既考定“人心惟危”乃人君御下之術，非特高令峻法，使人畏憚而已。即宮室之營造，制度之等差，亦莫不寓有立威厚勢之意焉。漢初道德之論盛行，故言治者多明斯旨。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帝見其壯麗，甚怒。

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見《漢書·高帝紀》）。使蕭何而不精於帝王之術，其能爲此言乎？賈誼上疏文帝陳政事，有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見《漢書·賈誼傳》）賈生此論，亦通於道論之要矣。自古帝王必侈營宮室，多立等差，皆所以爲南面養威地耳。蓋其用心於人，務欲使之懾於威，伏於勢，以便於一己之控馭。惟危之效，亦以斯爲大焉。

《漢書·鼂錯傳》，載錯上書言皇太子宜知術數一文，於古治道之要，敷陳至精。觀所云“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皆非洞明道德之意，不足以語此。獨忠孝事上一節，則第就爲太子者言之耳。余嘗謂西漢諸儒，無慮皆達治道之本，驗於斯而益信。

劉向嘗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見《漢書·董仲舒傳》贊）。蓋向有見於仲舒深通帝王之術，足以輔世主以臨馭天下，其所操術，固不在伊尹太公下也。今讀《春秋繁露》，所以發明帝王之術者，明切甚矣。而離合根、立元神、保位權三篇，幾於字字珠璣，悉道論之精英也。其言有曰：“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爲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任羣賢，所以爲受成；

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離合根》第十八）又曰：“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立元神》第十九）又曰：“爲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爲君虚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紬。擯名考實，以參其實。賞不空行，罰不虛出。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保位權》第二十）若此諸論，非治帝王之術而確有所得者，何足以知之乎？《漢書·藝文志》道家，著錄《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蓋伊尹、呂望之書，乃道論之原泉，故敘次道家者，以弁其首。劉向取仲舒儕諸伊呂，實以其於道論造詣至深，不讓古人耳。向子歆不達斯旨，遽加駁難，豈有當哉？（駁駁難之辭，亦見《漢書·董仲舒傳贊》引）

司馬談嘗習道論於黃子，故其學亦不醇於儒，而尤精通帝王之術。觀其《論六家要指》，反覆贊歎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指約易操，事少功多”。又謂“儒者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此皆第就君道一端立說，意謂言及人君南面之術，則道家爲巧，而儒者爲拙耳。班氏彪、固父子乃病其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相與譏短不休，夫亦未達司馬氏論述之本旨矣。余嘗謂欲窺道家無爲之真諦，首必研精太史公《論六家要指》一篇大義，此乃百家之鎔鑄，道論之梯梁。學者能由此入門，以上探管、商、老、莊、韓、呂之書，則於先秦人之所謂道，庶有得也。

劉向之父德，史稱其少修黃老術，有智略（見《漢書·楚元王傳》）。然則向深通道論之要，亦實承其家學耳。向之言曰：“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持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列子敘錄》）此與《漢書·藝文志》所云：“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語意全同，其必同出向手無疑。蓋《漢志》以《七略》爲底本，而《七略》之文，多存向之緒論，故二者密合無間如此。向於道家之學，可謂得其本柢矣。觀向所爲《說苑》二十篇，以君道冠首。開宗明義，即假晉平公與師曠問答之辭，以明人君清靜無爲之意，而他篇相互發明者，尤爲繁夥。其言有曰：“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說苑·政理篇》）若斯所論，達於致治之源，直入老聃之室矣。惜其所著《說老子》四篇，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而早亡，莫由盡窺其精蘊耳。

揚雄《法言》：“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

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撻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問道篇》）雄生於西京之末，習聞儒先緒論，故於老子之言無爲，能心契而深許之。顧獨以捐仁義、棄禮學爲病，不悟此乃末流之弊，非道家之本旨（晉李軌《法言注》曰：“老子之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爲之本。”李氏此言，最爲精諦）。《漢書·藝文志》論及道家，有曰：“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所謂放者，蓋指莊周一流人。《太史公書》稱莊子散道德放論，是其事也。大抵漢以上稱黃老，本以清靜無爲，施之治國，故其效著。魏晉以來，始稱老莊，專以曠達逍遙，託諸遺世，故其患大。方雄之時，雖論者未嘗以老莊並舉，而末流之弊已見，故不得不劇論之，蓋亦所以警世矯偏也。

桓譚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詳《後漢書》本傳）。蓋譚在當時，自不失爲魁傑之士，故其一生述造，亦多涉及治道。雖所著《新論》二十九篇，不傳於世，然第就存於《羣書治要》者觀之，猶可考見其大較。《言體篇》規切時事，尤爲詳盡。以高帝爲知大體，王翁（指王莽）爲不明大體，此是何等見解。譚之學，蓋又深於黃老者也。故《求輔篇》有曰：“唯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四引）此種議論，重在任人而不任智，實原於道德之意，固非當時章句俗儒所逮知已。

王充《論衡》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

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又曰：“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均見《自然篇》）王氏論治，推本無爲，而發明盡致。不啻爲《老子》“道法自然”一語，作詳細注解矣。

崔寔《政論》，仲長統亟稱之，謂“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語見《後漢書·崔寔傳》）可知其所敷陳，至爲深遠也。其言之存者，有曰：“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後漢書》本傳）此言刑罰德教，貴在因時布施，與物變化，而不可拘泥於一。亦卽《韓非·五蠹篇》所云“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之旨也。《淮南子·汜論篇》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斯言至爲明晰，故古之言治者，莫不兼道與事而備論之。觀寔論上下之分，有曰：“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于三公亦委策掾屬，以答

天子。”（《北書書鈔》六十八引）又曰：“君以審令爲明，臣以奉令爲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罪，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引）若斯所言，則又由申韓以歸本道德，得主術之弘綱矣。此與張衡上疏陳事所云：“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于下。”（見《後漢書·張衡傳》）持論正同。從知東京諸儒，亦多通達治體。要言不煩，最爲典核也。

阮瑀《文質論》有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僞，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達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節錄《藝文類聚》廿二所引）以余竊繹斯論，實一篇絕妙政論，通於道德之意矣。漢末文士，而能具此識議，所謂鳳鳴朝陽者也。

徐幹《中論》曰：“人君之大患，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闕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務本篇》）徐氏所言詳小略大、察近闕遠之患，卽所以申元首叢脞之戒。非於道論深造有得，孰能知之！

魏侍中劉廙所著《政論》五卷，雖早佚。然第就今存於《羣書治要》者求之，固猶可窺其旨趣。其言有曰：“君勞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爲臣，而萬臣爲君也。以一臣而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舊校云：“不”字恐衍）用人之名，而終爲人所用也。是以



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於己，而貴知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皋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爲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任臣篇》）此論至卓，發明君臣異道之旨，最爲精當。而無爲二字之真諦，悉在是矣。

魏大司農桓範著《世要論》十二卷，始著錄於《隋書·經籍志》。其書既早佚，而羣籍徵引，亦有稱《政要論》者。考《羣書治要》引此書，有爲君難、臣不易、政務、節欲、詳刑、兵要、辨能、尊嫡、諫爭、決壅、讚象、銘誅、序作諸篇。可知其書所言，初不限於論政。《隋志》以“世要論”爲書名，蓋原題如是也。《爲君難》一篇，極有理致。其言有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往，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因賞以恩（舊校云：‘恩’上恐有脫字），因罰以佐威，可不慮之以奸乎？（舊校云：二‘奸’字疑有一誤）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駿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舊校云：‘士’疑當作‘上’或‘主’），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也。”（節錄《羣書治要》卷四十七所引）此篇揭櫫七恕、九慮，所謂

元首明哉之事，無越於斯。而御臣之道，不俟旁求矣。不明於斯旨，而空言無爲，則必流於庸闇，徒益其昏聩耳。此申韓之學，所以原於道德也歟！

劉劭《人物志》，論者徒目爲辨材之書，而其實不盡於此也。觀其立論有曰：“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流業篇》）又曰：“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辦一官，而短於爲一國。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材能篇》）又曰：“臣以自任爲能，君以用人爲能；臣以能言爲能，君以能聽爲能；臣以能行爲能，君以能賞罰爲能。所能不同，故能君衆材也。”（《材能篇》）此皆通於道論之要，達乎爲政之本，豈第品鑑人物高下已哉！

“無爲”二字，本人君南面之術。竊其義而趨於曠達清逸，以任天率真爲一己放浪之資者，其始於何王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見《晉書·王衍傳》）。蓋自曹氏父子恣睢好殺，士大夫相率鉗口不敢言天下事，觀所云“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可知何王之傳會無爲，亦自有不得已之苦心。竹林諸賢，聞風繼起。若嵇康喜愠不形於色，阮籍未嘗臧否人物，劉伶攜酒出游，阮咸弦歌酣飲，意存遠禍，豈徒然哉？於是老莊遂爲玄談之宗，無爲乃成遁世之具。名士達官，翕然傾嚮。遺落世事，祖尚浮虛。視夫道家之所謂虛無、無爲本爲主術而發者，不啻背道而馳矣。

杜恕所著《體論》八篇，今存於《羣書治要》者，猶六千餘言。雖未標篇名，而大端以論治道者爲最備。其言有曰：“夫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

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中略）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於弑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又曰：“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皋繇瘖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爲太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撝聰也。”（均見《羣書治要》卷四十八）凡此所言人君致治之本，在能任人而不任智，以及清虛自守之旨，皆剴切通明，深契道論之奧。

《吳志·步騭傳》，稱黃武五年，權稱尊號，拜騭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時權太子登駐武昌，與騭書，論求賢之道。騭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肇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肇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見本傳）此疏雖甚短簡，而發明人君任賢以臻無爲之治，極有理致。

陸景《典語》有曰：“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總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良材，即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稷，佐日揚光；協齊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莖哉，股肱情哉，庶事墮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八引）此言大臣不親細事，實自《中庸》“官盛任使”之義推衍而出，合於道家之無爲也。

《晉書·荀勗傳》，稱其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並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並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云云（詳本傳）。荀氏言致治之本，宜以省事爲先；省事之要，在能清心。此即老子“我好靜而民自正”之旨也，通於道德之蘊矣。

殷仲堪《天聖論》曰：“天者，爲萬物之根本，冥然而不言。百姓生而不有其功，萬物成而不疲其勞。聖者，承天之照，用天之業，聖宣其道者也。”（《初學記》十七引）斯言引申“道法自然”之意，至爲簡要。惟所用聖字，殆取順義、循義、遜義，與常解殊。

南齊顧歡，嘗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於朝。觀其《上表》有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

日，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南齊書》本傳）此誠語簡意賅，妙達治本。惜其所撰《治綱》，今不得見耳。

江淹《無爲論》，乃以遁逸無悶，幽居永貞爲“無爲”。蓋猶沿何、王之餘波，以爲曠達之依託。去道家無爲之旨，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六朝文士，大抵宗奉佛理，其本無弊。必欲引老人佛，弊不可遏。學術升降之機，亦於斯可考見焉。其文既載《文集》，亦見《廣弘明集》二十九下。

鍾嶸上齊明帝書，諫親細務曰：“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南史》本傳）六朝文士亦復能解黃老之學，不絕如綫，非可數觀。

歷代帝王，以蕭繹爲最好學，而苦於不解治道。觀《金樓子》論及諸子，有曰：“道家虛無爲本，因循爲務。中原喪亂，實爲此風。何、鄧誅於前；裴、王滅於後；蓋爲此也。”（《立言篇》九上）此以魏晉南朝人之所謂道，上釋周秦諸子之所謂道，譬猶以蠡測海，可閔也。其論又曰：“世有習干戈者，賤乎俎豆；修儒行者，忽行武功。范寧以王弼比桀紂，謝混以簡文方赧、獻。李長有顯武之論，文莊有廢莊之說。余以爲不然。余以孫、吳爲營壘，以周、孔爲冠帶，以老莊爲歡宴，以權實爲稻糧，以卜筮爲神明，以政治爲手足。一圍之木持千鈞，五寸之鍵制開闔，總之者明也。”（同上）卽此，可知其臨蒞天下，固無以異於當時文士之所以涉世也。“以老莊爲歡宴”一語，尤爲淺薄。蓋其於君人南面之術，概乎未之有聞，可驗於斯矣。

後魏宗室任城王澄上表有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

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爲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慙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勵時，靖恭以致節。”（《魏書·任城王澄傳》）此等奏議，洞達道本。前段陳省事清心之要，與荀勗所言，如出一口。後段明大官不必親細事，與陸景所論，無勿同者。皆可謂識治之良才也。

後周王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中有曰：“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隆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附見《梁書·王規傳》）此文前以儒道並舉，下取周、孔、老、釋分列。可知牽佛附老，在南北朝時通行已久。至所稱道家墮支體云云，則又誤以道教爲道家矣。

隋薛道衡所撰《老氏碑》，有曰：“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樸還淳。”（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八）此數語，不啻將道德五千言體用，概括靡遺。後之爲老氏之學者，但取以治身，而道德之用遂隱，自莊周始也。悠悠千載，能深窺道德之原意者，益寥寥矣。知德者稀，良可慨也。

柳彧諫文帝親裁細務疏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

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于求賢，逸于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聞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隋書·柳彧傳》）此與後魏任城王澄所上表，辭意大同，俱道德五千言之箋說也。

唐太宗所以大過人者，在能以道家清靜之旨施之政理耳。天下之生久矣，如值大寒暑大病苦之後，則惟診治調息以養復其元，而未可施以肥醲酸削之劑。漢承嬴秦之敝，當生民大災患、大病瘵之時，故留侯師黃石，佐高祖約法三章，盡革苛政酷刑。曹相師蓋公，輔齊漢，不擾獄市，不更法令，致文景刑措之治，此黃老清靜之說，行之漢初而大效者也。唐初承隋之敝，猶漢之代秦也。惟太宗洞鑒於斯，故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靜，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木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靜，百姓何得不安樂乎？”（見《貞觀政要》卷一《論政體》第二）則其治國之道，與民休息而已矣。故其論治有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爲本，人以衣食爲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爲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爲，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尅己自勵耳。”（《政要》卷八《論務農》第三十）又曰：“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

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姦詐。”（《政要》卷八《論赦令》第三十二）以此臨民，民無有不治者。唐初開國之基，蓋奠於斯矣。魏徵嘗言：“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政要》卷八《刑法》第三十一）魏氏動靜之說，可以見興亡之機焉。雖然，此第就唐初安定天下之術而言耳。若夫帝王所以自處，復能無爲而無不爲，深有合於道德之意。觀太宗論隋文帝曰：“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中略）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不惡，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爲非。”（《政要》卷一《論政體》第二）然則太宗深有鑒於隋文苛察之失，故反諸執本秉要，清虛自守，任人而不任智。貞觀之初，人才稱盛，而能各獻所長，由斯道也。當時臣工明於此理者，自魏徵外，若孔穎達亦甚精通治術。孔氏之言曰：“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政要》卷六《論謙讓》第十九）此可謂明論嘉謨，足以匡弼君后。太宗之達於政理，有自來矣。雖然，亦賴乎其能力學也。太宗自言：“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爲天子。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原。行之數年，天下大理，而風移俗變。”（《政要》卷十《論慎終》第四十）所謂見政理之原，蓋指無爲自化，清靜自正而言也。歷代人主之好學者，史不絕書。其能精究道論，取精挾要，布之天下以致治平之績者，要必推太宗爲首選矣。



# 老子疏證

## 序

我國歷史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奴隸社會以後，統治階級內部爲了適應最高統治者的需要，便出現了一種研究怎樣實行統治的方法、權術的專門學問，師師相傳，一直到漢代還有這方面的專家們在開門授徒，傳述這方面的理論。史稱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劉德“少修黃老術，有智略”。他們所探求的，都是這門學問。而司馬遷敘述黃老術的授受原流道：“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史記·樂毅列傳》）可知這門學問的傳授，起源很早，到漢代還很盛行，正和漢代經師傳授儒家經傳的情況，足以媲美。所以漢代學者對道家之學的理解，比較深刻而精闢，是不足奇怪的。

《老子》一書，是戰國時期講求這門學問的老專家們哀輯自來闡明“人君南面術”比較精要的理論書。字數雖不多，談到的

問題却不少。由於其書不出於一時，不成於一手，所以前後不免有複見的字句，有些地方還雜入了後人附加的話。

其書爲了闡明事理，多因近取譬，也有時舉出用兵的例子，而其原意本非爲用兵而發。我們只看上下文的含意，便可知其本旨。唐代王真，在所著《道德經論兵要義述》中談到“五千之言”，“未嘗有一章不屬意于兵也”。似乎這書是一部古代兵書。明代焦竑，針對着這一看法，進行了駁斥。焦氏在所撰《老子翼序》中談到：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爲譚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亦有以啓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誦也，卽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也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爲也。柔非卽爲道，而去無爲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無爲可幾也。

焦竑，是明代後期比較淵博的學者。他平生研究《老子》，參攷了六十四家的注說，最後博采諸家精義，寫成了《老子翼》。由於他深造有得，所以談到《老子》一書的作用，獨能得其要領。其實，遠在漢代，便有人已深窺此義。《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說：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君人”，當爲“人君”二字誤倒）。

這說的何等清楚！我們再上推到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一段議論中推崇道家的話，分明是從最高統治者南面術的角度來談問題的。所以我總認為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實是通貫道家學說的一把鑰匙，必用此將鎖打開，才會懂得《老子》所強調的“無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道家包括《老子》在內的言論，既是爲君道而發，後來流弊，爲什麼又有那麼大呢？這在漢代學者早已回答了這一問題。《漢書·藝文志》既肯定道家所言，是“人君南面之術”，繼着又說：

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這裏所指斥的“放者”，是莊周一流人。《史記·老莊申韓傳贊》中明明說過：“莊子散道德，放論。”可知道家思想被人歪曲而變爲放蕩無羈、毀棄一切，是從莊周開始的。漢代以及漢以前的學者們以“黃老”並稱，原以施之政治。魏晉以來，但言“老莊”，便流於曠達清談，和現實脫離。所以“黃老”與“老莊”，二者是有截然不同的內容的，根本是兩碼事，絕不可以拿“老莊”的流弊，寫在“黃老”的賬上。這點必須分辨清楚，才有可能弄明白道家學說的原意。

注說《老子》的，唐以上有河上公和王弼兩家注本並行于世。河上公注本，顯係後世僞託，前人早已論定。但即使出于魏晉人之手，到今天也成了很早的注本。況其中保存不少精義，深得作者用心，有時遠勝王弼之注，較後起諸家更爲超逸。流傳至今，仍不可廢。可與王注並行，截長補短，足以相益。

《老子》一書，傳本很多。唐代陸德明作《經典釋文》時，已經感到“《老子》衆本多異”（見《經典釋文敘錄》）。流傳到現

在的，不僅有許多較古的刻本和刻石，而且還保存了六朝人及唐人手寫的殘卷。近人馬敘倫的《老子覈詁》，蔣錫昌的《老子校詁》，高亨的《老子正詁》，朱謙之的《老子校釋》，都做了仔細校勘的工作。但對《老子》一書的理論意義，却很少解說。

綜觀舊注，往世如河上公、王弼、吳澄，近世如高延第、魏源、奚侗，循文釋義，所得爲多。余早歲耽習《老子》，於此諸家之注，沈潛反覆，復博稽今人校釋，間下己意，嘗撰爲《老子約義》二卷。自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帛書《老子》甲乙本出土於長沙漢墓，兩千多年前的舊寫本，復見今日。因亟取帛書校讀今本，收獲很多。因一：箋記異同，發明其義，擴充《約義》，以成《疏證》。歷時一月，繕寫粗定。其間紕繆，一定是很多的。仔細進行修改，只得俟諸異日。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張舜徽記。

## 略 例

今爲《老子疏證》，首先將正文重新寫定；其次博采衆說，擇善而從；最後，自抒所見，稍加發明。取舍從違之際，略具條例如左：

一、《老子》兩篇的敘次，自漢代以下，都以《道經》爲上篇，《德經》爲下篇，因合稱爲《道德經》。帛書甲乙本《老子》，則與此相反，而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這和《韓非子》解老、喻老兩篇證說《老子》的專著、先德而後道的敘次，完全相合。足以說明此乃《老子》一書的本來面目，今依此繕寫。

二、帛書《老子》，皆分二篇。乙本篇尾，標有“德”、“道”篇題；甲本則但用圓點以示區分而已。今仍分上下卷，不標“德經”“道經”之名。因爲用“經”名此書，所起較晚，不當沿用。

三、帛書甲、乙本《老子》，都沒有分章。說明《老子》原書，本不分章。而後世分章，出於注家所爲。因分章而引起的糾

紛，確也不少。有些上下文意應連在一起講的，被割裂為兩章；有些各自一意的，反被合為一章。這便導致注釋的分歧和不必要的爭辯。照原文不分章，自可避免這一類的弊端。今依帛書，仍不分章。

四、今本《老子》分為八十一章，取與帛書甲、乙本對勘，第四十、第四十一章次序互倒；第八十、第八十一章在第六十七章之前；第二十四章在第二十二章之前。這是今本久經傳寫，以致錯亂的現象。在傳世的其他古書中，也常有這種情況，不獨《老子》為然。今悉依帛書排列次序寫正。

五、全書字句，以王弼注本為底本，用帛書甲、乙本以校王本，發現帛書實勝王本，便依帛書寫正；發現帛書有訛誤而王本不誤，便仍用王本。或他本實勝王本，便采用他本。

六、帛書甲本時代最早，不避漢高祖諱，所以文中多用“邦”字，乙本便改用了“國”字。甲、乙本均不避漢文帝諱，所以文中多用“恒”字，今本便改用了“常”字。今進行勘對，發現確由避諱而改了的，仍照原文改回，以復其舊。也有原本文用“國”、“常”等字，非由避諱改寫的，則仍其舊。

七、戰國時文體，字句間多有虛助詞如之、乎、也、者諸字以舒緩語氣，如《孟子》、《戰國策》諸書皆然。《老子》原文，當亦如此。觀帛書甲、乙本可知。今本虛字較少，是由傳寫者所刪汰。宋代范應元曾說：“古本每句下多有‘也’字，文意雍容；世本並無‘也’字，則文意不足。”（《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上）這話是對的！今檢尋文義，必有虛字而後語意完足的，便據帛書補之；今本雖無虛字而不損害語意的，便不必補。

八、自來注說《老子》的書，從《韓非子》解老、喻老以至今人所述，名目繁多。凡一義而數家相同，稱引時，舉其最早者。

## 引用各種版本目錄

帛書甲、乙本 一九七四年九月，文物出版社影印大本並附釋文。

河上本 《老子章句》，舊題漢河上公撰，涵芬樓景宋刊本。

嚴遵本 《道德真經指歸》，舊題漢嚴君平撰，道藏本。

王本 《老子注》，晉王弼撰，浙江書局重刊華亭張氏本。

陸本 《老子釋文》，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本。

傅本 《老子古本》，唐傅奕校定，《經訓堂叢書》本。

景龍碑本 《老子道德經碑》，唐中宗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刻。簡稱景龍本。

開元幢本 《老子道德經幢》，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易州刻，附御注。簡稱御注本。

廣明幢本 《老子道德經幢》，唐僖宗廣明元年，泰州刻。簡稱廣明本。

景福碑本 《老子道德經碑》，唐昭宗景福二年，易州刻。簡稱景福本。

古樓觀碑本 《老子道德經碑》，唐（無年月）終南山刻。

龍興觀碑本 《老子道德經碑》，遂州龍興觀刻。簡稱遂州本。

敦煌本 羅振玉《道德經考異》及《老子考異補遺》所錄唐人寫本十種，六朝人寫本一種，均殘缺不完，皆出於敦煌石室。

范應元本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宋范應元撰。《續古佚叢書》本。

陳景元本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宋陳景元撰。《道藏》本。

李道純本 《道德會元》，元李道純撰。《道藏》本。

## 引用各家注說目錄

嚴遵 《道德真經指歸》，《道藏》本。舊題漢嚴君平撰，書出後人之手，託名於嚴。

河上公 《老子章句》，舊題漢河上公撰。書係僞託，然其中多存古義，至遲亦當出魏晉人之手。

王弼 《老子注》，浙江書局重刊華亭張氏本。

陸德明 《經典釋文》，《抱經堂叢書》本。

陸希聲 《道德真經傳》，《道藏》本。

蘇轍 《道德真經注》，《道藏》本。

范應元 《老子道德真經古本集注》，《續古佚叢書》本。

吳澄 《道德經注》，湖北官書處重刊本。

李道純 《道德會元》，《道藏》本。

薛蕙 《老子集解》，《惜陰軒叢書》本。

徐大椿 《道德經注》，乾隆廿五年刻本。

姚鼐 《老子章句》，《惜抱軒全集》本。

王念孫 《讀書雜誌》，淮南書局刊本。

嚴可均 《老子唐本考異》，在《鐵橋金石跋》內。

吳雲 《老子道德經幢殘石》，見《二百蘭亭齋金石記》。

魏源 《老子本義》，《漸西村舍叢書》本。

俞樾 《諸子平議》，《春在堂全書》本。

易順鼎 《讀老札記》，光緒十年刊本。

譚獻 《讀老子》，在《復堂日記》內。

高延第 《老子證義》，光緒十二年刊本。

陶鴻慶 《讀老子札記》，《讀諸子札記》本。

馬其昶 《老子故》，秋浦周氏刊本。

劉師培 《老子斟補》，《劉申叔先生遺書》本。

羅振玉 《老子道德經考異附補遺》，《永豐鄉人雜著續編》本。

奚 侗 《老子集解》，一九二五年刊本。

馬敘倫 《老子覈詁》，《天馬山房叢著》本。

楊樹達 《老子古義》，中華書局排印本。

勞 健 《老子古本考》，影印手寫本。

高 亨 《老子正詁》，一九四三年開明書店印本。

于省吾 《老子新證》，《雙劍謄諸子新證》本。

朱謙之 《老子校釋》，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印本。

武內義雄 《譯註老子》，岩波書店昭和十三年刊本。

## 老子疏證卷上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韓非子·解老篇》曰：“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舜徽按：韓非以“其神不淫於外”解“上德不德”，以“無爲”、“無欲”、“不思”、“不用”釋“德”，皆就君道言，謂人君南面之術當如此也。《管子·心術上篇》云：“德者，道之舍”；又曰：“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則“德”之爲義，有時實指人君。《老子》所稱“上德”，猶言君道之上者；所稱“下德”，猶言君道之



下者。與“不德”、“有德”、“無德”之“德”，字同意異。隨文所施，義各有當。周秦故書，大抵然矣。在乎好學深思者，能心知其意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舜徽按：上句既言君道之上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反此，則違乎君道遠矣。卽韓非所云“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也。必從君道二字上理解此數語，始能知其原意所在。

上德無爲而無不爲。

俞樾曰：“《韓非子·解老篇》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蓋古本《老子》如此。今作‘無以爲’者，涉下‘上仁’句而誤耳。傳奕本正作‘不’。”

舜徽按：俞說是也。今據《韓非子》改正。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均有此句，帛書甲、乙本皆無，《韓非子·解老篇》亦無，蓋原文如此，今據刪。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韓非子·解老篇》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

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范應元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者，非以要譽也，無所爲（去聲）而爲之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韓非子·解老篇》曰：“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舜徽按：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統治者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爲義。上義之君必以此爲重者，事出有因，有所爲（去聲）而爲之也。河上公注云：“動作以爲己，殺人以成威，賦下以自奉。”三語盡之矣。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韓非子·解老篇》曰：“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貌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扔之。”

舜徽按：在階級社會中，統治者多爲之方以困折人。凡所立制度儀節，皆所以屈抑羣下使伏事己也。禮文繁縟，衆所不堪。雖上爲之而下莫之應。上禮之君，必強民從之。《廣雅·釋詁》：“扔，引也。”謂攘臂引民使就禮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吳澄曰：“結上文，起下文。”

舜徽按：帛書甲本作“故失道。失道矣，而後德”。多“失道矣”三字，乃衍文。乙本與今本同，可證。

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

河上公曰：“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

舜徽按：在階級社會中，禮文大備，則統治者控馭被統治者之具愈密。民不堪命，則羣起而攻殺之。《老子》之所謂“亂”，即指奴隸、農民革命言。此兩句末，依帛書甲、乙本補兩“也”字。甲、乙本文句末多有“也”字，今本多刪去，蓋由傳寫者貪省功也。然按之文義，有不必用“也”字者，亦有必用“也”字而語意始足者。今斟酌其情，宜補者據帛書補之，此類是已。

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韓非子·解老篇》曰：“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

高延第曰：“前識、先知，謂智也。治天下者，專任智數，不惟不智，適成其愚而已。”

舜徽按：此言為人君者不當以前識自詡其聰明才智也。《呂氏春秋·君守篇》曰：“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恆矣。”亦卽此意。如人君以前識自賢，則臣下相率舍職而阿主意矣。如此則主勞而臣逸，不足以成事，而愚莫甚焉。故曰愚之首也。自來讀《老子》者，多不解此爲君道而發，或疑“愚”爲“遇”之訛，或疑“愚”爲“偶”之訛，皆失之。今本兩句末均無“也”字，“首”又作“始”，茲據《韓非·解老》及帛書甲、乙本補正。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韓非子·解老篇》曰：“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

河上公曰：“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

舜徽按：厚謂樸素之道，薄謂虛浮之禮。彼，指薄者華者；此，指厚者實者。此言善爲人君者，不尚浮華，不露才智，一歸於虛靜而已。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莊子·至樂篇》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

舜徽按：《老子》云“得一”，《莊子》則云“無爲”，可知古人所謂“一”，卽指“無爲”，無爲卽靜。其意以爲天地惟能靜，故化育萬物；人主惟能靜，故治

理萬事。所謂“道法自然”，意卽在是。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舜徽按：此二語與上二語皆比喻之辭，所以襯託下文，而歸其意於“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也。

### 萬物得一以生

羅振玉曰：“敦煌戍本無此句。”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並無此句，與嚴遵本合。蓋原文如此，今據刪。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王念孫曰：“《爾雅》：‘正，長也。’《廣雅》：‘正，君也。’《呂氏春秋·君守篇》：‘可以爲天下正。’高注：‘正，主也。’爲天下正，猶洪範言‘爲天下主’耳。王弼本‘正’作‘貞’，借字耳。”

舜徽按：帛書《老子》乙本作“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甲本此句缺脫）。乃原文也。或謂“貞”爲本字，其作“正”者，乃由宋刻避帝諱而改，非是。

其致之，一也。

舜徽按：此句帛書甲本作“其至之也”，乙本作“其至也”，王弼本作“其致之”，皆有誤脫，以致語意不完。今依傅奕、范應元本寫定。“其致之一也”，當連

上文讀，乃總結上文之辭。或以爲領起下文，非是。

天無已清，將恐裂；地無已寧，將恐發；神無已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

舜徽按：“無”與“毋”，“以”與“已”，古多通用。各本作“無以”，帛書甲、乙本作“毋已”，其義同也。河上公注首句云：“言天當有陰陽弛張，晝夜更用。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其注以下數句亦言“無已時”，知其所據之本作已止之已，與帛書合，今從寫正。“發”當讀爲“廢”，謂廢墜也。廢墜猶傾圮耳。此數句皆陪襯語，下文“侯王無已貴高，將恐蹶”，乃主意所在。

萬物無已生，將恐滅

羅振玉曰：“敦煌本無此句。”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並無此句，嚴遵本亦無，蓋原文如此，今據刪。

侯王無已貴高，將恐蹶。

舜徽按：此段文字，前數句天、地、神、谷平列，語例字數均同，至此句語法一變，亦猶上文“天得一以清”數句語例字數均同，至末句“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語法一變，正相同也。蓋連舉數語，意固專指侯王，故加重語氣言之。爲天下正，極人世之貴高，若自貴高無已時，則必取敗，故曰“侯王無已貴高，將恐

蹶”也。此處既以貴高二者連舉，下句乃就貴高二者分言，文氣相承，極其自然。或疑“貴”當作“貞”，“高”乃衍文，非也。

故必貴而以賤爲本，必高而以下爲基。

舜徽按：此二句依帛書甲本寫正（乙本貴、高二字上，亦均有“必”字）。今各本作“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蓋由傳寫而有省奪也。河上公注云：“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爲本；必欲尊高，當以下爲本基。”似其所據之本與帛書同也。《淮南子·道應篇》引作“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兩“必”字又在“貴”、“高”下。雖有不同，意固無二。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舜徽按：“不穀”，一本作“不穀”，河上公注云：“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穀爲車輻所轉。”此解失之。帛書甲、乙本並作“不索”，索卽穀之形省。章炳麟《新方言》謂“不穀”卽“僕”之合音，是也。僕指臣僕，本賤稱。

此其以賤爲本也，非與？

舜徽按：此句各本不一。帛書乙本作“此其賤之本與，非也”，則又“與”、“非”誤倒（甲本僅存“此其”二字，餘文缺脫）。今參范應元所據古本寫正。

故致數與無與。

舜徽按：帛書乙本作“故至數與無與”，甲本“至”作“致”，兩“與”字皆誤作“與”。原文蓋本作“致數與無與”，證之《淮南·道應篇》所引而合，王弼本不誤也。乙本“致”字偶脫支旁，可以甲本正之。數謂計舉之也。《釋文》讀色主反，是矣。輿乃車之通名。《考工記》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淮南子·主術篇》云：“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盡，鑿者不斷，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蓋車之爲物，由輪、輻、蓋、軫、衡、軛、轂、轡之屬相合而成。若但舉車輿大名，何足以見其全體之用，故曰數與無與。古人常取此以喻治道，明一國之治，亦由衆智羣力所集，而非人主一人所能爲。《呂覽·君守篇》所云“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淮南·主術篇》所云“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皆卽此意。若自居成功，貪爲己力，適足以取敗耳。故善爲君者，必謙下自守，卑抑自持，自稱孤寡不穀，而羣下敬之，所謂“外其身而身存”也。此句承上文“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之下，而因近取譬，以喻君道，照原文讀可通，不必改字也。自來解《老子》者，多讀“與”爲“譽”，或直改爲“至譽無譽”，非是。河上本、《景龍碑》本，皆作“數車無車”，與“數與無與”同意。或疑“車”卽“輿”之爛字，則作“輿”者不誤。

不欲琤琤如玉，珞珞如石。



羅振玉曰：“敦煌本作‘祿祿’、‘落落’。”

舜徽按：帛書乙本作“是故不欲祿祿若玉而珞珞若石”（甲本殘缺）。字體雖異，要皆取其聲近耳。珞珞形容玉美，珞珞形容石堅。此二語，謂為人主者，既不可高貴如美玉，亦不可堅強如惡石。要當卑賤自處，柔弱自持。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河上公曰：“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之。中士聞道，治身以常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于情欲，而復亡之也。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之。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名爲道。”

舜徽按：此處所言上士、中士、下士，乃謂識道深淺不同之人。識之深者，行之篤；識之淺者，或行或不行；全不識者，惟相與非笑而已。其意以爲至道蹟奧，本非人人所易喻。不爲不識道者所笑，不足以見道之尊。《老子》言君道，主於清虛自守，卑弱自持，自古解此者稀，聞之而大笑者皆是也。故此處着重指出，以見理解之難。

是以《建言》有之曰：

舜徽按：此句各本作“故建言有之”，今據帛書乙本補正。敦煌本亦作“是以建言有之曰”，與乙本同，蓋原文如此。有一“曰”字以領起下文，尤勝，今本脫

去久矣。《建言》，乃所引古書名。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舜徽按：此數句及下文“若”字，帛書乙本皆作“如”，二字聲轉義通，不必改也。“昧”，乙本作“費”，當爲“眚”之形誤。《說文》：“眚，目不明也。從目，弗聲。”傳寫者誤作“費”耳。“類”，乙本作“類”，當爲“類”之聲借。《說文》：“類，絲節也。從系，類聲。”絲有節則不平，因引申爲凡不平之名。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

羅振玉曰：“‘大白若辱’句，敦煌本在‘上德若谷’之前。”

舜徽按：帛書乙本此二句與今本同，當不誤也。《老子》所引《建言》之語，皆指君道言。此云上德，謂君道之上者，若谷，謂其虛靜多受似谷也。“大白若辱”，謂人君自處卑賤，有似於垢污而實甚潔白也。《儀禮·士昏禮》：“今吾子辱。”鄭注云：“以白造緇曰辱。”故引申有垢污義。

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

俞樾曰：“建，當讀爲健。《釋名·釋言語》：‘健，建也。能有所建爲也。’是建、健音同而義亦得通。”

劉師培曰：“‘質真若渝’，與‘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並文，疑真亦當作德，蓋德字正文作惠，與真相

似也。質德與廣德、建德一律。”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此數句缺脫，無可取證。  
俞、劉兩家說是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高亨曰：“道隱無名，疑當作大道無名。蓋大字轉寫掇去，後人以意增隱字耳。”

舜徽按：帛書乙本作“道隱無名”，與今本合，則原文如此，非有掇誤也。“大象無形”，乙本“大”作“天”，乃傳寫者由形近而訛。

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于省吾曰：“景龍本作‘夫唯道善貸且善’，當脫‘成’字。敦煌‘貸’作‘始’，乃聲之轉。《周語》‘純明則終’，注：‘終，成也。’又‘故高明令終’，注：‘終猶成也。’《書·皋陶謨》：‘蕭韶九成’，鄭注：‘成猶終也。’是成終互訓義同。然則‘善始且成’，即善始且終也。”

舜徽按：于說是也。帛書乙本作“善始且善成”，語意完足，乃原文也。今據訂正。

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

舜徽按：各本無四“也”字，今依帛書甲、乙本補。有四“也”字，語意圓足，自勝今本矣。此所謂“道”，謂君道也。上文自“明道若昧”，至“大象無形”

等十數句，徧舉相反之事，以明相反相成之理。善爲人主者，如能以愚自處，以柔下人，善用衆智，不露己才，自能收無爲而無不爲之效。故《老子》於此處總結之曰：“反也者道之動也。”謂事物之貌似相反者，而實寓相輔相成之功，乃君道所資之以爲動也。君道之要，在能去健美，黜聰明，故又申之曰：“弱也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嚴可均曰：“河上、王弼作‘萬物’，御注作‘之物’。”

馬敘倫曰：“王弼注云：‘天下之物，皆有以爲生。’是王亦作‘之物’。今作‘萬物’者，後人據河上本改也。”

舜徽按：帛書乙本正作“之物”，蓋原文如此。今據改正。此文自“反也者道之動也”至“有生於無”二十餘字，今本題“四十章”，在“上士聞道”一段之前，乃傳寫者所誤移，今依帛書敘次寫正。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淮南子·天文篇》曰：“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和合，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舜徽按：《淮南》此言，實所以申釋《老子》斯義。楊樹達《老子古義》失收，蓋以其在《天文篇》而偶遺之耳。王念孫謂“曰規”二字爲衍文，非也。《淮南》

之意，以《老子》此處所云道，乃指君道言，故以規解之。規者圓也，《管子·君臣下篇》所云“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呂氏春秋·園道篇》所云：“天道圓，地道方。主執圓，臣處方。”皆即此意。古之言君道者，主于無爲。《老子》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至樂篇》則云“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是無爲即一，一即道也。《韓非子·揚權篇》曰：“道無雙，故曰一。”謂此爲人君所獨擅，而不與臣共者。此之謂道生一也。君既無爲，則臣下必有爲。《淮南》所云“分而爲陰陽”，陰陽謂君臣各有其道。此之謂一生二也。古稱卑爲陰，尊爲陽；故陰以喻臣，陽以喻君。《楚辭·九章·涉江》：“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注云：“陰，臣也；陽，君也。”是古人亦稱君臣爲陰陽矣。君臣之道既立，設官分職，各司其事。此之謂二生三也。百官盡能，萬事悉舉，此之謂三生萬物也。自來讀《老子》者，解一、二、三，紛紜不一。大抵墜入玄虛，糾紛難理。要必以此“道”爲君道，而後上下文義始有所傳麗。若謂此“道”非指君道，則下文何爲聯“孤寡不穀”而爲言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河上公曰：“萬物無不負陰而抱陽，迴心而就日。”

舜徽按：古人恒以“日”、“陽”比喻人君。此二語施之人事，上句乃謂人君苟得其道，則爲萬民歸嚮，如物之抱陽。下句乃謂人君謙抑自守，以和柔應之也。冲爲盅之借字，謂虛中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名。

河上公曰：“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爲稱者，處謙卑，法虛空和柔。”

舜徽按：“而王公以自名”句，末二字今本作“爲稱”。帛書甲本作“自名”，與敦煌本合，蓋原文如此，今據改正。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馬其昶曰：“稱孤寡不穀，無損於王公；強梁者，求益而反損。”

舜徽按：此謂爲人君者，苟自處卑弱，謙虛抑退，則羣下歸之，受其擁戴，是損之而益也。如妄自尊大，恣肆無忌，則羣起攻之，必致傾滅，是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

高亨曰：“《莊子·山木篇》：‘從其強梁。’《釋文》：‘強梁，多力也。’‘強梁者不得其死’，見《說苑·敬慎篇》所載《金人銘》。當是古代遺言，故《老子》謂‘人之所教’也。”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景龍碑》本，均作“吾將以爲教父”。帛書甲本作“學父”，與敦煌本、傅、范本合，蓋原文也。今據改正。父猶始也，本也。末一語，乃謂古人所傳“強梁者不得其死”之教，我將奉此爲學習之首要內容。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嚴可均曰：“河上、王弼無‘於’字，傅奕、《淮南子》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

舜徽按：《淮南子·原道篇》所引，乃原文也。今據補。帛書甲本作“無有入于無間”蓋亦上奪二字矣。水之爲物至柔，及其積厚勢重，可以潰決隄防，漂沒城邑。泛濫所至，無隙不入，可以知其威力之大。老子有見及此，因悟柔弱可勝剛強，爲人君者，宜去健美，黜聰明，任人而不任智，而收無爲之效。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

朱謙之曰：“傳本‘希’作‘稀’，下有‘矣’字。”

舜徽按：王弼本作“天下希及之”。帛書甲本作“天下希能及之矣”，語意完足，今據補正。乙本句末亦有“矣”字，餘文缺脫。古人言君道，每以“不言”、“無爲”並提。故《老子》又云：“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管子·心術上篇》云：“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淮南子·原道篇》云：“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主術篇》云：“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皆是也。無爲、不言，清虛自守，因循任下，責成不勞，乃君道之宗，故言及此者，並重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薛蕙曰：“多猶重也。世之人不知貴己賤物之道，而危身棄生以徇物。老子閱而教之曰：名之與身，何者其親乎？何爲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爲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何爲得名貨而亡其身也？”

舜徽按：《老子》設此三問以明事物正反兩面相互轉化之理。身爲最親，而尚名好高者至蹈死不顧，是疏其身矣。身爲最重，而貪貨逐利者至殉財無悔，是輕其身矣。或得之而取禍，或失之而蒙福，孰爲憂苦，亦未易輒定也。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河上公曰：“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生多藏于府庫，死多藏于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冢探柩之患。”

高亨曰：“‘甚愛’上，王本原有‘是故’二字，乃後人所益。河上本無。”

舜徽按：帛書甲本亦無“是故”二字，今據刪。下句已有“故”字，此二句不當重出“是故”，尤可證也。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范應元曰：“惟知足知止而不貪名貨者，則不致汙辱危殆，可以長且久也。”

羅振玉曰：“此句之首，景龍本、敦煌本皆有‘故’字。”

舜徽按：帛書甲本亦有“故”字，蓋原文如此，今



據補。此文自“名與身孰親”至“多藏必厚亡”，皆就庸常事物舉例說明多欲之爲害，而歸結爲知足知止之有益。其意乃謂爲人君者，宜恬靜寡欲，無競於物，以致長生久視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河上公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減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

舜徽按：“缺”字有作“𦐇”者，乃由六朝俗書“缶”旁與“垂”旁往往相亂而誤耳。帛書甲本作“𦐇”，可證。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河上公曰：“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貴不敢驕也，富不敢奢也。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

高亨曰：“‘沖’、傳本作‘盅’，沖、借字，盅、本字。”

舜徽按：帛書甲本作“盅”，則誤增偏旁矣。乙本仍作“沖”。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易順鼎曰：“《道德指歸論·大成若缺篇》‘大巧若拙’下，又云：‘是以羸而若拙。’疑所據本有‘大羸若拙’一句，無‘大辯若訥’一句。”

舜徽按：“大辯若訥”下，疑原文尚有“大羸若拙”

一句。久經傳寫，脫去四字耳。帛書乙本“趨勝寒”前，尚存一“紬”字，可證也。必有“大贏若紬”一語，然後四句兩兩相對，順理成章。按之文例，當如此耳。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可以爲天下正。

馬敘倫曰：“‘躁’，《說文》作‘趨’，疾也。今通作‘躁’，此當作‘燥’。”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均作“趨”，其字從走，有動義。身動則暖，可以勝寒；心靜則涼，可以勝熱，此常理也。人君清虛恬靜，則可勝外物之紛擾，故曰：“清靜可以爲天下正。”正者，君也，長也。帛書甲本“清靜”下有“可以”二字，語意較足，今據補正。河上、王弼本作“清靜爲天下正”，脫二字；傅、范本、《景龍碑》本作“清靜以爲天下正”，脫一字。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河上公曰：“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卻走馬治農田。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

罪莫大於可欲；

《韓非子·喻老篇》曰：“翟人有獻豐狐去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爲罪，虞、

號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

高亨曰：“此句王本原無，河上本、傅本皆有之。《韓非子》解老篇、喻老篇引並同。《韓詩外傳》九引作‘罪莫大於多欲’。孫詒讓謂《韓詩外傳》引‘可欲’作‘多欲’，義較長。‘可’當作‘多’，孫說是也。”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均作“可欲”，與《韓非》解老、喻老所引並同，乃原文如此也。可欲，謂已有物足使人欲得之，而終以此取罪也。觀《韓非·喻老篇》引證之例可知。孫說偏據《韓詩外傳》而欲改字，失之。如作“多欲”，則與下句“不知足”義同，不應複出。

禍莫大於不知足；

《韓非子·喻老篇》曰：“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洩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咎莫憯於欲得。

《韓非子·喻老篇》曰：“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

劉師培曰：“《韓非子》解老、喻老二篇引‘咎莫大於欲得’，‘大’均作‘憯’。憯與痛同，猶言禍莫痛於欲得也。《老子》古本亦必作‘憯’，傅本猶然。今本作‘大’，蓋後人以上語‘大’字律之耳。”

舜徽按：劉說是也。帛書甲本亦作“憯”，與《韓非》所引同。今據改正。

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奚侗曰：“足與不足，因意念而生差別，無限量也。知足之足，泊然無營，又安有不足之時邪！”

舜徽按：帛書《老子》，凡“常”字多作“恒”，以其傳寫時代甚早，故不避漢文帝諱，仍原文用“恒”字。此後各本，凡用“恒”字處，皆改作“常”矣。亦猶用“邦”字處爲避高祖諱，皆改作“國”耳。凡相代之字，通用雖久，今依帛書改回，所以存其真也。《老子》此數語，皆爲人君而發。言爲人君者，宜寡欲知足，以自遠災禍。

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

《韓非子·喻老篇》曰：“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舜徽按：王弼本作“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今依帛書甲、乙本寫正。《韓非》所引，多一“可”字，似後人所增。此四語皆四字成句，與下文“其出彌遠，其知彌近”，語例正同。《老子》所云“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非謂人君閉明塞聰，不越戶牖而能自知天下之情也。要在善用衆耳衆目爲我聽爲我視也。《管子·九守篇》云：“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塞矣。”《韓非子·姦劫弑臣篇》

云：“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定法篇》云：“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淮南子·主術篇》云：“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又云：“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又云：“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若此諸論，皆足以發明《老子》斯義。學者必博觀諸子之書，融會鈎稽，始知《老子》所言，悉指君道。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舜徽按：此言人君一己之聰明不足恃，雖出外日行千里，而所聞見者甚少也。《韓非子·八經篇》云：“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呂氏春秋·貴公篇》云：“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皆言善爲君者，要在任人而不任智，不貴恃一己之耳目以自賢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爲而成。

《韓非子·喻老篇》曰：“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舜徽按：各本作“不見而名”，今據《韓非子》所引改正。凡《老子》書中所稱“聖人”，皆指人君之通治道者。推之其他論君道之書，所言“聖人”，皆同斯義。與夫儒家六藝經傳中所稱之“聖人”，名同實異，學者所宜明辨也。

爲學者日益，聞道者日損。

薛蕙曰：“爲學者貴博，故多聞多見，務日有所益；爲道者貴約，故去健羨，黜聰明，務日有所損。”

舜徽按：王弼本作“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傅、范本二“日”上並有“者”字。有“者”字，是也。帛書乙本作“爲學者日益，聞道者日損”，文義尤勝，今據改正。此二語乃並提二事相與比較之辭，以明爲學與聞道不同之趣。意謂爲學之士，必展其才智，肆力于學以日求進益。聞道之君，則反是，必斂抑聰明，不露才智，以日求貶損也。人君而能深自貶損，則衆智羣力皆爲己用矣。《管子·心術上篇》云：“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韓非子·主道篇》云：“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淮南子·繆稱篇》云：“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皆足以發明日損之旨。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舜徽按：此言人君深自貶損，歸于無爲。《慎子·民雜篇》云：“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呂氏春秋·任數篇》云：“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淮南子·原道篇》云：“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若此諸論，闡明無爲之旨，至爲精闢。《淮南》所言之“物”，乃指羣臣。今語猶稱衆論爲物論，衆望爲物望，是“物”本有衆義。古之陳君道者，力主人君事不先爲，而分任羣下爲之。及其有成，卽己之功。此乃無爲而無不爲之真諦。

取天下恒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奚侗曰：“《廣雅·釋詁》三：‘取，爲也。’爲亦治耳。無事猶云無爲。《莊子·天道篇》：‘帝王之德，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俞樾曰：“‘常’乃‘當’字之誤。河上公注云：‘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疑河上原注作‘治天下當以無事’，後人因經文譌作‘常’，因於注文增入‘常’字耳。”

舜徽按：帛書乙本“常”作“恒”，後因避諱而改爲“常”，非“當”字之誤也。

聖人恒無心，以百姓心爲心。

朱謙之曰：“此言聖人不師心自用，唯以百姓之心爲心而已。”

舜徽按：各本作“聖人無常心”。帛書乙本作“聖人恒無心”，文義爲長。後出諸本既改“恒”爲“常”，又誤倒其字矣。今據乙本改正。《老子》所言“百姓”，謂羣臣也。《尚書·堯典》：“辯章百姓。”鄭注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禮記·郊特牲》：“大廟之命，戒百姓也。”鄭注云：“百姓，王之親也。”可知古書中所稱“百姓”，自指統治階級內部之百僚貴族而言。與今語所稱“民衆”、“老百姓”截然不同。古之言君道者，重在任人而不任智。人君無爲，而分任羣臣爲之，故必以羣臣之心爲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也。

李道純曰：“‘德善’、‘德信’下，或加‘矣’字者，非。”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並作“也”字，是已。今據改。此數句，謂人君好惡不形於外也。德者，得也。德乃借字，本字當作惠。《說文》：“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此承上文而言羣下之善與不善，信與不信，人主惟獨明於內，而不形於外，是內得於己也；不見喜怒，無忤於物，是外得於人也；故名之爲“德善”、“德信”耳。《管子·霸言篇》云：“聖人之憎惡也內”；《韓非子·揚權篇》云：“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



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皆此意也。他本有作“得善”、“得信”者，明其音義通耳。帛書甲、乙本並作“德”。

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爲天下渾心。

河上公曰：“言聖人爲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也。”

舜徽按：王本作“聖人在天下，歛歛爲天下渾其心”。帛書甲本“聖人”下有“之”字，“歛歛”下有“焉”字，今據補正。陸氏《釋文》引顧云：“歛歛，許葉反，危懼貌。”他本或作“怵怵”，或作“慄慄”，音義皆近。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河上公曰：“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爲聖人視聽也。”

高亨曰：“孩借爲閔。《說文》：‘閔，外閉也。’《漢書·律歷志》：‘閔藏萬物。’顏注引晉灼曰：‘外閉曰閔。’聖人皆孩之者，言聖人皆閉百姓之耳目也。”

舜徽按：“注”，帛書甲本作“屬”，二字古人多通用。“孩”，高讀爲“閔”，是已。惟謂爲閉百姓之耳目，則非。此謂人君自閉其耳目也。《韓非子·定法篇》云：“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呂氏春秋·任數篇》云：“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凡

此所言，皆謂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已則閉明塞聽，置而不用也。王弼本脫“百姓皆注其耳目”句，河上本、傅本並有之，與帛書合。百姓謂羣臣百官。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韓非子·解老篇》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謂之出，卒謂之入，故曰出生入死。”王弼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也。”

馬敘倫曰：“《說文》無‘塗’、‘途’二字，蓋徒卽塗、途本字也。《莊子·至樂篇》‘食於道徒’，卽道塗也。此徒字蓋如字讀。”

舜徽按：馬氏讀徒爲途，是也。《老子》所云“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亦卽途字耳。

而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

《韓非子·解老篇》曰：“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

舜徽按：王本作“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文句缺脫不全。《韓非子》所引與傅奕本合，乃原文也，今據寫正。帛書甲、乙本，此處字多錯亂，然“而民生生”四字可辨，知原文句首原有“而”字。本作“民”，唐人避諱而改作“人”耳。有兩“生”字，分屬上下句，語意始明。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文子·十守篇》曰：“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卽所以得長生。”

高延第曰：“生生之厚，謂富貴之人，厚自奉養，服食藥餌，以求長生，適自蹈於死地，此卽動而之死者之一端。緣世人但知戕賊爲傷生，而以厚自奉養者爲能養生，不知其取死同也。故申言之。”

舜徽按：《老子》此言，所以戒人君宜寡欲以全其生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古之統治天下者多早死，故《老子》言君道，以寡欲爲先。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高延第曰：“真善攝生者，安時處順，虛己遊世，無害物之心者，物亦不得而害之，故無死地。此章爲處亂世者指示，兕虎兵刃，皆凶暴不祥，喻世路之崎嶇，人情之險詐。讀《莊子》養生主、人間世二篇，足盡此章之旨，非真謂饑虎可尾也。葛洪之徒，不達此義，創

爲符咒厭勝，云可入山伏怪，謬妄甚矣。”

奚侗曰：“《說文》：‘攝，引持也。’生生有道，持之勿失，故云攝生。”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攝生”並作“執生”，“陸行”並作“陵行”，疑皆形誤。“以其無死地”句末，甲本有“焉”字，與《韓非·解老》所引及傳奕本均合，蓋原文如此，今據補。周秦諸子中爲說明事理，多爲比喻之辭以譬況之。《老子》此處所云咒虎甲兵，皆比喻之辭，高說是也。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

舜徽按：王本作“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末二句語意難明，今據帛書甲、乙本寫正。

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

舜徽按：王本作“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帛書甲、乙本並無“莫不”二字，與敦煌本合，今據刪。萬物猶言萬事，謂人君處理萬事，必歸於無爲，無爲卽道德也。

道之尊也，德之貴也，夫莫之爵也，而恒自然也。

舜徽按：王本作“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命”，嚴遵、傳奕本、敦煌本並作“爵”，與帛書甲、乙本合。今依乙本寫正。

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

奚侗曰：“亭之毒之，謂定之安之也。《說文》：‘亭，民所安定也。’引申有安定誼。《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篇》：‘亭，定也。’《廣雅·釋詁》：‘毒，安也。’它本亭毒或作成熟。”

舜徽按：王本句首有“故”字，“畜之”上有“德”字，今據帛書甲、乙本刪。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河上公曰：“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爲利也；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也。道之所行，恩德玄闡，不可得見也。”

舜徽按：此段極言無爲之道，功用甚溥，人君宜法自然，以施之於治國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奚侗曰：“道先天地而生，卽爲天下萬物之母。道爲母，萬物爲子，既因物之所從生以得其母，亦因道之所以生者以知其子。萬物爲道之子，道以無爲，使各遂其生。我守無爲之道，萬物恃我而生而不辭，則沒身無危殆矣。”

舜徽按：道家推尊無爲之道，必高遠其所從來。《老子》所云“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與所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皆誇大無爲之道，

未有天地之時，已有之矣。故諄諄申言爲人君者，必守之勿失，而後可以治天下，理萬事，以至沒身不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奚侗曰：“《易·說卦》：‘兌爲口’，引申凡有孔竅者皆可云兌。《淮南·道應》：‘王者欲久持之，則塞民于兌。’高注：‘兌，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門，謂精神之門。塞兌閉門，無知無欲，可以不勞而理矣。”

舜徽按：此言人君誠能閉明塞聰，收視返聽，以成無爲之治，則事成而身佚。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奚侗曰：“《爾雅·釋言》：‘濟，益也。’救當訓治，《呂覽·勸學篇》：‘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高注：‘救，治也。’”

舜徽按：此言人君如好自用其智，奮力有爲，則一人之智力有限，天下之事物無窮，終必身勞而事不治。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王弼曰：“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

舜徽按：此言人君所務，惟在幽微柔弱，不貴以強大剛強自賢。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高延第曰：“用其光，知白也；歸其明，守黑也。察及淵魚者不祥，不爲察，故無殃。襲，因也；常，常道；因其自然，道之常也。”

舜徽按：此言人君當掩情匿端，以愚白處，所謂大智若愚也。“襲”，王本作“習”，傳本作“襲”，帛書甲本亦作“襲”，古“襲”、“習”二字多通用。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奚侗曰：“我，代人主自我也。介，《說文》：‘畫也。’介然有知，謂有分別知識。王念孫謂‘施’讀爲‘迤’，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唯懼其入于邪道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河上公曰：“夷，平易也；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邪徑也。”

舜徽按：大道平坦可走，而常人皆喜行邪徑。比喻人君治國有無爲之道可循，竟捨之而不由，故多徇嗜欲、尚智數以自困也。此處“民”字不誤，帛書甲、乙本並作“民”，與河上、王弼本合，奚侗必改爲“人”，非是。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河上公曰：“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猶劫盜以爲服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並隨也。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哉’者，痛傷之辭。”

奚侗曰：“《左氏·文十八年傳》：‘竊賄爲盜。’《說文》：‘夸，奢也。’《荀子·仲尼篇》：‘貴而不爲夸。’楊注：‘夸，奢侈也。’盜竊人民財力以成其奢侈之行，故云盜夸。《韓非·解老篇》‘夸’作‘竽’，說解穿鑿，于誼不合。”

舜徽按：此數句言人主多欲，修其宮庭，美其服飾，以致田野荒蕪，倉廩空虛，而國家傾覆隨之，此由違乎無爲之道而然也。末句加重語氣，以痛傷之。或疑‘非道也哉’四字爲衍文，非是。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絕。

奚侗曰：“建謂建德，抱謂抱德。善建德者，外物不能動搖，故云不拔；善抱德者，一心未嘗間斷，故云不脫。”

舜徽按：王本“子孫以祭祀不輟”，帛書甲、乙本並作“不絕”，與《韓非子·解老篇》合，今據改正。而《韓非·喻老》所引，又作“不輟”，二字義通，蓋可並行。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舜徽按：五句“修之”下，河上、王弼本皆有“於”字，帛書乙本無“於”字，（甲本缺爛）與《韓非



子·解老篇》合，蓋原文如此。《韓非》作“修之邦”，與“豐”叶韻。河上、王弼本“邦”作“國”，乃沿漢人避諱本所改，今並依《韓非》所引及帛書乙本寫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河上公曰：“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以下四句語意皆同，茲不備引）《老子》言：吾何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也。”

舜徽按：二“邦”字，王本作“國”，由漢人避諱所改。傳本作“邦”，與《韓非子·解老篇》所引同，今據改。《老子》此數語，乃言道之爲用，小至一身，大至天下，得之則存，失之則亡，不可須臾離也。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

奚侗曰：“嬰兒天理渾然，無分別智故，含德最厚。”

舜徽按：此二句，河上、王弼本均作“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帛書乙本，“厚”字下有“者”字，語意始足，今據補。此言人君有無爲之厚德者，無知無欲，柔弱恬靜，有若嬰兒也。《老子》又云：“專氣致柔，能嬰兒乎？”亦卽斯旨。《漢書·賈誼傳》劉奉世注云：“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

蜂蟄虺蛇弗螫。

舜徽按：王弼本作“蜂蟄虺蛇不螫”。帛書甲本作

“蜂蜺蝦蛇弗螫”，“蜺”當爲“螫”之誤，“螫”與“蠆”音近相通。帛書與王本合，不誤也。蝦卽虺耳。

攫鳥猛獸弗搏。

舜徽按：王本作“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帛書甲本作“攫鳥猛獸弗搏”。與上語均六字爲句，辭意完足，今據改正。攫鳥，卽鷺鳥也。鷹鷂之屬，能自高空飛下攫取小鳥食之，故又稱攫鳥。《老子》此二語，乃比喻之辭，謂嬰兒專氣致柔，不受外物侵擾耳。與前文所云“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寓意正同。

骨弱筋柔而握固。

奚侗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拳握自固。無執，故無失也。”

舜徽按：帛書甲本作“骨弱筋柔而握固”，與今本合。乙本作“骨筋弱柔而握固”，蓋傳寫者誤倒二字矣。

未知牝牡之會而腴怒，精之至也。

嚴可均曰：“王弼作‘而全作’。《釋文》引河上作‘竣’，本一作‘腴’。‘精之至’河上、王弼本‘至’下有‘也’字，下句亦然。”

易順鼎曰：“《釋文》云：‘河上本一作腴’，又引《說文》‘腴，赤子陰也’。《說文》無‘腴’字，據此，則唐本有之。《玉篇》亦云：‘腴，赤子陰也。’卽本《說文》之義。是《說文》本收‘腴’字，蓋卽出於

《老子》。‘腴’、‘全’音近，故或假‘全’爲之。”

舜徽按：帛書乙本作“未知牝牡之會而腴怒，精之至也”。蓋原文如此，今據寫正。河上公注云：“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是其義已。

終日號而不嗟，和之至也。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與王弼本合，蓋原文如此也。“嗟”即今之“啞”字，他本有作“嘔”者，由形近而誤也。《老子》此語，謂嬰兒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啞者，由于無所用心，可止則止，未嘗寓喜怒于其間而和氣不散也。

和曰常，

高亨曰：“各本作‘知和曰常’，義不可通。疑‘知’當作‘精’，蓋‘精’字轉寫脫去，讀者依下句增‘知’字耳。前文云‘精之至也’，又云‘和之至也’，故此總之曰‘精和曰常’。”

舜徽按：帛書甲本無“知”字，蓋原文如此。此承上句“和之至也”而續申之曰“和曰常”，謂和柔乃養生治國之常理也。下句即繼之以“知常曰明”，文意自順。今本“和曰常”上有“知”字，乃沿下句“知”字而衍，今據帛書刪。

知常曰明。

舜徽按：此承上文，言人能知和柔爲養生治國之常理者，斯謂之明達也。

益生曰祥。

易順鼎曰：“祥卽不祥。《書序》云：‘有祥桑穀共生於朝’，與此‘祥’字同義。王注云：‘生不可益，益之則夭。’‘夭’字當爲‘妖’，蓋以‘妖’解‘祥’字。”

高延第曰：“益生卽上文‘生生之厚’。祥，妖祥也。益生者如揠苗助長，強爲增益，不得其助，適得其殃也。”

舜徽按：此言生不可益，益之則達於自然而災害至。《莊子·德充符篇》所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亦卽斯旨。

心使氣曰強。

奚侗曰：“氣周于身，以盪和爲用。心以妄動使之，則強矣。強梁者不得其死。河上本‘曰’誤作‘日’。”

舜徽按：此四句，帛書甲、乙本均作“曰”，後出本有作“日”者，由形近而誤。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魏源曰：“夫物壯則老，爲其強梁而達道也。苟知和守柔，常如赤子。則既不壯，惡乎老；既不老，惡乎已。”

奚侗曰：“弱者，道之用。故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既壯必老，不可常也，故云不道。”

舜徽按：“物壯則老”，即盛極必衰意。已者止也，謂衰竭也。此就君道立論，意謂凡不能以和柔自處而達於無違之道者，其衰竭甚早，不能長久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舜徽按：二“知”字均當讀爲“智”，古人通用。此言人君大智若愚，“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多言爲賢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奚侗曰：“玄，《說文》：‘幽遠也。’幽遠不可見，混沌之象。玄同，猶云混同。塞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是與物混同也。”

易順鼎曰：“此六句疑爲複出。《文選》魏都賦、運命論兩注皆引《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並無此六句，可證其爲衍文矣。”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並有此六句，知非後人誤衍。惟甲、乙本作“挫其銳而解其紛”在“和其光，同其塵”之上，與今本異耳。塞兌閉門，謂人君閉明塞聰也；挫銳解紛，謂人君摧折己之鋒芒，消除己之異見也；和光同塵，謂人君不立崖岸與衆融合也。六“其”字皆謂人君，所以明無爲之治，必自此始。或謂諸“其”字皆指民言，非也。《文選注》所引無此六句，乃

節取，非全文。唐人引書，大抵然矣。不可據之以疑本書，易說失之。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舜徽按：此言人君掩情匿端，羣下莫由窺測。既不得親之，利之，貴之；復不得疏之，害之，賤之也。“故爲天下貴”，言人君誠能如此，則最爲天下所重也。王弼注云：“無物可以加之也。”是已。帛書甲、乙本有三“亦”字，與河上本合，而王本誤奪矣。今據補。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吳澄曰：“正者，法製禁令，正其不正，管、商以正治國；奇者，權謀詭詐，譎而不正，孫、吳以奇用兵。奇者僅可施於用兵，不可以治國；正者僅可施於治國，不可以取天下。無事者，無爲之治。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期人之服從而天下無不服從，故唯無事者可以取天下也。”

奚侗曰：“正，政也。《文子·上禮篇》引作‘政’。奇謂奇詭，《孫子·計篇》：‘兵者，詭道也。’無事，無爲也。取，治也。”

吾何以知其然也哉？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均作“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帛書乙本作“吾何以知其然也哉？”無“以此”二

字。嚴、彭諸本亦無此二字，蓋原文也，今據帛書刪正。“吾何以知其然也哉？”乃用反問語氣以領起下文之辭。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吳雲曰：“傳本作‘夫天下多忌諱’，諸本無‘夫’字。”

朱謙之曰：“彭、范、高同傳本，有‘夫’字。”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並有“夫”字，是也。河上、王弼本均脫，今據補。此數句意謂尚智則偽生，繁令而奸起，以明有爲之不如無爲，爲人君發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奚侗曰：“無爲、好靜、無事、無欲，語異誼同，變文以叶韻耳。”

舜徽按：此四句實一意，所以明“無爲而無不爲”之旨。人君雖不自爲而羣下爲之，可以收其成功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淮南子·道應篇》曰：“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

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靡革者也；靡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高廷第曰：“悶悶，朴鄙；淳淳，渾厚；以道化民之象也。察察，苛細；缺缺，疏薄；以政治國之敝也。所以然者，法立奸生，令下詐起，如形影聲響，必然之理也。”

舜徽按：此言君道主於無爲，不以察察爲明也。“其民缺缺”，帛書甲本“民”作“邦”，證之《淮南》所引，仍作“民”，是漢時已有兩本。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

《韓非子·解老篇》曰：“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舜徽按：《老子》闡明事物正反兩方面相互轉化之理，指出壞事有時可變爲好事，好事有時亦可變爲壞事。而深慨禍福相爲倚伏，其幾甚微，無有知其究竟者，故曰孰知其極。



其無正也：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朱謙之曰：“‘其無正’，‘正’讀爲‘定’，言其無定也。《玉篇》：‘正，長也，定也。’此作定解。言禍福倚伏，孰知其所極？其無定，即莫知其所歸也。”

舜徽按：朱氏讀正爲定，是也。帛書乙本“其無正”下有“也”字，語意尤勝，今據補。此數語承上文而續申之，謂事物變化無定，有如正常者可變爲離奇，善祥者可變爲妖異。

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高亨曰：“迷謂不明於禍福正奇善妖之相尋也。”

舜徽按：王本作“人之迷，其日固久”。文字有脫奪，今據《韓非子·解老篇》所引寫正。帛書乙本亦有“也”字、“矣”字。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舜徽按：此言人主貴能深自斂抑，毋露己才。雖有方、廉、直、光之美，不以此傷物炫世也。帛書乙本無“聖人”二字，蓋偶奪去。

治人事天莫若嗇。

《韓非子·解老篇》曰：“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正則耳不聰，思慮

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聽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舜徽按：《韓非》解治人事天，皆就人君一身言。以適動靜、省思慮爲治人；不極聰明，不盡智識爲事天。謂當清靜自持，不可以有爲擾之也。此乃周秦舊義，故韓非述之。後人讀此句者，每以治理人民爲“治人”，順循天道爲“事天”，非原意也。

夫唯嗇，是以早服。

《韓非子·解老篇》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惟嗇，是以蚤服。”

舜徽按：“是以”，王本作“是謂”，蓋沿下句“是謂”而誤。帛書乙本作“是以”與《韓非子》所引合，今據改。服者，行也，用也。此言人君果能省思慮，掩聰明，而通於愛嗇之理，則不啻早行無爲之道矣。

早服是謂重積德。

《韓非子·解老篇》曰：“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則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舜徽按：“是謂”，王本作“謂之”，帛書乙本作“是謂”，與《韓非子》所引合，今據改。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舜徽按：此數語極言無爲之效。謂人君省思慮，一精神，以卑弱自處，而深有得於道德之要。柔能勝剛，故無不克。則衆人莫能測其所至，而可以保有其國。《韓非·解老篇》云：“母者，道也。”保有其國者，不失此母，則根柢深固，可以長久也。此二“國”字，帛書原文如此，知不必盡由避諱改。

治大國若烹小鮮。

《韓非子·解老篇》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淮南子·齊俗篇》曰：“《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

河上公曰：“鮮，魚也。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詩·匪風篇》《毛傳》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矣。”

舜徽按：烹，帛書乙本、敦煌本均作亨，用本字也。加火作烹，乃後增體。《詩傳》所言，與《老子》之義合。馬其昶謂義本《老子》，非也。蓋百家言主術，同歸於執本秉要，清虛自守，莫不原於道德之意（余別有專篇詳之）。為《詩傳》者，習聞古之道論，一言有合，不足怪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高廷第曰：“莅，臨也。有道之君御天下，上下安於性命之情，不邀福，不稔禍，祈禱事絕，妖祥不興，故其鬼不神。《莊子》云：‘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又云：‘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皆此義也。”

舜徽按：此云“聖人亦不傷人”，謂有道之君不以煩碎擾民也。鬼神既不作祟，聖人亦不病民，是為兩不相傷，而後無為之德交歸之。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

舜徽按：各本作“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今據帛書甲本寫正。甲本“交”作“郊”，誤增偏旁。乙本作“交”，猶未誤也。《老子》所云“大邦者下流”，乃取譬於江海。江海處下，故百川納之；大邦處下，則天下歸之。牝猶母也，母能育養人。此云“天下

之牝”，謂爲天下所會聚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二語，各本誤倒，文義不貫，又因避諱改“邦”爲“國”，今悉訂之。

牝恒以靜勝牡。

舜徽按：“恒”，各本作“常”，沿漢人避諱而改也。今據帛書甲、乙本寫正。牝牡猶雌雄也。牝之以靜勝牡，亦卽知雄守雌以弱制強，以柔克剛意。

爲其靜也，故宜爲下也。

奚侗曰：“靜者不爭，比於江海善下。”

舜徽按：此二語，各本但作“以靜爲下”。字句顯有脫奪，今據帛書甲、乙本補正。

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於大邦。

吳澄曰：“大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甘處於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

舜徽按：各本“邦”字均沿漢人避諱而改爲“國”，今依帛書甲本寫正。“則取於大邦”一句，各本無“於”字，義晦；今依甲、乙本補。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蘇轍曰：“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衆

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大邦不過欲兼畜人，小邦不過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則大者宜爲下。

吳澄曰：“大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爲下。”

舜徽按：王本作“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末句又無“則”字，今參校帛書寫正。

道者，萬物之注也。

舜徽按：各本作“道者萬物之奧”。帛書甲、乙本“奧”作“注”，並有“也”字，今據寫正。《說文》：“注，灌也。”引申有歸聚義。謂道爲萬物之所灌注也。

善人之寶也，不善人之所保也。

舜徽按：此兩句連上文讀。謂善人以道爲寶，持之勿失；不善人亦假此以自全其身也。兩句末，帛書甲、乙本並有“也”字，今據補。甲、乙本“寶”作“琛”，卽“寶”之異體。

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奚侗曰：“市當訓取。《國語·齊語》：‘市賤鬻貴。’高注：‘市，取也。’加當訓重，《爾雅·釋詁》：‘加，重也。’此言美言可以取人尊敬，美行可以見重於人。各本挽下‘美’字，而斷‘美言可以市’爲句，‘尊行可以加人’爲句，大謬。宜從《淮南》道應、人間兩篇所引訂正。二句蓋偶語，亦韻語也。”

舜徽按：奚說是也。今據《淮南子》所引寫正。然考之帛書甲、乙本，“行”字上均無“美”字，知傳寫誤奪甚早。“加人”，甲、乙本並作“賀人”，此由古讀“加”字與“賀”音近，因誤作“賀”耳。古讀“加”近“賀”，如“𡗗”從“加”聲，讀若阿；“𡗗”從“加”聲，讀古我切，皆其證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奚侗曰：“聖人常善救人，不以其不善而棄之。”

舜徽按：《老子》所云：“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足與此二語相發明。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舜徽按：帛書甲本作“共之璧”，“之”字疑衍，古人卽以“共”爲“拱”也。“駟馬”，甲、乙本並作“四馬”，後人加馬旁作“駟”耳。“置三公”，甲、乙本並作“置三卿”。“不如坐進此道”，甲、乙本並作“不若坐而進此”。文字雖有異同，而辭不害意，故仍存今本，不煩改訂也。拱璧，謂大璧也。既立天子，置三公，則有朝聘之禮。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以享于上，猶不若進

治國之道。此言進道之可貴，過於恭禮重幣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俞樾曰：“‘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九字爲句，乃設爲問辭以曉人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言人能修道則所求者可以得，有罪者可以免也。‘不曰’字、‘邪’字相應，猶言豈不以此邪？謙不敢質言也。下云‘故爲天下貴’，則自問還自答也。”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作“以求得”乃誤倒一字。帛書乙本作“求以得”，與唐《景龍碑》及傳奕本合，今據改正。“邪”字，甲、乙本並作“與”，同爲疑問詞，意合。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王弼曰：“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

奚侗曰：“道至虛無爲，能致虛極，是爲無爲也；道至靜無事，能守靜篤，是事無事也；道至淡無味，能安淡泊，是味無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姚鼐曰：“‘大小多少’下有脫字，不可強解。”

奚侗曰：“‘大小多少’句誼不可說，疑上下或有掄簡。”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此二句與今本同，是不必有



缺奪也。高延第謂：“大小多少同觀，故恩怨相等。太上無施報，此言有報者，有道之人，無論有怨無怨，惟以生育覆養爲事。自怨者觀之，則以爲報之以德耳。”馬其昶亦謂“事有大小多少，等量齊觀，而德怨胥泯也”。均可以備一解。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吳澄曰：“作，起也。所以得遂其無爲者，能圖其難於易之時，爲其大於細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大。終之難起於始之易，終之大起於始之細。故圖之爲之於其易細之始，則其終可不至於難，可馴至於大，而不勞心勞力，所以能無爲也。若不早圖之，急爲之於其始，則其終也，易者漸難，細者不大，心力俱困，無爲其可得乎？”

舜徽按：末二句，帛書甲本作“天下之難作於易，天下之大作於細”。《韓非子·喻老篇》則作“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均與今本小異，然於辭意固無害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武內義雄曰：“敦、遂二本無此二句。”

舜徽按：帛書甲本有此二句。此言善爲君者，爲之於細微之始，而不馳思廣驚，故卒能成其大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舜徽按：此言凡輕于許諾者，視事太易，必難踐言；凡視事太易者，未曾慎思，終必自困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於無難。

馬其昶曰：“猶讀‘猶若畏四鄰’之猶。猶難，連縣字，謂猶豫慎難也。”

舜徽按：末句王弼本作“故終無難矣”，他本無“矣”字。惟帛書甲本作“故終於無難”，文義爲長，今據改正。此二語重申善爲君者，遇事慎之重之，而不視之太易，故終致無難事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奚侗曰：“凡事豫則立，持危定傾，當及國家安寧；禍亂當無朕兆之時，其程功也至易。譬之物脆弱微細者，吾欲分解而離析之，事至易也。至於堅實壯盛，則難矣。”

舜徽按：帛書甲本作“其安也，易持也”。以此例之，下數句必皆有“也”字，語法相同。惜帛書此處缺爛，無由考見原文耳。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奚侗曰：“二句釋上四句誼。”

舜徽按：此二句言善爲君者，慎於事先，故無敗失。若變至而圖之，則多敗；已危而持之，則多失。“爲之於未有”，乃就上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而

言；“治之於未亂”，乃就上文“其脆易泮，其微易散”而言；所以明慎始之要。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

朱謙之曰：“《呂覽·音初篇》‘有城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高注：‘成，猶重也。’又《爾雅》以丘一重再重爲一成，《楚辭·九問》：‘璜臺十成。’十成卽十重也。”

高亨曰：“累當讀爲蓐，土籠也。起於累土，猶言起於黃土也。”

舜徽按：各本作“九層”，帛書甲、乙本並作“九成”，與傳、范本合，乃原文也，今據改正。《說文》：“層，重屋也。”周秦故書未有稱臺爲“九層”者，由成、層二字音義近而偶誤耳。下一語帛書甲本作“作于羸土”，乙本作“作于蓐土”。蓐者，盛土籠也。亦通作蓐、蓐，又聲轉爲羸，借羸爲之。

百仞之高，始於足下。

羅振玉曰：“敦煌辛本‘千里之行’作‘而百仞之高’。‘始’作‘起’。”

朱謙之曰：“遂州本、趙志堅本作‘百仞之高’，‘始’作‘起’。嚴遵本‘仞’作‘仞’。”

舜徽按：帛書甲本作“百仁之高”，“仁”卽“仞”之形譌。古文“仁”字從千心作𠂔，故乙本譌爲“百千之高”，以義不可通，傳寫者又改爲“千里之行”耳。今依帛書甲本寫正。自“合抱之木”至“始於足下”共

六句，皆言積微末以至高厚，自細小以成巨大之理，取易見之物以明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舜徽按：此數句極言無爲之有益。首言天下之事，有着意作爲而反取敗者；天下之物，有着意執持而反失去者，歸結到善爲君者，不先物爲，因物所爲，以成其無爲，故能無敗；因時推移，與物變化，而無所拘滯，故能無失也。

民之從事，恒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河上公曰：“從，爲也。民人爲事，常于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也。終當如始，不當懈怠。”

高廷第曰：“事當垂成，人情易放，精力多疲，稍有疏忽，必致危殆，棄其前功。宦急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比比然也。當加意保持，勿至幾成而敗。《莊子》所謂視其後者而鞭之也。”

舜徽按：帛書甲本作“民之從事也，恒于其成事而敗之。故慎終若始”云云，乙本作“民之從事也，恒于其成而敗之。故曰慎終若始，則無敗事矣”。甲、乙本作“其成”，不如各本作“幾成”爲安。幾者，近也，將也，謂事至將成而敗之也。意尤明晰。甲、乙本蓋由傳寫時以“幾”、“其”音近而譌。惟各本“常”字，甲、乙本並作“恒”，今據改。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吳澄曰：“難得之貨，人所欲者，不貴重之，是不欲人之所欲也，故曰欲不欲。衆人所趨者，我則不趨，衆人掉臂過而不顧，我則還反其處，是不學人之所學也，故曰學不學。”

舜徽按：此數句乃言善爲人君者，不欲衆人之所欲，不學衆人之所學，而別有事在。要歸于絕巧棄利、絕聖棄智，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耳。

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爲。

奚侗曰：“輔萬物之自然，《易·泰卦》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聖人之有爲也，不撓人之心，不逆物之情，輔相萬物自然而已。無爲而無不爲，固不敢妄有所爲也。”

舜徽按：各本均作“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以”字帛書甲、乙本並作“能”，“不”字並作“弗”，今從寫正。篆書以字作己，能字作能，《老子》原文蓋本作能，傳寫者缺脫而爲己耳。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舜徽按：帛書甲本作“故曰爲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乙本首句作“古之爲道者”，與今本同，惟誤奪“善”字耳。此言古之精于君道者，大智內明，無幽不照，外若愚昧，不耀于人聞智塞聰，使人莫由窺其端倪而絕欺蔽之原也。“非以明民”，謂不以己之聰明才智顯露於外，使羣下得洞察其淺深也。“將以愚之”，

則謂自處于無知無能以愚惑羣下，而羣下競效其智能以爲己用也。《管子·心術上篇》云：“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淮南子·原道篇》云：“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皆足以發明斯旨。古之言君道者，必主於去健美，黜聰明，所以養其神也。《韓非子·揚權篇》云：“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又云：“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神者，不測之謂也。“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卽人君韜光晦迹之術。實道論之精英，乃無爲而無不爲之根柢。自來解《老子》者，昧於斯旨，乃謂爲古代愚民政策所自出，而以秦世燔《詩書》、愚黔首比傳之，惑矣。顧歷代人君，上託斯語而行愚民之政者，固比比皆是，然非《老子》原意所在也。

民之難治，以其多智。

羅振玉曰：“景龍本、敦煌辛本均作‘多智’。”

舜徽按：各本作“智多”，而王弼注云：“多智巧詐”，下文又注云“以其多智也”，是王本原作“多智”無疑。今從《景龍碑》本寫正。多猶重也，尚也。此語承上文申言民之所以難治，由于爲人君者以己才智自賢，習於自用，則羣下相率不事事，而天下事終於無成。羣下競趨於機巧變詐以逢迎其主，而莫之能治矣。《呂氏春秋·樂成篇》云：“大智不形”；《任數篇》云：“至智棄智”；《淮南·詮言篇》云：“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皆足以發明斯旨。

故以智治邦，邦之賊也；以不智治邦，邦之德也。

舜徽按：各本作“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今依帛書甲、乙本寫正。甲本“國”字均作“邦”，乃原文也；乙本則避諱改作“國”矣。“以不智治邦”，謂人君以愚自處而以無爲治其國也。《管子·任法篇》云：“聖君任法而不任智。”《韓非子·揚權篇》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淮南子·覽冥篇》云：“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皆卽此旨。《老子》又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可與此互證。上之有爲，正由于自多其智，以智治邦耳。

恒知此兩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是謂玄德。

王弼曰：“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玄德。”

舜徽按：王本作“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今依帛書甲、乙本寫正。他本“稽式”作“楷式”，稽、楷二字，古多通用。楷式，猶言法則。“此兩者”，承上文“以智治邦”、“以不智治邦”二者而言。謂爲人君者能常知明辨于此二者之孰去孰從，則爲玄妙之德，非羣下所得窺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吳澄曰：“玄妙之德，深遠而不淺近，故人不可測。如人皆欲智，我獨欲愚，是與物相反也。”

舜徽按：此言人君以愚自處，與衆相反，而適所以

成其無爲之治。《說文》：“順，理也。”“理，治也。”爲人君者至于不以智治國，而卒乃至大治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舜徽按：此言爲人君者，宜謙虛自守，卑弱自持，法江海之居下而爲百谷所歸往也。古之王公，自稱孤寡不穀，是以言下之也；不敢爲天下先，是以身後之也。故處上處前而天下不厭惡，蓋由其貶抑退遜，在能不爭，而天下之人亦莫能與之爭也。《淮南子·說山篇》云：“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實本《老子》此語。

小邦寡民，使有十百人之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遠徙。有舟車無所乘之，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舜徽按：此段文字，各本多異，今參合帛書甲、乙本寫正。“十百人之器”，謂羣衆所持以自衛之器，卽武器也。今本誤連“十百人”三字爲“什佰”矣。“遠徙”與“重死”對言，謂避免遠徙也。後人不究其義，擅加“不”字矣。兩“有”字句，各本均增“雖”字；“安其居”句，各本倒在“樂其俗”上，今悉依帛書訂正之。此段乃道家述古之辭。或得之傳聞或出於意想，周秦諸



子中類此者衆，不獨老子之書有之也。若《莊子·胠篋篇》所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尤與《老子》此段文字相合，其所由來遠矣。《莊子》明云“昔者”，則爲述古之辭而非欲導斯世以反諸“老死不相往來”之時，意固甚明。莊周所稱容成氏以至神農氏，至爲荒遠，乃謂人類原始社會無階級無剝削之世。食、衣、居、俗雖甚朴陋，而人人各遂其生而處于甘、美、安、樂之境。所謂小邦寡民，亦特指當時之部落氏族耳，非真如後世之建國立制也。老子生于周末擾攘之會，目覩斯民塗炭之苦，故追思太古無剝削、無壓迫之樂，偶爾稱述及之。論者遽據此謂老子欲導斯民返於太古之無事，失其旨矣。他若《淮南子·齊俗篇》所云：“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得其所。”《論衡·說日篇》所云：“古者質朴，鄰國接境，鷄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同爲稱述遠古之辭，學者慎無拘泥于其所言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均作“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而“善者不辯”二句，他本或在“知者不博”二句之後。知自來傳本，此數句語既參差，字復多異，今據帛書乙

本寫正。信實之言，歸於朴厚，故不美；甘美之言，務尚夸飾，故不信；有真知者，不炫其博；好博觀者，多無真知。力行善者，不自矜重；自矜重者，必無善行。人君聽言觀人之術，宜留意及此，故《老子》言之。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均作“不積”，今依帛書甲、乙本改。《莊子·天道篇》云：“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足以發明“無積”之旨。積謂停滯也。善爲君者，不以天下之事滯於一己，而必與天下之人共治之。任人之才而不任己之智，羣下效力，而己收其成功，故曰己愈有、己愈多也。

故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舜徽按：帛書乙本句首有“故”字，今據補。天之生物，任其自然而化育之，是利而不害也。人君之治國，分委羣下而自處下，是爲而不爭也。

天下皆謂我大，大而不肖。夫唯不肖，故能大。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舜徽按：王本作“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他本文字，復多異同。今據帛書乙本寫正。首句之“我”，謂“道”也。《老子》明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

曰大。”是“大”者，道之別名。故此處首句“天下皆謂我大”，猶云天下之人，皆稱道爲大也。後人附注“道”字於“我”字下，展轉傳鈔，竄入正文，故王弼本遂作“天下皆謂我道大”矣。帛書乙本無“道”字，可證也。肖者，象也，似也。不肖，猶言無似，謂無所象似也。道之爲物，“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不能比擬他物而形狀之，故曰“大而不肖”。唯其不可得一物而比擬形狀之，此其所以爲大也。若道可得而形狀之，則久矣不能成其爲大矣。此數語乃言道之不同於他物，語意甚明。

我恒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舜徽按：首句各本奪“恒”字，今據帛書甲、乙本補。此承上文續申君道之要。“我”字指“道”言，謂君道之寶有三，必持之勿失。慈謂柔，儉謂嗇，不敢爲天下先，謂不先物爲也。君道之要，盡于此矣。故言人君南面之術者，目此三事爲三寶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高延第曰：“至柔馳騁至剛，故能勇；知足常足，故能廣；善下而不爭，故能爲君長。”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無“夫”字，今據帛書乙本補。末句，各本作“故能成器長”。帛書甲本作“故能爲成事長”，與《韓非·解老》所引合，今據改正。成事之長，謂人君也。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死矣。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無“其”字、“則”字，今據帛書甲、乙本補。此言爲人君者，今若捨棄慈、儉、後之三寶，而專務勇、廣、先，則必自取覆敗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建之，以慈垣之。

舜徽按：此言柔弱能勝剛強也。譬之應戰，尚可以柔克剛，以弱制強，推之其他，概可知矣。末二句，各本皆作“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今據帛書甲、乙本改正。建謂樹立也，垣謂圍護之也。意謂天之將欲樹立一人以爲君長，必以柔弱之道圍護之，使不致傾敗也。《釋名·釋宮室》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也。”是垣、衛義通。

故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

舜徽按：各本句首無“故”字，今據帛書乙本補。此承上文續申其義，有“故”字自勝。首三句取譬於用兵者不以威武氣勢勝人，卒能克敵制強。未及交兵接刃，不戰而能屈人之兵，卽“勝敵不與”之義也。爲人君者，貴在任人之才而不任己之智，清虛自守，卑弱自持，卽“用人爲之下”之旨也。非有不爭之德，曷由臻此？故末語總結之。

是謂用人配天，古之極也。

舜徽按：各本作“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帛書甲、乙本無“之力”二字，但作“是謂用人，是謂配天，古之極也”。詳審文義，甲、乙本與通行本均重出“是謂”二字，今徑刪去，寫定爲“是謂用人配天，古之極也”。用人配天，猶云以人配天。謂善爲君者，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與天合德，此以入道配天道，乃自古君道之極則也。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吳澄曰：“又申言慈之寶。‘不敢’字言用兵。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爲主，肇兵端以伐人也；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

舜徽按：各本無“曰”字，今據帛書甲、乙本補。用兵之難進易退，卽以逸待勞、以靜待躁之旨。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

奚侗曰：“有行若無行，故云行無行；無攘臂忿爭之狀，故云攘無臂；有敵若無敵，故云扔無敵；不以兵彊天下，故云執無兵。”

羅振玉曰：“‘執無兵’，敦煌辛壬本此句在‘扔無敵’前。”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執無兵”亦在“扔無敵”前，蓋原文如此，今據乙正。河上、王弼諸本皆誤倒在下，傳寫者亂之也。

禍莫大於無敵，無敵近亡吾寶。

舜徽按：各本作“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輕敵”，帛書甲、乙本均作“無敵”，謂曰無敵人，輕蔑之也。“幾喪”，甲、乙本均作“近亡”。“近”與“幾”聲通義同，猶“畿”之通于“圻”耳。今據帛書甲、乙本寫正。此處所言“寶”，謂三寶中之慈也。不能自處柔弱，則失所寶。

故稱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舜徽按：各本作“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相加”，帛書甲、乙本並作“相若”，蓋原文作“若”，聲轉爲“如”，傳寫者又由“如”譌作“加”耳。甲本作“稱兵”，乙本作“抗兵”，“稱”與“抗”皆可訓“舉”，義相通也。今據甲本寫正。兩敵對壘，而哀者勝，以見慈之爲用甚弘，魏源云：“與慈相反者莫如兵。故專以兵明慈之爲用，而儉與不敢先皆在其中也。老子見天下方務於剛強，而剛強莫甚於戰爭，因卽其所明者以喻之。使之卽兵以知柔退，卽柔退以反於仁慈，非爲談兵而設也。”必具此識，而後可悟《老子》之談兵，皆因事取譬，以明柔之爲用，其意本爲君道而發，不知者遽謂此書爲兵家言，非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吳澄曰：“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甚易知，其事甚易行也。世降俗末，天下之人，莫能知其言之可貴，莫能行柔弱謙下之事者。”

舜徽按：帛書甲本作“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

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乙本作“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兩本復小有異同。其與今本不合處，大抵帛書文句多有虛詞以爲語助，而今本概從省略。但求辭不害意，今亦不復一一據補也。老子教人柔弱謙下，亦特爲君道發耳。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奚侗曰：“言宗事君，謂道德也。既不知言宗事君，則我之爲我，更無有知之者矣。”

舜徽按：帛書甲本作“言有君，事有宗”。而乙本與今本同。《淮南子·道應篇》引此二句亦同今本，知不誤也。甲本由傳寫者互異一字耳。宗、君，猶言主綱、要領也。老子自謂闡發君道之言雖多，而其中有主綱；人君所務之事雖繁，而其中有要領，一歸於柔弱謙下而已。深慨時人愚而無知，是以不知我言之可貴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河上公曰：“希，少也。惟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爲貴也。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懷，不以示人也。”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均作“則我者貴”，高亨讀“則”爲“賊”，謂“賊我者貴”，與“知我者希”相對成文，非也。帛書甲、乙本並作“則我貴矣”，與敦煌本合，此乃原文，今從寫正。知希則貴，與老子所言“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語足相發。老子之意，謂知我言之可貴者少，益

見我言可貴；若盡人而能知我之言，則我與衆言相同，不足貴矣。褐，毛布，古代賤者所服。末句乃深慨聖人外不華飾而內懷大寶，衆人固不足以知之，亦不求人知也。帛書甲、乙本“褐”字下均有“而”字，與傳、范本同，今據補。

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矣。

奚侗曰：“尚，上也。知之而不自以爲知，是謂上德之人；若不知而自以爲知，則有道者之所病也。河上、王弼本均作‘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文誼不顯，茲從《淮南子·道應篇》所引改。”

舜徽按：帛書甲本作“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不知不知”，當是“不知而知”之譌。乙本作“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亦有脫奪。必有兩“而”字、兩“矣”字，文義始顯。傳寫周秦故書，原有虛詞有不宜省略者，此類是矣。奚侗據《淮南》所引改正，是也。今從之。

####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朱謙之曰：“遂州本無‘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二句，與景龍本同。”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均無此二句，蓋原文如此，今據刪。河上、王弼本有此二句，蓋沿下文而衍耳。惟《潛夫論·思賢篇》已引《老子》“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則《老子》中複出此二語，由來已早。



是以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

奚侗曰：“聖人之所以能不病者無它，以能病其所病，故不病耳。”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句首並有“是以”二字，乙本有“之”字及兩“也”字，今據補。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奚侗曰：“威，即謂可畏之事，如刑罰兵戎之屬。民不畏其所可畏，其故由于不能安居樂業，而禍亂自茲起，則大可畏者至矣。此為治天下者垂戒，非為凡人言也。”

舜徽按：帛書乙本“民”下有“之”字，下句作“則大畏將至矣”，意同。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奚侗曰：“狹即《說文》陝字，隘也。隘有迫誼。厭，《說文》‘笮也’。此言治天下者，無狹迫人民之居處，使不能安舒；無厭笮人民之生活，使不能順適。”

舜徽按：王弼本作“無狎”，河上、景龍、敦煌本均作“狹”。作“狹”是也。

夫唯弗厭，是以不厭。

高亨曰：“上厭字即‘無厭其所生’之厭；下厭字即‘天下樂推而不厭’之厭。言夫唯君不厭迫其民，是

以民不厭惡其君也。”

舜徽按：各本均作“夫唯不厭，是以不厭”。上“不”字，帛書甲、乙本並作“弗”，古人行文，二句相聯，有易字見意之例，今從改正。

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也，自愛而不自貴也，故去彼而取此。

河上公曰：“自知己之得失，不自顯見德美于外，藏之于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高榮名于世。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舜徽按：帛書乙本有兩“也”字，三“而”字，文義益顯，今據補。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高延第曰：“敢謂強梁，不敢謂柔弱。強梁者死之徒，故殺；柔弱者，生之徒，故活。利害所以不同者，蓋物壯則老，強梁不道，天且惡之，禍福景響，莫知其然。”

舜徽按：此亦為君道而發，非為衆人說教也。如上文所言“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弗厭，是以不厭”，即“勇於不敢則活”之意。反是，則暴戾恣睢，民必羣起攻之，自至於勇於敢則殺矣。

是以聖人猶難之

高亨曰：“嚴遵本、六朝寫本殘卷、《景龍碑》、《龍

興觀碑》並無此句。”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並無此句，知爲傳寫者竄入無疑，今據刪。老子言“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於無難”。已見上文。傳寫者援彼文句附注於此，後又誤入正文耳。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舜徽按：帛書乙本作“不單而善勝”。“單”當爲“戰”之譌缺。下又云：“單而善謀。”“單”當爲“繹”之譌缺，繹音闡，寬綽也。乙本作“天罔怪怪”。“怪”當爲“經”，《說文》多部：“經，大也，從多，圣聲。”段玉裁謂與恢音義皆同，是也。此數語乃言爲人君者宜法天，所謂道法自然也。天無爲而萬物化，人君無爲而萬事理，故《老子》陳君道，歸本於法天。

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殺懼之也？使民恒且畏死，而爲奇者吾將得而殺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則恒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也。夫代大匠斲，則希不傷其手矣。

舜徽按：此段文字，各本均有脫奪，義不完足。帛書甲本亦甚缺爛。今以乙本爲主，參取甲本之長而寫定之。如乙本作“若何”，甲本則作“奈何”，與今本合，故仍作“奈何”。其他虛詞爲今本刪汰者，亦據甲、乙二本補之，俾語意顯豁易解耳。代大匠斲，乃喻君行臣職也。道論之精，主於君無爲而臣有爲。君行臣職，乃主術之所忌，故《老子》又以傷手爲戒。此處雖但言司

殺之事，而其他可類推也。《文子·上仁篇》云：“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斯論足以發明《老子》之旨。

人之飢也，以其取食逸之多也，是以飢。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爲也，是以不治。民之輕死也，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舜徽按：此段文字，當以帛書甲、乙本爲正，今據寫定。兩本文句全同，惟“逸”字乙本作“說”耳。此字雖不見《說文》，而從辵與從足義同。考其聲類，“逸”從兑聲，與“遂”從豕聲音近，古韻又同部，其義當爲途徑。傳寫者誤書作“稅”，非其旨也。顧後漢郎顗，在所上章奏中已引《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見《後漢書·郎顗傳》）與今本《老子》同，則其致謫亦已舊矣。不有帛書，固無由訂正之也。“人之飢，以其取食逸之多”，有“取食”二字，意尤明白。此謂人之不得飽食，由於謀生之途不一，未能皆歸農耕也。《管子·治國篇》云：“民作一，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商君書·農戰

篇》云：“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可知周秦諸子言及治道，皆主於一民於農。《老子》言“人之飢，以其取食逸之多”，亦以未能盡歸于農爲病耳。《老子》此章所言“人”、“百姓”、“民”三者分別甚明。“人”蓋統百工技藝而爲言；“百姓”謂百官；“民”則專指從事農耕者。老子推原百工技藝之所以乏食，由於謀生之途雜而不務農耕；百官之所以不治其事，由於人君之好任己智，而臣下相率怠廢；農民之所以輕死犯上，由於飢凍已甚，迫於求生，故不惜鋌而走險耳。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高亨曰：“無以生爲者，不以生爲事也，卽不貴生也。君貴生則厚養，厚養則苛斂，苛斂則民苦，民苦則輕死。故君不貴生，賢於貴生也。”

舜徽按：此爲人君言也。人君惟能不求所以自厚其生，則內不致以嗜欲自戕其身，外不致以剝奪激起民變，乃適所以自貴其生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奚侗曰：“兵強則以殺伐爲事，終致滅亡，各本多作‘兵強則不勝’，非是。木強則失柔韌之性，易致斷折。‘折’，各本或作‘共’，或作‘兵’，皆非是。‘折’以殘缺誤作‘兵’，復以形近誤爲‘共’耳。”

舜徽按：兵強二語，王本原作“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列子·黃帝篇》、《文子·道原篇》、《淮南子·原道篇》並引作“兵強則滅，木強則折”。蓋原文如此，今據改正。此段文字，見之帛書甲、乙本者，多誤增字，未可從。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嚴遵曰：“夫弓人之爲弓也，既殺既生，既翕既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馳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

奚侗曰：“天道無私，喻如張弓，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要于均平而已。”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陸希聲曰：“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爲人道，損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者乎！”

舜徽按：法天之道以爲人道，卽前文所謂“用人配天”也。用人配天，《老子》以爲唯深于君道者能之。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若此其不欲見賢也。

舜徽按：末句，河上、王弼本作“其不欲見賢”；《景龍碑》本作“斯不見賢”；辭義不顯，今據帛書乙本

補正。不欲見賢，河上公謂“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畏天損有餘也”是已。《文子·十守篇》云：“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其足，故能成其賢。”此論足以發明《老子》不欲見賢之旨。其意以爲善爲人君者，唯不欲見賢，而後能成其賢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高廷第曰：“水之攻堅，所謂雷水穿石也。受國之垢，即國君含垢也。受不祥，即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至尊而以卑下自處，至德而以孤寡不穀爲稱，事若相反，實正理也。此語並發明上下篇立言之旨，凡篇中所謂致虛守靜；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柔弱勝堅強；不益生，則久生；無爲則有爲，不爭莫與爭；知不言，言不知；損而益，益而損；言相反而理相成，皆正言也。恐世人不察，故著此以曉讀者。”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莫之能勝”，景龍本“勝”作“先”，與敦煌、遂州本合，今據改正。其作“勝”者，沿下文兩“勝”字而譌也。《莊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郭象注：“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宣公十五年《左傳》云：“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杜注：“忍垢耻。”

然則古之善爲君者，有受垢含垢之道，實亦人君南面之術也。今本《老子》作“受國之垢”，不誤。帛書甲本作“受國之詬”，由與“垢”形近而誤；乙本作“受國之詢”，則又由“詬”而譌爲“詢”耳。凡此等處，古本未必盡是，今本未必全非，遠若帛書，亦有不可據者，貴能慎思而審辨之，無庸曲從以改今本。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高延第曰：“人有怨心，從而平之，雖不尋仇構釁，其意終未釋也。喻治國者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及其有事然後圖之，不足爲善矣。契，券要也。《曲禮疏》：‘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故有左右。’鄭氏注以右契爲尊，則此執左契，亦老氏謙下之詞爾。徹，卽善行無徹迹之徹，謂執徹也。此喻聖人以德化民，爲之於無事之時，不必刻責於人，人自歸之。如左契在我，人自以右契來合之。無德之人，以法令期會爲防制，使天下之衆，同出於一途，不可必得之事也。德所以爲人歸往者，蓋善人天之所佑，天且不違，況於人乎？”

舜徽按：古人以右契爲上，故秦漢虎符，皆右在皇帝。必右契始可責取，左契待合而已。此云“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乃言善爲人君者以卑弱自處，不爲主而爲客之意。

## 老子疏證卷下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奚侗曰：“《易象下傳》：‘未變，常也。’虞注：‘常，恒也。’此云常，謂恒久不變。可道，如禮樂刑政之道，出于時會；可名，如色香聲味之名，起于見觸；然皆不可常。”

舜徽按：各本“常道”、“常名”，帛書甲本並作“恒道”、“恒名”；且此數句有四“也”字；今從寫正。乙本惟首句與甲本同，餘皆缺脫。《說文》：“恒，常也。”二字義同。甲本作“恒”，乃原文。後因避漢文帝諱改“恒”爲“常”。然自《韓非·解老》，《淮南·汜論》、《道應》、《本經》，《文子·道原》、《精誠》、《上仁》、《上禮》諸篇所引，俱作“常”，不作“恒”，知今本改字，由來已舊。《韓非》作“常”，則漢世傳寫者所追改也。此數語謂道之可稱說者，非久長不變之道；名之可傳述者，非久長不變之名。此處所稱久長不變之道，謂君道也。《淮南子·齊俗篇》云：“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汜論篇》云：“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蓋治人之具，因時而變，非可久長守之者也。惟人君南面之術，蘊之於己，不見於外，乃治國之常道，歷久遠而不可變者。此乃老子宣揚君道之言，意謂凡人世可用言語稱說之道之名，皆非其至者，以此見君道之可貴。君道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故不可稱說也。

無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

奚侗曰：“無名、有名，皆謂道。天地之始，未立道名。既有名矣，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固萬物之母也。”

舜徽按：各本多作“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今依帛書甲、乙本寫正。考《史記·日者傳》引作“無名者，萬物之始也”。而王弼注云：“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可知此文兩句皆作“萬物”，與帛書合，乃原文也。《老子》形容君道之大，每高遠其所從來。若所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無名萬物之始也。又云：“可以爲天下母，強爲之名曰大”；即有名萬物之母也。

恒無欲也，以觀其眇；恒有欲也，以觀其所噉。

河上公曰：“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

舜徽按：各本作“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今依帛書甲本寫正。乙本亦有兩“也”字，末句亦作“以觀其所噉”。妙、眇古人通用，指幽深精微之理。《說文》：“噉，口也。”（今本誤作“吼也”，茲依段注改）噉與竅義同，謂孔穴也。空虛能受，故引申有歸趣義。今本誤“噉”爲“微”而意晦矣。帛書兩句之中，各有“也”字稍逗，可證漢以上人，均讀無欲、有欲爲句。與河上、王弼、孫盛諸家讀同，是已。其後若司馬光、王安石、范應元諸家，則並於“常無”、“常有”斷句，而以“欲”字連下讀，非原意也。帛書有兩“也”字，而句讀分明，故原文所用虛助字有不宜刪去者，此類是已。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河上公曰：“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

吳澄曰：“玄者，幽昧不可測知之意。”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此二句並作“兩者同出異名同謂”八字，蓋由傳寫時已有脫奪，故句意不完足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高廷第曰：“玄之又玄，即《莊子》‘深而又深，神而又神’，贊道之詞。猶云無聲無臭。門者，人所共由，喻道爲萬物所由生，萬事所由出也。”

舜徽按：玄謂微妙難識也。人君有欲無欲，同爲不可測，故曰同謂之玄。復贊歎此微妙難識之道，乃萬事萬物之本，不可須臾離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舜徽按：此言君道之所以爲美善，不同於世俗之所謂美善也。世俗以有爲爲美，而君道以無爲爲善；世俗以煩勞相尚，而君道以簡易相高；世俗以尊威自重，而君道以謙下自處；世俗競炫其才智，而君道率安於愚弱。舉凡天下所共推爲美且善者，皆君道之所忌，當深惡而痛絕之。凡善爲君者，不必與世俗計美惡，校短長。所謂“君無爲而臣有爲”；“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皆道論之精英，故《老子》於此發之。

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後之相隨，恒也。

舜徽按：各本“盈”作“傾”，無“恒也”二字，又刪去各句中“之”字、“也”字。今依帛書甲、乙本寫正。“恒也”，乃總結上六句之辭，必不可少，今本奪去久矣。《老子》言事物之可名者，如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類，皆以相對而存在。且皆相互依賴，彼此轉化，包含有樸素辯證法思想。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  
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高延第曰：“聖人知可道可名，不足爲盡善盡美，故以無爲爲治，不貴言語條教，來者不逆，爲者不宰，功成則退，不爲外物重輕，人反以成功歸之不去，所以爲常道常名也。”

舜徽按：聖人，指善爲人君者，亦即深通君道之人。此段文字爲闡明君道而發，而歸結爲“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意甚顯豁。帛書甲、乙本並無“生而不有”句，與敦煌本合，今據刪。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舜徽按：此言善爲君者當去好去惡，掩情匿端，不使臣下有緣以侵其主也。此處所言之“民”，指臣下言。

尚賢，謂人主矜重己之才智以與臣下競短長也。《韓非子·二柄篇》云：“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此等議論，皆足以發明《老子》之旨。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舜徽按：四“其”字，皆指人君自己。虛其心，謂少欲也；實其腹，謂廣納也；弱其志，謂謙抑能下人也；強其骨，謂堅定有以自立也。

恒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舜徽按：首句依帛書甲、乙本寫正。此言人君既去好去惡，掩情匿端，則臣下無由施其智巧以欺蔽其上。雖有才智之士，亦不敢有侵主之事。羣臣各守其職，君但責其成功，以收無爲而無不爲之治。

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高廷第曰：“冲，虛也。無爲之道，虛靜淵深，濡潤萬物，不以盈滿爲事。宗，主也。萬物被其化，故爲之宗。挫其銳，謂反於太朴，不爲厓異；解其紛，謂清靜自處，不與物相撓；和其光，不自表暴，光而不耀。

也；同其塵，不修身以明汙，受天下之垢也。湛，沒也，安也。言無爲之人藏身萬物之上，若存若亡。帝謂天帝，言無爲之道，爲萬物母，誰得而予之非獨不得子，此道實先天地而有也。”

舜徽按：首句依帛書乙本寫正。自“挫其銳”以下四句，已見前文。譚獻、馬敍倫並謂此爲複出衍文，而其實不然也。帛書甲、乙本並有此四句，知原文如此。古人闡明一理，數語不嫌重見。故文句相同者常前後疊出。周秦故書，大抵然矣，不必疑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奚侗曰：“芻狗，河上、王弼均以爲兩物，大誤。《莊子·天運篇》：‘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囊之而已。’《釋文》李云：‘結芻爲狗。’老子以芻狗喻自然人物，貴賤各因其用，生死自遂其性，不必有心仁愛之也。天地之于萬物，聖人之于百姓，莫不皆然。”

舜徽按：《老子》所言“芻狗”，乃喻用則重之、不用則棄之之意。天地大矣，值春生夏長之時，則草木任其怒茁，百花任其競芳，有似乎用之以飾美大地也。迨乎歲功既成，風寒以襲之，冰雪以摧之，葉落枝折，同歸枯萎，徒給蘇樵而已。老子因近取譬，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也。惟人亦然，當其居百官之位，爲人君治事，有爵秩以寵之，有車服以榮之，有似乎尊之以共濟艱難也。迨乎狡兔死而走狗烹，廢而不用，則任其老死牖下耳。故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

狗。”聖人，謂人主；百姓，謂百官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吳澄曰：“橐籥，冶鑄所以吹風熾火之器也。爲函以周罩於外者，橐也；爲轄以鼓扇於內者，籥也，天地間猶橐籥者，橐象太虛，包含周徧之體；籥象元氣，絪縕流行之用。不屈，謂其動也直；愈出，謂其生不窮。”

舜徽按：“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天地本體雖爲空虛，然生長萬物，無窮竭時；常動搖之，而變化益見也。河上公注云：“言空虛無有屈竭時”；王弼注云：“虛而不得窮屈”；並以窮竭訓屈，乃古義也。《禮記·樂記》所云：“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卽所謂“動而愈出”也。

多聞數窮，不如守中。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景龍碑》本均作“多言”；帛書甲、乙本，《遂州碑》本，均作“多聞”。作“多聞”者是也，今依帛書寫正。凡人以多聞博識自許，其心必不能虛。此二語乃謂人君不以多聞博識爲尚，而必以清虛自守也。《韓非子·難三》云：“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淮南子·詮言》云：“獨任其智，失必多矣。”然則雖有一人之多聞，不足恃也。人君以智自賢，其術恒窮，不如守虛之爲愈，亦所以續申上句“虛而不屈”之指。《老子》所云“守中”，與《管子·白心篇》所云“有中”，皆謂守虛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高廷第曰：“此章《列子》以爲《黃帝書》中語，《老子》引之。道本虛靜，體用兼該。谷神者卽‘爲天下谷’之谷，喻其深也。不死，猶云‘至誠不息’、‘常德不離’也。玄牝卽釋谷神，謂其虛靜幽深。無爲之道，深藏若虛，而先天地，母萬物，故爲天地根。緜緜，不絕兒。惟其藏之深，守之固，是以存而不亡也。用之不勤，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不必煩苦創制以相擾也。”

舜徽按：君道主虛靜，故《老子》常以谿、谷、雌、牝爲喻。以其中虛，故名曰谷；以其因應變化，故稱爲神；以其不屈愈出，故曰不死。“谷神不死”四字，足以盡君道之體用。玄牝本以喻道，以其先天地生，故稱爲天地之根耳。《老子》之書，不成於一時，不出於一手。其中多采用舊說遺言以明其指。有不標明出處者，若此數語，《列子·天瑞篇》引作《黃帝書》，而《老子》不言所出，是也。亦有標明者，凡稱“聖人云”、“建言有之”之類是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奚侗曰：“天地生養萬物，不求自益其生，故超然于萬物之外，而能長生。”

舜徽按：此言天地無爲于其間，而任萬物自生自長以成天地之化，以見無爲之有益。



是以聖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舜徽按：各本均作“後其身而身先”。帛書乙本“後”作“退”。甲本作“芮”，則由聲而變也。退字篆體作，與形近，故傳寫易得爲後耳。得字或從內作，故帛書中退字又多作芮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王弼曰：“無私者，無爲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舜徽按：帛書乙本作“不以其無私與？故能成其私”。甲本首句末亦有“與”字，作反問語氣。今本作“邪”，意同。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高延第曰：“幾，近也。水柔而處下，又能滋養萬物，受天下之垢，故近於道。惡謂川澤納汙，此皆水之性也。”

舜徽按：道謂君道也。此言就下受垢，皆衆人之所惡，而水能處之，與人君南面之術相近似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蘇轍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

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冰，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舜徽按：自來注說此數句者，多不得其解。惟河上公注與蘇氏說就水善立訓，曲達其旨，可從也。古人稱說物象之美，每好以人之德行比擬之。《老子》稱水之七善，亦猶古人稱玉有五德，或謂玉有六美，皆取仁、義、禮、智爲言，亦比喻之辭耳。此處所舉七善，實承上句“上善若水”而續申之，乃言水之德美無疑，不必別爲之說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高延第曰：“揣，擊治也。錘擊刀劍使之鋒利，則易折缺。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人事亦然，故曰天之道。”

舜徽按：此亦爲君道而發，言當以盈滿爲戒也。帛書甲、乙本均作“植而盈之”，“植”蓋“殖”之形譌，嚴君平作“殖而盈之”，是已。殖謂積其財貨也。《說文》：“揣，量也；一曰捶之。”此處用後一義。王弼本“銳”作“稅”，乃形譌，河上本猶未誤，今據改。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河上公曰：“營魄，魂魄也。”

舜徽按：一謂道也，即君道也。君道主於無爲，《老

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則謂：“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可知一卽無爲，無爲卽道。《管子·心術下篇》云：“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老子》之言“抱一”，猶《管子》言“執一”也。《老子》之意，謂人君必抱此無爲之道而不失，始可君臨天下，故設爲問辭，明其不可偶離也。

###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高亨曰：“《管子·內業篇》：‘搏氣如神，萬物備存。’尹注：‘搏謂結聚也。’《老子》之‘專氣’，與《管子》之‘搏氣’同。”

舜徽按：帛書乙本作“搏氣至柔，能柔兒乎？”“搏”卽“搏”之形譌。嬰兒柔弱已甚，無知無欲。故古之言君道者，多比擬及之，謂宜以此爲式也。

###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舜徽按：玄，幽遠也。玄覽，謂鑒察幽遠也。古稱“察及淵魚者不祥”。人君不宜以察察爲明，故必滌除此習，以求免於疵累。

###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舜徽按：“爲”字河上、王弼本均作“知”。今據《景龍碑》、《開元幢》、《古樓觀碑》改。古之言君道者，主於無爲，故愛民治國，必以此爲先。今本多作“能無知乎”，與下一語重複，不應兩見。傳寫者沿下文而誤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舜徽按：“爲”字，王弼本作“無”，今據帛書乙本改。《景龍碑》、《開元幢》、《古樓觀碑》並與乙本同也。天門，謂耳目也。古之言君道者，不貴以一己之耳目知天下，而貴以天下之耳目爲己用。《韓非子·姦劫弑臣篇》、《呂氏春秋·任數篇》，皆嘗暢發斯理。所謂“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卽“爲雌”之意。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舜徽按：“知”字，王弼本作“爲”，今據帛書甲、乙本改。《景龍碑》、《開元幢》、《古樓觀碑》並與帛書同也。明白四達，是無所不知也。知而不自以爲知，乃君道之所尚。《韓非子·揚權篇》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呂氏春秋·任數篇》云：“去智無以知則公。”皆卽“無知”之意。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奚侗曰：“玄德，猶云至德。以其深遠，故云玄也。”

朱謙之曰：“‘是謂玄德’，文中共三見。‘生而不有’下四句，亦重見。此蓋讚歎之辭，故不避重疊。”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吳澄曰：“輻，輪之輳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爲器，謂以土和黏膩之土爲陶器也。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其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

舜徽按：此處舉三事爲例，以明物之空虛處，正其有用處，皆所以證發無爲乃可有爲之旨，爲君道而言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魏源曰：“視久則眩，聽繁則惑，嘗多則厭，心不定，故發狂。”

高廷第曰：“四者皆徇於外物，惑亂神志，故聖人去之，而取尚清靜。”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奚侗曰：“貪貨必至害行。《儀禮·聘禮記》：‘多貨則傷于德。’”

舜徽按：前文已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王弼注云：“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篋，沒命而盜。”卽此所謂“令人行妨”也。言人君貪貨，則臣下競爲非邪以陷於非義耳。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王弼曰：“爲腹者，以物養己；爲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不爲目也。”

舜徽按：《老子》所言“爲腹不爲目”，乃就君道而發。君道無爲，主於任人而不任智。使天下之人，皆爲己用，卽所謂以物養己也。如自賢己智，代行臣職，則以物役己矣。腹與目，特取譬而爲言耳。腹以喻內，目以喻外。爲腹，謂有益政理；爲目，謂取悅於衆也。“去彼取此”，謂去彼有爲而取此無爲也。此段文字，帛書乙本作“五色使人目盲，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聾。是以聖人之治也，爲腹而不爲目，故去彼而取此”。甲本文句敘次與乙本同，惟文字有不同耳。如“貨”作“貨”，“爽”作“啗”，皆異體也。覈之文義，通行本敘次整齊，順理成章。甲、乙本顛倒錯亂，蓋由傳寫者亂之。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奚侗曰：“二句自是古語，而詞意不相比，疑有誤文。注家皆迂回其辭以就之。”

舜徽按：此二語乃上世遺言，故《老子》采用之，而又分釋其義於下也。“辱”與“大患”對舉，皆名詞；“寵”與“貴”皆動詞。“寵”謂愛之，“貴”謂重之也。《老子》言君道，嘗言：“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又言“大白若辱”，辱卽後起“黜”字，《玉篇》：“黜，垢黑也。”古之言君道者，以居下爲重，所謂“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也。人主以居下爲道，故不避垢辱而反愛之，且受之若驚，

此即所謂“寵辱若驚”也。人主之於國家，惟恐其有大禍患，故重視之若護頭目百體，惟恐其生疾病焉。此即所謂“貴大患若身”也。必如此理解，而後下文始可宣究其旨趣。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舜徽按：王弼本作“寵爲下”，乃原文也。帛書甲、乙本作“寵之爲下”，則誤衍“之”字矣。河上本作“辱爲下”，乃由不解“寵爲下”之義而改“寵”爲“辱”耳。陳景元、李道純本，均作“寵爲上，辱爲下”，以意分爲二事而上下之，尤無謂也。《老子》所云“寵爲下”，猶言“愛居下”耳。與其所云“以靜爲下”，“善用人者爲之下”，“大者宜爲下”，皆指居下言，其意正同。古之陳君道者，謂人主宜卑弱自處，故恒以居下爲言。既云愛居下矣，故得之若驚，謂驚喜也；失之若驚，謂驚恐也。此處所云得失，謂人主有時而得居下之道，有時而失居下之道耳。得之則喜，失之則恐，故皆以“若驚”言之。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舜徽按：吾，人君自謂也。此言人君所以惟大禍患爲憂者，由於自私其身，貪權位而恐失之耳。假若人君能不自私其身，復何禍患之足憂乎？及猶若也，見《經傳釋詞》。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高亨曰：“貴者，意所尚也；愛者，情所屬也。以身爲天下者，視其身如天下人也。若猶乃也。視其身如天下人，是無身矣，是無我矣，是無私矣。如此者，方可以天下寄託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高延第曰：“首三句卽所謂‘大象無形，大音希聲，道隱無名也’。皦，明皎也。無爲之道，精微渾穆，不可稱說。以之處上，則端拱無爲，不以功德自曜；以此處下，則常德不離，不與顛蒙同昧；言出處一致也。繩繩，戒慎也。謂慎守此道，人無得而稱之，天下同歸於太素。不惟不可稱，且無形狀可見。恍惚，卽所謂若存若亡也。首，始也；後，終也；謂始終一致也。以上皆言道之體用如此，乃古道也。執古可以治今，居今亦可以反古，皆以道爲綱維也。”

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舜徽按：王弼本作“古之善爲士者”，“士”乃誤字，帛書乙本作“道”，與傳本合，今據改正。河上公注云：“謂得道之君也。”則河上本原亦作“道”。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曰：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均有“曰”字以領起下文，是也。今據補。

豫兮若涉冬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高延第曰：“徘徊却顧，若涉冬川；憚強敵，道家尚畏慎也；敬讓若賓客，道家不爲先，不爲主而爲客也；冰釋，所謂暖然如春也；若樸，所謂我獨頑且鄙也；混濁，所謂受天之垢，察見淵魚者不祥也；七句皆以狀道也。”

舜徽按：“豫兮”，王弼本“兮”作“焉”，河上本、傅本並作“兮”，今據改。“儼兮其若客”，王本“客”誤作“容”，帛書甲、乙本均作“客”，與河上本合，不誤也。今亦據改。“客”字與下文釋、樸、谷、濁等字爲韻，尤可證已。

濁而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生。

舜徽按：此二句各本不同，而皆有“孰能”二字居句首，王弼本作“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語尤晦解。帛書甲、乙本均無“孰能”二字，文句整齊，今從寫正。此二句承上文續申道之爲用，動靜適宜，則濁者可使之清，安者可使之生，無所不可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吳澄曰：“成謂完備。凡物敝則缺，新則成。敝而缺者不盈也；新而成者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故能敝缺，不爲新成。”

舜徽按：末句河上、王弼本並作“故能敝不新成”，今據《淮南子·道應篇》所引改正。“能弊而不新成”，乃道家戒盈求缺之旨，故《淮南·道應》引證此語時，乃以“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五者爲說。

致虛極，守靜篤。

舜徽按：君道主於虛靜，故以致虛、守靜並提。致虛必達盡處，守靜務求其固，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帛書甲、乙本兩句末並有“也”字。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吳澄曰：“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反還也。物生由靜而動，故反還其初之靜爲復。植物之生，氣下藏；動物之定，心內寂。”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

吳澄曰：“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

而下藏於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爲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

舜徽按：植物之本在下，故生氣至冬而下藏於根；人之本在上，故生氣至夜而上藏於腦，腦必靜而後能安眠，亦卽歸根復命之意。

復命，常也；知常，明也。

舜徽按：各本均作“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今據帛書甲、乙本寫正。此言安靜可以復還性命，乃物理之常；知此常理而能守之，然後謂之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吳澄曰：“昧者不知此，則不能守靜而妄動以害其生，故曰凶。”

舜徽按：此皆爲君道而發也。君道以守靜爲要，故此文博取萬物之理以喻靜之爲用甚宏。爲人主者，如不解此而妄動，則必招尤致禍也。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高廷第曰：“知常之人，兼善萬物，故能容；能容則無偏頗，故能公；容且公，然後能主持天下。‘王乃天’以下，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義。”

舜徽按：此言爲人君者，信能守靜而不妄動，有容

人之量，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臨馭天下也。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舜徽按：太上，猶云最高也。乃就分別人君等次而言，不必以太古解之也。此謂人主之最高者，通於無爲之道，爲之下者，但知有其君而已，未見自賢其才智也。其好自用之君，爲所親近而譽美之者，則其次焉者也。又次，乃爲下所畏惡矣；最下，則爲下所攻殺矣。此言君道以無爲爲最高也。王弼本作“親而譽之”，今從河上本。各本作“其次侮之”，今從帛書甲本。

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

舜徽按：王弼本“有不信”下衍“焉”字，今從王念孫說刪。焉，於是也。言信不足，於是有不信也。帛書甲本作“信不足，案有不信”。乙本作“安”，“案”、“安”皆卽“焉”之聲轉，發語詞。此言人君如好多言，言而寡信，則其下將不信之矣。故下句提出“貴言”，所謂“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貴，重也，謂人君之言，猶豫遲疑，不肯輕易出口，恐致下之不信己也。河上本作“猶”，與帛書乙本合，今從之。王弼本作“悠”，則由音近而譌耳。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吳澄曰：“聖人不言、無爲，俾民得以安於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爲

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高延第曰：“此即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之意。六親咸和，孝慈之行不顯。國家邅治，忠臣之節不彰。今不治其本原，而爭其末流，雖有仁義孝慈忠臣，而無救於亂亡。”

舜徽按：此四句“有”字上，帛書甲本皆有“案”字，乙本則作“安”，皆語詞。今本無之，不害意也。“忠臣”，甲、乙本均作“貞臣”，與范本合。然《淮南子·道應篇》引此，仍作“忠臣”，知自古傳鈔，原有二本。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舜徽按：此處所云絕、棄，皆就人主言。絕聖棄智，謂不自任其聰明才智也；絕仁棄利，謂不以仁義相標榜也；絕巧棄利，謂不貪技巧貨利也。前文所云“不貴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足與此數語相發明。

此三言也，以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屬。

奚侗曰：“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文飾之事，反乎素樸之道，不足資以為治也。有所屬者，即絕棄文

飾、歸於素樸之意。”

舜徽按：各本作“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今依帛書甲、乙本寫正。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

舜徽按：見素抱樸，謂不尚文飾也，承上文“絕仁棄義”言；少私寡欲，謂不貪異貨也，承上文“絕巧棄利”言；絕學無憂，謂不矜才能也，承上文“絕聖棄智”言。三者相應，前後不亂，乃總結上文之辭。各本多以“絕學無憂”一語，誤連下文“唯之與阿”以下文句別爲一章，失之。昔賢如歸有光、姚鼐，近世如馬敘倫、高亨，皆主此句屬上，是也。

唯之與訶，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

舜徽按：“訶”，各本作“阿”；“美”，王弼本作“善”；“何若”，王本作“若何”；今並據帛書甲、乙本寫正。唯，應聲，乃順而受之之詞；訶，大言而怒也，乃逆而斥之之詞。此言唯與訶，美與惡，皆對立事物，究竟相去不甚遠，以明世俗之所謂順逆、美惡，未必皆可爲準式也。

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

舜徽按：各本作“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語意不明，顯有缺奪，今據帛書乙本補正。此言人君爲衆人之所畏，人君亦不可不畏衆人也。

恍兮其未央哉！

舜徽按：各本“恍兮”作“荒兮”，帛書乙本作“望呵”，即“恍兮”也，證之他處可知。今據改正。此言衆情恍惚，相與馳逐未已，下文即所以形容之。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俞樾曰：“‘如春登臺’，與‘若冬涉川’一律，河上公本作‘如登春臺’，非是。然其注云：‘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是亦未嘗以‘春臺’連文，其所據本，亦必作‘春登臺’，今傳寫誤倒耳。”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正作“春登臺”，足訂傳寫誤倒之失。王本猶未誤也。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儻儻兮若無所歸。

舜徽按：我，人君自謂也。泊爲怕之借字，《說文》：“怕，無爲也。”河上本作“怕”，用本字。帛書甲本作“泊”，蓋原文如此。未兆者，無見於外，即無爲之意。孩即咳字，《說文》：“咳，小兒笑也。”古文作孩。未孩者，喻其無知無欲之時。《廣雅·釋訓》：“儻儻，疲也。”儻儻無歸，謂若疲困無定向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其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高廷第曰：“衆皆馳逐若有所得，我獨遺落世事如顛蒙之人。沌沌卽悶悶，形容愚人之心之狀，與下察察相對。謂衆人於世故利害，析若秋毫，而我獨無所訾省。若海，言其寬博無涯涘。無所止，言不凝滯於物。謂世人各逞才智有所建立，而我粥粥若無能。”

舜徽按：此言爲人君者，收敛聰明，以愚自處，不矜才智與衆人爭短長也。沌沌，渾噩無欲之稱。《莊子·在宥篇》所謂“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是也。帛書甲本作惛惛，乙本作渚渚，《景龍碑》本作純純，皆以音近而異其字耳。王弼本“澹兮其若海”，帛書甲本“澹”作“忽”，與河上本合，唯河上奪“其”字耳。今從甲本寫正。“海”字，他本或作“晦”，帛書甲、乙本均作“海”，不誤也。

我欲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陶鴻慶曰：“傳奕本‘我獨’下有‘欲’字。據王注‘我獨欲異於人’，是王所見本亦有‘欲’字，而傳寫奪之。《老子》狀道之要妙，多爲支離惝恍之辭，或曰若、曰如、曰似、曰將、曰欲，皆此旨也。當以有‘欲’字爲勝。”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均有“欲”字，在“獨異”上，是原文如此也。今據寫正。食母，乃比喻之辭。謂人君與世俗異趣，世人皆爭趨末流，我獨守其本原。本原卽道，卽可以爲天下母之母。道者人君之所恃以生，猶嬰兒之仰乳於母。蘇轍所云：“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是其義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河上公曰：“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于道也。”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窈兮冥兮，中有精兮！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順衆父。吾何以知衆父之然？以此。

高延第曰：“至道之狀，恍忽精微，非耳目可接，而確有執守，爲古今所同歸，不可離也。《莊子》引廣成子教黃帝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云云，卽此章之意。謂至道精微，執簡御煩，以靜制動，其本體如此也。”

舜徽按：各本作“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自古及今”，“以閱衆甫”，今悉據帛書甲、乙本改正。末句“衆甫”，甲、乙本亦作“衆父”，尤可證原文如此。《老子》所云“衆父”，以喻道也。言其爲萬事萬物之本，故曰衆父。以父喻道，猶以母喻道耳。末句，帛書甲本作“吾何以知衆父之然？以此”。乙本“然”下多一“也”字，無二意也。此用問辭以明道之形狀，可於此恍惚窈冥中知之。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奚侗曰：“《說文》：‘企，舉踵也。’企而立者，不

可以久立；跨而行者，不可以長行。蓋任智尚力，違乎自然者，必至求得反失。”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企”作“炊”，蓋由“企”或作“跂”，又以形近而譌“跂”爲“炊”耳。此處按文例，自當二句對舉。今本有“跨者不行”，是也。帛書甲、乙本獨缺，蓋由傳寫時誤脫。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舜徽按：首二句，帛書甲、乙本與今本敘次互倒，且誤“是”爲“視”，傳寫者亂之也。觀下文“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數句敘次，與此相同，可知今本此四句敘次不誤。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吳澄曰：“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人，若律之於自然之道，譬若食之已餘者不當食，行之如贅者不當行也。如多於常分而不可用，幽顯之間，有物亦當惡之，而有道之人，不肯以此自處也。”

舜徽按：末句“有道者”，帛書甲、乙本作“有欲者”，乃傳寫之譌。

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執一，以爲天下牧。

河上公曰：“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其身也。枉屈己而申人，久久自得直也。地窪下，水流之；人謙

下，德歸之也。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自受取少，則得多也。財多者惑于所守，學多者惑于所聞。”

舜徽按：各本多作“枉則直”，帛書乙本作“枉則正”，與遂州、景龍、傅、范諸本合，且與上下文叶韻，是也。今據改正。末句，各本作“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今據帛書甲、乙本改正。句尾“牧”字，與“惑”叶韻而義亦長。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河上公曰：“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聖人不自以爲是而非人，故能彰顯于世。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于天下。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久不危。”

舜徽按：上文“曲則全”六句及此四句，皆爲君道而發，河上注得其指矣。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舜徽按：此言人君去健羨，絀聰明，清虛自守，卑弱自持，而自處於不爭之地，是以天下之人，皆莫能與之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舜徽按：“曲則全”一語，乃古之遺言，而《老子》述之以爲此段理論之綱。故於一段之末，又重申人君自處能曲，則必如其實以全歸之，無或爽也。

希言自然。

吳澄曰：“聽之不聞曰希。希言，無言也。得道者忘言，因其自然而已。”

高廷第曰：“希，罕也。希言，卽貴言之意。謂太上以自然之道化民，不爲言語條教，故化成可久。”

舜徽按：斯言特出在此，各本多連下文別爲一章，姚鼐則謂宜連上讀。竊疑原文本以偶句相聯，傳寫者誤脫其一語矣。不然，與上下文均不甚相屬也。

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

奚侗曰：“強梁之氣，反乎自然，其勢不可以久。”

高亨曰：“‘飄’上，王本原有‘故’字，河上本無，是也。蓋後人誤以‘希言自然’一句冠此章之首，故增‘故’字以聯之，而不計其文意之不相關也。”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均無“故”字，與河上本合，蓋原文如此也，今據刪。各本作“驟雨”，帛書甲、乙本作“暴雨”，與范本合，今據改。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奚侗曰：“強梁之氣，雖天地亦不能持久，何況於人？”

舜徽按：此言君道主於柔緩，而力戒暴疾。既舉飄風暴雨爲例，又重申天道且不能以暴疾持久，人道更可知矣。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高廷第曰：“同，齊也，合也。失謂無道德。言在上有道德之人，則所行莫不合於道德。上無道德之人，則所行者皆反道敗德。上出於道德，人亦以道德歸之；上出於不道不德，人亦以不道不德應之。”

舜徽按：首句王本作“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帛書甲、乙本均不重“道者”二字，與《淮南子·道應篇》所引合，今據刪。王弼注云：“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縣縣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可知王氏所據本亦不重“道者”二字，久經傳寫而誤衍耳。

###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均無此二句，蓋錯簡重出，今據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地母。

河上公曰：“謂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

不改者，化有常。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不腐，無不貫穿而不危殆。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

舜徽按：各本作“可以爲天下母”，帛書甲、乙本均作“可以爲天地母”，與范本合。蓋原文如此，今據改。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河上公曰：“我不見道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不知其名，強曰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言遠者，窮乎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言反者，遠不越絕，乃復在人身也。道大者，包羅諸天地無所不容也；天大者，無所不蓋也；地大者，無所不載也；王大者，無所不制也。”

舜徽按：古之陳君道者，主於法自然而尊無爲，與天地合德，故以王爲四大之一。或謂此兩“王”字，均宜作“人”，非也。帛書甲、乙本並作“王”，不誤。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舜徽按：此處不言“王”而言“人”者，王亦人也，言人而王在其中矣。或疑此既以天、地、人並舉，則上文不當言天地王，非也。《老子》所謂人法地者，

法其寧靜而生長萬物也；地法天者，法其遼濶而施不求報也。《老子》以道爲“先天地生”，“可以爲天地母”，故推尊之曰“天法道”，道主無爲，故又云“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高延第曰：“重謂己身，輕謂天下。靜謂無爲，躁謂有爲。身治而後天下治，無爲而後能有爲。故身爲天下事物之本，無爲又理煩治劇之主，君卽主也。輜重所以衛身，言聖人終日所行，不外治身之事，雖有眩惑耳目之事，不關於內念，謂心不役於萬物，超然物表也。後世人主視天下爲重，以一身爲輕，皆不知身爲治本，不治身則失其本；靜以御動，不能靜則中無主；均不足以治天下。”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作“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帛書甲、乙本“聖人”均作“君子”，與《韓非子·喻老篇》所引合，《景龍碑》本亦作“君子”，今從改正。“輕則失本”，帛書甲、乙本、《韓非子·喻老篇》引，均與王弼本同，不誤也。河上本、《景龍碑》本作“輕則失臣”，則沿下句“躁則失君”，改“本”爲“臣”以相對耳。或謂此文當作“輕則失根，躁則失君”，以與首句“重爲輕根，靜爲躁君”相應。不悟“本”卽“根”也，不煩改字而義自明。況古人行文，不必字字前後相照，可勝改乎？

善行者無轍迹，善言者無瑕譏，善數者不用籌策。善閉者無關

簫，而不可啓也；善結者無纒約，而不可解也。

吳澄曰：“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必有瑕謫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用關鍵，結繫者必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爲爾。有道者觀之，則豈謂之善哉！善行者以不行為行，故無轍迹；善言者以不言爲言，故無瑕謫；善計者以不計爲計，故不用籌策；善閉者以不閉爲閉，故無關鍵，而其閉自不可開；善結者以不結爲結，故無繩約，而其結自不可解。舉五事爲喻，以領起下文。”羅振玉曰：“景福本‘行’下有‘者’字，善言、善教、善閉、善結下並同，廣明本同。”

舜徽按：此五句，帛書甲、乙本皆有“者”字，與景福本、廣明本同，蓋原文如此也。河上、王弼本、《景龍碑》本皆誤奪，今悉補正。各本作“關鍵”、“而不可開”、“繩約”；兩句末又無“也”字，今亦據帛書甲、乙本訂補。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是謂襲明。

吳澄曰：“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爲救，亦若上文所譬，以不爲其事爲善也。襲者如以外衣掩蔽其內衣。儻救人救物之功彰彰而明，天下皆見其救之，不謂之善救矣。必使無救之之迹，掩蔽其所可見，而衆莫能知，故曰襲明。善救人，善救物，與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凡七善字。有道者謂之善，世俗不知其善也。蓋世俗以能爲其事爲善，有迹可見有名可稱，而與不善爲對。有道者以不爲其事爲善，泯然無迹，渾



然其名，而無與爲對者也。”

舜徽按：此言善爲君者，常能於平時審度人物之高下良窳而使之各得其用也。是以無棄人，無棄物。《淮南子·主術篇》云：“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製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修者以爲櫓櫓，短者以爲朱儒枅榱。無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難毒，然而良醫囊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此論可以發明《老子》無棄人、無棄物之旨。“而無棄人”，各本“而”作“故”，帛書甲、乙本作“而”，與《景龍碑》本合，今據改。“常善救物，而無棄物”，甲、乙本但作“物無棄財”，與上句語例不協，恐有奪脫，今不從之。“襲明”，甲本作“忬明”，乙本作“曳明”，忬當爲悞，形近而譌也。《說文》：“悞，習也。從心，曳聲。”襲、習古通用，故其字亦作“襲明”。乙本作“曳”，則偶脫心旁耳。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馬其昶曰：“見不善，非徒以爲戒，又必教之使善，然後吾之善量足，是不善人正善人爲善之資。故善者吾師之，不善者亦當愛而教之，此天下所以無棄人也。然世俗恒情，往往忌嫉賢能，而輕棄不肖。忌賢，則善者無以勸；棄不肖，則不善益流於惡。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在智者，猶迷於此，以其道誠要妙也。”

舜徽按：“要妙”卽“幼眇”，《漢書·元帝紀》：“窮極幼眇。”顏注云：“幼眇，讀曰要妙”，是已。要

妙，形容事理之深遠也。帛書甲、乙本作“眇要”，蓋誤倒。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恒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恒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恒德乃足，復歸於樸。

河上公曰：“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知自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於己。當復歸志於嬰兒，恣然而無所知也。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以爲天下法式也。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污濁，知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足，止也。人能爲天下谷，德乃止於己。復當歸身於質朴，不復爲文飾。”

易順鼎曰：“此章有後人竄入之語，非盡《老子》原文。《莊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此《老子》原文也。蓋本以雌對雄，以辱對白。辱有黑義，《儀禮注》‘以白造緇曰辱’，此古義之可證者。後人不知辱與白對，以爲必黑始可對白，必榮始可對辱，如是，加‘守其黑’一句於‘知其白’之下，加‘知其榮’一句於‘守其辱’之上；又加‘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四句，以叶黑韻，而竄改之迹顯然

矣。王弼已爲‘式’字等句作注，則竄改卽在魏晉之初。”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均作“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復歸于樸。”此數句均在“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云云之前，與今本異。從知此段，經傳寫而滋錯亂，由來舊矣。古人引書，有節取其辭者，故《莊子·天下篇》所引老聃語，亦未可遽定爲此段原文。況《淮南子·道應篇》已引“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又何可臆斷榮辱對言爲後人所加乎？故易說雖辨，不足以爲定論。而馬敘倫、高亨諸家翕然從之，非也。各本“常德”字，帛書甲、乙本並作“恒德”，今據改。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之義，悉爲君道而發，古之陳君道者，主於卑弱自持，此論足以盡之。

樸散則爲器。

徐大椿曰：“樸者，不彫不琢，無一物之形，而具萬物之質。散者，離其本真，加以造作之工。一有造作，則隨人所爲而成一器，此物不能爲彼物，而太樸漓矣。”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奚侗曰：“官長謂羣有司。樸散爲器，器各一用而已。聖人但因其材能，使各職其職。”

舜徽按：聖人，謂人主也。上句取譬於物，《莊子·馬蹄篇》所云：“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璧不毀，

孰爲圭璋。”卽所謂“樸散則爲器”也。爲人君者，用斯理以施之人事，因材授職，分設百官，而以爵秩祿廩尊寵之，亦猶犧尊圭璋意耳。

夫大制無割。

奚侗曰：“制者，宰制。大制謂宰制萬物，對上官長言。割謂裁割，不割猶云不器，器必以裁割而成也。《禮記·學記》：‘大德不官，大道不器’，皆可證成此誼。”

舜徽按：此就爲人君者言也。謂人君所務者大，不以躬親庶事爲能也。《列子·楊朱篇》云：“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呂氏春秋·貴公篇》云：“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鬥，大兵不寇。”《淮南子·繆稱篇》云：“兼覆蓋而並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皆足以發明大制無割之旨。”各本作“故大制不割”，帛書甲、乙本作“夫大制無割”。句首用“夫”字，使此語突起而語氣加重，意尤顯豁，蓋原文如此，今據寫正。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高延第曰：“此言有心於治天下，失其自然之道，天下轉不可得而治。神器，猶《莊子》所謂大物，不可以私智裁制。”

馬其昶曰：“已，語詞。”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培或墮。

舜徽按：“故物”以下，皆以相反爲義，而文字各本多歧。末句依帛書甲、乙本寫正，與范本亦合也。此言事物之轉變，有似先而反後者，有似緩而反急者，有似強而反弱者，有似成而反敗者，着意爲之，而未必致功，重申無爲之有益。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舜徽按：此言爲人君者，當深藏若虛，容貌若愚。雖有過人之才智，亦必黜之抑之，不以自矜自用。廣取羣下之才智以爲己用，而臻無爲而無不爲之治。去甚、去奢、去泰，卽去健美、絀聰明之謂也。帛書甲、乙本“去太”在“去甚”下，而《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又引作“故君子去泰，去甚”，蓋久歷傳寫，文有互倒耳。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高廷第曰：“老子時，列國大夫主政，首二句所以箴之。其事好還，卽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好反自爲禍也。古者兵出於農，征伐勤則稼穡荒，稼穡荒則饑饉至，相因之理也。”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首句有“者”字，次句無“於”字，今據帛書甲、乙本刪之補之。《景福碑》本與甲、乙本合，不誤也。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勞健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景龍》、敦煌與《道藏龍興碑》本無此二句，他本皆有之。《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又云：‘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按其詞意，軍旅凶年當別屬古語，非同出《老子》。又王弼注止云‘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荆棘生焉’；亦似本無其語。”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並無此二語，蓋原文如此，今據刪。

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強焉。

高廷第曰：“善者猶云彼善於此。果，謂殺敵。已，止也。人來伐我，不得已而敵之，是曰應兵。勝之則止，不必窮極兵勢也。”

舜徽按：王弼本作“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河上本“有”作“者”，語意均不圓暢，顯有脫奪，今據帛書甲、乙本寫正。

果而勿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不強。

舜徽按：“果而勿驕”，河上、王弼本均在“果而勿伐”下，帛書甲、乙本在“果而勿矜”上，與景龍、遂州、敦煌、景福諸本合，蓋原文如此也。“果而不強”，各本與上四句平列，帛書甲、乙本作“是謂果而不強”，乃總結勿驕、勿矜、勿伐、不得已四者之辭，於義尤

安，今據寫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王弼曰：“壯，武力暴興，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均作“物壯而老”，“而”字蓋沿上文數句“而”字致譌，非原文也。“物壯則老”，有驚惜意，歎盛極必衰也；若云“物壯而老”，乃萬物自然之理，無足異者。此數語結尾，乃言強梁之不足恃。“不道早已”，亦即“強梁者死之徒”之意。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高延第曰：“兵者殺人之器，人所畏惡。有道之人，不以善用兵自處。左陽主生，右陰主殺。”

舜徽按：各本作“夫佳兵者”，帛書甲、乙本均無“佳”字，今據刪。王念孫、阮元輩謂“佳”當作“佳”，即古“唯”字。不悟“夫唯”二字相連為辭見之《老子》者固甚多，而此處則以無“唯”字為勝，以此益見古書舊本之可貴。

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舜徽按：各本“不祥之器”在上，“非君子之器”在下，均無“故”及兩“也”字，今據帛書甲、乙本寫正。

銛襲爲上，勿美也。若美之，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舜徽按：“銛襲”，各本作“恬淡”，或作“恬澹”，蓋傳寫者初以形近誤“銛”爲“恬”，後又改下一字爲“淡”或“澹”耳。銛，銳利也；襲，攻敵也。首二句謂用兵以銳利襲敵爲上，然有道之主，不加稱美也。各本不特文字有譌脫，文句亦參差難理。惟帛書甲、乙本文從字順，今據寫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也。

高延第曰：“上將居右，以其專殺。古者遣將，設明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故預以喪禮自處。”

舜徽按：兩“尚”字，帛書甲本作“上”，二字古人通用，不必改也。“偏將軍居左”上，從帛書甲、乙本加“是以”二字。各本作“言以喪禮處之”，從帛書改“處”爲“居”，承上句“居左”、“居右”而爲言也。句末又據增“也”字，以明語氣之稍頓。

殺人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舜徽按：河上、王弼本作“殺人之衆”，他本或作“殺人衆多”，皆非。又誤“泣”爲“泣”。今並依帛書甲、乙本寫正。

道常無名，樸。



馬其昶曰：“樸一字爲句，下文所謂無名之樸也。”

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高延第曰：“臣，伏也。無爲之道，外無赫赫之名，樸素寡約，若不足以有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不敢相臣伏。人主執此以御天下，則人自來賓服。”

舜徽按：王弼本作“天下莫能臣也”。帛書乙本作“不敢”，又無“也”字，與《景龍碑》本合。今從寫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高亨曰：“‘民莫之令而自均’，猶言莫之令而民自均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無使之者，而民均沾濡其澤，則道實爲之。舉此以見道之無爲而無不爲。”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高延第曰：“道本無名，及化成萬物，乃始有名。功成名遂，各安於無事，故云知止。所謂功成不居，生而不有也。常道在己，天下歸之，猶百川之歸江海。”

舜徽按：帛書乙本作“夫亦將知止”，與王弼本同。河上本“止”作“之”，則由篆體止二字形近而誤耳。乙本“知止所以不殆”，王弼本“所”作“可”，亦由“所”或作“𠂔”，與“可”形近而誤也。今依乙本寫正。王弼本“猶川谷之於江海”，乙本作“猶小谷之與

江海也”，“小”字由與“川”形近而誤耳。惟“於”作“與”，且有“也”字，自勝今本，今從寫正。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忘者壽。

高延第曰：“人世爭競之故，皆欲以豪盛自處，不知自反故耳。道德之人，不貴知人勝人，而貴自知自勝。常存止足之分，勉強道德之途，循分守約，故無失而可久。”

舜徽按：此亦爲君道而發也。帛書甲、乙本此八句末皆有“也”字，今本雖無，不害其意，故不據增。各本作“死而不亡者壽”，他書引此“亡”字或作“妄”，皆非原意。帛書甲、乙本作“忘”，是也。今據改。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

吳澄曰：“汜，廣也。謂如水之汜濫洋溢。道之廣無所不在，或左、或右，隨處而有，取之左右，無所不可也。”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均無“大”字，疑傳寫誤脫。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均無此句，今據刪。

成功遂事而不名有，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則恒無欲也，可名於

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爲大也，故能成大。

高延第曰：“大道廣博，無所不宜，化育萬物，來者不拒。不居其功，不爲之宰。渾樸隱約，故小；萬物所宗，故大。道家以濡弱謙下爲德，故不爲大。天下莫與爭，故獨能成其大。”

舜徽按：此段文字，各本脫落錯亂，今依帛書甲、乙本寫正。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吳澄曰：“大象，喻道也。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往，歸往也。不害謂利。”

奚侗曰：“安寧、平和、通泰，皆申言不害誼。”

樂與餌，過客止。

高延第曰：“樂謂歌舞，餌謂飲饌，皆世人所好，過者遇之，莫不留止。”

道之出言也，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也，聽之不足聞也，用之不可既也。

高延第曰：“大道淡泊，故無味，不足爲餌也。至道希夷，故無見聞，不足爲樂也。既，盡也。周而不殆，既以予人，己愈有，故不可盡。”

舜徽按：此數句，帛書甲、乙本最爲完足，今據寫

正。甲、乙本並作“出言”，乃原文也。他本作“出口”者，乃由“言”字缺爛而爲“口”耳。惟帛書“道之出言也”句，上有“故”字，下有“曰”字，皆傳寫者所加。今本雖無，而此句特起，不承上得義，不應有“故”字；下卽形容道之無臭、無形、無聲、無盡之妙，不應有“曰”字，今徑刪。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王弼曰：“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爲大以除將物也。”

舜徽按：翕者，斂也，合也。與“張”爲對。《韓非子·喻老篇》引作“翕”，乃原文也。傳寫者或增其偏旁爲翕，爲翕，爲歛。帛書甲本謄而爲“拾”，乙本又變爲“擒”，皆失之。“固”當讀爲姑且之姑，而《景龍碑》本作“故”，帛書甲、乙本乃省其體而爲“古”矣。《韓非子·喻老篇》引此無“廢之”兩句，帛書甲、乙本亦無此兩句，並作“將欲去之，必古與之；將欲奪之，必古予之”；與今本又異。要之此數句，乃闡明促使事物轉化之理，雖文句稍有不同，而寓意則無二致，不必改也。《老子》之意，以爲人君如能善用此理以除強去暴，則無往不勝，斯不失爲微妙之明智矣。

柔弱勝剛強。

舜徽按：此句《景龍碑》本作“柔勝剛，弱勝強”；傅奕本作“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分爲二句，非。帛

書甲本作“友弱勝強”，是誤“柔”爲“友”，又奪剛字也。乙本作“柔弱勝強”，亦奪“剛”字，皆只一句，與王弼本同，不誤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舜徽按：此以魚喻君，以淵喻道。意謂魚離於水則死，君離於道則敗。因近取譬，以言爲人君者，不可須臾與道相失也。國之利器，謂人君南面之術。南面之術，絕聖棄智，而用人之聖智，以臻於無爲而無不爲之治。若此微明之道，深藏於己而不可出以示人也。自來證說此語者，多以賞罰爲利器，賞罰，特南面術之一端耳。

道恒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河上公曰：“道以無爲爲常也。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

舜徽按：河上注以“化效於己”釋“化”，是矣。物猶衆也，萬物猶云羣下也。羣下能各竭其才智以效力於己，則無爲之道備矣。物有衆義猶衆望謂之物望，衆論謂之物論耳。此文首句，帛書甲、乙本並作“道恒無名”，疑沿下文“無名”二字而誤。且首句“爲”字與“化”叶韻，通行諸本皆如此作，不誤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河上公曰：“吾，身也。無名之樸，道也。萬物已

化效於己也，復欲作巧偽者，侯王當身鎮撫以道德。”

舜徽按：鎮之以無名之樸，謂人君清虛自守，不見可欲，使羣下莫由窺測高深，不能欺蔽之也。

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

舜徽按：“鎮之以”三字，據帛書甲、乙本補。今各本脫去，而語意不完，且不可解矣。夫猶彼也，言人君能守斯道，清靜寡欲以鎮天下，天下之人亦將歸於無欲也。

無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舜徽按：帛書甲、乙本“無”作“不”，與河上、王弼本合。然此句承上文而言，則作“無”爲是，故遂州《龍興碑》作“無”也。末句，帛書甲、乙本並作“天地將自正”。正、定義同，不必改字。“天地”乃“天下”之譌，此處不合言“天地”也。

# 管子四篇疏證

## 序

《管子》，叢書也。囊括衆家，罔不賅備，蓋漢以上學者雜鈔彙集而成。迄乎西漢之末，劉向校書祕閣，獲見中外書凡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後世又亡其十篇。即今所存七十六篇之中，糅雜亦甚矣。而言人君南面之術者，往往在焉，如《心術》上下、《白心》、《內業》四篇皆是也。昔人每好取儒家正心養性之說以相傳會，而原意盡失。若此數篇，固不出管仲手，要皆傳鈔舊文，哀集之以入《管子》書耳。其間精義要旨，足與《道德》五千言相發明也。余既沉潛此數篇之義，歎爲主術之綱領，道論之菁英。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因博采諸家之說，以校正其文字；亦自抒管窺之陋，以發明其義理。撰爲《疏證》，成書四卷。愚夫千慮，容有一得。紕繆之處，不敢自保。聊欲與世之猶繹周秦故書者共商榷之。儻蒙誨所不逮，則幸甚矣。張舜徽記

## 引用各家注說簡目

- 尹知章 《管子注》（舊題房玄齡注）  
劉 績 《管子補注》（《管韓合刻》本）  
傅 山 《霜紅龕雜著》（宣統三年山陽丁氏刊《全集》本）  
王念孫 《讀書雜誌》（道光刊本）  
王引之 同上  
洪頤煊 《管子義證》（《積學齋叢書》本）  
戴 望 《管子校正》（同治十二年刊本）  
丁士涵 說見戴氏《管子校正》引  
陳 奐 同上  
馬瑞辰 同上  
張文虎 《舒藝室隨筆》（同治十三年刊本）  
安井衡 《管子纂詁》（日本元治元年即同治三年刊本）  
何如璋 《管子析疑》（稿本）  
陶鴻慶 《讀管子札記》（一九五九年印《讀諸子札記》本）  
俞 樾 《諸子平議》（同治九年刊本）  
吳汝綸 《點勘管子讀本》（鉛印本）  
顏昌峣 《管子校釋》（稿本）  
郭嵩燾 《讀管札記》（附見顏氏《管子校釋》內）  
郭大癡 同上  
張佩綸 《管子學》（影印手稿本）  
姚永概 《慎宜軒筆記》（一九二六年排印本）  
劉師培 《管子斟補》（《劉申叔遺書》本）  
章炳麟 《管子餘義》（《章氏叢書》本）  
尹桐陽 《管子新釋》（一九二八年排印本）  
李哲明 《管子校義》（一九三一年排印本）



- 羅 俊 《諸子學述》（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印本）  
 于省吾 《管子新證》（《諸子新證》本）  
 郭沫若 《管子集校》（一九五六年印本）  
 許維遹 同上

## 心術上篇疏證

舜徽按：心術者，猶云主術也；君道也。篇首開端即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不啻自釋其題旨矣。本書《樞言篇》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彼篇以心、日對舉，亦即此意。百家殊業，皆務爲治。故其立言，莫不有專篇以闡明南面之術。顧標題各有不同耳。若荀卿書中有《君道篇》，《韓非》有《主道篇》，《呂覽》有《君守篇》，《淮南》有《主術篇》，此易明者也。亦有擬諸物象，以明道之體用，而立篇題者。譬諸自然，則謂之天，故《莊子》有《天道篇》。比諸形狀，則謂之圓，故《呂覽》又有《圓道篇》。遠象諸物，則謂之內，故《管子》又有《內業篇》。近擬諸身，則謂之心，此篇是已。題無常準，而旨趣不殊，在學者之善得其會歸耳。抑百家言主術，同歸本乎內潔其心。《淮南·原道篇》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又曰：“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詮言篇》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

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淮南》所謂“反己而得”，亦即《管子》此篇所謂“內得”；《內業篇》之所謂“中得”；同歸於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而已矣。《心術》上下二篇主旨，亦即在是。“心術”二字析言，則又有別。《淮南·人間篇》曰：“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筌，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爲，行智所之，事智所乘，動智所由，謂之道。”《淮南》分釋二義，與道並論。蓋同爲君人者之弘綱，意尤明豁矣。《管子》書，舊稱難理。而《心術》、《白心》、《內業》三篇，尤爲蹟奧。而文字衍脫譌亂，亦特甚。舊注自尹知章以來，詮釋辭義，得失互見。清世諸儒，及近人箋訂之書，發疑正讀，時有善言。今並有所擇取，加以考論。顧諸家校勘文字之功爲多，而闡述大義之言彌少。今則廣徵周秦以來諸子百家故書雅記，爲發明其旨趣焉。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

尹知章曰：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爲，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

舜徽按：《九守篇》曰：“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與此篇開端數語，意正相發。皆所以明君無爲而臣有爲，君臣異事之理。《荀子·天論

篇》曰：“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韓非·揚權篇》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均足以闡明斯旨。尹氏作注，已窺見此理，故其辭亦簡約能盡。

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尹知章曰：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上順道，則下事得。○王念孫曰：“充益”當爲“充盈”，字之誤也。上以道理爲韻，此以盈聲爲韻。此篇中多用韻之文。○戴望曰：此“故曰”二字，乃涉後文而衍。○郭沫若曰：此“故曰”二字，不當衍。此乃引證古語，以證成其取譬於君臣之意。

舜徽按：“益”卽“溢”之本字，饒也，滿也。“充益”二字，連用成辭，不煩改字。周秦故書，文句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本無定例。此篇中雖多用韻之文，然亦不可一概論也。王說泥矣。“故曰”二字，非衍文，郭說得之。尹注所云“九竅失其由”，“由”字當爲“用”字之譌，傳寫者亂之耳。上文既言君臣異事之理，此又續申君當虛靜自守之意。《老子》嘗曰：“虛其心”，又曰：“無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皆卽此旨。《賈子·道術篇》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謂之虛，其末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以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義亦自此出。

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

尹知章曰：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陳奐曰：“羽”字衍。“使弊其翼”，與“使盡其力”，皆四字爲句。力、翼爲韻。尹注云“盡力弊翼”，其所見本無“羽”字。

舜徽按：“羽”字不必爲衍文也。周秦用韻之文，有上下句字數相當者；亦有爲長短句作其氣勢者；何可一例繩之。注家簡約其辭，未必與原文盡合，又不可盡據以改易正文。陳說失之。《荀子·堯問篇》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呂氏春秋·審分覽》曰：“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聘驚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淮南·主術篇》曰：“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銜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凡此諸論，皆與斯篇所云“毋代馬走，毋代鳥飛”之旨，相互發明，亦卽執本秉要任人而不任智之意。

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

舜徽按：《九守篇》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意以待須。”與此數語，皆所以闡明人主貴能漠靜自處，不爲臣下先倡之意。《呂氏春秋·勿躬篇》曰：“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袂簪日用而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淮南·詮言篇》曰：“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亦卽此旨。

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

舜徽按：此二語當連讀。尹注分屬上下文，非也。《韓非·解老篇》曰：“道與堯舜俱智，與桀與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游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與此二語，意近而實相發。

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絜，神乃留處。

尹知章曰：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不絜，亦喻情欲。○戴望曰：宋本“潔”作“絜”，下“潔其宮”同。《說文》無“潔”字，作“絜”爲正。“神乃留處”，宋本“乃”作“不”。○丁士涵曰：當從宋本。下文云：“不絜則神不處。”○俞樾說同。○吳汝

綸曰：處，止也。神乃留處，言留止而不來也。據後解，則當作神不留處。

舜徽按：“掃除不絜，神乃留處”，與“虛其欲，神將入舍”，語意實同。掃除不絜，即虛其欲也。神乃留處，即神將入舍也。後解所云“不絜則神不處”，正所以說明“掃除不絜神乃留處”之意。丁、俞、吳三家說皆非。戴氏謂宋本“乃”作“不”，今檢宋楊忱本，仍作“神乃留處”，原未誤也。《莊子·知北游》篇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持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實與此數語相發明。尹注謂不絜喻情欲，是也。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

尹知章曰：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王念孫曰：“而莫索其所以智”，“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下文兩“智乎”而衍。“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本作“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今本“聖人”作“正人”，聲之誤也。“無求”下有“之”字，乃涉上文“求之”而衍。“故能虛”下有“無”字，則後人所加也。○郭沫若曰：“求之者不得處之者”，“處”當為“虛”，字之誤也。“得”當作“及”，草書形近而譌。此言求之者不及虛之者，正起下文“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之意。

舜徽按：王氏謂首句“乎”字為衍文，“正人”為

“聖人”之謬，郭氏謂“得處”二字當作“及虛”，皆是也。惟王氏謂“故能虛”下不當有“無”字，則非。考周秦故書，以“虛無”二字連用者多矣。此處“虛”下有“無”字，自非後人所加。且下文“虛無無形謂之道”，與“化育萬物謂之德”，相對爲義，即承“故能虛無”四字引出。

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

王念孫曰：“虛無無形”，本作“虛而無形”。洪云：《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嘯賦注》、左太冲《詠史詩注》引此並作“虛而無形”（案今本《文選》《嘯賦》及《詠史詩注》皆作“虛無無形”，蓋後人以誤本《管子》改之，唯《遊天台山賦注》未改）。念孫案下解云：“天之道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虛而無形謂之道”明矣。今本“虛而”作“虛無”，亦後人所改。○劉師培曰：《文選》嵇康《雜詩注》應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並引“虛無形謂之道”，則不疊無字甚明。

舜徽按：“虛無”二字爲一辭，“無形”二字又爲一辭。二辭合而成句，非疊字之比。如諸家所據《文選注》引此語，有作“虛無無形”者，有作“虛而無形”者，有作“虛無形”者。可知迭經傳寫，已多譌脫。何由遽定作“虛而無形”者爲是，作“虛無無形”者爲非乎？誠審繹上下語意，則今本《管子》作“虛無無形”者未誤，正不必據誤本《文選注》以改原書也。本書正篇有曰：“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彼篇所言，與此二語，意可互明。

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

尹知章曰：人事各有宜也。

舜徽按：義之爲言宜也，故尹《注》直以“宜”釋之。《韓非·解老篇》曰：“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足與此語相發。

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

丁士涵曰：當作“親疏有體”。《周禮·天官·序官注》云：“體猶分也。”

舜徽按：禮之爲言體也。《賈子·道術篇》曰：“動有文體謂之禮。”是已。此語原文，疑當作“登降揖讓貴賤親疏之體謂之禮”十三字爲一句，與上句語法正同。今本貴賤下衍“有等”二字，而辭意滯澀矣。以無他證，不敢輒改也。《韓非·解老篇》曰：“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韓非》斯論，足以證發禮之體用。

簡物小未一道，殺僂禁誅謂之法。

尹知章曰：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爲一者，乃殺



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丁士涵曰：“未”疑“大”字之誤，六字作一句讀。○郭嵩燾說同。○吳汝綸曰：簡物六字有脫。

舜徽按：一本“未”作“末”。丁、郭二家，並謂“末”爲“大”字之誤，是也。吳氏謂有脫文，則非。此處原文“簡物小大一道殺僂禁誅謂之法”十三字爲一句，與上句句法一例。惟讀“簡物小大一道”六字宜稍逗，與“殺僂禁誅”皆所以明法之用。簡猶差也，乃分別之意。分別事物之小大，使各得其所，而一齊之以道，此“道”卽指法之本體言；而“殺僂禁誅”四字，乃就法之作用言也。《韓非·有度篇》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美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韓非》此言，亦卽“簡物小大一道”之意。所謂一民之軌，軌猶道耳。尹《注》據誤本爲說，非是。

大道可安而不可說。

尹知章曰：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張文虎曰：依注，則“安”乃“案”之借字，“大”字疑本作“夫”。

舜徽按：此處依原文讀自通，不煩改字，張說非也。《莊子·大宗師篇》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亦卽大道可安而不可說之意。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

其則。

尹知章曰：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王念孫曰：“直人”當爲真人，說見下解。○張佩綸曰：“顧”當作“側”，字之誤也。“側”與“色”、“則”爲“韻”，“義”讀爲“俄”，言無反無側也。○章炳麟曰：此卽後世所謂“不偏不倚，發而中節”之意。“義”與“顧”意相近，“義”借爲“俄”。《詩·賓之初筵箋》：“俄，傾貌。”《廣雅·釋詁》：“俄，衰也。”《說文》：“顧，環視也。”環視者，必傾邪其目以眇睨。凡傾邪者，必有所偏倚。吾心既無所設，無所爲，則無所偏倚於一物，有感者則應之因之而已。初非偏倚于此迹也。不必如《雜志》以“直”爲“真”之誤。○郭沫若曰：“顧”乃“頗”字之譌。《書·洪範》：“無偏無頗。”“義”、“頗”爲韻。○許維適曰：據尹《注》，不當有“又”字。今本“又”字，涉《注》“又不見於色”而竄入正文內。

舜徽按：王氏謂“直人”當爲“真人”，非也。“直”疑“惠”之脫誤。惠乃德之本字。德人，謂全德之人也。《莊子·德充符篇》曰：“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莊子》所謂全德之人，卽此處所云惠人。尹《注》以“安道之君子”爲釋，亦全德之意。“顧”當爲“頗”，郭義爲長。昔之寫書者，“顧”字多作“頗”，與“頗”形近而誤。尹《注》據誤本爲說，非是。許氏謂“又”字爲衍文，可從。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尹知章曰：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俞樾曰：“伐”乃“貸”字之誤。“貸”字闕壞，止存上半之“代”，因誤爲“伐”矣。據下解曰：“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以“無過”釋“不伐”，則“不伐”是“不貸”之誤，明矣。《禮記·月令》：“宿離不貸”，鄭《注》：“不得過差也。”是貸之義爲過差。《周易·豫象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忒”與“貸”同。日月曰不過，四時曰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此文言“不貸”，而後解言“無過”，正合古義。且言天地者，當美其不差貸，不當言“不伐”。天地之大，誰能伐之乎？於義求之，既不可通。“貸”字與上文“色”字、“則”字爲韻，今誤作“伐”，則於韻求之，又不合矣。是不可不正也。

舜徽按：此處舉天地爲言，謂人君必體天地之德，以虛靜自守，乃能底於不伐之境。所謂不伐者，謂不自矜誇也。《老子》第二十四章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呂氏春秋·知度篇》曰：“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反復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皆卽此意。如俞氏所云：“天地之大，誰能伐之。”是直解伐爲討伐之義，誤矣。若但泥於四時不忒之義，而必謂“伐”爲“貸”之譌體，則亦未達此語原意也。本書《戒篇》有曰：“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韓非·主道篇》曰：“道在不可見，

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皆足以發明此語。

尹《注》“可”字，當爲“自”字之譌。

絜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

尹知章曰：宮者，心之宅，猶靈臺也。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中門，謂耳目也。去私毋言，謂無私言。宮絜無私則神存。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張佩綸曰：“宮”當作“官”，字之誤也。《孟子》：“心之官則思。”趙《注》：“官，精神所在也。”○張文虎曰：下解“開”作“闕”，疑“關”字之誤，此言收視返聽也。

舜徽按：“絜其宮”與下句“開其門”相對，則作宮字是也。尹《注》釋門爲口，而下解謂門爲耳目，似若不諧，其實口、耳、目三者，皆可謂之門。《淮南·主術篇》曰：“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淮南》所云慎守，乃閉而不用之意。張氏謂“開其門”，“開”字爲“關”字之譌，其說是也。“去私毋言”四字，卽承上文六字言。去私，謂絜其宮；毋言，謂關其門。則門之爲義，仍偏重在口，所謂不言之教也。此數語，續申上文天虛地靜之義，以言人君當寂漠自守，歸於無爲。《莊子·天道篇》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

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莊子》此論，發明虛靜之爲用，最爲詳核矣。

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

尹知章曰：忘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遍而盡。

舜徽按：此言天下至大，事物至繁，人君不可能智周萬物，才盡萬事。恃一己之才智，何如任衆人之才智。謀猶慮也，謂一人之智，不足以盡知而徧慮也。《韓非·八經篇》曰：“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呂氏春秋·君守篇》曰：“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若此諸論，皆於人君任人而不任智之旨，有所闡明。可取與“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二語，相互證發。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

尹知章曰：立名當物，所以稱聖。

舜徽按：此承上文任人而不任智之旨，復申取下之

術，在能循名責實，使下無隱情，而名實相當，夫是之謂聖人也。本書《樞言篇》曰：“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九守篇》曰：“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皆足以發明斯旨。《韓非·主道篇》曰：“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又曰：“羣臣陳其言，君以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韓非》所論，益爲透闢。蓋人君授人以位，則必按其位之名以責其效。責其效，卽所以使其實必副其名也。如此，則羣臣競效才智，莫敢自隱，以求實副其名。故人君但須執名核實，而百官盡力。所謂“令名自命，令事自定”，乃人君持簡御繁，以一治萬之術。執本秉要，不外是矣。

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

尹知章曰：道以不言無事爲紀。○王念孫曰：“不言”下脫“之言”二字。○郭沫若曰：當作“不言之意”，意、事、紀爲韻。

舜徽按：“不言”與“無爲”，乃君道之綱。周秦故書中有分舉之者，亦有合言之者。《老子》第二章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四十三章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此分舉之例也。《管子》此處所云“不言無爲之事”，乃合言之例，不必如

王、郭二家說爲增二字也。本書《樞言篇》曰：“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莊子·知北游篇》曰：“至言去言，至爲去爲。”若此諸論，皆通於君道矣。

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

尹知章曰：“君人者，必殊形異執，與物同理，故可以爲天下主。”○王念孫曰：“不”字涉上文“不言”而衍，並見下解中，尹《注》非。○何如璋曰：言事物之蕃變，形勢雖殊，其理則一。此卽《形勢篇》“萬物之生，異趣同歸”之旨。得其道，則皆備於我，自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王以“不”字涉上文“不言”而衍，非。○張佩綸曰：王說非也。此言勢異而理不異，若云與萬物異理，則不可通矣。下解自奪“不”字。

舜徽按：“不”字自是衍文，王說可從。下解無“不”字，知原本未誤。尹《注》以與物同理爲釋，則唐以前已衍“不”字矣。何、張二家說，皆失之。“與萬物異理”五字，正所以申言殊形異執之旨。謂君之與臣，上之與下，其所守不同，所務各異耳。物猶人也，衆也。故衆望謂之物望，衆論謂之物論，衆議謂之物議。此言萬物，猶云羣下也。本書《君臣上篇》曰：“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

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莊子·在宥篇》曰：“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又《天道篇》曰：“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韓非·揚權篇》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溼，君不同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呂氏春秋·園道篇》曰：“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淮南·主術篇》曰：“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若此諸論，至爲切要。皆足以發明“殊形異執，與萬物異理”之旨。

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休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爲，去智與故。

尹知章曰：若不惡死，雖殺無益。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不休乎好。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王念孫曰：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怵”，則此不作“怵”明矣。今作“怵”者，後人據下解改之。



也。但改注文“休止也”爲“怵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作“怵”，是也。“怵”與“誑”通。《說文》曰：“誑，誘也。”《漢書·賈誼傳·鵬賦》：“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此云怵乎好，迫乎惡，卽承上好利惡死而言。故下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尹《注》非。○陶鴻慶曰：“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不”字衍文。本作“其可利，以其好利也”。與上文“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文義相對。下文云：“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與“誑”通，言不爲利所誘誑也。此云“可利”，亦謂可以利誘。今衍“不”字，則不成辭。○郭沫若曰：陶校非是。唯其好利，故可以使之不利。如不好利，則利害置諸度外。利之不能動，害之亦不能動，卽是不好利者，不能加以不利；唯好利者，始能加以不利也。

舜徽按：“其可不利”，“不”字非衍文，郭說是也。此數語明人君不當自見其好惡，而與臣下以可乘之隙。首云“人之可殺，以其惡死；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乃因近取譬之辭，言常人惟以有惡死好利之情，故可制之於法。以見受制於人，悉由自取。人君如欲不制於下，則必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則臣下莫之敢欺。君子，謂人主也。《韓非·主道篇》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二柄篇》曰：“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淮南·主術篇》曰：“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

起。”皆可證發斯義。

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

尹知章曰：既忘智，則事自去。

舜徽按：此言人君物來而順應，非所預設；事至而後動，非所自取。仍承上文恬愉無爲，去智與故之義，而引申之。《韓非·主道篇》曰：“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亦卽此旨。《韓非》所云“不約而善增”，“約”字當爲“動”字之譌。不動而善增，卽無爲而成之意。王先慎謂“約”字當爲“事”字，非也。

過在自用，罪在變化。

尹知章曰：自用不順理，則生過。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

舜徽按：此言人君如好自用其智能，或數數變易其國政，皆足以自取覆敗。《韓非·有度篇》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又《解老篇》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觀此二論，可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之理。尹《注》蓋猶未達斯旨，故言之不明。

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

尹知章曰：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

舜徽按：此言虛靜因應，無知無爲，乃君道之綱，以總結上文之意。《韓非·主道篇》曰：“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呂氏春秋·任數篇》曰：“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皆可取以證發斯旨。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尹知章曰：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日，謂爲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

舜徽按：尹《注》謂自此以下，非管氏之辭，而爲後人注說之語，其言是也。竊疑《管子》原書，每篇皆自有解。蓋漢以上學者所撰，其初與本書別行。傳鈔者欲省兩讀之煩，乃雜取納之本書。劉向校書時，病其繁

重，所除去之四百八十六篇中，此類書必甚不少。今所存八十餘篇，見於篇題而可考者，惟《牧民》、《形勢》、《立政》、《九敗》、《版法》、《明法》諸解僅存耳。其有不別立篇題而混雜入本書內者，亦必繁多。若此處一大段文字是也。顧前人解說之辭，有得原文之意者，亦有與原意不符者。今爲疏證，不曲從，不立異，惟求其是而已。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舜徽按：此釋篇首發端數語之意。以耳目喻百官，以心喻君。言爲人君者，但當虛靜無爲，使百官得守其分，得盡其能，而治道備矣。《韓非·揚權篇》曰：“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亦卽此旨。

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

尹知章曰：心無嗜欲之爲，故能制於九竅。○王念孫曰：凡言“故曰”者，皆覆舉上文之詞。此文“心術者”二句，是釋“無代馬走”、“無代鳥飛”之意，不當有“故曰”二字，蓋涉上下文而衍。○張文虎曰：王氏衍首“故曰”二字，是也。“術”字亦疑衍文。下“故曰君”，當絕句。此正解上文“心之在體，君之位也”。

下文“位者謂其所立”，是解“位”字。尹《注》以“君”字屬下句，非。

舜徽按：王、張兩家說，是也。尹《注》“故能制於九竅”，“於”字當爲衍文。若云制於九竅，則爲九竅所制矣，非原意也。“於”字蓋傳寫者所誤增。

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

尹知章曰：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爲其所能無不誠。○張文虎曰：此文語不可解，疑上“能”字當作“人”，“誠”乃“試”字之誤。能字古讀若耐，與試爲韻。○吳汝綸曰：“誠”當爲“成”。○于省吾曰：《注》說既非，張說尤謬。下“能”字應讀爲“而”。能、而字通，詳《經傳釋詞》。“誠”本應作“成”，後人不解“成”字之義，而改爲誠。《詩·節南山》：“誰秉國成。”《傳》：“成，平也。”《周禮·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注》：“成，平也。”上云“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其能，而不與下平也。是就爲君立說，言上不奪下之能，而不與下平也。又上云“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按奪其能，是與下爭，非無爲也，則與下平矣。

舜徽按：吳、于兩家謂“誠”當作“成”，是也。于氏闡明不與下成之義，尤爲允愜。惟謂下“能”字應讀爲“而”，則非。竊疑下“能”字，原文本作“上”。上不與下成，卽君臣異道之意。世俗傳書，凡遇文中重疊字，例於第一字下書“上”字，示與上同。此處原文作“此言不奪能，上不與下成也”。傳寫者誤視“上”字爲“能”字重文之標識，遂徑改作“能”字耳。其致

譌之跡，蓋如此。

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

丁士涵曰：觀下疑脫“其則”二字，上文“毋先物動，以觀其則”。

舜徽按：丁說是也。此申君御臣下，以靜制動之意。《淮南·汜論篇》曰：“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最足證發斯旨。

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

尹知章曰：靜爲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

舜徽按：《老子》第二十六章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韓非·喻老篇》曰：“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也。”凡《老子》所云：“輕則失本，躁則失君。”《韓非》所云：“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皆即動則失位，靜乃自得之旨。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

尹知章曰：所謂大無不苞，細無不入也。

舜徽按：此言道之所存，無乎不在也。《淮南·原道篇》曰：“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原流泉淖，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淮南》此言，足以發明“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語。

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

尹知章曰：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

舜徽按：此言道在人身，虛則得之也。《淮南·原道篇》曰：“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淮南》所云“嗜欲好憎外”，即君道貴虛之意。

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尹知章曰：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俞樾曰：此“精”當為“情”，蓋世人唯以情為主，故必去欲而後宣，宣而後靜，靜而後精，精而後獨立。若作“所職者精”，失其旨矣。○郭沫若曰：“世”字《纂詁》本屬上為句，引豬飼彥博云：“世當作也”，可從。“職”假為“職”，“精”當為“情”。“宣”乃“寡”字之誤。○劉師培曰：

“立”字衍。下云“獨則明”，亦無“立”字。

舜徽按：“也”“世”二字，形近易譌。豬飼彥博謂“世”當作“也”，屬上爲句，是已。其他諸字，不必改讀。蓋此數語，乃言精與神之爲用，亦就人主立說。《淮南》有《精神篇》，高誘釋之曰：“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書《內業篇》曰：“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春秋繁露·通國身篇》曰：“氣之清者爲精。”此文言人之所職者精也云云，謂人之所賴以生者在氣，必去欲而氣乃通。通則靜，靜則明，明則神。若嗜欲不除，神亦不能留止也。《淮南·精神篇》曰：“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又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又曰：“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淮南》所論，通於道德之要，實與此文相表裏。尹《注》已窺悟斯旨，但未詳核耳。舊注固有不可盡廢者矣。劉氏謂“精則獨立”，“立”字爲衍文，是也。蓋獨與一同義。《韓非·揚權篇》曰：“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亦卽斯旨。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

尹知章曰：有此然後知彼也。○王念孫曰：此當作“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人皆欲知”云云，覆舉上文也。“其所知”云云，



乃釋上文之詞。今本“莫索”下衍之字，“彼也”上又脫“其所知”三字，遂致文不成義。

舜徽按：卽如王說校改，而語意仍晦。竊疑原文當作“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知此也，其所以知彼也”。共二十字。今本字數雖同，而誤脫誤倒，至不可讀。首句兩“知”字，皆當作“智”，與上章一致。下句“知此知彼”互倒，亦宜乙正。證以下文“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二語，則原句知此在前，知彼在後，明矣。此，謂道也。彼，謂人事物理也。道不遠人，近在己身，故謂之此。爲人君者，必先知道，始能周知世情。尹《注》云：“有此，然後知彼也。”最足以發明斯義。人君苟達於執本秉要之術，無爲而無不爲，則下情悉無所隱。知此也，其所以知彼也。意在是矣。

不修之此，焉能知彼。

尹知章曰：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

舜徽按：此言人君不修之己，以清虛自守，則亦無由以知人事世情也。《淮南·主術篇》曰：“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淮南》所言無爲之效，惟有道之主能之。

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

尹知章曰：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誑者，無能藏隱故也。○張文虎曰：“能”讀爲而。而、如古通。○郭嵩燾曰：“能”當作“如”。

舜徽按：“能”字當爲“如”字之誤，郭說是也。人君自修之道，莫若自虛其中。自虛其中者，嗜欲不藏於己之謂也。尹《注》據誤本書，釋爲“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誑”云云，非是。

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

尹知章曰：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王念孫曰：“故”下衍“曰”字。“奚”下不當有“率”字，此卽奚字之誤而衍者。去知則奚求，無藏則奚設，相對爲文，則無率字明矣。尹《注》非。○郭大癡曰：去知者，外不紛驚於視聽也。無藏者，內不豫有所意必設謂，挾成心以縣待物之至也。反覆，《考工記·廬人》鄭《注》：“猶軒輶也。”反覆虛者，狀輕重高下之無成勢、無常形耳。

舜徽按：自“人皆欲知”至此，皆言人君自修之道。王氏謂“曰”、“率”二字爲衍文，是也。郭氏所釋諸義，皆甚允愜。尹《注》失之。

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赴。無所位赴，故徧流萬物而不變。

尹知章曰：屈，竭也。赴，逆也。無物與之同，故不變。○王引之曰：“位”、“赴”二字，義不相屬。“位”當爲“低”，低赴，卽抵牾也。凡物之所以抵牾者，以其有形也。道無形，則無所抵牾。故下文云：“無所低赴，故徧流萬物而不變”也。《史記·天官書》

“其前抵者戰勝”，《漢書·天文志》“抵”作“低”。《漢書·食貨志》“封君皆氏首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史記·平準書》作“低”，是抵、低古字通。隸書“低”字作“伍”，形與位相似，因譌而爲位矣。

舜徽按：此釋上章“虛無無形謂之道”一語，而申言人君法天之意。本書《形勢篇》曰：“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此論亦足發明斯旨。

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

尹知章曰：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爲道舍。○張文虎曰：職、識古通假字。“知”字似衍。○郭嵩燾曰：下“生”字疑衍。○吳汝綸曰：下“生”字屬上讀。

舜徽按：物得以生生，卽上章化育萬物意。吳說是。

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以然也。

尹知章曰：得道之精而然。○丁士涵曰：“其謂”當作“謂其”。下文“謂其所以舍”，“謂各處其宜”，“謂有理”，皆“謂”字在上。“以”與“已”同。○陶鴻慶說同。

舜徽按：原句當作“謂其所以得也”，與下文“謂其所以舍”句法一例。今本文字既有誤倒，又衍“然”字，而義晦矣。“然”字因注而衍。

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

尹知章曰：無爲自然者道也。道之所舍之謂德也。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同體故能不別。道德之理可間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王引之曰：“之理”二字，因注而衍。“間者”上又脫“無”字。無間者，謂其所以舍也。言道之與德，所以謂之無間者，謂德即道之所舍，故無間也。尹所見本，已脫“無”字，故以爲可間。豈有上言“無間”而下又言“可間”者乎？失之矣。

舜徽按：析言之，道與德有別。渾言之，則二者無分。本書《戒篇》曰：“所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韓非·解老篇》曰：“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若此諸論，則道之與德，名二而實一矣。故周秦古書，言之多不別也。

義者，謂各處其宜也。

戴望曰：“各”，一本作“名”。

舜徽按：作“各”者是也。上章云：“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此處以各處其宜解之，謂君臣父子人間之事各得其宜耳。《荀子·彊國篇》曰：“分義則明。”楊倞《注》云：“義謂各得其宜。”亦足爲此解旁證。

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

許維通曰：《御覽·禮儀部》二引無“而”字。

舜徽按：《御覽》引書，多有脫佚，不可盡據以改本文。此處有而字爲是。《禮記·坊記篇》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防者也。”與此解同，亦有“而”字。

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

王引之曰：“禮出乎義”當作“禮出乎理”。禮者，謂有理也。故曰“禮出乎理”。“義出乎理”當作“理出乎義”。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曰“理出乎義”。“理因乎宜”當作“義因乎宜”。義者，各處其宜也。故曰“義因乎宜”。寫者錯亂耳。不然，則義者宜也。上言“禮出乎義”，而下又別言“理因乎宜”，是分“義”與“宜”爲二也，殆不可通。○郭沫若曰：王校不可從。原文當爲“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道”。“道”因形近誤爲“宜”耳。此與下文“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同例。

舜徽按：首“故”字，疑沿下文而衍。下文“故禮出乎義”云云，乃總承上文之辭。王氏謂當作“禮出乎理，理出乎義，義因乎宜”，其說自安。郭氏必謂“宜”字爲“道”字之譌，不特前無所承，而語意亦墜虛矣。誠如王所校改，與下文“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辭例亦同。

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僂禁誅以一之也。

尹知章曰：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俞樾曰：如尹說，當曰與禮同出，乃曰所以同出，義不可通矣。“出”疑“世”字之誤。“世”，隸書或作“世”，故與“出”相似而誤也。所以同世，謂所以齊同一世之人。下云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即所以同世之義。

舜徽按：齊同一世之人，正以解上章“簡物小大一道”之旨，俞說可從。

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

尹知章曰：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權道者，事從之而出。○許維通曰：“故”字涉上文衍，《莊子·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釋文》引李頤云：“督，中也。”尹《注》釋督爲察，非是。○郭沫若曰：此督字乃動詞，如訓爲中，無義可說，仍是督察之意。尹《注》不誤。

舜徽按：許氏謂“故”字爲衍文，是也。“督”字仍以訓察爲允，郭說得之。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

郭嵩焘曰：上文“其謂所以然也”。萬物皆得以然，言得之以爲物也。“以得”二字誤倒。

舜徽按：郭說非也。“然”字應屬下。“然莫知其極”，與“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俱五字成句。德、得、極爲韻。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

尹知章曰：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劉績曰：“宜”即前“義”也。王念孫曰：此二語釋上文“真人之言，不義不顧”也。“莫人”當爲“真人”。隸書“真”字作“眞”，“莫”字作“莫”，二形相似。上文作“直人”，此文作“莫人”，故知其皆“真人”之譌也。“言至也”三字，語意未明，疑有脫誤。“宜”與“義”古字通。“不宜”，即上文之“不義”也。義者度也，言事至而後應之，不先爲量度也。故曰：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尹不知“莫”爲“真”之譌，又不知“不宜”即上文之“不義”，遂讀“莫人言”爲句，“不宜言”爲句，而強爲之說矣。○俞樾曰：此云“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下云“不顧，言因也”，皆釋上文“真人之言，不義不顧”之義。“不宜”即“不義”也，然則“莫人”乃“直人”之誤。疑《管子》原文本作“直人言正也”，蓋以“正”釋“直”。《禮記·曲禮篇》“直而勿有”，《郊特牲篇》“直祭祀於主”，鄭《注》並曰：“直，正也。”以正釋直，乃古義也。“直”與“莫”，“正”與“至”，皆以形近而誤。

舜徽按：王氏謂“莫人”當作“真人”，俞氏謂“莫人”當作“直人”，疑皆非是。原文蓋本作“愚人”，說已詳前。

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

張文虎曰：“能”字疑衍。下云“因也者非吾所顧，故

無顧也”，亦無能字。

不顧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

尹知章曰：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舊也。非吾所爲，故無顧。○俞樾曰：“非吾所顧”當作“非吾所取”。此與上文“應也者非吾所設”相對成文。據下文云“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又云“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並以“所設”、“所取”對言，故知此文亦當作“所取”也。《廣雅·釋詁》：“取，爲也。”尹氏作注時，文尚未誤，故釋其義曰“非吾所爲，故無顧”。以“爲”訓“取”，正本《廣雅》義。或據尹《注》，謂正文亦當作“爲”，則是尹氏空舉正文，無所訓詁，無爲貴注矣。○郭沫若曰：第一、第三“顧”字，均當爲“頗”。第二“顧”字，涉上下文而衍。俞謂當作“非吾所取”，是也。宋本作“所所”，下“所”字卽“取”字之譌。

舜徽按：俞、郭二家說得之。尹氏據誤本書作注，故言之不明。

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

尹知章曰：不知深淺之囿域也。○張佩綸曰：“囿”字疑誤。

舜徽按：《說文》：“囿，苑有垣也。”苑有垣，則內外隔離，外無由知內。此以深囿連言，喻人君淵默虛靜，莫能窺其意旨也。“囿”字不誤。



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

張佩綸曰：“伐”當作“貢”。

舜徽按：此言不伐，別自有義。不煩改字，說已詳前。

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

尹知章曰：去好過，去欲好之過也。○丁士涵曰：“好過”當作“好惡”，好惡，謂私也。上文云“去私無言”，又云“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韓非子·揚權篇》“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張文虎曰：上文作“開其門”，此作“闕其門”，疑皆“關”字之誤，乃言收視返聽也。

舜徽按：丁氏謂“好過”當作“好惡”，是也。足訂尹氏據誤本立說之非。張氏謂“闕”當作“關”可從。說詳前。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

尹知章曰：不得無實虛延其名。○王念孫曰：“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陶鴻慶曰：“言”下當重“言”字，因重文作二而誤奪也。“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二句，文義相對。故下文云“督言正名”，此節上下文皆論聖人因形以爲名，故於其言無所苟，孔子所謂“名之必可言也”。王氏謂“不得過實”

上當有“名”字，非也。○張佩綸曰：“延名”乃“過名”之誤。舊注非。

舜徽按：陶說是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二語，乃覆舉上文之辭。“此言”二字下，乃解說之語。解者以“言”當“名”，以“實”當“形”，故云“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也。《韓非·姦劫弑臣篇》曰：“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又《主道篇》曰：“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據此，可知“言”猶“名”也。陶氏謂“言”下當重“言”字，“言不得過實”，猶云“名不得實”耳。正不必如王氏說“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而後可也。“延”有“長”訓，引申之自有“過”義。“實不得延名”，謂實不得過其名也。不必改字，張說非。

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故曰聖人。

尹知章曰：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張佩綸曰：“姑”當作“故”。

舜徽按：張說是也。下“故”字當爲“是”字之譌。此處原文當作“故以形務名，督言正名，是曰聖人”，共十三字。句首衍“形以形”三字，而義不可通矣。尹氏據誤本爲說，而意益晦。《韓非子·揚權篇》曰：“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脩

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謹脩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韓非》此論，最足發明“以形務名，督言正名”之旨。

不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

尹知章曰：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人有所爲，故聖人得不應。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王引之曰：“務其”下“應”字，“所以成”下“之”字，皆衍文也。尹《注》曰：“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則正文作“務其所以成”明矣。此以“名”與“成”爲韻，下文曰“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亦以“形”與“名”爲韻。○張佩綸曰：“之應之道也”，當作“此應之道也”，與下一律。

舜徽按：此數語乃言人君出聲應容之道。王氏謂“務其”下“應”字爲衍文，張氏謂“之應之道”當作“此應之道”，皆是也。惟“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一語，猶有脫誤，諸家皆未校出，則其義仍不可通耳。今旁稽之周秦故書，知“以其”二字下脫“出”字，“人”字當爲“入”字之譌。原文當作“應也者，以其出爲之入者也”。尹氏據誤本書注之曰“人有所爲，故聖人得不應”，而意全晦矣。《呂氏春秋·審應覽》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呂覽》所言，可以印證此文。

無爲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

尹知章曰：損益者生有爲。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張佩綸曰：“道”當作“事”，涉上文“應之道也”而誤。

舜徽按：道猶事也，不必改字。尹《注》“非因而可”，“可”字當爲“何”字之譌，傳寫者脫二畫耳。《韓非·主道篇》曰：“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韓非》所言“因以斷事”，“因而任之”，“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云云，卽無爲之道。《呂氏春秋》有《貴因篇》，闡發斯理尤盡。

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

尹知章曰：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張佩綸曰：上文明以“不言”、“無爲”爲道之紀，非以名爲紀也，此解不合。○郭沫若曰：張說甚謬。道之本身雖以“不言”、“無爲”爲綱紀，然而在乎人事，則聖人以名紀萬物。此重申上文“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之義。何不合之有？

舜徽按：郭說是也。《韓非·揚權篇》所云：“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卽以名紀萬物之理。物猶

人也，衆也。萬物，謂羣下也。此與上文“與萬物異理”之萬物同義。

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於能，動於故者也。聖人無之。無之，則與物異矣。異則虛。虛者，萬物之始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

尹知章曰：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必善，然後成人也。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物有我無，故異也。異於有，故虛也。有形生於無形也。聖人體虛，故爲天下始也。○陶鴻慶曰：“未於能”三字，文不成義。尹《注》云：“能未成者，習而成之。”疑正文本作“習於能”，故《注》云然。今作“未”者，涉注文而誤耳。“故”謂智故，上文云“恬愉無爲，去智與故”，是也。尹《注》謂“運動必循於故致”，非是。○張佩綸曰：人者四句，乃解“人之可殺”。“人”字當屬下節，錯置於此。兩“無之”當作“無知”，聲之誤也。篇終言“其處也若無知”，是其證。“異”當作“不異”，與經合。王氏據解改經，非是。

舜徽按：“未於能”當作“成於能”。“成”字漢隸有作“成”者，與“未”形近而致譌耳。“動於故”，“故”謂智故，陶說是也。此文首云“人者”，謂衆人也，常人也。言常人必致力於強、善、能、故四者，而後可以立事成業。至於人君，則無須於此，是與衆人不同之情也。故曰“聖人無之，無之則與物異矣”。衆人皆有，而人君獨無，是虛也。主道貴虛。惟虛能受，能受則可以制人，而不爲人所制。此乃主道之弘綱，無爲之精義。故曰可以爲天下始。張氏昧於斯旨，故其說甚謬。

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

尹知章曰：迫入於惡，故失於好。爲好所怵，故忘其惡。二者皆非。○丁士涵曰：“不怵乎好”上，當有“君子”二字，今誤脫在“恬愉無爲”句上。○郭沫若曰：丁說非是。原文乃先釋“不怵乎好，不迫乎惡”，再釋“君子”，先後分爲兩項，故有兩“故曰”。“故曰君子”四字，當自爲句。趙本失其讀，丁校亦誤。

舜徽按：郭說是也。此云“故曰君子”，與上云“故曰聖人”句例正同，皆謂人君也。

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

尹知章曰：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張佩綸曰：“虛素”當作“虛絮”，本經“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絮，神不留處”言。

舜徽按：張說非是。周秦故書言及君道，以虛素爲言者，多矣。《韓非·揚權篇》曰：“權不欲見，素無爲也。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呂氏春秋·上德篇》曰：“愛惡不藏，虛素以公。”皆言人君貴能清虛自守，任人而不任智也。

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

尹知章曰：舍己而隨物，故曰因。○陶鴻慶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當作一句讀。下文云

“物至則應，過則舍矣”，卽此義。尹《注》於“以物”斷句，誤。

舜徽按：尹《注》以“舍己而隨物”爲釋，疑正文“舍己而以物”，“以”字乃“从”字之誤，“从”卽“從”也。尹所見本，蓋猶未誤，故以“隨”釋“从”耳。“爲法者也”四字，於義不安。使非衍文，則其上必有奪字。

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

尹知章曰：變化則爲生，謂有爲於營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俞樾曰：古“爲”、“僞”字通，尹讀如字非。

舜徽按：古之言君道者，皆主於君無爲而臣有爲。若臣有爲而君亦有爲，則上下抵觸矣。故曰：“不虛則忤於物也。”君以無爲爲治。若喜變化，則有爲矣，故曰“變化則爲生”。“爲”讀如字，義亦可通。下又云“爲生則亂”者，卽君臣同道則亂之意也。末句“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原文當作“因其能而用之也”，今本衍一“者”字，且誤兩字，而義晦矣。尹氏釋爲“就能而用”，則正文本自有“而”字也。

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李哲明曰：下“矣”字涉上而衍，“所”字亦當衍。

刪此二字，文即可讀。上言“物至則應”，是其體本虛也。過而舍之，舍之是復於虛矣。

舜徽按：下文“舍矣者”三字，乃承上句“過則舍矣”而申釋之之辭。下“矣”字不必爲衍文也。“言復所於虛”，猶云“言復歸於虛”也。“所”字疑爲“歸”字之誤。

## 心術下篇疏證

吳汝綸曰：此篇與《內業篇》相出入。○何如璋曰：此篇乃《內業》解，因錯卷在此，遂附以《心術》標目而分爲上下二篇。然其文俱見《內業》，惟顛倒錯亂耳。

舜徽按：上世道術，所起甚早，初但口耳相傳而已。迨著之竹帛，則人各有記，故語多雷同。而百家言主術，咸歸於執本秉要，清虛自守。記禮之人，各述所聞，故其論不嫌複出疊見。周秦古書，大抵然矣。《管子》書，既非出於一手，成於一時，則其中雖有彼此近似之篇，無足怪也。《心術》之與《內業》，皆所以明人君南面之術。旨趣既同，語故無二。即令此篇非彼篇之解，亦足以相互發明也，今隨文疏證之。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

尹知章曰：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

舜徽按：此言人君必外內交養。無諸中，固不能形



於外。反之，則外貌不莊者，內亦無以居德也。尹所引《詩》，乃《大雅·抑篇》之辭。彼篇鄭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正義》云：“此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故人能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鄭、孔所言，足以發明外內必交相養之旨。尹氏以“誠至”釋“精”，誠至乃專一之意。蓋內不專一，則莫由虛靜；內不虛靜，則心紛亂而不治。此所以百家言主術者，必以虛無清靜爲本。

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

尹知章曰：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李哲明曰：“飾”當爲“飭”，《內業》云“攝德”，攝亦整攝之意。“飾德”則虛僞，非其義矣。

舜徽按：飾猶修也，治也。此言飾德，猶言修治其德，不必改飾爲飭也。此數語皆四字爲句，“神”字疑衍。

是故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

尹知章曰：貪賄，則官亂也；健羨太甚，則心亂也。官貨兩忘，則內德也。○張文虎曰：此謂耳目口鼻之官也。尹《注》云“貪賄則官亂”，謬。○陶鴻慶曰：

“曰”字不當有，涉上篇之解而誤衍也。官謂耳目，上篇云“耳目者，視聽之官也”，是也。又云“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卽此義。尹《注》解爲官府，大誤。○安井衡曰：《內業》再言“內得”、“中得”，皆作“得”，此“德”亦當爲“得”。

舜徽按：張、陶二家說，足訂尹《注》之誤。官謂人體五官；物謂七情六欲也。《淮南·原道篇》曰：“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爲狂。憂悲多志，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淮南》斯論，可以發明“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是謂內德”之意。古德、得二字，渾言多通。《說文·心部》：“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惠”卽“德”之本字。許君以“得”詁“惠”，謂其義同耳。此篇作“內德”，《內業》言“內得”，義可兩通。不煩改字，安說非。

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

尹知章曰：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不達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膜。

○許維通曰：“反”猶復還也，下文“必反其性”同。

舜徽按：“行者正之義也”，當作“行者民之義也”。“義”卽“儀”之省借，古字通用。下云“行不正則民不服”，正承此語而發。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

舜徽按：此言人君無爲於己，若天地之無爲而無不覆載也。《老子》第七章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王弼注：“無私者，無爲於身也。”王氏以“無爲”釋“無私”，最爲精邃。若但以公私之私說之，則浮淺矣。古人言君道，必取譬於天地者，本書《形勢解》曰：“天之載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載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載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韓非·大體篇》曰：“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觀斯二論，可悟善爲君者，必與天地比德之理。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

尹知章曰：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自理矣。○劉績曰：“財”同“載”。○王念孫曰：此以兩“治”字絕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與名正相對也。尹以“天下治實不傷”連讀，大謬。○郭沫

若曰：“實不傷”上，當奪一“名”字。傷猶爽也。

舜徽按：此言人君任人使物，咸得其宜，俾名實相應，各效所長，而天下自理也。本書《形勢解》曰：“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韓非·揚權篇》曰：“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若斯二論，與此處所云“聖人因而財之”之語，可相證發。

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

尹知章曰：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許維通曰：“知遠之證”，義難通。“之”猶“若”也，“證”當作“近”，“證”俗作“証”，與“近”形略似。知遠之近，猶知遠若近也。近與心爲韻，若作“證”，則失其韻矣。《內業篇》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字異而義同。

舜徽按：許氏謂“證”當作“近”，是已。謂“知遠之近”，猶言知遠若近，則非也。蓋“之”猶“自”也，“知遠之近”，猶云“知遠自近”耳。亦即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之意。《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朱《注》云：“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朱子以“見於彼者由於此”釋“知遠之近”，亦即知遠自近之意。《內業》所云“雖遠若近”，與此處“知遠之近”語意不同。許氏取以爲證，非是。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

尹知章曰：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己分，誠己自通，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

舜徽按：此言人能專一精誠，必有以自得，無假於外也。能止能已，實一意而分爲二語。“已”卽“止”也，尹《注》讀爲“自己”之“己”，失之矣。《莊子·庚桑楚篇》曰：南榮趯曰：“趯願聞衛生之經。”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斯論雖爲衛生而發，然推而廣之，實亦君道之綱，故此處亦以爲言。

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尹知章曰：誠己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教。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我也。○丁士涵曰：當以“思之思之”句，“不得”上又脫“思之”二字。《內業篇》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以彼證此，可知其有脫字矣。○陶鴻慶說同。

舜徽按：此言人能精思熟慮，必無不解之理，若冥冥者有以助之也。《呂氏春秋·博志篇》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亦卽此旨。

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

尹知章曰：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

舜徽按：尹《注》釋“一”爲“專一”，是也。凡能專一心力以從事於一事一藝者，積之既久，始可語乎變化，俗所謂熟能生巧也。驗之詩、文、書、畫、樂伎、百工，靡不皆然。大抵用力之始，必專守成規，勤學苦練，卽一氣一事之謂也。及其深造自得，始能越出成規，自成家法，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卽能變之謂也。非極精大智，孰能臻於此乎？學藝如此，治道亦然。故此篇言及主術，亦主於專一也。

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

尹知章曰：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今極於變通之理，應物者也。慕選則齊潔，故不亂；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俞樾曰：“慕”乃“纂”字之誤。《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爲齊，《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子選”。是選有齊義。《韓詩》作“舞則纂兮”，蓋“選”與“纂”，聲近而義通。此云“纂選者所以等事也”，正以纂選之義並爲齊也。《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是其義也。“纂”與“慕”，字形相似，因而致誤。尹《注》曰：“或占慕之，或選擇之。”失其義矣。○劉師培曰：慕選與極變對文，“慕”疑“纂”訛。纂亦極也，選當訓齊，纂極互言。

舜徽按：尹《注》固失之，俞、劉說亦未爲得也。“慕選”二字，義不可通。疑爲“恭巽”二字之譌。巽者遜也，順也。“恭巽”乃率由舊章，專守成規，無事改作之意。凡成事必以此爲始基，抑亦立業之次第應爾。故曰“恭巽者所以等事也”。等猶次第耳。爲之既久，自能通於變化，應物施事，無所不宜。故曰“極變者所以應物也”。此數語實承上文“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二句，而續申之辭。“恭巽而不亂”，謂專一也；“極變而不煩”，謂能操簡馭繁，持類統雜也。

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

尹知章曰：“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

舜徽按：精專無雜，不爲物擾，乃君道之根柢，故一又爲道之異名。本書《兵法篇》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是“一”與“道”、“德”本無殊也。《老子》第三十九章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至樂篇》則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可知“一”卽“無爲”，“無爲”卽“道”耳。《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呂覽》此論，亦見《莊子·庚桑楚篇》，而文辭略同，俱足以發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之旨。

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

尹知章曰：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舜徽按：尹《注》稱《易·乾·文言》之辭，以明君道上法自然之意，是也。本書《版法篇》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莊子·天道篇》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天下功成。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呂氏春秋·勿躬篇》曰：“聖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皆卽此旨。古人言君道，所以必取象於天道者，《大戴禮記·哀公問篇》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孔子此論，發明君道上法自然之意，最爲透闢矣。

聖人裁物，不爲物使。

尹知章曰：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爲裁而使己也。

舜徽按：《說文》：“裁，制衣也。”凡制衣者，必割裂其布帛。故引申之，又有分義。本書《乘馬篇》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彼篇所言“分民”，卽此處“裁物”之義。“裁”，古通作“財”。上文云“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可與此相證發。



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

尹知章曰：聖心安，是國安；聖心治，是國治。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從也。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功成人服，非理而何。

舜徽按：“心”有二義：一謂人體五官之心。人君必先治其心，而後能治天下。《淮南·原道篇》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是其義也。一則以“心”喻“君”，謂君能自治，始能治國。《淮南·繆稱篇》曰：“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是其義也。此篇及《內業》所云“治心”，皆謂五官之心。治心之術，歸於執一。執一之要，不外清虛二字而已。此處重申治心為治國之本，實承上文“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為言。

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

尹知章曰：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

舜徽按：此數語承上句“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而續申之。操者，把持也。危猶畏也。謂把持萬民，不在刑；而使民畏服，不在怒。其能使民爲我把持而百姓爲我所服，終以道爲至本也。“至本”猶言“大本”，今“至本”二字互倒，傳寫者亂之耳。尹《注》誤矣。《淮南·汜論篇》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最足以發明斯旨。

至不至無，非所人而亂。

尹知章曰：無，虛也。所謂至者，虛之道也。非至虛而爲天下主，必亂。○張文虎曰：“至不至”疑當作“本不至”，承上句而言也。尹《注》以“至不至無”爲句，文不成義，“無”字當衍。○許維通曰：張說非。疑當作“至無不至”，與上“道其本至也”義正相承，今本字錯亂耳。“所”猶“其”也，“而”猶“則”也。○郭沫若曰：“不”讀爲“丕”。“至丕至無”，猶言道之爲物“至大無外，至小無內”。

舜徽按：“不”字當爲“本”字，形近之譌。此處仍承上文“至本”言。尹《注》釋“無”爲“虛”，是也。諸家說皆失之。“至本至無”猶言大本至虛耳。“非所人而亂”，許說可從。

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

尹知章曰：有司執制，常棄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何如璋曰：“利”當是“則”字，言有司所執

制者之法度，不可云道。○郭沫若曰：“利”當是“制”字之誤，“制”古本作“刺”。

舜徽按：“利”猶“善”也。不煩改字。執制，猶云拘守法制也。此言百官羣吏，遵制行事，以致善績者，蔽於一曲，而闕於大理，終不足以語乎道要也。蓋古者君臣異道，上下殊事。本書《君臣上篇》曰：“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又曰：“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彼篇所云“守職”，所云“身善”，卽此篇所云“有司執制者之利也”。大抵百官羣吏，各有專司，徒工一伎，而昧於全體。以言守職，則善；若云應變，則隘。《商君書·更法篇》曰：“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淮南·汜論篇》亦曰：“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凡此諸論，皆爲有司執制者而發，其所以拘隘至此，由不明道故耳。尹《注》已窺斯旨，但未暢盡，故今爲詳說之。

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

尹知章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歿世不亡也。無形則無變移之時。○戴望曰：“沒世不亡”，“亡”當作“忘”，古字通。○安井衡曰：“不化”不當重出，

下“不化”疑當作“不傷”，與亡、強、方、明爲韻。

舜徽按：原文作“歿世不亡”，亡猶盡也。尹《注》得之，不煩改字，而義自安。尹《注》又以“無變”釋下“不化”二字，則化字不誤。竊疑上句“與時變而不化”，“化”字爲“已”字之譌，而下“不化”字仍舊，於義較勝。

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

尹知章曰：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肋強也。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陶鴻慶曰：此文當作“戴乎大圓，體乎大方；鏡乎大清，視乎大明”。今本衍“能”字。兩“者”字蓋涉上句“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而誤也。圓方清明，義當平列，卽上文所謂“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也。《內業篇》云：“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義亦平列，可知此文之誤。尹《注》順誤文解之，於義難通。

舜徽按：陶氏謂此文有誤，尹《注》順誤文解之，於義難通，是也。惟以《內業篇》“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一語語法求之，則此處原文，疑當作“乃能戴大圓而體乎大方，鏡大清而視乎大明”。今本“能”字上奪“乃”字，兩“而”字誤爲“者”字，而義不可通矣。“乃”者，轉語之詞，實承上句“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以續申其義。言人必正靜，而後筋骨肋強，始能頂天立地，明乎大道，以治天下也。若但作“戴乎大圓，體乎大方，鏡乎大清，視乎大明”，四語齊列，則平淡寡味矣。

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

尹知章曰：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之爲物彌精，心之爲用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劉績曰：“金心在中不可匿”，當依《內業篇》作“全心在中，不可蔽匿”。下文“金心之形”，當依《內業篇》作“心氣之形”。此作“金”字誤，尹曲爲之說，非也。○洪頤煊說同。○俞樾曰：《內業篇》又云：“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疑“全”字、“金”字皆正字之誤。正心者，誠心也。“正”、“誠”古通用。下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義亦同此。

舜徽按：“金心”當爲“全心”之誤，劉說是也。全者，純一不雜之謂。“全心在中不可匿”，卽有諸內必形諸外之意。俞氏謂“全”當爲“正”，非是。且《內業篇》所云“正心在中”，與“全心在中”二語，分在兩章，文不相聯。所謂“正心”，乃指中正無偏之心，與誠義亦別，不必混而爲一。末云“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二語相對爲文，正申不可匿之意。“可知於顏色”，辭義自安。王念孫必謂“可”字爲衍文，亦非。

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尹知章曰：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

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劉績曰：“戈”《內業》作“戎”，“不言之言”，作“不言之聲”。“金”亦“全”字之誤。○許維通曰：《說郭》卷六《讀子隨識》引“戈”仍作“戈”，下“言”字作“信”。

舜徽按：不言之言，義不可通，且與下句聞於雷鼓不協。下“言”字，當爲“音”字之譌。篆文𠂔𠂔二體，極似易淆，故傳寫者亂之。此處作“不言之音”，猶《內業》作“不言之聲”也。此篇與《內業》理論全同，而文辭不必字字皆合。故此處作“戈”，彼篇作“戎”；此處作“音”，彼篇作“聲”；均無不可。惟有大關繫處，若“全”誤爲“金”，則必據彼改此耳。“音”字既誤爲“言”，引者又誤爲“信”，益不可解矣。

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

尹知章曰：愛惡以爲心本也，故貨刑爲末也。○俞樾曰：“明王之愛天下”，“暴王之惡天下”，兩“之”字皆“心”字之誤，承上文三句而言。“貨”當作“賞”，與“刑”相對爲文。《內業篇》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彼篇文義多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舜徽按：“明王之愛天下”，“暴王之惡天下”，兩“之”字蓋沿下數句皆有“之”字而誤衍。俞氏謂當作“心”，非也。惟謂“貨”當作“賞”可從耳。尹《注》“愛惡以爲心本”，當作“愛惡以心爲本”，傳寫者誤倒，而義晦矣。本書《立政篇》曰：“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

也。”此論足以發明愛惡以心爲本，賞刑爲末之意。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

尹知章曰：正平則能保全其生，喜樂哀怒失常，則失其主。樂主和，故能節怒。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

舜徽按：喜樂哀怒，所謂情也。人之生，不能無情，情過則足以傷生。故善養生者，必以節情爲亟。於人君，尤治心之本，是以此處言及之。《呂氏春秋·情欲篇》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足以證發斯旨。此處所云“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卽上文“意氣定然後反正”之意。

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尹知章曰：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蔑不足資也。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感而得言。意感其事，然後呈形。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擁，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

固，被及其身也。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舜徽按：“利”與“安”，皆有善義。人君必有虛靜平正之心，以之應事，則無不利；以之自處，則無不安；故謂之利心安心也。苟人君不能內治其心，執一以靜，而惟多其意念，繁其思慮，以求博營而廣知，則足以傷其生。故曰“過知失生”。失猶傷也。主道以無爲爲本，無爲以虛靜爲宗。必藏其聰明，偃其智故，始能制物而不制於物，以用之不窮。此處所云“內聚以爲原”者，意在斯耳。既如泉之不涸竭，則應變施事，其術靡盡矣。《淮南·原道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又《人間篇》曰：“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凡此諸論，悉道德之精蘊，可取以證發斯義也。讀此等書，貴在心知其意，以探索其主旨。至於一字一句之間，雖與《內業篇》多有出入，正不必強求其盡同也。諸家率致詳於校字之末，其書具在，今亦不能盡錄云。

## 白心篇疏證

舜徽按：白心者，猶云道心也。《淮南·俶真篇》曰：“虛室生白。”高誘《注》云：“白，道也。”是白有道誼矣。《荀子·解蔽篇》引《道經》曰：“道心之微。”



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亦曰：“道心惟微。”皆指君道言，詳拙著《危微論》。微之爲言隱也，蔽也，周也，密也，亦即清靜無爲之意。其本在能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故此篇尤詳道之。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和則能久。

尹知章曰：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靜則思慮審，爲建事之宗。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爲事實也。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爲儀。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王念孫曰：尹說甚謬。“當”當爲“常”，“有”當爲“首”，皆字之誤也。“建常立首”爲句，“以靖爲宗”爲句。“首”卽“道”字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寶、久爲韻。“建常立道”者，建亦立也。立之而可行，謂之道；立之而可久，謂之常；其實一也。靜以守之，時以成之，正以準之，則常可建而道可立矣。故曰“建常立道，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也。“政”與“正”同。儀，法也。言以正爲法也。尹以“政”爲“政事”之“政”，亦非。下文“非吾當”，“當”字亦當爲“常”。“非吾儀”，“非吾常”，“非吾道”，卽承此文“建常立道，以政爲儀”而言。下文又云“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亦承此文而言。○陶鴻慶曰：王氏謂“建常立道”四字爲句，與下寶、久爲韻，其說是已。然此文隔句用韻，而首句用韻爲他書所罕見，疑“建常立道”句當在“以政爲儀”句下。“和”乃“利”字之誤。其文云“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建常立道，利則能久”。儀也，常也，道也，文異而義同。而“建常立道”爲主

靖待時以後之事，故下文云“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亦以儀與常道比次成文，與此文合。“則”猶“乃”也，“利則能久”承上四句言之，言如是者其利乃能久也。下云“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常，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正與此云“利則能久”反復相明，故知今本“和”當爲“利”，且亦以儀、常、道三字比次爲文，尤足明首句之誤倒矣。○何如璋曰：舊注以“當立”爲句，非。朱氏《權》連下“有”字爲句。按“當”乃“常”字，“立”乃“無”字，以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建之以常無有”，是其證。建，立也。“無有”，虛也。惟道集虛，故建之以爲本。○張佩綸說同。○郭沫若曰：何、張說“建當立有”爲“建常無有”，可從。如以“有”爲“道”，則道與常並，並由人所立，有失道家以道爲“太一”之旨。“建常無有”，謂建此以說道也。道者亘古永在，似無實有，故曰“常無有”。有與寶、久亦韻。

舜徽按：首句誤字，終以何、張所校改者爲允，郭說是也。末句“和”字，陶氏謂爲“利”字之譌，恐亦未是。疑當爲“私”字形譌。私者，謂人君之權位也。爲人君，必建之以常無有，以靜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而後權位乃可長久。古之人君，雖比德於天地之無不覆載，然而窮天下之財以自養，據至高之位以自尊，其實乃以一己之大私，爲天下之公。故論君道者，亦不諱言私也。《老子》第七章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此言，最足以發明人君虛無無爲，私則能久之意。下文有數“利”字，不必承此爲言，陶說泥

矣。大抵古之明於君道者，自守必靜，故曰以靜爲宗。本書《心術上篇》曰：“動則失位，靜乃自得。”是其義也。其處事必及時，故曰以時爲寶。本書《霸言篇》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是其義也。其應物必以正，故曰以政爲儀。本書《法法篇》曰：“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是其義也。蓋此數者，必備於一身，而後可以保其權位。故結之曰私則能久。

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

尹知章曰：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爲之也。

舜徽按：“吾”謂人君也。“儀”與“義”古字通。義者，宜也。此處所云“吾儀”、“吾常”、“吾道”，實一物耳。“不爲”、“不行”、“不取”，亦一意而分言之。謂非人君分內所宜爲者，雖暫見利，亦不爲之。《韓非·揚權篇》曰：“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韓非》此言，明君臣異道而事，上下各處其宜之理，最爲精諦。蓋人君之所宜爲者，在於明道察要，任人而不任智，不貴以聰明才勇與羣下競短長也。“不爲”、“不行”、“不取”之旨，亦卽在此。

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

尹知章曰：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

也。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達也。○王念孫曰：“其事也不隨”，“隨”當爲“墮”。字本作“陸”，《方言》曰：“陸，壞也。”《呂氏春秋·必己篇》注曰：“墮，廢也。”不廢不墮，義正相承。今作“不隨”者，涉上文“不始不隨”而誤。

舜徵按：上文既言無爲之要，此又續申如不得已而有爲，亦當隨乎自然之變化，應乎人事之推移，物倡而已隨之，亦即《老子》“不敢爲天下先”之旨也。《呂氏春秋·任數篇》曰：“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淮南·原道篇》曰：“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又《說山篇》曰：“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凡此諸論，皆足以發明斯旨。

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索其端，則知其名。

尹知章曰：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順理則情自見，索端則名自形。

舜徵按：尹《注》連上文“故其言也不廢”二語爲釋，故其言如此。然稽之文義，“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墮”二語，乃總結上文之辭。“原始計實”，乃總起下文之語。“本其所生”，即原始之意，謂推原事物之所由起也。“知其象則索其形”三語，即計實之事，謂由表可以知裏，由此可以知彼，而人君因應變化，制物而

不制於物。而物先己隨，物唱己和之效宏矣。

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

尹知章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冬不爲松柏不凋，輟其霜雪；夏不爲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丁士涵曰：“明君”二字衍。下文但言“聖人”，即蒙此文言之，不當有“明君”二字。○張佩綸曰：“法”當爲“治”字之誤也。時、治、利、利爲韻。○許維適曰：丁、張說是也。尹《注》云“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周公爲聖人，非明君。是尹所據本無“明君”二字明矣。○郭沫若曰：張說非也。治不當言枉，且治亦不與利爲韻。

舜徽按：丁、張說皆非也。周秦諸子中，常以“明君聖人”連稱，《商君書·更法篇》曰：“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是其例已。此文言“明君聖人”，乃精於君道者之通名，不必謂周公也。許說尤泥矣。不爲一人枉其法，法謂賞罰，不當改爲治字，郭說得之。

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

尹知章曰：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行

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衆也。○吳汝綸曰：“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句有奪誤。○張佩綸曰：“既誇”當作“百姓平”。皂上有百字之迹，姓字女篆似母，展轉成誤，𠂔似夸字。○郭沫若曰：此句結上“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二句。“萬物均”承“天行”句而言，“既誇衆”當承“聖人”句而言。“既誇”當爲“既廩”之誤。《禮·中庸》“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稟”卽餼廩，本書《問篇》“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廩”字草書與“誇”字形近，故致誤。“餼廩衆”則與“百姓被其利”正相應。

舜徽按：張氏之說，固臆斷不可從，郭說似亦未的。蓋古言餼廩，乃謂祿米，不足以概百姓之利也。竊意末句“萬物”二字，亦可包百姓爲言。尹《注》循文立訓，義亦可通。既別無明證，闕疑可也。

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

尹知章曰：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王引之曰：“名自”二字，因下文“正名自治”而衍。物至而治之，謂事來而後理之也。尹《注》以“循名責實”解之，則所見本已衍“名自”二字。○陶鴻慶曰：“物至而名自治之”，本作“物至而名之”，“自治”二字，涉下句而誤衍也。下文“正名自治”云云，卽承此言。下文又云“上聖之人，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命亦名也，文義正與此同。王氏云“當作物至而治之”，非是。

舜徽按：王、陶二家說，皆非也。《韓非·主道篇》曰：“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韓非所言“令名自命，令事自定”，卽此文“物至而名自治之”之意。尹《注》以“循名責實”爲解，已深窺斯旨矣。可從也。若如王說改爲“物至而治之”，如陶說改爲“物至而名之”，俱失古人原意。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

尹知章曰：奇，謂邪不正。音錢。名正法備，則事無闕滯，故聖人無事也。○王念孫曰：此皆以四字爲句。“治”下“之”字，涉上文“物至而治之”而衍。“奇身名廢”當作“奇名自廢”，“自”與“身”相似，又涉下文兩“身”字而誤爲“身”，又誤倒於“名”字之上耳。尹《注》曰“奇謂邪不正也”。“正名自治，奇名自廢”，相對爲文，謂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也。《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是其證矣。倚與奇通。

舜徽按：王氏校改“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爲“正名自治，奇名自廢”，是也。至釋爲“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則非也。此處所言正名，乃承上文循名責實之義而續申之。凡周秦諸子之言名實，名猶言也；實猶事也。《韓非·主道篇》曰：“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

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又《二柄篇》曰：“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爲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韓非》此二論相同，而意可互明。所謂“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乃循名責實之妙用，卽正名自治意也。“臣不敢陳言而不當”，謂言者不敢妄言，卽奇名自廢意也。有賞有罰，卽法備也。如是，則人君垂拱於上，羣臣竦懼於下，莫敢不盡力矣。故曰“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

不可常居也，不可廢舍也，隨變斷事也。

尹知章曰：居必有時而遽，廢舍則百度弛紊也。居變則不壅塞也。

舜徽按：此承上文續申法之爲用，不可常據，亦不可常離，在能隨變斷事，因應適宜。此處曰“居”曰“舍”，以喻賞罰爲人主所馮依以制下，若居處之有宮室，行游之有舟車耳。《韓非·姦劫弑臣篇》曰：“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身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據此，可知周秦諸子言及法術賞罰，固已擬之於良馬便楫，故此處亦以“居”與“舍”爲言也。蓋人君不言正名則已，如欲循名責實，必以賞罰行之。行之而不適宜，則又足以敗事。故曰：“不可常居，不可廢舍，隨變斷事也。”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有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



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史談此言，最足以印證斯義。

知時以爲度。大者寬，小者局。物有所餘，有所不足。

尹知章曰：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寬則有餘，局則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

舜徽按：俗讀以“知時以爲度”句屬上，非也。此數句承上文續申“知時變化”、因物損益之要。度、局、足三字爲韻，自當連讀也。《老子》第七十七章曰：“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老子》此言，可通於治道。人君法天，其於裁制庶物，務令各得其所，故必究心於大小損益之宜。尹《注》所云“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是也。

兵之出，出於人。其人人，入於身。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兵不義不可。

尹知章曰：人爲兵本。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修身則德立也。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王念孫曰：“其人”之“人”，涉上句“人”字而衍，尋尹《注》亦無“人”字。○洪頤煊曰：“適”古“敵”字，“敵”與“身”對言之，上二句亦以“人”與“身”對，尹《注》非。

舜徽按：此文上下，皆言人君取下及所以自處之道，而忽間入言兵之事，解者率釋爲三軍攻戰之兵，而

前後文義，實不相貫。細繹此文原意，則所謂兵者，乃言人君馭下之威。凡盛氣、厲色、疾視、峻辭皆是也。《呂氏春秋·蕩兵篇》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又曰：“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違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據此，可知古所謂兵，其目甚繁，初不止於三軍攻戰矣。人君立威之術，雖在賞罰；而接物馭下之頃，又有聲色氣辭之威焉。使能施用得宜，則羣下畏伏，莫不從令，亦古者主術之一端也。故此處言及之。首云“兵之出，出於人”，謂施用此威出加於人也。下云“入於身”，謂不用則入藏於己也。運用之際，貴能審度其時、其人、其事。可用則用，始能取勝致果。故曰“兵之勝，從於適”。“適”即“敵”字，猶今言“對方”也。己之用威得宜，則對方自服，故曰“德之來，從於身”。德者，得也。猶今言“反應”也。對方反應如何，實決於己耳。惟能審察於冥漠之中，而有得於運用之妙者，為能因應得宜。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祥”者，“詳”之借字，審察之謂也。“鬼”者，冥漠之通號，舊注以鬼神釋之，失其旨矣。《呂氏春秋·蕩兵篇》又曰：“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與此文“兵不義不可”之語，意正相發。古者人君立威，蓋莫不留意於此，故周秦諸子中數數道之。

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卑之餘驕。

尹知章曰：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信音申。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丁士涵曰：兩“義”字當作“者”，與上文兩“者”字一例。“信”，古“伸”字。○于省吾曰：“者”字無由誤作“義”，丁說非是。此應讀作“強而卑”句，“義信其強”句，“弱而卑”句，“義免於罪”句。義之言宜也，上文“祥於鬼者義於人”，義即宜也。

舜徽按：兩“義”字均當作“宜”，聲之誤也。于說可從。此數語，乃言人君宜以卑自處，始有以保其強大。《老子》第六十六章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此論，足以發明斯旨。《呂氏春秋·慎大覽》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淮南·道應篇》曰：“善持勝者，以強為弱。”若此諸論，皆人君自居不敗之道也。昧於斯理者反此，以致自取敗亡而莫之悟。故論道者，必以驕為戒也。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

尹知章曰：不聞有餘，理纔用於一人。不聞不足，

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安井衡曰：殊，絕也。絕無取於道，則民反之，終不免於賊殺也。○戴望曰：“民”當讀爲“泯”。《詩·桑柔傳》曰：“泯，滅也。”“反”，“及”字之誤。泯及其身者，言滅亡之禍，必及其身也。《左氏·昭公十八年傳》：“里析曰：吾身泯焉。”

舜徽按：此言道之充於天地，無乎不在。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故用之一人，行之天下，均無不可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福猶利也。本書《勢篇》所云“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語意與此正同。戴氏謂“民”當讀爲“泯”，是也。謂“反”爲“及”字之誤，則非。竊疑“民反”二字，當卽“泯沒”二字之缺爛。“沒”字脫去水旁，則爲“殳”，故又以形近譌爲“反”耳。“泯沒”，猶云死亡也。“泯沒其身不免於賊”，言雖身死，猶必爲人所唾罵，不免蒙民賊之名於後世。《孟子·告子篇》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卽其事已。

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

尹知章曰：左爲陽，陽主生，故爲出也。右爲陰，陰主死，故爲入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俞樾曰：本當作“出者而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今本奪“傷”字，“入”卽“人”字之誤。尹《注》有兩“傷人”字，知正文必有兩“傷人”字，《注》中無“入”字，知正文亦無“入”字矣。○郭嵩燾曰：此不當據《注》以改正文，上文“兵之出，

出於人，其入，入於身”，此正相承爲文。

舜徽按：郭氏謂此數句承上文“兵之出，出於人，其入，入於身”爲言，是也。上文言人君立威之術，余既闡發其旨於前矣。此又續申人君立威，不可不慎之義。古者以左爲陽，右爲陰。君道爲陽，故以左爲言。臣道爲陰，故以右爲號。人君接物馭下之頃，常有盛氣、厲色、疾視、峻辭之威。出此威者既爲君，故曰：“左者，出者也。”受此威者則爲臣，故曰：“右者，入者也。”“入”，猶今言“接受”也。出此威者，如不經意，若於人無傷，而受此威者，則自傷彌甚。故君人者，於接物馭下之際，尤宜慎之重之。“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當作“出者不傷人，而入者自傷也”，傳寫者誤移“而”字於“出者”二字下，而義不可通矣。

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

尹知章曰：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後知乎。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閑。徒然而居，能致令名。

舜徽按：此言人君但修於內，而成敗禍福皆決於己，不必有假於外也。尹《注》簡明易了，可從也。

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

尹知章曰：若能去言善，直能爲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劉績曰：“去”乃“云”字之誤，云善言，爲善事。“反無名”，卽下文“能者無名

也”，尹《注》非。○張佩綸曰：《莊子·知北游篇》“至言去言，至爲去爲”。《呂氏春秋·精諭篇》“至言去言，至爲去爲”。劉改“去”爲“云”，非是。○許維遘曰：“去”疑爲“出”字之誤。《心術上篇》云：“真人言至也。”又云：“不出於口。”因出善言、爲善事，非有心出之，有心爲之，故下接云“事成而願反無名”。《易·繫辭上》“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舜徽按：諸家義多未安，惟張說得之。本書《心術上篇》云：“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卽此處所云“去善言善事”之意。“去善之言，爲善之事”，兩“之”字疑衍文。“爲”字草書與“及”字形近易淆，此處“爲”字，當爲“及”字之譌。

能者無名。從事無事。

尹知章曰：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閑暇，若無事然也。○何如璋曰：“者”字乃“名”字之譌，與下句對。謂能名於無名之名，而盡有其實。從事於無事之事，而不懈其功。

舜徽按：此二語承上文續申不言無爲之益，乃言一事，非指二事，不必強求上下句相對也。尹《注》自瞭，不煩改字。何說非。

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

尹知章曰：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

舜徽按：尹說非也。上文云“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此處“出入”二字，實承上文而言。謂君臣之際，上下相與之宜耳。“觀物所載”，載者，事也。《周禮·地官·載師》鄭《注》：“載之言事也。”是載、事義通。此云“觀物所載”，謂觀察羣下所事，分任其才，而人君坐收其成，亦仍無爲而無不爲之意。

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尹知章曰：凡此皆謂爲而忘之者也。○張佩綸曰：“法”當作“爲”，“灋”與“爲”形近。“弱”當作“窮”，《淮南子·道應篇》“無窮無始無爲相問答”，是其證。“爲”、“始”韻，“終”、“窮”韻。○顏昌曉曰：“弱”疑“爲”之誤。古“爲”字作“𠄎”，與弱相似而誤。○許維通曰：張說“法”當作“爲”，是也。“弱”當作“窮”，非也。“終”與“窮”義重複，不當“終”、“窮”並舉，故《淮南子》言“窮”而不言“終”，本書言“終”而不言“窮”。疑“弱”字卽《莊子·天下篇》述關尹老聃“以濡弱謙下爲表”之濡弱，不必據《淮南子》改“弱”爲“窮”。○郭沫若曰：“法無法”，張佩綸改作“爲無爲”，謂“爲、始韻”，許據其說而改正文，非是。古音“爲”在歌部，“始”在之部，不相協。“法無法”當作“治無治”，“治”與“始”韻也。又“弱無弱”亦不辭，張改爲“窮無窮”，“窮”與“終”雖韻，而義則犯復，張說亦失之。顏疑“爲”字之誤，則失韻。“弱無弱”當作“躬無躬”，“躬”或作“軀”，草書與“弱”字形近，故致譌。“躬無躬”者，言事不

必躬親也。《呂氏春秋》有《勿躬篇》，暢發其旨。

舜徽按：此數語乃言人君致治之道，物動而應，隨變而化，初無常形，無定法，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以歸於無爲也。張、郭諸家，拘於疊句用韻之例，必爲改易數字以圓其說。不悟周秦古書疊詠之語，有用韻者，亦有不用韻者。此例甚多，何可一概論乎？惟末句“弱無弱”當作“爲無爲”，乃由傳寫致譌，則顏說爲不可易耳。始言無法，謂無定法也。繼言無始無終，卽《呂氏春秋·圜道篇》所云“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也。末以無爲結尾，而主道畢矣。

故曰：美哉第第。

尹知章曰：第第，興起貌。謂能爲而不爲，有契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第第。

舜徽按：此語承上文言人君淵靜無爲意而贊頌之。第第，猶昏昏也。卽所以形容人君無智無能，冥冥昏昏之狀。凡从弗聲之字，多有幽晦不明義。《說文》目部：“眚，目不明也。”人部：“佛，見不審也。”髟部：“髻，若似也。”心部：“怫，鬱也。”其義皆近。山部：“第，山脅道也。”山脅道自視常道爲陰暗矣。《吳都賦》“巒嶷鬱峴”《注》云：“山氣暗昧之狀。”此乃第字本義也。尹氏以興起釋“第第”，非是。《呂氏春秋·分職篇》曰：“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呂覽》此言，最足以發明“美哉第第”之旨。蓋人君南面之術，不以察



察爲尚，而以昏昏爲美。此篇上文既詳舉無爲之益，復出此語以贊頌之，意在是矣。“第第”、“昏昏”，語之轉耳。

故曰：有中有中。孰能得夫中之衷乎？

尹知章曰：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

舜徽按：尹《注》晦滯，殊不可解。自劉績、王念孫、俞樾、戴望、陶鴻慶、郭沫若諸家，人各一說，文繁不及備引。自來解者，莫不釋“中”爲“中外”之“中”，而其實皆非也。此處“中”字，當讀如《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中”。中者，虛也。蓋卽“沖”、“盅”之初文。《老子》又云：“虛而不屈。”河上公《注》曰：“言空虛無有屈竭時。”信斯言也，則人君尚虛之旨，不外是矣。此處“有中”二字連舉，乃極言君道以守虛爲貴，故疊言以重其事。復云“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又致慨夫人君而達於守虛之奧旨者，爲不可多得也。

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無成有貴其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

尹知章曰：君棄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棄功名，則無所成名。能貴無成，乃是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王念孫曰：“有貴其成”，當作“貴其有成”，與下文“貴其無成”相對。“無成貴

其有成”者，功未成則貴其有成也。“有成貴其無成”者，功成而不有其功。卽上文所云“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也。尹《注》皆非。○許維通曰：《莊子·山木篇》“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本書亦引成語，故加“故曰”二字。

舜徽按：天地萬物，成於此者毀於彼。故《莊子·齊物論》云：“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古之言南面術者，尤兢兢於斯理。《老子》所言“功成而不居”，又言“功遂身退天之道”，皆卽此旨。唯達於君道者，爲能以卑弱自處，有以自全也。《莊子·山木篇》：“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郭象《注》云：“功自衆成，故還之。”郭《注》此解，可云精諦。《莊子》彼文，無“同”字，於義爲長。

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滅。孰能己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

尹知章曰：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何如璋曰：“己無己”者，周而復始，往而復來，故可以法夫天地之紀也。《詩·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禮·中庸》：“純亦不已。”

舜徽按：“巨之徒滅”，卽太盛難守之意。與上云“極之徒仄，滿之徒虧”，相對成文。丁士涵謂“巨”當爲“成”，承上“有成”、“無成”言之，非也。自尹《注》以“忘己”釋“無己”，其後安井衡、王念孫、俞樾皆讀“己”爲“自己”之“己”，而所解各異。獨何氏讀爲“已止”之“已”，張佩綸、郭沫若皆同其說。

細審上下文義，何說自可從也。“已無已”與上文“始無始”“終無終”語法正同。“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謂人君能效法天地，運行不息，永存不滅者，不多也。天地所以能長久，在乎無爲而已矣。《老子》第七章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禮記·哀公問篇》曰：“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觀此二論，則主術必效天地之紀，昭昭明矣。紀猶道也，法也。《呂氏春秋·孟春篇》：“無亂人之紀。”高《注》云：“紀，道也。”《國語·越語》“四時以爲紀”，章《注》云：“紀猶法也。”皆其義證。

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

尹知章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無以旁譽之言以爲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李哲明曰：“淑”疑爲“淑”字，卽“寂”字。讀者多見淑，少見淑，因改“淑”耳。淑與上“空然”、下“自清”，義皆相成。作“淑”非其義。

舜徽按：此言人君聽言之際，當以正靜自處。其言而善，勿遽許之；其言而惡，勿遽拒之。人君當隱其好

惡之情，而臣下之真善真惡乃不可掩也。本書《九守篇》曰：“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韓非子·二柄篇》曰：“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凡此所論，皆足以發明斯旨。此處兩言“勿聽”，聽猶受也。謂但任其自言，人君勿遽受之，而有所決斷也。言善言惡，謂其言之善惡也，非謂道人之短長也。自尹《注》以毀譽爲解，後之說者多從其義，而原意晦矣。“兩”猶偶也，值也。“勿兩”，謂人言雖入於耳，而吾心未曾與之相接也。《韓非子·揚權篇》所謂“聽言之道，溶若甚醉”。卽形容“空然勿兩之”之狀。末言“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實亦“去好去惡，羣臣見素”之旨。

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沉矣。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

尹知章曰：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沉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張佩綸曰：“也”下“夫”字衍。○郭沫若曰：“夫”字不應衍，語意待商，搖曳生姿，正自有味，且與“或”字相應。

舜徽按：句末“夫”字，乃驚歎詞。此與《禮記·中庸篇》“道其不行矣夫！”“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語法正同，非衍文也。此數語以天地之不墜沉，若有物以維載之，以喻人君之能不傾敗，必有道以持繫之。斯道非他，清靜而已矣。《老子》第四十五章

曰：“清靜爲天下正”，卽此旨也。古人亦謂“道”爲“一”，《老子》第三十九章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將恐蹶。”《老子》此論，亦以天、地、神、谷、萬物爲言，而歸結於“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河上本“貞”作“正”，證以“清靜爲天下正”一語，則侯王之道，不外是矣。

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鼙鼓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撻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

尹知章曰：必有以而動也。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也。○王念孫曰：“撻”當爲“搖”，“撻”古“搖”字也。隸書“撻”字或作“撻”，因譌而爲“撻”。《淮南·兵略篇》“推其撻撻，擠其揭揭”，“撻”亦“撻”字之譌。本書《七法篇》“撻竿而欲定其末”，“撻”字又譌作“撻”，蓋世人多見“搖”，少見“撻”，故傳寫多差也。

舜徽按：王氏謂“撻”卽“搖”之形譌，是也。搖猶爲也，治也，作也。《爾雅·釋詁》：“搖，作也。”《廣雅·釋詁》：“搖，治也。”皆其義證。舊注失之。此數語承上文續申人君之所不同於天地者，天地本靜，而人君有治人之事。舉凡禮、樂、刑、政之數施，莫非動也。爲人君者，不能事事自治，固自有治之之術矣。其術爲何？則下文所舉“視則不見，聽則不聞”云云者，是也。終歸於清虛自守，拱己正南面而已。

視則不見，聽則不聞。洒乎天下滿，不見其塞。集於顏色，知於肌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薄乎其方也。韓乎其圜也。韓韓乎莫得其門。

王引之曰：“集於顏色，知於肌膚”，當作“集於肌膚，知於顏色”。“色”與上文“塞”字爲韻，今本誤。○安井衡曰：“韓韓”，諸本作“韓韓”，字書無“韓”有“韓”，引此文云“音未詳”。《樞言》作“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蓋沌聲豚聲並與敦近。韓字從享得聲，音當同敦。然則沌、豚、韓三字同聲，聲同則義通，猶《莊子》所謂“渾沌”也。渾沌無七竅，此云“莫得其門”，其義正同，而韓乎之爲圜貌，即在其中矣。

舜徽按：此言君道之運用，無聲無形，放之則盈天下，斂之則見於膚色。往來無時，方圓莫測，而臣下靡由窺其隙也。本書《樞言篇》曰：“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亦卽斯旨。《莊子·天運篇》曰：“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成玄英《疏》云：“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瞻望而不能見；道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莊子》之言，得成《疏》而益明，信有以見道之體。此處末數句，以方圓爲言，乃喻君道之渾灝無際，若天地之不可測度也。《淮南子·兵略篇》曰：“夫圜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淮南》所言，可與此文相發。

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

有所比也。

舜徽按：此言五官四體，各有所司。喻百官執事，各守一職。心居五官四體之中，猶君居百官執事之上。事物既各有附屬，自可收無爲而無不爲之效也。本書《心術上篇》曰：“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又曰：“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其言皆甚明白，足以證發斯旨。尹知章《注》，於此未達一間，今所不取。

當生者生，當死者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

舜徽按：此言天地萬物，各有常處也。《逸周書·武順篇》曰：“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周書》所謂“日月西移，水道東流”，卽此處所云“各死其鄉”也。《周書》揭櫫“耳目役心”四字，尤通於君道之要矣。此處上言耳目手足，而下云“置常立儀”，意甚顯豁。生死，乃顯隱之異名。本書《勢篇》曰：“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尹《注》云：“死生，猶隱顯也。”是其義已。大抵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臣供百職，其效在顯。君臨萬民，其術在隱。當顯者顯，謂臣道也。當隱者隱，謂主術也。西東乃左右之殊號。古者以左爲陽，故以稱君；以右爲陰，故以稱臣。各死其鄉，謂各歸其常處也。

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

張文虎曰：“貞”疑當作“眞”，與“人”字韻。

舜徽按：本書《正篇》曰：“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靜，能守慎乎？廢私立公，能舉人乎？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彼篇所言，與此數語，辭意大同。此云“置常立儀”，即彼篇之“立常行政”也。本篇篇首已言“以政爲儀”，則儀者政之殊號也。“守貞”疑爲“守慎”之譌。傳寫者脫去“慎”字偏旁而爲“眞”，後又誤爲“貞”耳。

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

尹桐陽曰：著書以爲世法，近於爭名，故聖人不甚喜。輪扁以書爲聖人之糟粕，而王壽焚書而舞，則惡書之尤者。聖人行不言之教，故言爲聖人所薄。惡、薄爲韻。

舜徽按：惡猶粗也，薄猶淡也。此言道之載於書傳，布之言談者，皆古人之粗跡，其味不厚，不足以見道之蘊也。《易·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莊子·天道篇》曰：“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皆卽此意。

上聖之人，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

舜徽按：尹《注》以“上聖之人”四字連上讀，非也。今從王念孫說訂正。尹《注》又誤以句末“耳”字



爲耳目之耳，屬下爲句，亦非也。今從劉績說訂正。尹氏於此處句讀既謬，注誼自歧，今皆無取焉。“口無虛習”，“習”字當爲“唱”字之譌。“口無虛唱”，卽不爲物先唱之意。與“手無虛指”相對爲文。張佩綸謂“習”當作“諧”，非也。“口無虛唱”，“手無虛指”，謂人君不輕言，不輕動，下云“物至而命之耳”謂分命臣工爲之，循名以責實也。《韓非子·揚權篇》曰：“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難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此卽“物至而命之”之意。

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

舜徽按：“諭”與“喻”通，謂明白也。《廣雅·釋言》：“諭，曉也。”是其義。《莊子·天道篇》曰：“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莊子》所言，可與此數語相互證發。皆言君道之運用，深不可測。其形諸外而可曉者，乃其粗跡；若其精妙，則蘊藏於中，非人之所能知也。

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

丁士涵曰：下“至”字當作“正”。上文云“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此承“物至而命之”句，故言至於正也。名至於正，教亦可存可亡，所謂聖人無事也。

○郭沫若曰：下“至”字當是“妄”字之誤。名之妄者，君子不爲苟察，聽其自生自滅，則奇名自廢。

舜徽按：此處不煩改字，而義可通。下“至”字謂道之極精妙處也。運用君道，若能至於斯境，則有教無教，均無不可矣。此乃明“至言去言，至爲去爲”之效，教讀爲“行不言之教”之教。

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

尹知章曰：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王引之曰：“其”當爲“於”，正文及注“神”字皆當爲“鬼”，上文曰“祥於鬼者義於人”是也。“鬼”與“水”爲韻。後人改“於”爲“其”，改“鬼”爲“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郭沫若曰：古文“鬼”或作“槐”，故誤爲“神”。

舜徽按：尹氏解上一句，是矣；解下一句，非也。此二句原意，當以“和於水者濟於舟，祥於鬼者義於人”釋之，而義始得。“祥”爲“詳”之借字，“鬼”乃“冥漠”通號。祥於鬼者義於人，謂審察於冥漠之中，而有得於運用之妙者，爲能因應得宜也。說詳上文“祥於鬼者義於人”句下。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後解。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

王引之曰：此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后適（句）觸有解（句）不可解而后解（句）”。言事之有適也，必無適而后適；觸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解。下

文云“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正所謂“不可解而后解”也。事之無適而后適，亦猶是也。今本“無適而”誤作“而無適”，“后”誤作“若”，“觸有解”之“有”，又誤入上句內，遂致文不成義。尹《注》及句讀皆非。○俞樾曰：王說誠是，然必改參差之文法以爲整齊，轉非古書之舊矣。《小爾雅·廣言》：“若，乃也。”《管子》書《君臣》上篇“若任之以事”，“若量能而授官”，下篇“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諸“若”字並猶“乃”也。此文“若有適”，亦當訓爲乃有適。言事有適而無適，乃爲有適；觸必解其不可解，而後能解也。如此則從舊讀，義自可通，無庸增改。

舜徽按：此文首二句，語意難曉，故讀者多歧。俞說近是，可從也。此文首二句，爲襯託之辭；末二語，乃主文。重申精於君道而善舉事者，周密若結，國人莫由窺其端倪也。

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

尹知章曰：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爲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欲爲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與不善，足以爲物所信則止矣。此言可以爲善不善之取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各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王念孫曰：“提提”，顯著之貌，謂有爲善之名也。“提”與“題”同，《說文》曰：“題（音提）顯也。”爲善而有名，則必爲人所嫉，爲不善則陷於刑。《莊子·養生主篇》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語意正與

此同。又《山木篇》曰：“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淮南·說林篇》曰：“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皆是“爲善毋提提”之意，尹《注》非。○張佩綸曰：王說是也。但“毋提提”下，當脫“於名”二字。“提”與“刑”非韻也。

舜徽按：“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即《莊子》所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之意，王說是也。張氏拘泥於協韻，謂“提提”下脫“於名”二字，不悟此等文句，未必果爲韻語也。不煩增字，而義可通。末數語歸結於惟正中可以久行不弊，以見過與不及之不足取也。本書《法法篇》曰：“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觀此所言，可知行貴正中之理，亦實爲君道而發。

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孰能棄刺刺而爲愕愕乎？

俞樾曰：“筴”字義不可通，當讀爲慝。《說文》心部“慝，快也”，《廣雅·釋詁》“慝，可也”，“不以萬物爲慝”，正與“不以天下爲憂”相對，言萬物不足以快其心也。筴、慝並從夾得聲，故假用之耳。○郭沫若曰：此數語明示“愕愕者”與“刺刺者”相反，“愕愕”殆假爲“落落”，“刺刺”同“烈烈”。“筴”，俞氏讀爲“慝”，甚是。是則磊磊落落者，無爲而心忘天下；而烈烈桓桓者，有爲而氣吞八荒也。

舜徽按：郭說是也。“孰能棄刺刺而爲愕愕”一語，乃歸結於有爲之不及無爲，意尤明顯。“刺”，本音盧達切。或讀爲七賜切之“刺”者非。

難言憲術，須同而出。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審而出者彼自來。

郭沫若曰：“近”殆“適”字之誤。

舜徽按：此言人君聽治之道，不責任己之智謀，而貴用人之智謀也。同猶平也，而猶汝也，出謂言自己出也。凡爲君者，不得已而言，則法術之事，不涉於口。但平其論，無所損益。使人莫窺其門，乃可不至於窮。知非己知也，而謀非己謀也。誠能審慎周密以至如此，而羣下之情自至矣。《呂氏春秋·君守篇》曰：“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淮南子·繆稱篇》曰：“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此二論，足以證發斯義。

自知曰稽，知人曰濟，知苟適可，爲天下周。

俞樾曰：“周”字無義，疑“君”字之誤。“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君”古文與“周”相似而誤。○郭沫若曰：“周”當爲“帝”，與稽、濟、適爲韻。“帝”古作“啻”，如《陳侯因脊敦銘》“高祖黃帝”作“啻”，卽其證。啻稍蠹蝕，故誤爲“周”。

舜徽按：此與下文皆爲韻語，郭氏謂“周”爲“帝”之譌，是也。《老子》第三十三章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蓋人君之道，知人與自知，所宜並重。故古之言主術者，恒及之也。此文首二句，當釋爲“自知之術曰稽，知人之術曰濟”，先秦古書，行文簡質，故但以四字爲句耳。稽猶考也，謂考之於人，以正得失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夫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獨甚。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詔，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呂覽》此言，卽“自知曰稽”之說也。濟之爲言齊也，謂齊度人之才智高下也。《淮南子·主術篇》曰：“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淮南》此言，卽“知人曰濟”之說也。苟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是謂適當，自可爲天下主矣。

內固之一，可爲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

丁士涵曰：“一”字衍，言固之於內，可以長久也。尹《注》亦無“一”字。○張文虎曰：“長久”當爲“久長”，“長”與下“王”字爲韻。○許維通曰：丁說未安，“之”猶“於”也，下文云“一以無貳，是謂知道”，足證“一”非衍字。

舜徽按：“一”者，道也。本書《兵法篇》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皇與帝、王既無殊，則一與道德亦不異。可知“一”即“道”之別名也。人君能內固於道，自可久長不敝，度時論用，則足以爲天下王矣。張氏謂“長久”當爲“久長”，是也，傳寫者誤倒耳。

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壤土而與生。

丁士涵曰：“壁”當作“辟”，辟，開也，通也。《堯典》《閼四門》，《史記》作“辟”，“請”者“情”之借字。

舜徽按：丁說是也。此言人君之德，上法天地。“天之視而精”，謂明四目也。“四辟而知情”，謂辟四聰也。“壤土而與生”，謂如地之生長萬物，各得其宜也。

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

尹知章曰：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

舜徽按：此言道之運用，在能隨時推移，與物變化，如波之應風而上下起伏也。尹《注》得之。

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

尹知章曰：臣代於君，必是篡奪而取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

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

舜徽按：此承上文隨時推移，與物變化之旨續申立功成事之本無定式也。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有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可以證發斯義。《莊子·秋水篇》曰：“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可知篡與非篡，亦何常之有？

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

張佩綸曰：上敘武王之事，既非解“去辯與巧”，而此句與上文“棄功與名”、“棄名與功”，實爲一類，宜移置於前。“子而代父”數語，於本篇不倫，乃他篇錯簡，今不可考矣。

舜徽按：此非錯簡也。上文既言義之與篡，本無定界。以見此等名目，皆起自衰世闇主，所以禁人窺竊，自固其位者之所爲也。《老子》第十八章曰：“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斯言，最爲透闢。蓋自仁、義、忠、孝，此類名目一出，於是好辯之士，巧飾之徒，益有所取資，而天下紛紛矣。故此處總結之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也。若夫爲人君者，尤以去辯與巧爲亟。《老子》第四十五章曰：“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卽斯旨也。

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卧名利者，寫生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



尹知章曰：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卧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馬瑞辰曰：“寫”當訓“憂”，謂寢息於名利，必多危險，故憂生危。尹《注》非。

舜徽按：《說文》“寫，置物也”。此處“寫”字，自當訓置。謂寢息於名利，貪求不已者，是置其生於險境也。上云“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乃言二事。尹《注》合而為一以釋之，亦非也。大抵用心深，則流於刻覈，有損主道之明。矜小節，則難圖大事，有害王道之廣。皆非人君所宜有，故此處道及之。《老子》第五十九章曰：“治人、事天，莫若嗇。”《韓非子·解老篇》曰：“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老子》之言，得《韓非》斯解而益明。取以印證此段文字，則“思索精者”等三句，乃愛其精神之事也；“知周於六合之內者”一語，乃嗇其智識之事也。

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

尹知章曰：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則華揚而實喪，未有能名身俱進者。

舜徽按：《老子》第九章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棖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所言，

與此段文字，意無二致，皆所以誠盈溢也。《史記·蔡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亦卽斯旨。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尹知章曰：滿盛則敗亡，故不可任其仕也。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亡。交於驕暴，則危亡及己也。○王念孫曰：“任”卽“仕”字之誤。今作“仕任”者，一本作“仕”，一本作“任”，而後人誤合之也。尹《注》云“不可任其仕”，則所見本已衍“任”字矣。“交”當爲“友”，亦字之誤也。仕、子、友爲韻。“友”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洪頤煊曰：依注當作“任仕”，與下句合韻。○姚永概曰：如尹《注》，則“任”字在“仕”字上。仕，事也。任事與嫁子對文。

舜徽按：洪、姚二家說是也。“任”與“仕”形近易淆，今本作“仕任”，傳寫者誤倒耳。尹《注》不誤，其所據本猶未倒也。可據訂正。此數語承上文誠盈之意，亟言滿之足以取敗也。凡爲人君者，尤必知所事焉。本書《形勢解》曰：“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觀此所論，則人君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固有在矣。

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

力也。

尹知章曰：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如羽，一人載之不爲重。服，行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安井衡曰：古本無“與”字。

舜徽按：此言道在邇而不必求之於遠也。《老子》第四十七章曰：“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韓非子·喻老篇》曰：“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韓非》此論，足以發明道在邇而不必求之於遠之意。

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君親六合，以考內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

俞樾曰：此“君”字乃“周”字之誤，“親”字或“視”字之誤。

舜徽按：俞說甚是。“周視六合”，謂遍察上下四方也。此段文字，言養生之道，貴在自知情欲之所蔽，而有以驅遣之也。“行”，猶驅遣也。“情”，謂悲樂喜怒好惡也。必盡去斯情，而後可清吾心，靜吾慮，以攝養其精神。然必遍察天地萬物，而返求之於己，始知天地惟能清靜無爲，方有以收其成功。人君宜象此德，而以除情去欲爲亟。《莊子·刻意篇》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

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悵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悵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莊生斯論，達其本矣。《淮南子·泰族篇》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此處所云“行情”，又養神之先務也。

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執儀服象，敬迎來者。今夫來者，必道其道。無遷無衍，命乃長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無貳，是謂知道。

丁士涵曰：“衍”與“延”同。《文選·西京賦》“遷延邪睨”，薛綜《注》：“遷延，退旋也。”○俞樾曰：尹《注》云：“無遷移，無寬衍。”兩意不倫，恐非也。“衍”當讀爲“延”。《周官·大祝》“二曰衍祭”，鄭《注》云：“衍字當爲延。”又《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注》云：“衍讀爲延。”《詩·椒聊篇》“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十九引作“蕃延盈升”。是衍、延古通用也。遷、延乃疊韻字，古有此語。襄十四年《左傳》“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也。“無遷無延”猶曰無遷延耳，不當分爲二義也。

舜徽按：此文承上行情養生之說，復申人君宜清心靜慮之旨。“左右前後”，猶上所云“周視六合”也。“周而復所”，卽“以考內身”也。《淮南子·精神篇》曰：“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可知古人恒以人之有情欲，象天道之多變化矣。“執儀服象，敬迎來

者。”謂人君常宜凝守其威儀，如天象之漠然無爲，以迎情欲之至也。“今夫來者”，“今”當爲“令”字之誤。令猶使也，“令夫來者，必道其道。無遷無衍，命乃長久”。謂必使彼已至之情欲，各順其道以處之，不至蔓延滋長，而性命乃可長久也。末四語，言人君能處其心於太和中正之境，而形貌性命，乃可相保不衰。此心專一不移，然後謂之知君道也。

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責其往來，莫知其時。索之於天，與之爲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

舜徽按：上文云“何道之近而莫之能服也”，尹《注》：“服，行也。”此處續申行之之術，在能一其端，固其守。道之運行，莫知其時，而上與天道相合。能有合於天道之漠然無爲，乃能有得於己也。《廣雅·釋詁》：“期，會也。”會與合同義，此云“與之爲期”，“不失其期”，皆言與天道合也。

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尹知章曰：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於人而不與之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丁士涵曰：末一語當作“古之從同”，今本誤倒。尹氏作《注》時，蓋猶未誤。

舜徽按：此文重申人君必與天地合德之意，以結一篇之尾。尹氏詮釋文義甚明，可從也。《淮南子·原道

篇》曰：“達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俶真篇》曰：“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本經篇》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主術篇》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詮言篇》曰：“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凡此諸論，悉君道之弘綱，足以發明必與天地合德之旨。《論語》已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可知古之言君道者，莫不以同天合德爲美，又不第道家爲然矣。

## 內業篇疏證

舜徽按：內猶心也，業猶術也。名篇既與《心術》義近，故所言亦表裏相依。《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內業》十五篇。注云：“不知作書者。”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云：“按《管子》有《內業篇》，此書恐亦其類。”其後馬國翰輯佚書，乃本王說定《管子》是篇卽《漢志》儒家之《內業》十五篇，釐其篇章，以合《漢志》篇數。其表章之意，有足多者。惟近世述周、秦哲學者，鮮見齒及《內業》。間有究繹及此，則亦牽引唐宋以來理學諸儒復性、主靜之說以傳會之。且謂某語爲周子主靜之說所自出；某語爲李翱復性之書所由成；朱子得某語而爲主敬之義，程子得某語而爲定性之論。穿鑿惑亂，莫甚於此。舜徽研覈遺文，始悟是篇

所言，專爲君道而發。舉凡後起傳會之說，皆非此文本旨也。今取《心術》上、下及《白心篇》，與是篇彼此印證，則其所以言性情，言道德，言仁、義、禮、智，而歸本於一心，乃君人南面之術，昭昭明矣。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

尹知章曰：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丁士涵曰：正文“此”字乃“化”字之誤。○郭嵩焘曰：此章專言氣，疑此文當爲“凡物之精，氣則爲生”，與下文“此氣”連文，故氣譌爲此。

舜徽按：“氣”字古但作“气”，俗省作“乞”，與“凡”字形近，故傳寫者誤書作“凡”耳。“凡物之精”，原本蓋作“气物之精”，讀“气”字小逗，而意自得。猶云气者物之精也。“此則爲生”，謂此气乃生命之本也。本書《樞言篇》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尹《注》云：“日與心，以生成爲功；而生成以氣爲主。此言氣者，道之用也，尤宜重也。”觀《樞言篇》所言，可知氣爲一切生成之母。此篇闡明君道，而首言及氣者，蓋如尹氏所云“氣乃道之用，尤宜重之”云爾。“鬼神”，謂陰陽變化也。“聖人”，謂人君也。萬物必得氣而後生成流動，惟能包藏此氣於胸中者，乃有以君臨天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亦卽斯意。

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

丁士涵曰：“民”乃“此”字之誤。氣卽精氣也，下文云“是故此氣也”，是其證。○羅煥曰：杲，明也。杳，冥也。淖，讀爲趙，動而遠也。卒，讀爲猝，急而近也。登天，言其高明；入淵，言其幽深；在海，言其遠；在己，言其近。

舜徽按：此言氣之運行天地，無乎不在。高若不可際，深若不可測，遠若距海洋，近若在己身也。氣之所在，卽道之所在耳。《淮南子·原道篇》曰：“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懷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足與此文相發。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

王念孫曰：“音”卽“意”字也。言不可呼之以聲，而但可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得爲韻，明是“意”之借字。若讀爲聲音之音，則失其韻矣。

舜徽按：“音”字蓋本作“意”，傳寫者誤脫下半而爲“音”耳，不必謂爲“意”之借字也。此數語，言氣之爲物，不可以強力制止，不可以聲音呼召，但可養之以德，逆之以意也。尹知章作注時，仍誤本作“而可迎以音”，解爲“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其說甚謬，今所不取。

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

尹知章曰：不失氣，德自成。德成，智自生也。以智安物，物皆得宜。○王念孫曰：“果”當爲“畢”，字



之誤也。尹《注》“物皆得宜”，皆字正釋畢字。《心術篇》亦云：“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舜徽按：王說是也。此數語，承上“此氣”二字爲言，故尹《注》解“勿失”爲“不失氣”，其實不失氣，卽不失道也。人君能固守其道，則足以成無爲之德。無爲之德既成，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洞燭萬物，斯爲聖人已。《韓非子·解老篇》曰：“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觀於《韓非》斯言，可悟此處所云“成德”二字之理。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

傅山曰：“反濟”，謂向隨六賊，渺無所止。猛舍六賊，則本體不遠，如還登岸，所謂“反濟”也。

舜徽按：“凡心之刑”，“刑”當爲“形”，字之誤也。下文云“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亦作“形”不作“刑”，可證也。“形”謂心之本體。心之本體，自有充盈生成之實，初不必有假於外。惟必去彼情欲六者之爲害，始有以自全其本心也。《淮南子·原道篇》曰：“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爲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

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淮南》此論，足以發明養心必先去欲之旨。

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

尹知章曰：安寧者，心之所利也。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丁士涵曰：“折折”即“哲哲”之借。《說文》“昭，哲明也”。《毛詩傳》“哲哲猶煌煌也”。○張佩綸曰：“稽”乃“趨”之誤。《中庸》“道不遠人”，《易·繫辭》“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于省吾曰：“稽”應讀作“指”，二字並諧旨聲。《荀子·正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指實，即稽實也。此稽不遠，即此指不遠也。

舜徽按：“此稽不遠”，謂所資以自考古者不遠耳。《白心篇》已云“自知曰稽”，即其義也。不煩改字，而意亦通。張、于兩家說，似均未諦。此段文字，承上去欲之旨，續申人心本靜，而情欲擾之。苟勿煩亂於物，自然發皆中節。雖斯道若明若昧，若遠若近。人君但反求之於己，則日用而不竭也。《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

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熟復《呂覽》斯論，可知古之言君道者，必以去欲爲亟，固自有在矣。而此處所云“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此稽不遠，日用其德”之旨，悉由是而可推明也。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王念孫曰：“謀”當爲“詠”。《說文》：“宗，無人聲也。或作詠。”故曰：“詠乎莫聞其音。”俗書“謀”字與“詠”相似，後人多見“謀”，少見“詠”，故“詠”誤爲“謀”矣。

舜徽按：此文首四句言道常充滿人體，無所謂來去也。惟因人不能固守，則一去而不復反。雖有時重來，亦不能久留也。孔子所謂“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殆卽此意。末八句言道無聲無形，時集於吾之身心，而萬事得序其成，是以謂之道也。《莊子·知北游篇》曰：“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在宥篇》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呂氏春秋·大樂篇》曰：“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強爲之謂之太一。”《禮記·中庸篇》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皆足以發

明斯旨。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

傅山曰：舊注讀“善”字爲句，而又倒“安愛”爲“愛安”。愚謂當以“所”字爲句，言道本無所在，而學道者當善其心，而安於愛，蓋安土敦仁之教也。○王念孫曰：“愛”當爲“處”字之誤。

舜徽按：傅氏謂當讀“所”字爲句，王氏謂“愛”作“處”，皆是也。惟“善心安處”四字，仍甚費解。竊疑原文當作“必善安處”。傳寫者既誤“必”爲“心”，而又倒“善”字於“心”字之上，而義不可通矣。此文言道無定居，必有善法以安置之。心靜氣理，乃所以安處之之法也。復續申道之於人，若遠實近，若離實親，惟在己之求之而已。《禮記·中庸篇》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亦卽此意。

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王念孫曰：“靜音”當作“靜意”，與得爲韻。○張佩綸曰：“情”當作“精”，《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舜徽按：情者，實也，誠也。“彼道之情”，與上文“彼心之情”語法正同，謂道之實，心之實耳，均不必

改字也。此處所云音聲，謂言語也。言道之實體，不可以言語形容，惟修心靜意者，乃能得之。末復重申道無形聲，而人不可失之之意。《淮南子·精神篇》曰：“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道應篇》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觀夫《淮南》所言，可悟“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意，道乃可得”之理。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

尹知章曰：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安井衡曰：古本“凡”上有“故”字。“故凡道”至“命之曰道”二十三字，皆屬上節。“天主正”以下提行。

舜徽按：上文既云“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又云“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目之所不能視，耳之所不能聽，人之所得以生，事之所得以成”。最後復出此處十餘字以總結之。皆所以明人君南面之術，在能運用於無形。即《韓非子·主道篇》所云“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之意也。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

尹知章曰：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均生萬物，地之平也；無爲而無不爲，人之安靜也。○許維遹曰：“安”字疑涉注文而衍。“人主靜”與上“天主正，地主平”，文同一例。

舜徽按：許說非也。周秦古書中並舉之辭每句字數不必全同。且此處文意以末句爲主，多一字轉見沉厚有力言人君宜法，天地之正平以安靜爲本也。《老子》第四十五章曰：“清靜爲天下正。”卽此意。

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

尹知章曰：枝者，爲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四者，謀之用也。○王念孫曰：“枝”當爲“材”，字之誤也。《樞言篇》曰：“天以時使，地以材使。”《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周語》曰：“高山廣川大藪能生之良材。”故曰：“山陵川谷，地之材也。”“材”與“時”“謀”爲韻，若作“枝”，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舜徽按：王說非也。古人惟稱山陵川谷所生之物爲材，不謂山陵川谷爲材也。此處若徑改作“材”，而原意亦晦矣。詳繹前後文義，此承上文爲言，而忽出斯數語者，蓋以明天地萬物有常有變，天以正爲常，而春秋冬夏寒暑不齊，與正相反；地以平爲常，而山陵川谷起伏不一，與平相反；人君以安靜爲常，而喜怒取予紛紜相擾，與安靜相反。春秋冬夏，乃四時之運行，故曰天之時也；山陵川谷，乃地之別出，故曰地之枝也（《說文》：“枝，木別生條也。”引申爲一切旁出之名）；喜怒

取予，乃人心之所使，故曰人之謀也（《爾雅·釋言》：“謀，心也。”）。王氏牽於用韻之說，而必改字，泥矣。天地於不正不平者，既處之得宜，人君於物之足擾吾心者，亦必有以處之，下文即爲此而發也。

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

尹知章曰：時自變耳，聖本不化。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必正靜，然後定也。○于省吾曰：“物”下疑奪“遷”字，注文可證。“從物遷而不移”，言隨物之自遷，而聖人不移。上云“與時變而不化”，正相對爲文。

舜徽按：此承上文續申人君所以處物之道。此物非他，即上所云“喜怒取予”也。處之之道，亦惟效天之因時而變，隨物而遷耳。《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曰：“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大矣。”熟復董氏斯論，可知人君所以區處喜怒取予而能使之中節，不外道法自然而已。“能正能靜，然後能定”二語，乃人君修心之術，亦即取物之方。《逸周書·寶典篇》曰：“何修非躬，躬有四位。一曰定，二曰正，三曰靜，四曰敬。”《周書》既以定、正、靜並舉，而又益之以敬，蓋敬乃三者之本也。悉爲君道而發。

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舍。

尹知章曰：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

固也。心者精之所舍。

舜徽按：此言人君清虛自守，心不紛馳之效。《春秋繁露·通國身篇》曰：“形靜志虛者，精氣之所趨也。”精氣之所趨，即可以為精舍之意。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尹知章曰：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得道，能有生。生則有心，故思也。思則知生也。成智則理足，故止也。○戴望曰：《左氏·襄公三十一年傳注》：“道，通也。”“氣道乃生”，猶言氣通乃生耳。尹《注》非。○于省吾曰：戴說未允。安井衡讀“氣”字逗，當從之。

舜徽按：此承“可以為精舍”一語而申明其意。謂精舍之精，乃指氣之精者而言。氣必得道而始生。有氣始有思，有思始有知，有知則有得於己，即精氣之所止矣。止猶舍也，謂精氣之所止留也。尹氏釋為止足之止，非是。

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尹知章曰：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

舜徽按：此言人君不以多知為貴。若過求多知，則心勞神擾，足以傷其生也。人君不務多知，惟在執本秉要而已。《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即此旨也。下文即申言執一之理。

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尹知章曰：“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

舜徽按：此二語與《心術下篇》所云“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實一意耳。尹氏彼《注》云：“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尹氏於彼處以“專一”釋“一”，於義爲長，不當於此處復有異解也。余已疏證於彼篇矣。

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

尹知章曰：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

舜徽按：此言君道之運用，雖亦因時推移，與物變化，然其氣與智，固不隨之而遷易也。此惟專一有守者能爲之。《淮南子·汜論篇》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淮南》所稱“聖人”，此篇所稱“君子”，皆謂人君也。

執一不失，能君萬物。

尹知章曰：無心爲有心者主也。

舜徽按：此二語亦見《心術下篇》。尹氏彼《注》云：“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余已詳爲疏證於彼篇矣。

君子使物，不爲物使。

尹知章曰：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

舜徽按：《心術下篇》曰：“聖人裁物，不爲物使。”

與此二語意同。《荀子·修身篇》引《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亦可互證。

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

王念孫曰：“公之謂”本作“此之謂”。“此”字指上文“治心在於中”以下四句而言，今本作“公之謂”者，後人不審文義而妄改之。

舜徽按：“公之謂也”，“公”字不誤。所謂“公”者，以天下之事責之天下之人也。《老子》第七章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王弼《注》云：“無私者，無爲於身也。”《老子》所謂無私，即公也。本書《君臣上篇》曰：“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據此，可知本書言及君道，亦以自任其智爲不公。然則公之本義，固謂分命羣才以共任天下之事也。有道之君，無爲於上。而能致天下大治，言出而民從之者，非一手一足之烈，而羣力輻湊之效也。故曰“公之謂也”。“治心在於中”以下三句，亦見《心術下篇》。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

舜徽按：《心術下篇》曰：“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與此二語意同。余已疏證於彼篇矣。

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

王念孫曰：“忒”字“義”字衍文。當讀“神明之極”句，“照知萬物”句，“中守不忒”句。

舜徽按：此言人君如能正其形貌，攝其威儀，以天仁地義爲法，則德將來舍。神明自發於外，而中有守，行無差忒也。《心術下篇》曰：“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異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與此處文句雖異，而意實同。

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

舜徽按：《心術下篇》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與此文意同。余已疏證於彼篇矣。

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

舜徽按：此言道之精者，常在己身。其往來不可思議，其得失關乎治亂。人君必虛其欲，潔其心，正其形，而精始定止不去。則耳目不擾於物，心能專一正定，萬事皆合法度矣。《心術上篇》曰：“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又曰：“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若斯二論，皆足與此文

相發明也。余已疏證於彼篇矣。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

尹知章曰：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羅煥曰：天，顛也。地，底也。此以天地，喻人之頂踵。州，竅也（本《爾雅·釋畜》“白州驢”郭《注》）。九州，猶言九竅也。

舜徽按：羅氏謂天地喻頂踵，九州即九竅，可謂妙悟。道本在身，而忽言及天地九州，皆可推此說以求之。

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

羅煥曰：頂踵九竅，皆官也。而心爲之主。惟解道者爲能安其心而治其官。

舜徽按：此文亦散見《心術下篇》。大抵本書言心，有直指人體之心者，有比喻一國之君者。此處與《心術下篇》所言，皆謂人體之心，余已發其義於彼篇疏證矣。自來言君道者，率歸本於治心，非特周秦諸子然也。《周書·蘇綽傳》，奏行六條詔書，有曰：“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

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蘇氏言治心之本，歸於心和志靜，可謂識主術之要矣。足以發明此文之義。

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劉績曰：《心術》作“意以先言”，此乃字之誤，下音同。○王念孫曰：兩“音”字讀爲意。

舜徽按：此言人君有諸中必形諸外，發於己必及於人，大而至於國家之治亂，己身之生死，皆實繫之，以見治心之不可以已也。《心術下篇》曰：“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與此文異而意則同。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

劉師培曰：《荀子·解蔽篇》：“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本書《地數篇》：“苟山之見榮者。”諸“榮”字並與此同，榮指光色言。《荀子·賦篇》：“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榮精並文，與此正同。○羅煥曰：言能存精養氣，則如水之有原，生生不窮矣。淵謂生氣之淵，泉謂藏精之泉。四海以喻

四體。精氣長存，故自頂至踵，暢於四肢，定心在中，必無惑志。英華發外，必無邪災也。

舜徽按：此言人君而能虛潔其心，精氣內充，如淵泉之不竭，則外物莫之能犯。《莊子·達生篇》曰：“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還物而不懼。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亦即此旨。《心術下篇》曰：“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與此文異而意則同。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尹知章曰：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申強。忒，差也。若不反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羅煥曰：反謂求諸己也。

舜徽按：《心術下篇》曰：“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與此段文意正同。皆以明人君能正靜其心，有修於內，則足以制其外也。《淮南子·原道篇》曰：“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韜。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窮。其魂不躁，其神不嬈。湫漻寂寞，爲天下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

無失所乘。履危行險，無忘玄伏。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淮南》發明“內得”之效，可謂盡致。所云“求之近者，往而復反”二語，尤足以見道在邇而不必求諸遠之意，人君亦惟內治其心而已。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

劉績曰：“澤”乃“釋”字。○陳奐曰：“澤薄”與“逐淫”對文，“澤”讀爲“釋”，釋，舍也。舍薄，猶言去其浮薄耳。○許維適曰：陳說是也。惟訓薄爲浮薄，則非。薄猶迫也，薄迫聲類同。下文“內困外薄”，薄與困相對，薄亦迫也。“逐淫澤薄”言逐除其淫惡，舍去其迫脅。

舜徽按：此言君道必慎泄爾言，以周密爲主。能周密，則形諸容貌者，必寬裕從容；藏諸心意者，必堅定不拔。蓋周密又寬舒堅固之本也。本書《樞言篇》曰：“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法法篇》曰：“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易·繫辭上》：“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若此諸論，皆足以發明君道必周必密之義。

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劉績曰：“和”乃“知”字之誤。前《心術篇》作“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是也。

舜徽按：此文亦見《心術下篇》。言有諸內者，必形於外。人君必慎修其內，正定其心，然後能無忤於物也。《荀子·榮辱篇》曰：“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與此處所云弟兄戎兵之說，意同。“戎兵”，《心術下篇》作“戈兵”。

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

張佩綸曰：兩“意”字當作“壹”，上云“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

舜徽按：《心術下篇》曰：“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與此處所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二語，意正相發，皆言刑賞非治民之本。治民之本，在人君能正其心意，定其氣志。苟誠積於中，則其外自有相感而通者。卽所謂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也。《呂氏春秋·精通篇》曰：“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



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者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細繹《呂覽》此論，則古之言君道者，必歸結於“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理在是矣。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安井衡曰：諸本“搏”作“搏”，舊注云“搏謂結聚”。則其本作“搏”。搏，古專字也。

舜徽按：此文亦見《心術下篇》，惟字句稍有不同耳。余已疏證於彼篇矣。

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

舜徽按：此承上文續申“搏氣如神，萬物備存”之義。言人君如能正靜自處，專一其心志，而耳目不濫馳於外，則雖至遠之情，未來之事，猶近在左右，能一一知之也。《禮記·中庸篇》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亦足以發明斯義。

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爲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

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舜徽按：此文首四句，言用心不同，則所致各異。用之太過，均足傷生。而思索不宜太過，尤此文主意所在。大抵人君用思太過，則精神困於內，事物迫於外。不早爲之謀，生將遜遁其舍而死亡。思之不可致極，猶食之不可過飽，惟節量適宜，使合乎中，則所思者自至矣。《心術下篇》及本篇，皆嘗言“過知失生”，此處又重申其理。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乃生，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平正擅匄，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匄。

丁士涵曰：“平正擅匄”四字重見，疑前者爲衍文。

舜徽按：上文云“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已言人宜象天地之德，安靜自處，以平正治其心，而不爲物欲所擾。此處又重闡其理。“平正擅匄”四字，乃此文主旨。大意謂人秉天地之中以生，必治心以和，乃能長壽。否則忿怒喜樂相侵，則足以傷其生也。“其精不見，其微不醜”，實承“天出其精，地出其形”而言。微猶形也，醜猶類也，謂天出精而不見精之所在，地出形而不見形之相類。人之所以象天地者，本不拘於形跡，但問其心是否能正且平如天地耳。故曰“論治在心”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曰：“裏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此下原脫五字）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

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以且多且治也。”董氏此論，足以發明古之言君道者“論治在心”，“平正擅術”之旨。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舜徵按：此文亦見《心術下篇》，而字句稍有不同。皆言人之始生，本甚平正，徒爲喜怒哀樂所擾，以致喪失其中和之性。詩、禮、樂三者，皆所以治人之情，使復反於平正，而歸本於敬靜二字。靜，所以治心；敬，所以持躬。故曰“內靜外敬”也。《心術下篇》但舉禮、樂而不及詩，詩與樂，本相通耳。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飽則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邀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李哲明曰：“大充”句逗，“傷”字無所屬，“充”下疑奪“氣”字。求之下文，“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此飽屬氣言，可證。“不通四末”即“傷”之謂也。又云“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與此文“氣傷而形不臧”適相反射。“傷”上當有“氣”字無疑。○許維通曰：此文當作“大充氣傷而形戕”，方與下“大攝骨枯而血涸”相對。今本“傷”上脫一“氣”字，因“戕”誤為“臧”，校者又妄增“不”字。《呂氏春秋·重己篇》“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太鞫，中太鞫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氣傷”即“氣不達”，“形戕”即“不得長生”，可與此文印證。

舜徽按：許說是也。此文續申治氣養心之術，在於和平寬大。譬諸食之過飽過飢，皆足以傷生而損形，必多少適度，得乎中道，乃足以舍精而生智。中云“疾動”、“廣思”、“長慮”，皆喻疾生而後治之之術，不得已而用者，非中道也。其於治心，亦必平日大其心，寬其氣，養之有素，而後中有所主，役物而不役於物。有自得之樂，若雲氣之行天，無不自如矣。《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曰：“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氣多而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和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忿恤憂恨者，生之傷也；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董氏斯論，足以發明“大心”、“寬

氣”、“獨樂其身”之旨。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胸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王引之曰：“丞”讀爲“烝”。烝，升也。泄，發也。“屯”當爲“毛”字之誤也。言得道之人，和氣四達，烝泄於毛理之間，故胸中無敗也。《淮南·泰族篇》曰：“今夫道者靜莫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是其證也。《淮南》言“毛蒸理泄”，此言“理烝毛泄”，互文耳。

舜徽按：此文重申人君必節欲靜心始能治理天下之意，以結一篇之尾。首言憂悲喜怒之爲害，宜有以處之，乃克宿道而致福，仍歸本於去躁執靜爲不可緩也。《淮南子·詮言篇》曰：“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觀於《淮南》此論，可知古之言君道者，必以節欲靜心爲本，非無故矣。

# 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述義

舜徽按：此文見《史記》卷一百三十，乃《太史公自序》中述其父談評隲周秦諸子之語也。春秋戰國之際，百家爭鳴。諸子之言，紛然轂亂。後世學者，釐析其立說之異同，從而名之曰：此某家也，此某家也。當時曷嘗自立此名乎？司馬氏以前，論列諸子流別者，若《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呂氏春秋·不二篇》，《淮南子·要略篇》，皆但稱舉同異，提挈綱要，而不命之曰某家某家。諸子分家，實自史談始也。其後劉向、劉歆，領校羣書，撰定《七略》，別諸子爲十家。《漢書·藝文志》因之。後世簿錄諸子者，又本《漢志》而略有出入耳。司馬談嘗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故其論次諸子，以陰陽爲首，而極推重道家之言，亦特張其師說耳。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顏師古曰：

“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郭嵩燾曰：“言六家同務爲治，而所施異宜，不相爲用，務此則忽彼，故曰有省不省。下言道家爲術，無所不宜，則亦無所不省也。”

舜徽按：省猶審也，詳也。此言諸子之說，皆務爲治，不過致治之途徑各殊，而所言又有詳略之辨耳。《淮南子·汜論篇》曰：“百川異源，而皆歸于海；百家殊業，而皆務于治。”足以證成此文“同歸殊塗皆務爲治”之義。此文原作“此務爲治”，此字疑爲“皆”字之譌。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司馬貞曰：“《漢書》作大祥，言我觀陰陽之術大祥。而今此作祥，於義爲疏也。”張守節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拘而多畏，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李慈銘曰：“古祥、祥字通。《易》‘視履考祥’，《釋文》本或作詳。《孟子》申詳，《檀弓》作祥。”李楨曰：“褚補《史記·日者傳》，言孝文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家爲主，人取諸五行者也。據此，知忌諱拘畏，西漢時已如是。”

舜徽按：“大祥而衆忌諱”者，大猶尚也。言其術以吉凶之兆爲尚，而忌諱甚多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

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足以發明斯旨。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中井積德曰：“當時儒者，多趙綰王臧之倫，治國以明堂辟雍爲首務。其他莫非制度文飾，訓詁名物，不知儒術爲何物。宜乎毀之曰寡要少功也。”

舜徽按：儒之名在漢以前，含義本廣。《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鄭玄《注》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鄭《注》云：“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然則儒之本義，乃以道術教民者之通稱。故《說文》云：“儒，術士也。”《史記》載秦阮術士，後世謂之阮儒。此四百六十餘人，固有傳孔子之學者在其中矣。故扶蘇進諫，亦以諸生誦法孔子爲言也。儒名非孔門所得專，固昭然可曉。雖《儒行》見於《禮記》，“君子儒”載於《論語》，然當日孔子之所謂儒與漢人之所謂儒，又自不同耳。自漢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孔子於傳述六經之功爲最大，故推重其道爲最尊。於是漢人之所謂儒，乃專謂孔子之道。《淮南子·俶真篇》高誘《注》云：“儒，孔子道也。”此一語也，非高氏之私言，實兩漢學者之公論已。顧漢儒掇拾於秦火之餘，書缺簡脫，學者不能通其讀，不得已而爲之傳注，以致詳于訓詁名物，流于瑣碎而不知返，又爲當世所詬病。司馬氏此處所云“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下文所云“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皆謂是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

顏師古曰：“不可徧循，言難盡用也。”

舜徽按：《淮南子·要略篇》言“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然則如《論語》所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蓋墨子貴儉之說所自出也。如《孟子》所稱“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蓋兼愛之說所自出也。周道尚文，夏道尚質。質之極，必流于枯索寡澤，非生人所能堪。《莊子·天下篇》稱“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亦卽此文所云“儉而難遵，不可徧循”之意。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舜徽按：法家之學，至韓非而集大成。《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又《史記·張敖傳·索隱》引《別錄》曰：“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經也。”皆足與此文相發。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

李慈銘曰：“梁玉繩《史記志疑》以儉字爲未的，引《評林》董份說爲檢字之誤，梁說是也。名家以察覈名實爲務，不得云使人儉。蓋檢卽斂也，《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注》：‘檢，斂也。’《漢書·食貨志》作‘不知斂’。名家以繩墨檢察人，使各約束於禮，而不得肆，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

舜徽按：惠施、鄧析，名家也。《荀子·非十二子篇》稱其“甚察而不惠”。楊倞注云：“惠，順也。”蓋謂其苛察繳繞，不順人情也。不順人情而人畏其檢察，故相率競於偽飾而失其本真。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紬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美也。紬聰明，不尚賢，絕聖棄智也。”郭嵩燾曰：“去健羨，紬聰明，是道家要旨。儒者不務明此義，而任知術以役天下，是神先竭也。形勞則敝，應上主勞而臣逸句。”羅煥曰：“上六節，蓋古人之言，而太史公述之。以下六節，則太史公之說明語也。”

舜徽按：此非二人之辭也。上六節，僅提其綱；下六節，分陳其義；皆太史公語。周秦故書，以及漢初文字，類此者衆矣。反覆申明，益見行文沉厚之致，不必以後世文法繩之。太史公甄論六家短長，而歸重道德，乃就君人南面之術立說，是一篇絕大政論文字，非第揭櫫諸子異同已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漢志》所言，蓋劉氏《七略》中《輯略》原文。乃西漢舊說，班氏仍而未改耳。而“君人南

面之術”一語，尤足以括道家之旨而無遺。凡探討道家之說者，皆當本此意以求之也。司馬氏嘗學道論於黃子，故亦窺得道家深處。此文所云“指約易操，事少功多”，“去健美，絀聰明”，皆為君道而發。亦即《漢志》所言“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之意。道家言主術，在能任人而不任智，故君無為而臣有為。以視儒者所言人主為天下儀表，事必躬親為之先倡者，固不可同日語。但就君道一端而言，則儒者為拙而道家為巧矣。司馬氏此文，歸重道德，意在斯也。班彪、班固父子，乃謂史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是非繆于聖人”，為其所蔽。豈知言哉？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

舜徽按：古有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尚書·堯典》云：“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明以農事為重也。《孟子》稱“無違農時”，亦特順天道之大經而已。《釋名·釋天》云：“春，蠢也，物蠢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緇也，緇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此與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意，可相證發，亦即四時之大順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瀧川資言曰：“六藝，六經也。《晏子春秋·外篇》載晏子沮景公封仲尼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墨子·非儒篇》云：‘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是史談所本。當年，猶言當生、當身。《列子·楊朱篇》：‘且趣當生，奚遑死後。當身之事，或聞或見。’孫氏《墨子閒詁》以爲丁壯之義，恐非。”蘇輿曰：“當年猶丁年。《釋詁》：‘丁，當也。’《淮南·齊俗訓》：‘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當年與丁壯對文同義。《管子·輕重丁篇》：‘男女當壯。’《戌篇》又作‘丁壯’。丁、當雙聲互訓，是其證。此言禮文繁縟，年雖丁壯不能究盡。”

舜徽按：蘇說是也。當年，謂鼎盛之年，卽丁壯也。《漢書·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謂匡當來耳。鼎、當、丁皆雙聲字，故古人通用。成學在於盛年，而煩難之學，卽盛年亦不易通，故曰當年不能究其禮。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章昭曰：“采椽，櫟椽也。”顏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卽瓦器也。”

王念孫曰：“梁當作粢。粢與糲，皆食之粗者。《李斯傳》：‘堯之有天下也，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韓非子·五蠹篇》：‘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淮南·精神篇》：‘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主術篇》：‘堯太羹不和，粢食不穀。’皆其證也。”

舜徽按：采椽，《漢書》采作椽。顏《注》：“椽，柞木也。”與韋氏訓采爲櫟義同。刑，經傳作劓，始見《儀禮》。刑爲劓之省借。鹿裘，粗裘也。粗裘謂之鹿裘，猶粗車謂之鹿車；粗布謂之鹿布；粗巾謂之鹿巾耳。墨子之學，與儒家異趣，其持論尤與儒者不同而致後世譏彈者，則在短喪薄葬。然細繹墨子節葬之說，實亦有爲而發。蓋墨子目覩當時天子諸侯淫侈用殉之酷，不勝憤嫉，欲以除易其弊，與孔子所云“死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用意正同，一也。墨子持身儉苦，其平日起居飲食，已非生人所堪。雖儒家所行寢苦枕塊、食饘粥之食，以爲居喪之儀者，亦無以過之。故墨子言短喪，乃不欲徒重儀文以害事耳，二也。由此觀之，可知墨子力主短喪薄葬，殆非無的放矢矣。且短喪薄葬在當日，實亦彊本節用之一端，又何可厚非耶？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舜徽按：《韓非子·有度篇》曰：“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奉法者弱，則國弱。”《韓非》此語，足以概法家精神而無遺。亦卽“一斷於法”、“嚴而少恩”之旨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

舜徽按：繳繞，即今言糾纏也。參伍，即今言錯雜也。《莊子·天下篇》謂“辯者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又謂“惠施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斯皆名家之短也。至其所長，則循名責實，固君道之弘綱也。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

張守節曰：“無爲者，清淨也；無不爲者，生育萬物也。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幽深微妙，故難知也。”

舜徽按：《淮南子·原道篇》曰：“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大抵道家所言無爲而無不爲，乃爲君道而發。《淮南》所云“不先物爲”，“因物之所爲”，即任人而不任智之意。

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

張守節曰：“任自然也。”

舜徽按：老子言“道法自然”，亦謂君道耳。《呂氏春秋·君守篇》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

言之詔。”又曰：“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又《知度篇》曰：“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反復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卽此所言，已足發明人君南面銜虛無因循之義。周秦故書中闡明斯旨者甚多，今亦未能悉數也。

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舜徽按：此言人君宜掩情匿端，不見好惡，以杜姦邪，而是非之情乃見也。《韓非子·主道篇》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呂氏春秋·君守篇》曰：“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人主好以己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若此諸論，皆足以證發斯義。

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

舜徽按：此言人君無爲于身之效。《老子》第七章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注》云：“無私者，無爲于身也。”是其義已。“不爲物先，不爲物後”二語，《漢書》作“不爲物先後”。省節似有脫文，當以此爲正。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舜徽按：此言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之效。有法無法，有度無度，謂雖有法度而不拘泥于法度也。《呂氏春秋·貴因篇》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如《呂覽》所稱湯武之事，則因時立業之類也。禹墨及孔子之事，則因物與合之類也。“因物與合”，《漢書》作“因物與舍”，蓋傳寫致譌，當以此爲正，業、合爲韻。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

舜徽按：此承上文續申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之義。劉劭《人物志》曰：“老子以虛爲道，以無爲德。”劉氏此言，可謂達本之論。老子言主術，所以貴虛無者，爲其能多受也。卽人君不貴己之智才能勇，但因臣下之智才能勇以爲己用耳。《淮南子·主術篇》曰：“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又曰：“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足以發明斯旨。《呂氏春秋·貴因篇》曰：“因則功，專則拙。”亦爲君道而發。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



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

舜徽按：此言人君聽言之道，而是非黑白之所由別也。《淮南子·汜論篇》曰：“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卽此竅言不聽之謂也。竅，空也；謂無證驗也。末數語總結上文，而極言無爲之效。復反無名者，謂如復歸荒昧之世，無爲而治也。《老子》第一章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舜徽按：此言人君宜自惜形神，而後可以長生久視，亦卽《老子》所言“治人事天莫若嗇”之意也。《呂氏春秋·當染篇》曰：“古之善爲君者，勞于論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呂覽》所謂“知要”，亦不外清虛自守，卑弱自持而已耳。邵懿辰《書太史公自敘後》有曰：“班氏父子譏太史公論學術，則崇黃老而薄五經。爲之說者，謂特其父談云耳。而遷書之尊孔氏，則可謂至矣。然余讀六家要指之篇，而知談之言，亦有爲而發也。遷錄其文，而首著之曰：‘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明此篇作於武帝世。建元、元封中距三十年，始頗嚮儒術，博求賢良文學。既而廣心浩大，弊中國以事四夷、巡遊、禱祠。事端之興，若蠅毛。談意若曰，武帝崇儒，宜度越往昔，而治效顧不如文景尚黃老時。故曰：‘道家使

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曰：‘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竅言不聽，姦乃不生。’凡是道家之常言，而施之建元、元封間，則皆切時之藥石也。常求神仙方術，而形神騷動。故諷以先實其神。以謂養身之道，在彼不在此。六家中，舉墨子爲詳。土階茅茨之云，與營建章、作通天臺、適相反。曰‘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猶云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並抑損之微言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言雖墨氏學，審行之，宏羊平準可不作，而德行亦可如堯舜矣。篇首稱六家皆務爲治者，末言欲以治天下何由，明此篇論治，非論學也。”（見《半巖廬遺文》卷上）邵氏謂此篇乃論治非論學，一語破的，可謂妙達神指者矣。至於謂史談是論，實爲規諷時君而發，則未必盡然也。觀史遷指斥時政，見於百三十篇者，至爲彰著。若《封禪書》直敍漢武惑於鬼神、勞民傷財之事；《平準書》痛責當時大臣阿意興利之罪；《酷吏傳》大書嚴刑峻法之慘；《蒙恬傳》深憫人民徭役之繁。皆直言無隱，罔知顧忌。故漢末王允，目爲謗書。遷以良史之才，其能不畏不懼，以至如此。奚必託于父談之辭，以申其諷諫之意哉？大抵古之言君道者，率主於任人而不任智，以收無爲之效，而以道家所言爲最密。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上如文帝、景帝、竇太后，宗室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處士如蓋公、鄧章、王生、黃子、楊王孫、安丘望之等，皆宗之。史談實嘗習道論於黃子，得其精蘊，故言之能識其要。今詳繹是文，非特有以測其學之所至，抑亦可覘一時之風尚也。舜徽服膺是文，以爲必由此入門，而後能窺見道家之閭奧，故略爲詮述其旨趣焉。

張舜徽 著

史學三書平議



## 引 言

往余啓導及門讀史，先之以《史通》、《通志總序》、《文史通義》三書，謂必閑於前人評史之言，而後能考鏡原流，審辨高下。循序漸進，庶有以窺見治史門徑。諸生好學者，相從請質疑義，余一一答之，講習餘暇，間有疏記。凡三書中議論之精者，表而出之；其或疏舛，輒加考明；不護前人之短，期于求是而已。當時記諸書眉及行間上下皆滿，越歷多載，近始稍加芟治，錄爲一冊，顏曰《史學三書平議》，固未能探得前人深處也。

張舜徽識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

## 史通平議序

劉氏《史通》之成，迄於今千二百餘年矣。昔人以其詆訶前賢，語傷刻覈，而《疑古》、《惑經》諸篇，尤爲世所詬病。故其書始成，傳習者少，而譌脫亦甚。《舊唐書·柳璨傳》，稱璨以劉子玄所撰《史通》，譏駁經史過當，璨紀子玄之失，別爲十卷，號《柳氏釋史》，學者伏其優贍。可知劉氏是書，唐末已有起而駁之者矣。然造端宏偉，識議多精，雖不免小疵，固未足掩其大醇。故自唐以下，評彈之言迭起，終無有能奪其席者。余耽悅是書，治之三反。偶有所悟，輒錄於書之上下皆滿。嘗據唐以上舊史，以補苴其罅漏；亦間自抒所見，以論列其是非。苟遇劉氏起例發凡，實於後世史學有啓牖之功者，則亦表而出之，以志服贊之意焉。爰以暇日，理董簡端所記，刪汰繁冗，擇取其較可存者，次爲六卷，命曰《史通平議》（《史通》版本不一，茲據《史通通釋》本）。自惟愚駑，於古人無能爲役。蠡測所及，未必有當萬一。聊述管窺，以備遺忘耳。世有達者，幸督教之。

張舜徽記

公元一九四八年歲在戊子二月

# 史通平議

## 內篇（卷一）

###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權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舜徽案：自古記事之書，與立言者殊科。立言之書，宗旨各異，自爲畛域。本有不同，靡由強合。故說、遷論列諸子，分舉六家；劉、班甄敘六藝，析爲九種。所以別同異、明指歸也。至於記事之書，古今聯續，變革因循，敘述不能無沿襲，體例則但有增損。自《太史公書》出，而史法乃備。觀其敘述舊事，上采《詩》、《書》、《國語》、《左傳》、《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類。及班氏撰《漢書》，凡漢武以前之

事，悉本《史記》，此皆沿襲之說也。至于列傳之中，班氏多錄論政、論學之文；諸志之內，復創立刑法、五行、地理、藝文諸目，此又增損之義也。推之他史，悉可反隅。若夫《尚書》、《春秋》，相互爲用。《左傳》、《國語》，同出一手。古人本未區分，何必強立門戶。知幾釐爲六家，徒以繭自縛耳。雖然，《書》與《春秋》，自來列諸六藝，視爲垂世立教之書。昔人縱亦目爲史之大原，抑未有取與《史》、《漢》並論者。下儕漢人諸作，等量齊觀，則自知幾始。俾學者不囿於經史之分部，而有以窺見著作之本，推廓治史之規。劉氏之功，又不可泯矣。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

舜徽案：此處據《尚書偽孔序》及諸家說，以釋《尚書》得名之故，而其實皆非也。古者記事之冊，但謂之書。許慎所云：“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蓋簡策所錄，皆得命之曰書。昔人溯其本原，而必傳會河圖洛書之說，固已誤矣。且《尚書》之名，所起尤晚。考之周秦故書雅記，凡有稱引，直云“書曰”，若配代爲言，則云“夏書”、“商書”、“周書”（若《墨子·明鬼篇》所引皆如此）。無有稱“尚書”者。《太史公自序》云：“余聞之先人曰：‘堯舜之盛，《尚書》載之。’”



尚書連言，蓋以此爲最朔。《偽孔序》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孔穎達《正義》曰：“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據此，可知是名定於漢人，亦惟漢人始用是名，固明甚。《論衡·正說篇》曰：“《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則其說又在王肅之前矣，不解知幾何以忽之。

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語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

舜徽案：《漢書·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自來學者，泥於是言，咸目《尚書》爲記言之書，知幾尤兢兢於斯義。古初著述，所包甚廣，而必衡之以狹；其用甚圓，而必說之以方。宜其於二典、《禹貢》、《洪範》、《顧命》諸篇之專詳人事、地理、災祥、喪禮者，無以處之，而轉責其爲例不純也。余病其強分畛域，無異於以繭自縛，可見於此矣。

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舜徽案：《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尚書》家著錄《周書》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記。”顏師古注引劉

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又《蕭何傳》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顏《注》云：“《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據此，可知西京校書之時，固視《周書》與《尚書》並重。顧自漢以降，學者已苦《尚書》難讀，更無人理此艱澀之編。《隋志》列之史部雜史類，學者益輕忽其書。知幾獨推尊及之，實有發潛聞幽之功。自宋以來，誦習者衆，皆劉氏表章之力也。此作七十一章者，篇與章古人通用。猶之《急就篇》，亦稱《急就章》耳。

（

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

舜徽案：《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但著錄《魏尚書》八卷，云：“孔衍撰。梁十卷，成。”而兩《唐志》著錄《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後魏尚書》十四卷。後魏之“後”字，自是衍文。書名、卷數，皆與《史通》有出入。章宗源謂：“《隋志》云：‘《魏尚書》，梁十卷。’合兩漢十六卷，與《史通》二十六卷正符。《唐志》十四卷，四字誤增。”此彌縫之說也。舜徽竊疑孔衍所綴緝者，乃漢、魏舊事。蓋欲釐析記事、記言爲二編，《隋志》古史類有孔氏《漢魏春秋》九卷，實與《漢魏尚書》相表裏。意其所纂漢、魏諸史中美詞、典言以成一家者，其大題但爲《漢魏尚書》。

析言之，始有《漢尚書》、《後漢尚書》、《魏尚書》諸目。其書既上擬《尚書》而作，《尚書》即統虞、夏、商、周爲一編，《漢魏尚書》，亦同斯例，本不必斷代爲書也。《隋志》僅著錄《魏尚書》八卷，而注曰：“梁十卷，成。”豈孔氏綴輯之初，以魏世於己爲近，得先撰成；而兩漢但有目無書，故《隋志》不著錄耶？《魏尚書》雖已撰成，不久旋廢。故知幾於下文總之曰：“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其書既不行於代，知幾自未寓目，況唐以下人乎！則《史通》與《唐志》所言，傳聞異辭，不足怪也。唐初諸儒修《隋志》，但著錄已成者《魏尚書》八卷，猶不失審慎之意。

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舜徽案：王劭，字君懋，爲王慧龍五世孫。《北史·王慧龍傳》附載劭行事。而後論有云：“劭爰自幼童，迄於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縉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據此，可知其書受嗤當代，殆非偶然。知幾所言，蓋公論矣！大抵上世制作，本無成法。後人每求之一端，而昧其全體。乃至貌襲其名，而遠離其質。修史者，動輒以尚書、春秋爲題，最是惡道。本書題目篇云：“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尚書》，此皆好奇厭俗，

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知幾斯論，至爲通覈。王劭所造《隋書》，實亦上效虞、夏、商、周諸書之名，而撰述不足以副之，宜其見譏於世也。

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

舜徽案：古史以記事之書爲最早。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則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故上世紀事之書，皆通名之曰《春秋》。《墨子·明鬼》下篇，已引《周春秋》，言宣王、杜伯事；又引《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皆言春秋時事。可知周時列國皆有《春秋》，魯史特其一耳。

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

舜徽案：上世墳籍，以“春秋”標題者，蓋有二體：有論治亂存亡之理者，有記治亂存亡之事者。若《韓非子·備內篇》引《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此論理之春秋也。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於是但記事實，不雜議論之春秋，乃成定體。他若《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之類，皆摘取史實，參以議論，以明致治之要，故仍得以“春秋”名書。《呂氏春秋·序意篇》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此一語也，實綜括上世春秋二體而統言之矣。至於陸賈之《楚

漢春秋》，專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見《史記集解序索隱》）。猶爲記事之春秋，名實相符，未爲大失。正不必逐年依次書事，如魯史之體製，然後謂之春秋也。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舜徽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據此，可知漢初儒者，但名是書爲《左氏春秋》。明其爲一家之書，而未嘗言其有傳經之用。《漢書·楚元王傳》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然則左氏解經之語，多出於劉歆所增附，亦明甚。知幾謂：“丘明受經作傳”，實沿《漢書·藝文志》及杜預《春秋集解序》之遺說。然而又曰：“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有此二語，殊亦無以自解。蓋傳無經有，猶可諉之曰，闕所不知。若經闕傳

存，非各自爲書之明證乎？知幾既列左氏爲六家之一，目爲古史，自足增重，正不必拘泥於傳經之說也。《朱子語類》卷八十三云：“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真名言也！

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

舜徽案：馬、班二史，雖紀、傳互出，表、志相重；而詳略不同，取舍復異。相資爲用，其來已久，故二書得並行不廢。而荀悅《漢紀》，實專刪《漢書》而成，本無涉於《史記》。如知幾所言，首以遷固並舉，則荀紀似爲改編《史》、《漢》二書而作矣。若謂知幾此處所云，紀傳互出，表志相重者，乃謂一編之中，敘述史實，紀與傳既多互見，表與志難免複重，仍專爲《漢書》而發。則此文上句，不合以遷固並提，使語意清混不清也。全書中此類甚多，殊嫌輕率。

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

舜徽案：《隋書·經籍志·史部·古史類》，皆著錄編年之史，共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自《紀年》十二卷、《漢紀》三十卷外，餘皆後漢、魏、晉、宋、齊、梁六代之書，可謂多矣。而知幾僅稱此數家之書者，蓋

略舉以示例，而非以優劣爲去取也。卽如作《後漢紀》者，尚有袁宏書三十卷。此處雖未列其姓字，而《正史篇》乃云：“晉東陽太守袁宏，鈔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袁、范二家而已。”知其於袁《紀》，亦甚推重。此處舉張璠而遺袁氏，殆非有軒輊於其間也。

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舜徽案：《國語》之爲書，與《左傳》相表裏，故古人稱內外傳。《左傳》以事爲主，多敘記之文；偶載言論，多爲事而發。《國語》以言爲主，多論議之文；偶載事實，亦多與語相聯。以其所重在語，別國分載，故稱《國語》。論其體製，則十五《國風》，實其初祖；而後世總集，乃其苗裔也。《戰國策》雖爲縱橫家言，而所重在語，與《國語》義例爲近，故昔人恒取以並論。至於司馬彪《九州春秋》，專紀漢末州郡之亂，州各爲篇，實敘事之作，與《國語》體製原殊。浦起龍乃謂其書爲本家的派，豈其然乎？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

舜徽案：司馬遷所著之書，《太史公自序》但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報任安書》亦

但云：“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皆未道及所著為何書。蓋其撰述始成，但有小題而無大題。桓譚所云：“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殆不誣也。漢人言及是書，但稱“太史公記”，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傳”，或直稱“太史公”，而不稱之為“史記”。且《太史公書》中，稱“史記”者，凡七八見，皆泛指列國史記言，乃古史之通名，非一書之專號，明矣。後人省約“太史公記”四字之名，為“史記”二字之簡稱，所起雖晚，願約定俗成，沿用已久。舊注三家，皆以“史記”標目，本無損於原書。知幾必指為遷所自署，則非也。

至梁武帝，又敕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舜徽案：《隋書·經籍志》著錄《通史》四百八十卷，與此所稱卷數不符。兩《唐志》著錄《通史》六百二卷，與此亦異。考《梁書·武帝本紀》云：“又造《通史》，躬製贊序，凡六百卷。”蓋其書之正文，本六百卷。兩《唐志》多二卷，殆全書之序目也。《史通》作六百二十卷，“二”字下衍“十”字耳。《梁書·吳均傳》稱：“均受詔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可知此書不成於一時，若斷若續，縣歷歲月，卷之多寡，亦前後不同。《隋志》所稱四百八十卷者，蓋指未成之本言也。爾時印刷之術未興，如此卷帙浩繁之大書，僅存官府，傳布不易，不久即佚，良由於此。顧野王嘗就斯



編加以刪節，撰《通史要略》一百卷，亦竟未就。見《陳書》本傳。

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

舜徽案：《隋書·經籍志·子部·雜家類》，有《科錄》七十卷。云：“元暉撰。”元暉，乃北朝元魏宗室常山王遵之曾孫。《魏書》昭成子孫《常山王遵傳》，附載暉行事云：“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義，迄於晉、宋，凡十四代。”其卷數與《史通》合。《隋志》作七十卷，蓋誤放“二百”兩字矣。知幾誤以撰人爲濟陰王元暉業，而王應麟《困學紀聞·考史篇》亦沿其誤，浦起龍已辨正之。且《科錄》乃類書體，故《隋志》列之子部雜家，與《皇覽》、《類苑》諸書比敘。知幾乃取與梁武《通史》並論，非其倫也。自梁武以降，在南北朝時，有志於通史之役者，則如《周書·明帝紀》所稱：“帝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摭採衆書，自義、農以來，迄於魏末，敍爲《世譜》，凡五百卷。”《隋書·蕭濟傳》亦稱：“陳亡後，濟子從典入隋，楊素奏使續《史記》，迄於隋，其書未就。”此皆髣髴梁武之所爲，而非《科錄》類事之比。知幾均不之及，亦見其疏。

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

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舜徽案：章學誠《丙辰劄記》曰：“李氏《南北史》，乃是集史，並非通史。通史各出義例，變通亘古以來，合為一家紀載。後世如鄭樵《通志》之類，足以當之。集史雖合數朝，並非各溯太古自為家數者可比。歐氏《五代史記》，與薛氏舊史，是其同類，與通史判若天淵者也。劉氏牽合為一，非其質矣。”章氏此說是也。考《新唐書·藝文志》正史類，有集史五家。凡梁武帝《通史》，及李氏《南北史》，皆屬之，此“集史”之目所由昉。而《舊唐書·經籍志》，概目之為“都史”。曰都，曰集，皆總會之意也。自秦漢以下，一統之局多，而分裂之形少。若南北朝，若五代，易姓改號，為時甚暫。或一人而歷仕數朝，或一制而沿行數世。修史者不容依其分裂之局，各自為篇；勢必合成一書，以見首尾。故其體雖聯屬數朝，而其例實無殊於斷代。不合儕諸通史之班，固明甚。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敍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甯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舜徽案：史事上下相續，理難分割。儻一一斷代為書，則前後重複，彼此牴牾。自鄭樵以來，已有繁文斷

鍾之歎。章學誠《釋通篇》，乃謂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所言尤通達詳核，足爲知幾諍友。顧章氏亦嘗自道：“劉義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語見《文史通義·外篇》家書二）學者如不深味斯言，非特無以知劉，且亦不足以識章也。蓋唐世設館修史，率以斷代爲宗，知幾所論，無越斯道，不破不立，故於通史之體，頻肆譏彈。至所云：“勞而少功，述者所宜深誠。”則又已甚之辭，非定論也。今歷代史乘，充積棟宇，前後相犯，蕪雜難理。正患無碩學雄才，創殊例，成要刪，甄綜古近，通爲一書耳。安得以茲事體大，規爲不易，而遽沒其體製之善哉！

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舜徽案：知幾斯語，但就《漢書》中紀、傳言之耳。若夫十志所敘，貫通古今，何嘗專明一代！後之斷代爲書者，述及典章制度，靡不溯厥本原，窮搜遠紹。良以因革損益，非綜述不能明。以此見斷代爲書之窮，而通史之體，究不可廢。自唐以下，有識者鑒於通史之修，不易竟功，乃分功而治。有偏詳歷代典制因革者，杜氏《通典》之屬是也。有偏詳古今人事變遷者，涑水《通鑑》之屬是也。雖非通史之全，而實有通史之用，故通史之體，終亦未廢。

##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

舜徽案：此篇乃從六家中取其二體，重申論之，以爲可永行來世者也。其實唐以上舊史，可以二體統之，不必言六家。蓋古史之體，《書》與《春秋》而已。《春秋》爲編年之祖，固無論矣。自魏澹以來，論者多謂紀傳之體，出於《尚書》，其言亦自有故。若典、謨、誓、誥，無異紀傳之篇；《禹貢》、《洪範》，不殊書志之體。特大輅椎輪，不如後來踵事增華之審密耳。然則上溯紀傳編年二體之源，必推本於《書》與《春秋》，明矣。《左傳》、《國語》，實《春秋》之羽翼；《史記》、《漢書》，乃《尚書》之支流；悉可歸於二體，奚必強分六家。知幾泥於記言、記事之不同，必謂《書》與《春秋》各有所司，於是言及二體，乃不得不以創始之功屬之《左傳》、《史記》。所謂數父祖而忘高曾，抑亦非探本之論也。又考《陳書·文學傳》，載何之元《梁典自序》有云：“《尚書》述堯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爲優。”據此，可知六朝舊義，固以紀傳之體源出《尚書》。

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

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僞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邱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

舜徽案：知幾謂編年紀傳之書，各具短長，互有得失，其言是矣。顧其所以短之者，則非也。蓋著述自有體要，故採撰必嚴去取。編年之史，以致詳國家大事爲主，不在此限，悉屏不錄。故柳惠、顏回之名，不見於《春秋》；亦猶屈原、嚴光之行，不著於《通鑑》；此正秉筆者權衡之宜，安可目爲邱山是棄乎？至於紀傳之史，以人物爲中心，某事宜載某篇，某人宜附某傳，尤貴量其主從，善爲銓配。已著於甲篇者，則於乙篇但云：“事見某篇”，“語在某傳”。彼此既相聯繫，前後又避複重。且《史記》之爲書，通貫歷代。有專傳，有合傳。合傳之例，以事類分，不以時代分。屈原與賈誼同傳，曹沫與荆軻並編，皆取其行事相類耳。銓配之例，於斯爲大。知幾反舉此相譏，目爲弊短，異乎吾所聞。

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

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舜徽案：《隋書·魏澹傳》所載魏史義例，引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范氏此言，重紀傳而薄編年，與干寶譽丘明而抑子長者殊趣。竊商其情，良亦有故。蓋干寶《晉紀》，實爲編年之書；范氏《後漢》，則屬紀傳之體；宜其抑揚黜尚，有爲而發。言各有當，未必皆是是非之公。唯知幾於二體均無成書，但論史法，義無偏袒，兼知其美，不守一家，庶幾平情之論也。又考《魏書·高祐傳》，載祐《修魏史奏》有云：“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與范曄之言，若合符契，而用意則無不同，皆當分別觀之。

### 載言第三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

舜徽案：記事、記言，分屬左右二史之說，見諸載籍者，亦不一其辭。《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藝文志》則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二說適相反，殆非傳聞之異已也。蓋古之人君，左右有史，言行悉由注記，初則未必各有專尸，兩不相謀也。左史記言，亦兼記事；右史記事，亦

兼記言。故後之稱之者，錯舉互辭，皆無不可。所以必設兩人者，資對勘，避漏誤耳。當時所記之策，未必卽傳世之《尚書》、《春秋》。《漢書·藝文志》必續之曰：“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禮記·玉藻注》必實之曰：“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此皆無徵之辭，未足以爲典要。知幾論史，泥於其說，必謂言事有別，宜分爲二。揆諸古初著述之體，夫豈其然！

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入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上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分擾，古今是同。案遷、固列君臣以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無獨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者也。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

舜徽案：知幾議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以收錄文辭，使不與敘事相雜，其議是也。至於上咎《史》、《漢》，不合以文辭入記，則非也。大抵兩漢以上，文不徒作。可以傳世而行遠者，家不數篇。馬、班採以入史，莫不有其微旨。《史記》屈、賈同傳，於屈原載其《懷沙》，於賈生載其《弔屈賦》、《鵬鳥賦》，而兩人之志行以明。至於《過秦論》，則載之《秦始皇本紀》後，

而秦所以速亡之故自見。他若《司馬相如傳》載《子虛》、《大人》諸賦，及《諫獵疏》，既以存規諷之旨，亦以明得失之迹。推之他篇所載，要皆各有取義，豈徒以繁富爲美。班《書》繼起，益多錄經世有用之文，悉與當時學術政治大有關繫。其時尚無自編文集之例，史家得之傳鈔，採以入史。諸家之文，亦託此以傳於後。由今論之，班、馬甄錄之功，爲不可泯矣。降及六朝，文集蔚興。《隋志》集部別集類，著錄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可謂夥矣！其文既各別行，自無煩重收入史。如不得已，亦必擇其要者，別爲一書，與史並行。後世若《唐文粹》、《宋文鑒》以及明清《經世文編》之類，皆足爲史傳羽翼。溯厥體例，蓋皆本知幾斯議而稍變通以爲之者也。

####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如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

舜徽案：《文心雕龍·史傳篇》敘述古史源流有云：“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勳。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據此，可知六朝舊義，固以《呂覽》十二《紀》爲太史公“本



紀”名篇之例所自出矣。不悟《呂覽》依十二月次作十二《紀》，實與《禮記·月令》無殊。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序，因天道以明人事。每紀五篇，皆首篇言天道，而餘四篇明人事。悉論議之文，與太史公敘事之書，體例絕殊。如徒見其同一“紀”字，遽謂有所取式，則穿鑿傳會矣。知幾所言，實沿文心之謬。況《史記·大宛列傳》已稱：“《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又稱：“《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然則“本紀”之名，漢以上已有之，非史遷所自創。大抵《史記》義例，悉出《世本》。《世本》雖佚，觀後人所稱引，則有本紀，有世家，有傳。又有《居篇》，《作篇》。《居篇》以記都邑，《作篇》以敘庶物，即後世典志之權輿，又《史記》八書所自出。洪飴孫撰《史目表》，取《世本》以冠正史之首，可謂得其原矣。

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謙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

舜徽案：《史記正義》引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稱本紀，諸侯曰世家。”蓋自裴氏此說出，而《文心》及《史通》皆循用之。其實史公著書，何嘗有此區別！且其書既通貫古今，於人物進退，自有權衡。又非後來斷代爲書之體，以一朝一姓爲記載中心者所可比。知幾乃謂必天子而後可以稱紀，紀必編年，祇記大事，每事又止以簡嚴之筆，記其大綱。此乃持後起之例，以詆訶古人，古人必不受也。

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

紀。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

舜徽案：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三曰：“義帝如韓林兒，政非己出，不可立紀。項羽曾宰天下，諸侯聽命，自當立紀。《史通》之所識，非也。近人曲爲之說，亦非也。漢諸王及蕭、曹等，皆有土有民，即古諸侯，故作世家。陳涉亦然。唯秦先世立紀，頗失界限。然不如是，則先後參差，不得不爲變例。魏收作《魏書》，即承用之。”徐時棟《煙嶼樓讀書志》卷十二亦曰：“天下號令在某人，則某人爲本紀，此史公史例也。故《高祖本紀》之前，有《項羽本紀》。高祖以後，不立《孝惠本紀》，而獨立《呂后本紀》。固以本紀爲紀實，而非爭名分之地也。此後無人能具此識力，亦無人敢循此史例矣。”兩家所言，足爲史公辨謗。抑《史記》於周自西伯、秦自莊襄以上，亦稱本紀，蓋沿古之《帝繫》。帝繫，所以記王者先世，原未可拘泥於已王、未王，曲加區別也。知幾於此，似猶未達一間。

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號。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

也。後來作者，宜準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儼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宏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

舜徽案：《晉書·陸機傳》，但稱機所著文章二百餘篇，而未言及修晉史事。《隋書·經籍志·史部·古史類》著錄陸機《晉紀》四卷，列于孔衍《漢魏春秋》、干寶《晉紀》之間，蓋目其書爲編年之體。知幾此處，却題陸機《晉書》，與陳壽《國志》、章曜《吳史》並論。而《正史篇》言及晉史，又稱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則其書又似紀傳之例。考《初學記》文部《史傳篇》，引陸氏《晉書限斷議》曰：“三祖實終爲臣，故書爲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據此，可知機爲三祖立紀，頗曾斟酌，實是紀傳之書無疑。證以《文心雕龍·史傳篇》所云：“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則機所撰述，本未畢功。《隋志》但著錄四卷，殆卽三祖之紀。書既未成，流布自少。修《隋志》者，但據傳聞，未考其實，遽載之編年史類耳。機必爲三祖立紀，蓋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而未可濫肆譏彈。且懿、師、昭，開創晉業，自與孫和不同，又不容並爲一談也。

##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當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

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案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

舜徽案：自來論者，咸謂世家所以記諸侯。《史記》中非諸侯而入世家者，有孔子及陳涉兩篇。知幾雖未議及孔子，於陳涉則詆毀甚力。而不知史公著書，早已自言其故。《太史公自序》有云：“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觀史公以陳涉比湯武，其不容儕之匹夫可知。《秦楚之際月表》又云：“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此又以陳涉與項羽、劉邦並論，其推尊之爲何如。徒以涉之功，止於發難；未嘗如項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己出。編之本紀，有所不可，乃降而列之世家耳。至其服膺孔子之教，則《孔子世家》中，既言：“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太史公自序》又稱：“孔子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亦隱然以孔子身繫斯文之重，有世代相承不絕之緒，與諸侯之世有其國者，初無以異，故亦列之世家耳。後人不解其意，反謂史公自亂其例，豈有當乎？

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

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卽位建元，專制一國。縣縣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概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

舜徽案：《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是《史記》以前，已有世家。而其體非史公所自創，明矣。且其書既爲通史，貫串三千年之事。不列世家，則春秋列國及漢初分封之人，將何所附？後世政出一家，史爲斷代。不立斯目，理固宜然。知幾謂爲班革前非所致，非也。浦起龍曰：“由周而來，五等相仍。當子長時，漢封猶在。故立此名目，以處夫臣人而亦君人者。自茲以降，去古益遠。藩微封耗。史無世家，時爲之也。”浦氏此言，可謂有識！

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榜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敕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

舜徽案：割據之世，政出多門。諸國分立，原非一體。如欲合爲一史，存其事蹟之真，自宜國別爲書，情

無適莫。漢以後，惟陳壽有志於此。故敘述三國之事，取蜀、吳與曹魏並列。徒以身爲晉臣，不得不爲魏帝立紀（今本皆無紀名，乃南宋刻書者所刪）。而魏、蜀、吳各自爲書，總之曰《三國志》。論其義例，信爲允當。史家正統、偏霸之說，昉于東晉，而習鑿齒實首發之。自是修史者，每兢兢於斯義。奴爲主言，不合不公。嚴正僭之防，失是非之準，抑揚由己，詳略任情。其實晉與十六國，皆發號之君。修史者，必重晉而輕十六國，置之載記之列，而十六國之史亡。五代與十國，悉宰民之主。修史者，必重五代而輕十國，置之世家之列，而十國之史微。用使後之覽者，莫由周悉，斯並正統、偏霸之見爲之梗也。雖然，此特就斷代爲書者言之耳。至如梁武《通史》，涑水《通鑒》，皆通貫古今，聯續而下。每於分裂之局，必擇用一國正朔以爲記事之綱。《通史》列吳、蜀於世家；《通鑒》於漢末，直承以魏、晉、宋、齊、梁、陳，於唐末直承以五代；斯皆不得不然，又當別論矣。知幾校論唐以上史家義例，言及三國，不涉陳壽之書，乃以《通史》所以處吳、蜀者爲折中之規，是殆於斷代爲書、與通史不同之故，猶未了然也。

###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

舜徽案：《史記·伯夷列傳》引“其傳曰”云云。可知《史記》以前，已自有傳。史公特以此爲依據，而重加編述，以成己作耳。《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有《高祖傳》十三篇。注云：“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又有《孝文傳》十一篇。注云：“文帝所稱及詔策。”若此諸傳，殆與《高祖》、《孝文本紀》所載相同。然則遠在漢初，紀與傳實無甚區分。知幾必謂紀以編年，傳以列事，二者截然不相爲謀。此乃以後起之繩墨，上衡古人，未見其有合也。

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

舜徽案：知幾此四語，至爲通核。殆可爲全史發凡！大抵諸史列傳，有專傳，有合傳，又有類傳。專傳、合傳之法，相沿無改。而類傳之例，因時損益。如馬、班、范三史，同有循吏、儒林、酷吏諸傳。范《書》又益以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諸目。推之以下諸史，互有增減。如《梁書》之《止足傳》，《新唐書》之《藩鎮傳》，《五代史記》之《伶官傳》，《宋史》之《道學傳》，《明史》之《土司傳》，皆創立新題，爲前此所未有。知幾所云：“述者多方，有時而異”二語，足以盡之。

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廢。其同於古者，唯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召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

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

舜徽案：知幾大張附出之義，力斥濫立傳文之非。高識淵懷，信爲不刊之論！非特有以糾唐以上諸史之失，抑亦後來修史者之準臬也。《史》、《漢》、《三國》，成於私門。權衡取舍，自有義例。故傳之可立與否，不以勢利爲進退。自被詔修書之制行，於是子孫爲大官者，欲爲先人立傳，賄賂請謁，肆行無忌。是以魏收立傳，黜陟不公；牛弘撰史，愛憎無準。亦有子孫躬居史職，恒欲貶美其親，是以房玄齡董史冊，而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而虞荔、虞寄有嘉傳；前人論之備矣。知幾斯議，實亦有爲而發。觀《忤時篇·與蕭至忠書》所云：“取嫉權門，見讎貴族”者，情溢乎辭，蓋亦有憚於立傳之際，損益進退之不易易也。元修《宋史》，成於草率。卷帙最繁，而立傳尤爲蕪雜。明修《元史》，復沿其短。趙翼《陔餘叢考》、《廿二史劄記》，錢大昕《廿二史攷異》，皆已盡舉其失。清修《明史》，力矯二史之弊。商榷義例，期於至善。而附傳之法，尤爲得宜。實知幾斯議有以啓之。古人立言不爲一時，故是書終不可廢。

## 內篇（卷二）

### 表歷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



舜徽案：表譜之立，所以提要鉤玄，持類馭雜。使繁賾之物，歸於簡約；糾紛之事，達諸整齊。二者體用相近，而又有不同。蓋譜得兼明無句讀之文，表則限於有經緯之作。觀於杜預所爲《世族》、《地名》諸譜，均取平鋪，無闡方畧，其明徵也。大抵譜之用，圓而神；表之體，方以智。論其作述，則表難於譜；校其範疇，則譜可賅表。唯表主撮舉大凡，無取臚陳瑣事。故史公作表，述事不過十餘言，挈領提綱，有條不紊。後來繼作，能者蓋寡。甚則於方格之內，申繁褥之辭。治絲益棼，徒形蕪累。此讀史者所由越卷而觀，評史者所由疑其煩費也。如欲匡斯弊短，則譜之爲用，實可救表之窮。若須經緯始明者，則倣史公；必待敘述方見者，可效《周譜》。惜乎後之史家，鮮有兼施二體者，而莫由收相輔相成之用也。

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歎曲重沓，方稱周備？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宗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各相祖述。述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爲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

者哉？

舜徽案：鄭樵《通志序》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朱鶴齡《愚菴小集》卷十三《讀後漢書》曰：“表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係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朱氏此論，尤爲剴切詳盡，足以矯知幾立說之偏。蓋表爲史家要領，可訂歲月之誤，兼補紀、傳之遺。又與書、志相表裏，其大用尤在通紀、傳之窮。知幾論史，力主立傳宜少，而又不以列表爲然，不可解也。卽以兩漢之事論之：高祖大封功臣，呂后定列侯功次，實是一朝大典，而紀、傳敘述皆略。史公立《功臣表》，使百餘人事蹟、世系，瞭如指掌。《後漢·光武紀》稱：“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饗將士，班勞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以范《書》無表，今可考見者，僅三十餘人而已。然則表之有無，關繫實大，不解知幾何以忽之。抑《外篇·雜說篇》又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耑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

中，雁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觀，舉目可詳。”然則知幾亦終推重《史記》中立表之法，爲不可廢。雖前後持論，判若兩人，究以《雜說篇》所言爲是。

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氏，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鳶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裁。何斷而爲限乎？

舜徽案：班《書》志、表，自多通貫古今，非止專明一代。《律歷》則始自伏羲，迄於建武。《禮樂》則上聯周漢，下逮顯宗。《刑法》起黃帝、顓頊，而論及建武、永平。《食貨》則始自《洪範》，而結以世祖。《郊祀》由顓頊、共工，以至王莽。《五行》則博解《春秋》。《地理》則詳釋《禹貢》。《藝文》則從古至漢。《古今人表》則從古至秦。可知班《書》志、表，實上承司馬氏通史之體而作。整齊其文，以補《史記》之所未備。《後漢書·班彪傳》稱：“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然則叔皮原著，本以上續遷書。孟堅繼志，初無更易。徒以生於東漢，故敘人事，但詳西京耳。況史之載事，實有不容截然畫分時代者：《史記》始於黃帝，而《歷書》、《貨殖傳》屢稱神農。後世斷代之書，亦多敘及往古。《隋》志經籍，《唐》表世系，以至諸史《地理》，多舉前代疆域，史之不可限斷若是。知幾極詆《古今人表》不言漢事，不合編入《漢書》，蓋猶昧於斯旨。章學誠《方志略例》、《亳州志人

物表例議》云：“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固以斷代爲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迹，但畫西京爲界也。”章氏此言，真通人之論矣！

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爲切者矣（浦起龍《通釋》云：“此推到東晉五胡，國分土裂，宜用之。然則唐修《晉書》，不爲十六國立表，亦闕典也。”）。

舜徽案：知幾謂分割之局，可以立表。一統之時，不必有表。故於崔鴻《十六國年表》，目爲切要。考《北史·鴻本傳》云：“劉元海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凡一百二卷。”《魏書·本傳》載鴻《表》亦云：“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據此，可知其所爲《年表》，原在本書百卷之外，別自單行者也。唐初諸儒修《隋書·經籍志》，但著錄其本書，不連《年表》。故云：“《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魏崔鴻撰。”修《晉書》時，亦但據其本書以成載記，而未及參稽年表，故竟不爲十六國立表，實當時諸儒之疏略耳。

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宏景《帝代年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舜徽案：《吳志·韋曜傳》載曜因獄史上辭曰：“囚昔見世間有《古曆注》，其所記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羲，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爲一卷，事尚未成。”可知昭著《洞紀》，前有所承。《隋志·雜史類》，有《洞紀》四卷。又有臧榮緒《續洞紀》、皇甫謐《帝王世紀》、來奧《帝王世紀》、何茂材《續帝王世紀》、吉文甫《十五代略》諸書，而獨未收陶弘景之《帝代年曆》。《梁書·弘景傳》實言其有是作，蓋《隋志》偶遺之耳。凡此諸家之書，乃古歷譜牒之遺，亦後世大事記、年表之體所自出。知幾目爲非正史之流，失之矣。《史記·三代世表》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又曰：“余讀《謀記》，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十二諸侯年表》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又曰：“譜牒獨記世謚，其辭略。”由此觀之，史公立表，悉本之歷譜牒。昔人所稱並效周譜者，不外是矣。大抵上世簡樸，史官但依年注記大事，而年歷譜牒之書以起。今見之《漢書·藝文志·數術略》歷譜類者，如《黃帝五家歷》、《顓頊歷》、《顓頊五星歷》、《夏殷周魯歷》、《漢元殷周謀歷》、《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諸書，皆其遺製。凡此諸書，未必卽史公所讀之歷譜牒，然其體例固同。史公本歷譜牒之所載，刪取其要以爲表，表猶譜耳。漢初此類書籍，則名爲紀。《漢志·六藝略》春秋家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漢大年紀》五篇，皆與譜牒爲近。韋昭《洞紀》之作，實其嫡嗣。爾後六朝史家，繼起有述。著錄於《隋志》

者，已甚繁夥。皆於考明古史，大有裨益。安可一概目爲非國史之流乎？由其記事簡略質樸，與表體爲近，故知幾亦從而輕蔑之耳。

## 書志第八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

舜徽案：諸史書志之作，知幾謂出於《三禮》；鄭樵謂出於《爾雅》；章學誠謂爲官禮之遺；而其實皆非也。蓋禮之爲書，但綜述官制禮儀，實後世會要、會典之體所自出。卽諸史偶有撮取，亦僅禮樂之一端，未足以概書志之全。《爾雅》分類以載庶物，有排比而無論述，乃後世類書之祖，亦與史志例異。如欲上溯厥源，實濫觴於《尚書》也。《尚書》爲體不一，典、謨、誓、誥，既開本紀、列傳之法。若《禹貢》專詳地理，《洪範》總述災祥，《呂刑》致詳法制，各有專篇以明一事，故班固撰地理、五行、刑法諸志，咸必甄采其文，此非書志之體出於《尚書》之明證乎？顧古書簡質，所言未備。後世禮以義起，因時增益。論厥創始，固不應數典而忘祖也。

於其編目，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猶《溝洫》；析《郊祀》爲《宗廟》；分《禮樂》爲《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耻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

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宏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

舜徽案：諸史書志標題，與篇帙多寡，何必盡符於古。非特篇目可與前異，即門類不妨新增。自班《書》以後，世志《五行》。後又增立新目，如《宋書·符瑞》、《齊書·祥瑞》、《魏書·靈徵》之類，誠爲無謂，在所必刪。至於《魏書》之志《釋老》，可以規當時之教化。而唐以下，復有《兵志》、《選舉》諸目，可以考一代之制度。雖古無此體，不害例自我創也。知幾論及諸史列傳之法，已云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其言是矣！推之昔人作“志”列“表”，莫不皆然。“志”既有因時之義，“表”亦多新增之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依諸國爲區分。一變而爲《唐書》之《方鎮》，再變而爲《遼史》之《屬國》。《漢書·百官公卿表》，以官職爲經緯。一變而爲《唐書》之《宰相》，再變而爲《宋史》之《宰輔》。至於《五代史》之《職方考》，則用以明地；《遼史》之《皇子》、《公主》，《元史》之《后妃》，則用以譜人；《遼史》之《游幸》，《金史》之《交聘》，則用以紀事。凡此諸表之新立，皆所謂禮以義起，乃史家斟酌時宜，不得不爾。與諸志之增闢門類，其事正同。寧可悉目爲出於胸臆，而非短之？

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

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

舜徽案：知幾此篇，亟言書志之中，天文、五行、藝文三者可以刪汰。平情論之，唯五行在可去之列。天文則代有發明，藝文則世有增減，皆足以明學術之升降，見著述之盛衰，何可不詳述本末，以供後人稽覽。而知幾所蔽，尤在藝文。不悟人才升降，取鏡學術；學術考校，全資藝文。而《漢》、《隋》二志，可藉以辨章學術、考鏡原流者，爲用尤宏，而未可徒以簿錄視之也。請以二事明之：秦燔墳籍，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今觀《漢志》所載，以此類書爲最少，從知書籍之亡，不盡由於秦火。《隋志》禮類，以言喪服者爲最多，從知六朝喪服之學，斯稱極盛。揭斯二例，他可反隅。則二志之功用溥矣！豈第廣列書名，惟騁繁富已哉？加以書經五厄，散佚日多，若無前人簿錄之書，何由窺其涯略？當知幾之世，《七略》、《七錄》猶存，故視《漢》、《隋》二志，煩而無當。使其生值今時，自必以往代學術所繫，全賴二志以存其概矣。至於議變其體，效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之例，惟詳當代，不及上世。則又權衡取舍，斟酌得宜。後之修《明史·藝文志》者，實用斯例。蓋知幾此言，有以啓之也。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見，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痼癢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



列，親疏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舍諸，深所未曉。

舜徽案：浦起龍曰：“人形、方言二項，是設辭。特假設以決天文、藝文之當除耳。”浦氏此言，固曲得作者之意。然覈論之，則人形、方言，實亦未足以入史也。相人之法，所起雖早。周末荀況，卽已非之。爲此說大行，必致相率舍人而任天耳。至於辨府藏之用，詳孔穴之位，醫經備矣。何煩載之書志乎？若夫五方殊語，事類尤繁，非史志一篇所能盡。後之爲地方志乘者，各採方言，自成門類，分地別載，猶嫌不賅。況一國之史，尤難綜錄靡遺，欲納之史志之中，其勢有所不可。知幾必取人形、方言以敵天文、藝文，雖屬戲言，亦太失輕重矣。

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

舜徽案：知幾議於史志增立都邑、氏族、方物三目，其識甚偉。雖不見用于當時，然其後鄭樵《通志》有《氏族略》、《都邑略》。而馬端臨《文獻通考》又別立《土貢考》。皆遙承知幾此議而增闢者也。

##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

舜徽案：左氏所稱“君子曰”之辭，所言非必與本經有關，且有極不是處。故林黃中疑爲劉歆所加，朱熹亦謂《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並見《朱子語類》。

自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

舜徽案：《文選》有干寶《晉武帝革命論》、《晉紀總論》各一首。李善注引何法盛《晉書》稱：“寶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梁書·裴子野傳》稱：“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據此，可知干、裴論史之功，早有定評。至於范曄撰《後漢書》，其自負亦在《論》、《贊》。《隋志》有《後漢書讚論》四卷，蓋唐以上人讀其書而別鈔成帙者。然則三家長於論事，非知幾一人之私論也。

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

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紵於高士者矣。

舜徽案：唐修《晉書》，秉筆者悉一時文士。沉思翰藻，競爲綺艷，誠有如知幾所譏彈者。然知幾此書，專論史法，乃亦不免以駢儷之辭，說紛繁之理。此猶李諤請正文體，而已作已甚浮華。蓋承六朝文格靡弊之餘，相習成風，有不期然而然者，時爲之也。知幾譏短前人，終亦自蹈其弊，此斯道所以難言。

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

舜徽案：知幾謂《漢書敘傳》之後，以四言成文者，其體爲述，乃范曄贊辭之所自出，此言誤矣。顏師古《匡謬正俗》卷五曰：“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敘》一篇，總歷自道作書本意。篇別皆有引辭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書。’‘爲此事作某世家。’‘爲此事作某列傳。’子長此意，蓋欲比擬《尚書·敘目》，卽孔安國所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楊子雲著《法言》，其《本傳》亦傳《法言》之目，篇篇皆引辭云：‘撰某篇’，亦其義也。及班孟堅爲《漢書》，亦放其意，於《序傳》內又歷道之。而謙不敢自謂作者，避於擬聖，故改“作”爲“述”。然敘致之體，與馬、揚不殊。後人不詳，乃謂班《書》本贊之外，別更爲覆述，重申褒貶，有所歎詠。摯虞撰《流別集》，全取孟堅書序爲一卷，謂漢述，已失其意。而范蔚宗、沈休文之徒，撰史者，詳論之外，

別爲一首華文麗句，標舉得失，謂之爲贊。自以取則班、馬，不其惑歟？”據此，可知六朝以來學者，多誤以爲《漢書敘傳》之外，別有述文。顏師古既已糾彈其謬，亦略見《漢書敘傳注》中。知幾豈未之見耶？

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

舜徽案：《史記》每篇之末，申之以“太史公曰”，此論體也。《漢書》因之，乃易名爲“贊”。范氏作《後漢書》，則改稱“論”，而又系之以“贊”。論爲散文，贊爲四言韻語。每篇並用兩體，後之修史者多遵之。顧范氏新創是例，自以爲前無古人。《宋書·范曄傳》載曄《獄中與諸甥姪書》，有曰：“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辭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曰：“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觀此諸言，可知曄之自視，固已甚高。隋、唐諸志，咸著錄《後漢書讚論》一書，殆即賞音者之所爲也。後人無范氏之才識，乃亦紛紛效顰，徒形其繁贅耳。宋人史論，好駕空凌虛，題外生枝，更墜惡道矣。觀歐陽修《五代史論》，不別標題，每篇皆以“嗚呼”二字發端，章學誠《信摭》，至目爲一部弔祭哀輓文集，殆非苛論。斯又變本加厲，爲知幾所不及料者也。故知幾此篇持論，大體精核。實爲箴育起廢、

懲前毖後之言。鄭樵《通志總序》，章學誠《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皆引申斯義，大暢其說。自此治史者，重在史實之求真，不尚虛文之敷論，皆知幾斯議爲之先導也。

###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

舜徽案：《詩》、《書》之序，皆傳注家所補撰，實後世解題之權輿。與史家自序其書以明述造之意者殊科。遷、固《自序》，皆在書尾，蓋出於《易》之《序卦》。後史惟私撰者，如《宋書》、《北史》承之。集衆官修之書，已無此製。《史》、《漢》自序，既自道作書之旨。其每篇篇序，又各言其採撰之例。或但直敘其事，不爲序篇者，亦每於篇末或後論中補申其義。此類甚多，無煩舉例。自來史家多效爲之，而其用甚宏。遠非誥誓風雅之序所能比也。

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泊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

舜徽案：華嶠所撰《漢後書》，雖不傳於世（其書本名《漢後書》，見《晉書·本傳》。《隋志》題“後漢書”者二字互倒也。《史通·正史篇》不誤。此處云後漢以時代言耳）。而范曄之書，多本華氏。今觀范書《肅宗紀論》、《二十八將論》，桓譚、馮衍《傳論》，袁安《傳論》，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傳序》，班彪《傳論》，李賢並注爲華嶠之辭。王允《傳論》，李《注》雖未明言，然以《魏志·董卓傳注》參校，知亦嶠之舊文。推之其他篇序，范襲華書者，必猶不少。知幾褒崇華嶠，而貶抑范《書》，亦嫌疏略。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蹢，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舜徽案：《春秋》書事之例，見諸《左傳》者，自隱公七年至定公九年，逐事發凡，共五十則。杜預《左傳序》，申明其旨，以謂傳中發凡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則杜氏似以仲尼之前，已自有例矣。《公羊》家又有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諸目。而《穀梁》尤致詳于時、月、日之例。論說紛紜，研繹難

盡。故朱子論《春秋》，已病三傳之例，不盡可通。既云：“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又云：“《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均見《朱子語類》卷八十三）自此說出，言《春秋》者多宗之。至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讀春秋隨筆》，乃謂看《春秋》須先破除一例字，自是通核之見，足以解經生之蔽。大抵古之作《春秋》者，簡質少文，但記大事。何嘗先立若干條例，然後從事筆削。後之讀其書者，從而鈎稽比合，以窮得其去取別擇，或載、或不載之故，以纂成全書之通則。俾學者易得其脈絡，抑亦守約之助。惟固執其例而不達變，則泥矣。朱子之言，實有爲而發也。六朝學者之治《三傳》，皆究心經例。故爲史者，亦講求撰述之例。惜知幾此篇所舉諸史之例，今多不傳，莫由考鏡其得失。所可見者，如《後漢書》光武紀、安帝紀，李賢注所引范曄序例；《隋書·魏澹傳》所載史例；皆本《春秋》。然則知幾論及史例，必溯原於夫子修經，左氏立傳，非偶然也。若趙翼《陔餘叢考》所舉《八書》及《南北史》義例；《廿二史劄記》所論南北史子孫附傳之例；悉由鈎稽比合得之，非修史者所自立。後世史家，自定義例，上法《春秋》，科條嚴明，一字無假，則歐陽修《五代史記》實爲之最。其發凡之辭，既散見諸篇，又託爲徐無黨注，詳述其屬詞之例。至朱子爲《通鑒綱目》，立例尤繁，門牆益峻。卒以檢梃先成，敘述多隘。於是事實不得悉書，褒貶未能盡合，斯又一例字爲之梗也。

又《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

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舜徽案：皇后立紀，創自華嶠《漢後書》（見《晉書·華表傳》）。其後范曄《後漢》，實沿其例。知幾謂：“《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此亦未可一概論也。若王隱《晉書》，則皇后仍謂之紀，在列傳之首。詳《史記·外戚世家·索隱》。

### 題目第十一

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

舜徽案：知幾不滿於班書之立《古今人表》，既言之於《表歷篇》、《雜說篇》，又於此處責其不及今人，爲與標目不符，凡三致譏議矣。不悟此《表》不及今人，正自有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曰：“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爲今人之鑒。俾知貴賤止乎一時，賢否著乎萬世。失德者，雖貴必黜；修善者，雖賤猶榮。後有作者，繼此而表之，雖百世可知也。”梁玉繩《古今人表考》曰：“若表今人，則高祖諸帝，悉在優劣之中，非班所敢出也。”兩家所言，皆足以推明作者之心。解紛祛惑，要以此爲定論。

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



之至，孰過於此。

舜徽案：古書目錄，皆置全書之尾。《太史公自序》，班固《敘傳》，即《史》、《漢》之目錄。今本《史》、《漢》，書首別有《目錄》，乃後人所增。盧文弨《鍾山札記》、錢大昕《養新餘錄》皆已言之。錢氏且據《史通》此處所言，定為史家自造目錄始於范書之證。又《因習篇》曰：“蔚宗既移題目于傳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與此處所言，足以相發。

## 斷限第十二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於司馬氏。案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

舜徽案：章學誠《丙辰劄記》曰：“凡前史所闕，後史皆得補之。如唐人修《隋書》，而別修《五代史志》。後人取以附入《隋書》，今人直稱為《隋書志》矣。然唐人修《隋書》時，《五代志》併入《隋書》，義無不可，序例申明其故可也。班史《地理》，上追《禹貢》、《職方》；《五行》詳備春秋祥異；皆補馬之缺也。”

章氏此論甚通！推之《後漢》、《三國》無志，今讀《宋書》諸志，即足以補范、陳兩家之闕。猶之《隋書》諸志，可補《南北史》之闕，在學者心知其意而善讀之耳。如徒規規於斷限之義，則失古人所以拾遺補藝之意。

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鳩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

舜徽案：斷代之史，每值兩朝嬗代之時，重複在所難免，此鄭樵、章學誠所為力主修輯通史也。鄭氏之言曰：“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通志總序》）章氏之言曰：“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亡微，新王興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即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為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文史通義·釋通》）大抵斷代為書，其弊勢必至此。知幾徒病諸史敘事傳人，疊見互出，而不推尋所以致病之由，故持論自易流於偏激耳。

### 編次第十三

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

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舜徽案：劉咸炘《太史公書知意》卷六曰：“傳非專主於記人。龜策者，一術之稱。與日者、貨殖、游俠相同。不類象形之言，與兒童之見何異。凡傳皆以事爲經，人爲緯。今本之無人名，乃非元本耳。若謂當與八書齊列，則日者、扁倉，皆當爲書乎？”劉氏此言甚允，足爲知幾諍友。大抵史公列傳，所苞滋廣。論其編次有專傳，有合傳，有類傳。而標目之例，或以姓名；或以術業；或以行事（如《循吏》、《酷吏》）；或以地域（如《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大宛》）。則凡敘述所及，本不限於一端。知幾所云唯人而已者，特取其多者論之，未足以盡史公列傳之例也。

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爲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

舜徽案：班書雖爲斷代之體，然上起高祖，下終王莽。自其綜括一代之例論之，則固西京二百三十年間之通史也。其間銓配先後，作者自有權衡。向、歆於楚元王，雖時不相續，而系出一宗。揆諸附傳之例，未爲大乖。

蓋逐免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爲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僞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鷗一也，何大小之異哉！

舜徽案：兩漢一統之局，政出一家。故修史者，必正君臣之分。編述事實，其例自嚴。陳壽纂論舊事，雖以三國並書，究亦唯魏帝有紀。其於吳蜀，則固以列邦視之。就事實論，先主之據益州，正乃承二牧之遺烈。敘述相承，所以明一邦之終始耳。何可持班、范二書之例以繩之。

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誼將荀彘同編。孫宏傳讚，宜居《武》、《宣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如斯舛謬，不可勝紀。

舜徽案：班固謂史公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蓋據《太史公自序篇》中論及六家短長，反覆申明道家之說，以爲立俗施事，無所不宜；又於儒家之書，以爲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有似乎揚道而抑儒也。不悟司馬彼論，乃是一篇絕大政論文字，第就君人南面之術立說耳。況史談嘗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故論列六家，首陰陽而終道德，自是尊其所聞之義。班氏未喻此旨，遽以先黃老而後《六經》，用概史公學術之全，厚誣古人矣。知幾此處，仍而不改，則亦未爲識得史公深處。至老、莊、申、韓同列一傳，尤有微意。史公已云：“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

意，而老子深遠矣。”觀此數語，史公已明言申、韓之學，源出道家。而同列一傳之故，昭昭矣。推之管、晏同傳，孫、吳同傳，孟、荀同傳，皆寓有辨章學術、考鏡原流之意。故《史記》中諸子列傳，悉可視同周秦諸子書之敘錄，而非後來諸史數人合傳之例所可比也。

#### 稱謂第十四

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

舜徽案：知幾此論甚偉！所謂不以成敗論人也。然智既足以知之，抑何以自解於必目項羽爲僭盜耶？上文明言《史記》紀項羽以王，謂爲真僞莫分。是直以勢窮者爲匹庶，力屈者成寇賊矣。且知幾所謂真僞，乃由後起正統偏霸之見推衍而出，持此以衡古人之書，非古人所及知。此所以商榷史例，亦必論其世也。

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寔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

舜徽案：陳壽之前，若王沈《魏書》，魚豢《魏略》，皆以當代之人，述當代之事。敘述之際，已不得不多爲時諱。至其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亦勢

之不得不然耳。

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主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

舜徽案：《隋書·經籍志·史部·古史類》有《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云：“梁湘東世子蕭萬等撰。”姚振宗謂：“萬當爲方，因俗書萬爲万而誤。”其說是也。考《玉海》藝文類引《中興書目》，作三十卷。並云：“方等采削諸史，以晉爲主。附列漢劉淵以下二十九國。又上取吳孫皓事，起宣帝，迄恭帝。”據此，可知其書敘事，仍以晉爲中心，而兼及當時列國之事。其稱謂之例，今可考見者，如《太平御覽·時序部》所引是書有燕王慕容熙，兵部又引有蜀王李雄、秦王堅、夏王勃勃、吳王皓，皆此書並存諸國王號之證。方等以梁人上述兩晉史實，時移世異，諱忌漸寬。故於諸國之主，皆得稱之以王。使其生值晉代，必不爾矣。

至如元氏起於邊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

舜徽案：知幾此論是也。而斯議，實發自魏澹。《隋書·魏澹傳》稱：“高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傳中載澹之

史例凡五，其二有云：“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卽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古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據此，可知魏澹已大不滿張虛號於拓跋氏之先世，而思有以革之。持論甚正，實爲知幾所本。今觀魏收之書，帝紀首列序紀，稱其先出於黃帝少子昌意之後。積六十七世，有名毛、貸、觀、棲、詰汾者，凡十四帝。拓跋珪建國稱帝，悉追尊爲皇帝。又尊其始祖力微爲神元皇帝。下逮什翼犍，凡十三帝。其謚號名諱，皆出追加。誕妄不經，實有史以來所罕見。宜知幾言之有餘慨也。

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敍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至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爲玄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爲曹丕。夫以淫亂之臣，忽隱其諱。正朔之后，反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爲，文逐韻而便作。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爲史，通多此失。上才猶且若是，而況中庸者乎？

舜徽案：唐以前人修史，罕有先定義例而後從事纂述者。故稱謂之際，不免牴牾。自知幾此論出，而後史家講求及之。宋以下益臻詳密，如歐陽《五代史記》，涑水《資治通鑒》，皆嘗自定其例，故書法較爲整齊。元明所修諸史，其例簡略，而大體放依宋賢。清修《明史》，則討論周洽，修訂矜慎。如王鴻緒《史例議》、徐

乾學《修史條議》諸篇，尤爲審密。而稱謂之宜，三致意焉。故《明史》修成，而論者咸相推善，抑亦講求史例之效也。雖然，在當日修史，惟患例之不周。在今日讀史，則轉恨例之太密。蓋例密，則去取從嚴，而史實多漏。故歷代正史，雖可汗牛。論其敘事，乃有不及稗官野史文集之詳核者。卽稱謂之際，已歸畫一，仍無以救舊史之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 內篇（卷三）

### 採撰第十五

司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於此矣。

舜徽案：昔之言古史者，惟司馬遷明於考信闕疑之義。其言有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史記·伯夷列傳》）“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五帝本紀贊》）此考信之說也。其言又曰：“唐虞以上，不可記已。”（《龜策列傳》）“神農以前，吾



不知已。”（《貨殖列傳》）“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平準書》）此闕疑之說也。可知其於太古之事，言必有徵，不知則闕，絕不糾纏於荒遠無稽之談，足以見其採撰矜慎之意。降及後漢，斯風漸替。張衡條上遷、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有云：“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並錄。”（見《后漢書》本傳）從知東京諸儒，已多究心荒古之史。韋昭《洞紀》，上起庖犧，蓋亦一時之風尚也。魏晉士夫，玄談成習。意追高遠，語崇虛漠。嵇康爲《高士傳贊》，以混沌編首；皇甫成《帝王世紀》，乃肇始三皇。書闕有聞，世遠無徵。遂不得不採及雜書，醇駁莫辨。知幾謂引書之誤，實萌於此，非苛論也。至於據莊周寓言，以傳高士；採《六經》圖讖，以明世紀。課虛成實，以無爲有。實開王子年《拾遺記》迂怪妄誕之先。履霜堅冰，其來有自。而史家考信闕疑之義，泯然絕矣。

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遂云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可謂助桀爲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斷，蓋亦陰過之所致也。

舜徽案：《雜說篇》曰：“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足與此文相發。考《南史·文學·王智深傳》稱：“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多載孝武、明帝諸褻黷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煩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據

此，可知沈約修史，格於形勢，猶有回護。至於魏收身在北朝，無所顧忌，則已甚之辭，轉益加厲。世人目爲穢史，殆非偶然。大抵南北對峙之日，立破異情，主客相非。而文籍罕通，見聞尤隘。故修史喜搜奇詭之事，論人偏多抑揚之辭。此時而求信史實錄，蓋亦難矣。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蕘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徧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舜徽案：《雜說篇》曰：“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亦足與此文相發。《四庫提要》稱：“《晉書》之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大抵宏獎風流，以資談柄。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一一互勘，幾於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體，安得目爲史傳。”此與知幾所言爲近，皆切中《晉書》之病。蓋唐初修是書者，多屬一時之文士。承六朝餘波，好奇貪瑣。避重取輕。知幾比之於魏、梁兩代之修類書，以明其採撰之蕪雜，殆非苛論。

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

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僞者乎！至如江東五僞，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

舜徽案：此處所云郡國之記，卽《雜述篇》所言之郡書，謂地方《耆舊傳》、《先賢傳》之類也。《雜述篇》曰：“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園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是已。大抵此類書在唐以上，本皆別行。故《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著錄此類書及家傳爲最多。家傳，卽知幾所謂譜牒之書也（後世耆舊先賢傳，歸入方志；家傳歸入宗譜，故別行者稀）。爲耆舊先賢傳者，意在矜其州里；爲家傳者，意在誇其氏族。揚善隱惡，有褒無貶。所書不實，固事之常。而修史者率加採用，化僞爲真，宜知幾深斥之也。抑唐以上單行之傳記，自此二者之外，尚有別傳。魏、晉、南北朝時，尤爲盛行。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引據唐宋類書及史注所載別傳而不見於《隋志》者，得一百八十四家，可謂夥矣。今觀《隋志》，有《東方朔傳》八卷，當卽別傳之始（《隋志》標目奪去別字）。《漢書·東方朔傳》曰：“凡劉向所錄朔書，俱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顏師古注云：“謂如《朔別傳》，皆非實事。”今按《藝文類聚》諸書引《朔別傳》，類皆奇言謔語。可知別傳之爲書，蓋多出於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未可據爲典要。班固早已知之，故《東方朔傳贊》有曰：“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兒童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

著之朔，故詳錄焉。”顏注云：“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爲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爲《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據此，可知班氏撰史，別擇甚嚴。得小顏申明其旨，尤足以見史家採撰之不可苟矣。知幾但論郡書譜牒之不可盡據，而未及別傳，故今爲補申之如此。

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

舜徽案：書虛、藝增，王充論之備矣。知幾於上文推斯義以明史家採撰之必察傳求是，真不刊之偉論也！惟此處頗以採訪爲非，則又失之拘隘耳。觀夫司馬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峯，扈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綜其游踪所歷，登山臨水，搜古探奇，裨益見聞不淺。而扈困鄆、薛、彭城之際，徘徊於漢高及蕭、曹、周、樊、盧、滕諸人故里！博訪周詢，采輯遺佚。故《史記》敘事真切，論者皆推爲實錄。陳壽生長巴西，習聞蜀漢舊事。故於推論諸葛功烈，爲能獨見其大。所謂“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使非得之親見親聞，豈能評斷若是。其後孫盛作《晉陽秋》，亦以採訪爲重。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奚可一概目爲鄙說不足取乎？

## 載文第十六

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

舜徽案：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曰：“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又《和州文徵序例》曰：“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爲列傳。原史臣之意，雖以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齊，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不盡如後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徵行蹟也。”章氏此論，信爲通核！足以發明馬、班之意矣。原夫古稱不朽，言居其中。孔門四科，亦有文學。故《史記》列傳，以人爲經者（若《匈奴傳》之類，乃以地爲經），或尊其德，如《伯夷列傳》之類是也。或重其言，如周秦諸子及《屈賈列傳》之類是也。或取其功，如管、晏、商君《列傳》之類是也。若司馬相如之文，乃詩騷之嗣音，亦立言之一體（凡著之篇籍者，古人皆謂之立言。不必如百家專明理道之文然後謂之立言也）。論其輕重，自足與德、功比隆。故史公載其辭賦，以傳其人。《漢書》以下，率效斯例。與後世史傳中濫

載文辭者，自不可同日語。知幾此篇，就魏晉以下史傳載文之弊，揭舉五失，深中肯綮。而論列之際，乃取史漢所載辭賦相提並舉，則失之矣。

若乃歷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

舜徽案：《曲筆篇》曰：“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題目篇》曰：“魚豢著《魏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雜說篇》曰：“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斯皆知幾評貶諸家之辭，與此處所言，相互發明。惟此處推美王邵齊、隋二史，則與他篇所言不符。觀《六家篇》及《雜說篇》，於邵之《隋書》，已致譏議，此處不應從而許之。況《隋書·邵傳》，稱其所撰《隋書》，多錄口勅，又采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辭義繁雜，無足稱者。斯皆知幾平日論史所嫉惡之事，豈得反相頌揚？竊意此處所言，本但推美邵之《齊志》。屬辭之頃，因連類而及《隋書》耳。知幾論及《齊志》，見於《論贊》、《題目》、《補注》、《言語》、《敘事》、《曲筆》、《模擬》、《正史》、《雜說》、《忤時》諸篇者，凡十餘事，大抵稱其長於敘事耳。《齊志》爲編年體，卷帙無多。《隋書·邵傳》，稱其所著尚有《齊書》一百卷，爲紀傳體，而《隋志》失載。知幾此處所言，殆指《齊書》。

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字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徒矣。

舜徽案：知幾所深惡者，乃在浮濫寡實之文，謂不當以入史。持論正大，切中舊史之病。至於經世有用之作，則又許其可與五經齊列。所舉諸篇，皆關理道。有所取必有所棄，其餘無用之文，則自委同草芥矣。末揭“撥浮華，採貞實”六字，尤爲此篇主旨所在。史家載文之宜，學者讀文之準，悉不外是。有識之言，爲益無方，本不但爲修史而發。

### 補注第十七

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

舜徽案：知幾此處所云：“委曲敘事，存於細書。”下文又云：“定彼榛櫟，列爲子注。”皆謂史家自注之事，而所舉例，多爲魏晉以下之書。其實此例，亦出自

馬、班。無論《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已有自注之辭。即《史記》中行文敘事，亦往往有自注語雜入正文者。近人楊樹達《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卷一，文中自注例，已詳言之矣。推之他書，亦多有是。蓋西漢初年，此法即已盛行，非始于魏晉也。

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

舜徽案：史注與經注異體，而釋史尤難於說經。蓋立言之書，但循文立訓，蘄於明達而止。至於記事之書，取材多途。或傳聞異辭，或一事殊載。注之者，勢必博采廣徵，辨其異同，補其疏漏，此其所以不易爲也。諸史惟《史記》、《漢書》時代較遠，所采又多古書，故注之者不能不致詳於名物訓詁，而於史實則無庸補綴。若裴松之受詔注《三國志》，職在補其闕略，故兼採衆書，寧繁無簡。《四庫提要》既綜裴《注》大旨，約爲六端，已闡發其功用矣。《提要》又稱是注：“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大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水經注》、《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于陳壽本書。”凡所論斷，允得其平。知幾獨識其喜聚異同，不加刊定。然在今日讀史者觀之，刊定愈少，則保存史實愈多。故有裴氏一注，上可以訂補范氏《後漢書》之疏舛，非特有裨《國志》之闕遺而已。豈可輕議之乎？

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



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覽。

舜徽案：班書敘事，自武帝以前，雖多本《史記》，而文字時有不同，事實不無出入。其歧互處，正學者所當究心處。故《史記》舊注三家，亦常取證班書，疏其同異。自來注班書者，自不能無資於《史記》也。陸澄之書，今不可見。《隋志》著錄《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下又云：“梁有陸澄注《漢書》一百二卷，亡。”然則澄所注班史全書，唐初修《隋志》時，卽已早佚，則知幾亦無由寓目。竊意見載於《七錄》者，蓋《漢書注》之全帙；著錄於《隋志》者，蓋僅比勘《史》、《漢》異同之作，猶後世《班馬異同》之體，故其書止一卷。知幾所指摘者，殆卽此本。

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

舜徽案：范氏以前，理董後漢史實者多矣。若謝承、薛瑩、司馬彪、謝沈、華嶠、袁山松諸家之書，卷帙浩繁，包羅宏富。范書晚出，雖有刪訂之功，詎無割裂之失？劉昭作注，而能采其所遺，以補疏漏，固大有裨于前史。惜自章懷太子注行，而昭注遂廢。今可見者，惟《續漢書八志注》三十卷耳。當知幾之世，謝、薛、司馬、華、袁諸家書多有存者，雖無昭注可也。若在今日，諸家書俱已早佚，使知幾易世而處，必知昭注爲足尚矣。考《梁書·蕭子恪傳》，稱其弟子顯嘗采衆

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云云。傳末敍所著書，有《後漢書》一百卷，而《隋志》失載。然則范書行世以後，廣采衆家以證異同者，梁代學者，猶多爲之，又不僅劉昭一人已也。

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

舜徽案：《隋書·經籍志·史部·正史類》曰：“梁有劉孝標注《漢書》一百四十卷，亡。”據此，可知孝標於班書用力至深，知幾但知其有《世說新語注》，而不知有見載於《七錄》之百數十卷《漢書注》，故輕肆詆議，一至如此。卽以《世說新語注》而論，徵引繁博，考訂精審。高似孫《緯略》，亟稱其書可爲注書之法，殆非偶然。徒以昔之簿錄羣書者，列《世說新語》於子部小說家，故知幾從而目爲委巷小說流俗短書耳。其實此書得孝標爲之注，足以羽翼後漢、魏、晉諸史。乃乙部之支流，佚籍之淵藪。知幾斥爲勞而無功，失之遠矣。

### 因習第十八

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卽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

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

舜徽案：上世習俗淳樸，大抵共名多而專名少。故《尚書》稱堯之沒曰：“放勳乃殂落。”稱舜，則曰：“陟方乃死。”周以前，本無尊卑之異名。至周尚文，乃有薨、卒之殊號。然如《儀禮·士虞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則有時不分尊卑，亦皆得同言卒矣。蓋卒者，人死之通稱也。況《太史公書》，事總古今，勢無主客。其書西伯以下與諸列國王侯之死，同被卒稱，未爲大誤。

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迄於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

舜徽案：知幾所云“事總古今，勢無主客”八字，精核之至！可謂窺見《太史公書》之全體大用矣。復奈何致疑於項羽不當立紀，陳勝不當列之世家乎？又《史記》述高祖初起事時，則稱“劉季”；得沛後，稱“沛公”；王漢後，稱“漢王”；卽帝位，則稱“上”。此乃史家據實直書之法，班書沿之，未爲大誤。亦猶《尚書》敘虞帝未卽位時，稱“舜”；卽位後，分命九官，始稱“帝曰”。《顧命》稱康王未卽位時，曰“子釗”；卽位後，始稱“王”。皆斯例也。然則《史》、《漢》書法，非無所承矣。

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

舜徽案：《史記·陳涉世家》，但云：“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殤至今血食。”無“子孫”二字。古者祭有牲牢，始云血食。史言殤至今血食，謂殤邑之人，歲時祭祀之不絕也。知幾此處，益以“子孫”二字，非特與原文不符，且辭義亦不可通矣。班固爲《陳勝傳》，則云：“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于殤，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亦無“子孫”二字。班氏雖仍舊文，有至今血食一語，而其下已續以“王莽敗迺絕”五字，後人讀之自明。殆未有復疑其祭祀之典，延至東京而未絕者，知幾誤矣。

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爲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剏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唐·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依阮《錄》。案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督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舜徽案：僞史之目，實對正史而立。阮孝緒《七錄》紀傳錄，分類十二。一曰國史，七曰僞史。雖不列正史之名，然孝緒撰有《正史削繁》九十四卷，見載於

《隋書·經籍志·雜史類》。蓋其所謂正史，卽《七錄》中之國史也。唐修《隋志》，改偽史爲霸史，不得謂爲全依阮《錄》也。且霸史類著錄之書，尚有《吐谷渾記》、《天啓紀》諸種，又不得謂爲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也。顧偽霸之名，均甚不經。重內輕外，雖存夷夏之防；而尊此抑彼，已失是非之準。其後《四庫總目》，沿《東觀漢記》、《晉書》之例，改題載記。雖視偽霸爲允，而可錄之書已不多矣。

### 邑里第十九

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欲求實錄，不亦難乎？

舜徽案：自來致詳於文律者，凡官職、邑里，悉宜用當代名稱，不可濫施古號，昔人言之備矣。況在史傳，應爲千古實錄，而可沿用古代地名以紀人乎？此自六朝崇尚門閥以來，標舉郡望，結習已深，故修史者習非成是，不易輒改。知幾預修國史，撰《李義琰傳》云：“魏州昌樂人。”而監修者必改爲“隴西成紀人”。言不見從，惟有永歎。此篇條辨加詳，自是有爲而發。下文自注中，既已明言之矣（下文自注有云：“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不啻爲全書發凡）。上文拈出“隨時而載，用明審實”八字，乃一篇主旨，亦爲人作傳者，標書邑里之準則也。

## 言語第二十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皋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

舜徵案：《尚書》所載言語，皆各如當日實情記錄之。陳壽《上諸葛亮集表》有云：“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陳氏此論，已深窺《尚書》載言之體。大抵周誥殷盤，昔人苦其佶屈聱牙，不易籀誦者，以其中悉爲當日口語，且雜方言，記事者皆如當日實情，以錄爲篇章，初無意於修其辭令，以文飾之。歷世久遠，語音遷變，遂致艱澀而難通耳。故《尚書》載言之體，從實而書，不加潤色，誠千古不易之法。後之修史者，於載言之際，文勝於質，理溢乎辭。而真實之情，不可見矣。

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

舜徵案：舊史載言，無如《史記》之逼真者。如記高祖罵陸賈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記陳涉故人見殿屋帷帳驚歎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記周昌口吃廷爭之辭曰：“臣期期知其不可，臣期期不奉詔。”凡若此類，不可悉數。要皆從實而書，不假修飾。使其人、其事、其語唯妙畢肖，物無遁形，此誠史家載言之極則，後來鮮有能學步者。班書加意修辭，力追典雅，於此已不逮史公遠甚。漢以下文尚靡麗，益不足以

語乎此矣。

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眚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舜徽案：知幾此段議論，通達之至！道盡漢以下史家刻意學古之弊，皆由淺見寡聞不識時通變之爲累也。綜觀歷代史傳，力追古人、以致文理不通者，則莫甚於宋祁之修《新唐書》。戛戛獨造，惟古是求。於《舊書》各傳，無一篇不改竄易換。造句用字，僻澀詭怪，前人已糾彈其失矣。其尤甚者，乃於載言之際，全代古人爲文。如《姜皎傳》，《舊書》載玄宗宣布其功之詔，爲四六文體，乃唐時原文。宋氏不欲以四六入史，遂通篇改爲散文。《薛登傳》，《舊書》載其諫舉一疏，《新書》亦全爲改作。若此所爲，非特前無是例，亦事之至可哂者。食古不化之病，一至如此，又何足以言史事之真實乎？故知幾斯論，誠箴育起廢之藥石。惜宋祁輩未之見耳！

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

舜徽案：知幾此篇，持論正大。歸結爲“識時通變，從實而書”八字，足以括之。非特爲史家載言之準，抑亦文人屬辭之律也。章學誠《文史通義·論古文十弊》有云：“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以謂之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章氏斯論，實本《史通》此篇之義，推衍而出。

### 浮詞第二十一

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易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上，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

舜徽案：呂思勉《史通評》曰：“此篇戒敘事時屏入主觀之語，以致失真也。敘事不可屏入議論，人尚易



知。乃至詞氣未竟之時，加一二語以足之，而亦有闕出入，則知者甚鮮。劉氏此論，可謂入微矣！惟其議古人，亦有失當處。如賢，愈也。趙鞅諸子，無恤最賢，但謂其勝於餘子。蕭何知韓信賢，亦謂其過於常人耳。且賢字非專指德行。才優於人，亦賢也。劉氏不知訓詁，而妄加抨擊，誤矣。又《酷吏傳》，謂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不能絕。此子貢、冉有不過長於政事之代名，語言自有此例。如辯擬蘇、張，勇侔賁育等，皆是也。劉氏不知文例，而妄加抨擊，又誤矣。要之，劉氏論事長在精覈；而其短處，則失之拘泥武斷。與王充《論衡》，殊相類也。”呂氏此言甚允，切中知幾之病。大抵古今才識之士，逞其雄辯，有所論列。其精處，在能通貫羣書，揭櫫大例，實有突過前人者。其粗處，則在勇於判斷，自信不疑，亦有貽誤後學者。若王充、鄭樵，皆坐此失，不第知幾爲然。論其摧陷廓清之功，又足掩穿鑿傳會之失。學者取其長而棄其短，可也。

## 敘事第二十二

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深奧，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差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

舜徽案：經史之目，實起於載籍日繁之後，編簿錄者，書以類聚，從而爲之名耳。漢世撰述猶簡，故劉、班條別羣書，著錄《太史公》百三十篇於《六藝略·春秋家》。以其時記事之書，自《世本》以至《漢大年紀》，僅有八家四百十一篇，不能獨成一類，遂推本其體之所自出，附於《春秋》，實爲允愜。其後史籍大興，由附庸蔚爲大國。故自晉以來，爲書目者，勢不得不分門類以區處之。自晉乃有甲乙丙丁之分，至唐始立經史子集之限。斯皆古代作述之士，所不及知。何可依此以定優劣？況經之名所起亦晚，章學誠嘗言：“因傳而有經之名，猶因子而立父之號。”（《文史通義·經解》上）又言：“六藝之初，經目本無有也。《大易》非以聖人之書而尊之，一子書耳。《書》與《春秋》，兩史籍耳。《詩三百篇》，文集耳。《儀禮》、《周官》，律令會典耳。”（《方志略例》二《駁文選義例書再答》）此皆名通之論，灼然推見上世撰述之本原。蓋自漢世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後，論者始妄分軒輊。至唐初修定《五經正義》，而學益定於一宗。知幾囿於俗見，遽持經史之名，以爲高下之準，豈有當乎？

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憑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較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幾矣。

舜徽案：知幾日星之喻，未見允當。此由尊經卑史

之見，牢不可破，故持論乃爾。觀《言語篇》指斥世人貴遠賤近之弊有云：“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所言本甚通達，不謂知幾又自蹈之矣。蓋一時有一時之文體，《尚書》、《春秋》之不能降為兩漢，與史公、班氏之不能上攀三代，皆無可如何之事。何能持史漢之文，以與《尚書》、《春秋》絮長校短乎？

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

舜徽案：知幾此處雖班、馬並舉，其實偏詆史公耳（行文之便，因馬及班，全書中往往有之）。非特指斥過刻，抑亦未窺得史公深處。余嘗以為《太史公書》，不第千古良史已也。論其大用，實有傳經之功。六藝自秦火而後，亡者過半。司馬氏嗣其家學，世掌典墳。恐遺經之復墜于地，故罔羅舊聞，自創新體。虞、夏、商、周本紀成，而《尚書》盡在其中；春秋列國世家成，而《左傳》在其中；《禮》、《樂》諸書成，而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可考見其大較；此非傳經而何？知幾乃目為《五經》之罪人，真可謂不辨黑白矣。史公於《五經》中，獨不采《易》、《詩》以入史，以二書遭秦火而全也。抑知幾此處，或但謂其敘事之文，不及《尚書》、《春秋》之典核，以為史書之體，至是一變，故目為《五經》之罪人。不悟史公而生於《尚書》、《春秋》之世，亦自不能為《史記》之文。時實為之，非作者所能自主。知幾在《言語篇》已云：“《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畛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持論甚通，何又於此乃自相牴牾耶？

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麤非類。若《史記》之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嫵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儒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

舜徽案：劉咸炘《史通駁議》曰：“此皆知幾以一己之見高下之，蘇、張傳皆本《國策》，陳、項傳本於遷史。非遷、固之所造，不足見遷、固之工。《三五本紀》，采掇古書；日者、倉公、龜策諸傳，多敘術數；《淮南》、《司馬》、《東方傳》多載文詞；亦知幾所不喜。不知史以述爲主，不以作爲長也。馬、班書佳篇甚多，知幾皆不舉，而獨舉此。浦氏以爲僻，信矣。”劉氏斯議，切中知幾持論偏激之病。全書中往往有此，皆當分別觀之，未足視爲定評。且《言語篇》已云：“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此處乃云：“言嫵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何前後乖刺至此耶？

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闕略，無復體統。洎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

舜徽案：太史公理董古史，與敘述秦漢時事，爲例不同。《自序》所云：“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此理董古史之例也。故自周以往，大抵仍

用舊文，因而不改。惟於難知之文，以訓詁代之耳。此乃述者之職志，不得謂爲無體統也。至於敘秦漢事，則出於己所綴緝，自鑄偉詞，則直躋乎作者之林矣。其能條貫有倫，煥炳可觀，亦豈偶然。故善讀《太史公書》者，必明於作述不同之例，而未可輕爲抑揚之辭也。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

舜徽案：上世文辭尚簡，亦實由於記載文字之具，極其樸陋，而載筆彌艱，乃不得不省約其辭。證之鼎彝、甲骨刻辭，視《尚書》、《春秋》尤爲簡略而可知也。自縑帛之用日廣，而著述之體一變；迨人工造紙、雕板印刷之術，相繼以起，而著述之體再變。豈人才之有殊？實器用之多利耳。故古代文尚簡要，而後世言有枝葉。勢也，亦時也。使生後世，而必力追三代。貌襲古人簡約之辭，務求事增文省，其不蹈宋祁修《唐書》之失者，蓋亦罕矣。知幾斯論，殆有鑒於《晉書》之蕪雜，思有以規其短。有爲而發，本未可一概論也。

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君懋，非不幸也。

舜徽案：知幾此論，道盡六朝文敝，切中膏肓。然

自魏晉以下，士習華靡，要亦時尚使然耳。《隋書·李諤傳》，載諤上書請正文體有曰：“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矜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李氏所言，信爲剴切。然其自撰此文，固猶駢四儷六也。知幾斯論，略與李氏同趣。然觀《史通》全書，亦重在修辭鍊句。凡四字可盡者，必足成八言。一句能畢者，輒聯爲二語。所謂“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之病，累牘連篇，靡不然矣。使知幾當日自成一史，亦未必能黜華崇實，屏絕綺語，而反之三代兩漢也。蓋習尚移人，有不期然而然者。何用深責六代諸史乎？

## 內篇（卷四）

### 品藻第二十三

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爲斷，羈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

舜徽案：劉咸炘《史通駁議》曰：“此足見知幾於

史家銓配列傳之法所見甚淺。老、韓同傳，明道法之源流。董、袁合篇，著爭裂之原起。豈止如知幾所言而已乎？若知幾言，則諸史英雄同時者多矣。何不皆合之耶？”劉氏此言，指斥知幾輕於立論之失，深中肯綮。大抵史家立傳，或分或合，恒視其書之義例而定，初未可一概論也。如項羽、陳涉，在《史記》則各自成篇，在《漢書》則合爲一傳。《後漢書》爲董卓立專傳，《三國志》則取與二袁、劉表同篇。良以項、陳事跡，在通史宜加詳，在一代則可略。董卓在後漢爲重，在三國則較輕耳。取舍分合，史家自有權衡，實亦無一定成法也。知幾之病，恒喜自作一例，以上衡古人，此其所以乖舛。

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敍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爲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甯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置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又其敍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舞陽居末。斯並是非督亂，善惡紛拏。或珍瓠齷而賤璠璣，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爲監，欲誰欺乎？

舜徽案：品比人物，古稱方人。子貢方人，而仲尼諷之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良以校量人物

高下，難有持平之準。自取徒勞，無裨日用，故孔子薄之。孔子平日論人，但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是其時第列人才，惟分三科。至於取《禹貢》田賦九等之目，以區分人才高下，則所起稍晚。《史記·李將軍傳》云：“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此卽以九品論列人才，見諸載籍之始。可知兩漢初年，已有斯目，本不起於《漢書·人表》也。夫定以三科，區分較易。別以九等，確當實難。此以爲是，彼以爲非。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等差高下之見，不能畫一，無足怪也。《班書·人表》，自魏張晏已有異議，知幾復大爲駁難。不悟書經三寫，謊脫日增。況旁行斜上之體，傳鈔不慎，動輒錯行。其中訛謬，亦實有非班氏所能任咎者。卽知幾此篇自注所云：“鄧三甥第六，陽處父第四，士會第五。”俱與今本不同。從知自唐迄今，《人表》等次，又已紊亂。推之自漢迄唐，其錯舛亦必不少。如一概目爲班書原次而譏彈之，厚誣古人矣。

### 直書第二十四

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

舜徽案：《漢書·司馬遷傳贊》云：“自劉向、揚雄



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班氏此《贊》，信非溢情之譽。今觀《高祖本紀》中，敘述其早歲好酒色，對廷吏無不狎侮，又喜大言之狀，歷歷如繪。而《封禪書》內，紀載武帝惑於鬼神，勞民傷財之事，亦無所隱。其痛惡興利大臣之情，既發之於《平準書》；而憎恨嚴刑峻法之意，復宣之於《酷吏傳》。全書中類此者甚多，宜王允目爲百三十篇謗書也。修史惟不隱惡爲最難。知幾所云述漢非，亦實指不隱惡而言。

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如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

舜徽案：自曹氏、司馬氏忍戾嗜殺，士大夫多屏息結舌，不敢言天下事。惟清談玄理，全軀遠禍而已。敘述當時史實者，尤不敢不有所回護。若習鑿齒生值東晉，時代較後，禁網漸疏。修史能秉直筆，要亦時會使然。《晉書》本傳，稱其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載正之，起漢光武，終于晉愍帝。于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云云。可知其修書之體，且以正統予蜀，而不黨魏，則何事不可直書。此所以知人必先論世也。

## 曲筆第二十五

筆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舜徽案：古者事涉君親，必多隱諱，此歷朝所以無信史也。此處雖君親並舉，然在國史，則偏爲君主諱耳。苟事涉君主，必爲隱諱。則君主之祖先、子嗣、戚姻，以及柄權之貴臣，皆在所必諱。而動多顧忌，曲筆滋繁。欲求據實直書，蓋亦難矣。誠持斯義以上衡六代諸史，則如《稱謂篇》所斥《魏書序紀》，追美拓跋氏之先，襲其虛號，以相誇耀者，亦特事涉君親必多隱諱之引申義耳。復何譏乎？《太史公書》所以能不隱惡，正以其不爲君諱也。後人不易學步者，在此。

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

舜徽案：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之說，出《晉書·陳壽傳》。其言不經，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三國志跋》，趙翼《廿二史劄記》，既已爲之申雪矣。且壽本蜀人，於蜀漢遺事，聞見親切，故自《三國志》外，又有《益都耆舊傳》及《古國志》二書，以羽翼之（古疑卽故字，謂蜀漢也）。卽以《蜀志》言，雖卷數僅《魏志》之半，而記蜀事特詳。如羣臣稱述讎緯，及登壇告

天之文，魏吳皆不書，特書於蜀。立后、立太子、諸王之策，魏吳皆不書，而特書於蜀。太傅許靖、丞相諸葛亮、車騎將軍張飛、驃騎將軍馬超之策文，皆一一書於本傳。其於蜀漢，可謂厚矣。至於災祥之事，不輕下筆，則固修史者所宜慎。《後漢書·安帝紀》注引范氏《序例》云：“凡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見於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或虛飾，故書某處上言。”據此，可知史家秉筆，重在徵信，固不敢苟且從事。蓋亦舊史義法乃爾，晉宋相沿未改耳。陳壽闕所不知，未爲大失也。

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

舜徽案：《洛陽伽藍記》卷二稱：“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佞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此處所載趙逸後論，

尤爲精要。揭櫫“佞言傷正，華詞損實”八字，已道破當時史傳曲筆誣書之通病。其語通核不刊，殆亦知幾此篇藍本也。又考《魏書》卷四十三《毛脩之傳》稱：“脩之嘗言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觀於脩之所言，實有大謬不然者。縱不問《蜀志》全書，純以武侯爲中心。即以本傳評語而論，其傾倒武侯至矣。應變二語，本作疑辭。原有苦衷，非爲枉屈。蓋當時亮所對敵，乃司馬懿。揚亮，則適以貶懿。當晉武帝之時，壽豈敢出此。傳中不得已必爲疑辭以稍抑之者，所以爲懿、炎祖孫地也。讀書稽古，貴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知幾於此，似猶未達一間。

### 鑒識第二十六

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耻。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

舜徽案：《漢書·儒林傳贊》曰：“初，《春秋》，公羊而已。孝宣世，立穀梁。平帝時，又立左氏。”《經典釋文序錄》曰：“後漢建武中，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因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仍行於世。”《隋書·經籍志》曰：“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

高第，爲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在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觀此三書所載，而唐以前《三傳》立學興廢之跡，班班可考。大抵《左氏》在漢世立於學官較晚，復旋立旋罷，而其學傳授不絕。魏晉以降，《左氏》大行，而《二傳》漸微。見諸先唐史籍可稽者如此。知幾乃謂，左氏之書，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豈情實乎？下文取與《尚書古文》並論，復謂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則亦失考甚矣。

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

舜徽案：漢世孔壁所出之真《古文尚書》，惟孔安國通其讀。安國所獻之書，雖不傳於後世。然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是以《史記》中虞、夏、殷、周、秦本紀，以及燕、衛、晉、宋諸世家，所採錄之《尚書》，皆據當日《尚書》古文原本，最爲可信。後世治古史者，必取資於此矣。唐代學者，於梅賾所上《古文尚書》之偽，尚無人致疑而辨難者。故知幾立論，但據梅本。亦以其時通行之《五經正義》，《書》取偽《孔傳》，而左氏用杜預《注》。知幾囿於俗尚，宜其所見止此。雖曰考證之

學，古疏今密，不應持宋以後論定之事，以上議唐人。然知幾以史學名家，言及三代遺典，乃不能上稽《太史公書》，以考其同異，非特無以明經，且亦未爲知史也。

### 探蹟第二十七

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

舜徽案：知幾此言，在全書中最爲平正通達。信後生之藥石也！《禮記·儒行篇》曰：“博學以知服。”鄭《注》云：“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孔《疏》云：“謂廣博學問，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仲尼之言，得漢注唐疏，而其旨益明，足以昭戒百世矣。況自古史籍，難在創例。繼起者踵事增華，體益加密，固前人之所深望於後人者。後人如遽據其一疵，以沒其百美，吹毛索癢，則在在皆可譏議。古今寧復有完書乎？故論古寧失之寬，無失之刻。多取其長，少摘其短。庶可謂爲善讀書者！且古人著述，皆各有其義例。苟非通貫全書，不容輕易置喙。如此篇下文所舉孫盛、葛洪之失，亦正坐未窺古人著述大體，乃欲有所揣測，終亦莫由推見作者用心也。卽知幾《史通》全書，持摭前人之處，亦不免嚴訶厲詆，流於激切者。所謂知之非難，行之維艱，信矣。

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

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

舜徽案：知幾此言，深得陳壽撰《國志》時不得不爲曹魏回護之苦心。誠明乎斯義，則知幾不必誤信後起無稽之言，謂陳壽因挾私嫌而妄貶諸葛矣。大抵奴爲主言，乃諸史通病。黜陟失中，抑揚無準。悉可推此義以求之。

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

舜徽案：《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鑿齒集》載其論略曰：“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據此，可知鑿齒當日修史，必以魏爲僞國者，固自有權衡在也。知幾謂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似得習氏用心。然《世家篇》已云：“梁主敕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則又與此論不合。蓋知幾於三國時正僞之辨，本無定見也。

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

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邈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

舜徽案：《北史·崔亮傳》稱：“齊文襄嘗言崔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別族。’乃止。”據此，可知北朝之嫉惡鴻書者，正大有人在，初非魏收一人之私言也。

###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

舜徽案：《列子》八篇，雖著錄於《漢書·藝文志》，然其書早亡。今本《列子》，乃後人薈萃道家言而成，非列禦寇之書，前人早論定矣。且古人撰述，亦有纂輯羣言，自標一子之例。與夫模擬著書者，固自不同也。惟揚雄生于西京之末，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故時人有問雄者，常以法應之。譌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漢書》本傳）。亦步亦趨，蓋其所以自待者彌高。而班固論之曰：“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



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本傳贊》）然則雄所述造，蓋無文而不規撫前修，又不第《法言》、《太玄》然也。著述之體，至此一變。自東漢以下，士子競以擬古著書相高，雄實開其先云。

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舜徽案：知幾此篇，道盡模擬著書之弊，曲當事理，可云通識！後世模擬《春秋》者，莫拙於歐陽修。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六曰：“歐陽公《五代史》，自謂竊取《春秋》之義。然其病，正在乎學《春秋》。如《唐廢帝紀》：‘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案《春秋》，衛人立晉。晉者，公子晉也。立者，立其人也。此紀石敬瑭事，當云：‘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方合史例。今乃襲用‘立晉’之文，此《史通》所譏貌同而心異者也。”錢氏此言，深中其病。而歐陽法古之跡，一至如此，真足令人發噤。其才識下於譙周，又已遠矣。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

舜徽案：此處所云三史，自指《史記》、《漢書》及《東觀漢記》。所云五經，亦但謂《尚書》與《左氏春秋》耳。而爲區分之曰，魏以前學三史，晉以降效五

經，特就紀傳、編年二體之書立言乃爾。至其他雜史之書猶多，則別有所承，不在此限。

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舜徽案：史公著書，自創新體，於羣經無所胎襲。即使採用典墳，亦必以訓詁代經文，譯古書爲今語。剪裁鎔鑄，成一家言。此其所以卓也！後來史家，所以未易學步者，非由學力不逮，實才識限之耳。

### 書事第二十九

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痢，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

舜徽案：知幾指斥魏晉以降史籍蕪雜之失，至爲切要。故後人治兩晉南北朝史實者，最難爬梳。唐以下惟司馬光修《通鑒》，能糾此失，有所別擇去取於其間。高似孫《緯略》，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可以想見其理董此三百五十年間舊事，至費苦心矣。《朱子語類》亦云：“南北史除了《通鑒》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朱子此言，非過譽也。考司馬光《與范祖禹論修書帖

子》有云：“詩賦等如止爲文章，詔誥等若止爲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詼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並告存之。”此言雖原爲纂《唐史長編》而發，然推之全書，莫不如此。不啻爲全書書事之例，發其凡矣。觀其理董六代之臻於精謹，亦以其於去取別擇之際，審密不苟耳。故今日讀兩晉南北朝舊史者，能取《通鑑》對勘，則有條不紊，若網在綱也。

若乃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

舜徽案：百職遷除，千官黜免，亦當時變革之一端，足資考核之處甚多。載之本紀，則病繁蕪；概屏不錄，則傷闕略。執兩用中，固莫如取旁行斜上之法，作表以綜述之耳。《漢書·百官公卿表》，於見諸紀傳之人，不書地名。其不見者，則以地名表之。若天漢元年，濟南太守琅邪王卿爲御史大夫，二年有罪自殺之類，是也。或書其地，兼及其字。如元鳳五年，鉅鹿太守淮陽朱壽少樂爲廷尉，坐侍中邢元下獄風吏殺元棄市之類，是也。《後漢書》乃移用斯例以爲紀。三公有傳者，不著其地。其無事迹可見者，則以地名表之。如《明帝紀》，永平十四年，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爲司徒。《和帝紀》，永元十年，太常太山巢堪爲司空之類，是也。使范《書》有表，則此等無事迹之高官，正不必濫

載於紀矣。此皆舊史短長，昭然可考者。知幾論史，惟不明於表之爲用甚大，且欲刪去（詳《表歷篇》）。故於此類繁雜之事，竟無法以處之也。

### 人物第三十

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驚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皋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

舜徽案：史公著書，凡其人行事簡略，而又時在遠古者，但舉其功烈大端，附著於本紀內，而不別爲立傳。如皋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書闕有間，遺事無多。雖欲爲傳，不可得也。他如周末諸子，行蹟無考者，則亦存傳疑之義。太史公論及六家短長，亟稱墨家強本節用之說，乃人給家足之道，雖百家弗能廢。然《史記》竟無《墨翟傳》，但於《孟荀列傳》之尾，附著數語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寥寥二十餘字而已。此亦由世遠難稽，無可爲傳故也。至於七十列傳，以夷、齊居首，則《太史公自序》已云：“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可知其首冠此傳，亦自有其微旨。何得斥爲齷齪之甚乎？

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驄、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太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

舜徽案：略小存大，正史家立傳之通例，非特班《書》爲然。良以一時人物衆多，何可兼錄靡遺。自必擇取其較爲重要者，而後爲之傳。儻求其細大不捐，難肋無棄，則必繁冗蕪雜，有如《宋史》列傳之濫，爲識者所深病矣。且舊史記事，多以時政大端爲主。凡與此關繫較重之人物，則載之。若司馬光《通鑑》不載文人，不采俊偉卓異之事。如屈原之才，嚴光之潔，其姓名皆不見於《通鑑》，以此等人於政事所繫不大耳。雖《通鑑》爲編年之書，與《史》、《漢》異體。要之紀傳諸史，登載人物，亦各有其權衡，又不容漫相揣測也。

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

舜徽案：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曰：“列女之名，昉於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爲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爲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爲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章氏此言是矣！信足以矯知幾持論之偏。考劉向作《列女傳》，分標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諸目，本以兼錄德才，並資儆勸。范《書》效其體，亦重在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任一操而已。至《隋書·列女傳序》，始云：“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

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可知唐初諸儒，論及列女，偏重在德，且以貞烈相高。知幾囿於時論，故其所見止此。自唐以下，修《列女傳》者，乃多取患難顛沛殺身殉義之事，以相風厲。宋人撰《新唐書》，至改“列女”爲“烈女”。元、明二史，《列女傳》中所載貞烈之行，尤爲衆多。是不啻驅天下婦女以競趨死地，而其間有才行者，益湮沒而不彰矣。

### 覈才第三十一

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

舜徽案：張衡雖以文辭聞於東京，而兩爲太史令，博通墳籍。范書本傳，稱其嘗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嘗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云云。可知其有志修史，而竟未成，不得謂爲不閑於史也。至於陳壽修《三國志》甫成，已爲時人所重。《晉書》本傳，言之甚詳。而《文心雕龍·史傳篇》，復稱其書：“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又安可謂爲不習於文耶？知幾所不慊然者，蓋以其敘事簡質而寡澤耳。知幾於六代諸史之以文辭取勝者，已病其華靡無用。於陳壽之簡質敘事者，又譏其不習於文。持論如此，豈可謂平？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

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醪，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

舜徽案：知幾目擊當時文士修史之弊，故不惜數數道之。《載文篇》所云：“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雜說下篇》又云：“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麗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皆辭意激切，與此段議論，實相表裏。蓋史以載事，事欲其核。事苟核矣，文即不勝，無害。事未核，而緣飾之以文，失實亂真，貽誤千載，弊孰甚焉。故知幾言之尤兢兢。末所云：“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實知幾所以自慨。參之《自敘》、《忤時》諸篇，其意自見。顧知幾此書，亦爲俳體。假使當日得行其志，自成一史。不知果能爲姚思廉之所爲否耶？

### 序傳第三十二

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縣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爲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寶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非止一家。競

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牒，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見其失者矣。

舜徽案：古人著述，無自題姓字之例。至於開卷上標書名，而下題某撰，非特兩漢人著述無此體，即魏晉人之書，其姓字亦多為時人，或後人所補題（詳余所著《廣校讎略·作者姓字標題論》諸篇）。若夫有意自顯名氏，惟賴有自敘之文，或進書之表耳。人情貴遠賤近，為道者尚必託之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淮南子·脩務篇》已發其例）。故古之自敘其書者，亦主於述家世，詳行事，而高遠其所從來。俾世人溯其淵源，而重其書。《史》《漢》敘傳之文，固無論矣。即許慎《說文解字敘》，於論列文字源流，著書體例既竟，復於《後敘》中補述其世系。所謂“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緡雲相黃，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是也。蓋漢世以此為序書正體，故許君雖未詳舉于前，亦必補綴於後。誠明於斯例，則班書《敘傳》之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何足為病。

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

舜徽案：漢世述作之林，治經者必問其師承，立論者必稽其家學，而尤致詳於門望世系。簞門寒族之士，雖文行卓異，終不為時所重，欲傳其書甚難。故王充《論衡》既成，或嘲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



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見《自紀篇》）充欲破時俗之陋見，乃因近取譬以自解。所謂“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皆所以自喻其意。末又稱引史事，明士貴崛起之旨。其用意固在力矯世人論士之偏，欲使其書得行於當時，而傳之後世耳。其不得已之苦心，詳繹通篇前後文意，自見。何可責其矜己辱先，目爲名教罪人乎？

### 煩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患者久矣。及干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甚。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愈煩，其失彌甚者矣。

舜徽案：史家煩省之理，但當求諸一人撰述之中，而未可持此以衡數家之優劣也。一書之中，何者宜詳，何者宜略。撰述之際，貴有義例。史公敘三千年事，都五十萬言。而秦漢事爲最詳，太古事爲最略。就本紀言：五帝合爲一紀，夏、殷、周各成一紀，至秦既有《秦本紀》，又有《秦始皇本紀》，至漢，則自高祖以逮武帝，每人各爲一紀。就十表言：三代稱《世表》，十二諸侯稱《年表》，秦楚之際則稱《月表》。此皆詳近略遠之例也。《荀子·非相篇》所云：“傳者久，則論略；

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亦卽斯旨。《文心雕龍·史傳篇》曰：“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卽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文心》此論，信爲通核。曠觀自古史家，深明斯旨，而煩省得宜者，其惟太史公乎！

### 雜述第三十四

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驚。權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里書；十曰都邑簿。

舜徽案：唐人以紀傳、編年爲正史。知幾於論述正史之餘，復釐雜史爲十科。有郡書、地里，則方志入史矣。有家史、別傳，則譜牒入史矣。有瑣言、雜記，則小說入史矣。於是治史取材，其途益廣。學者致力之端，知不局限於紀傳、編年之書。則知幾是篇，啓牖之益爲多。惟方志之作，務欲矜其州里；譜牒之書，無不誇其氏族。至於小說筆記，又多出於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敘述之真實與否，讀之者不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僞。本書《採撰篇》，既已詳道之矣。則固有待於取材之際，審辨而善用之。

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

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舜徽案：此論極其圓通。當時治經者，率據守《五經正義》數家之說，而六朝疏證，散佚爲多。治史者，但猶繹紀傳編年二體之書，而稗官野史，搜尋不廣。知幾蓋有鑒於學者專固之失，故發爲救弊補偏之論。所謂“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此數語尤爲精要！信足以矯俗士之僻陋也。

### 辨職第三十五

大抵監史爲難，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夫載言記事，藉爲模楷。捫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

舜徽案：知幾此議甚正！即使設館修書，亦必擇任兼擅才、學、識三長者以總其事，而後能樂觀厥成。有唐開國之初，始立史館。以宰相大臣監修，復分任一人或二人爲主修。若姚思廉之主修梁、陳二書，李百藥之主修《北齊書》，令孤德棻、岑文本之同修《周書》，皆得各行己意，自爲義例。是則名爲官修，實同私撰。故其書各有體要，不似後來宋元諸史之草率蕪冗也。宋人所修之史，無踰《資治通鑑》之博大精醇者。當時雖由劉攽、劉恕、范祖禹諸人分纂《長編》，而司馬光一人

獨任剪裁潤色之役。竭十九年之力，而後成書。使非官府厚其廩餼，廣徵圖史，殆亦不易以濟事。故其書名爲私撰，實卽官修。此皆所任得人之明效也。綜觀自唐以下諸史之利弊，信知幾斯言之有識。

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儒，立言垂後。何必身居解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舜徽案：《忤時篇·報蕭至忠書》，力陳設館修史，有五不可。與此論實相表裏，此處特略言以發其凡耳。大抵自唐以上，史成於一人。自唐而下，史成於衆手。成於一人者，爲之愈難，其書愈善。成於衆手者，就之愈易，其書愈不能精。焦竑嘗論之曰：“古之國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諸名山，傳之百代。而欲以烏集之人，勒鴻鉅之典，何以勝之。故一班固也，於《漢書》則工，於《白虎通》則拙。一歐陽修也，於《新唐書》則劣，於《五代史》則優。此其證也。”（見《澹園集·論史》）焦氏此論，蓋亦自知幾之言，推演而出。

### 自敘第三十六

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彈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已納諸胸中，曾不櫛芥者矣。

舜徽案：上文分舉《淮南子》、《法言》、《論衡》、《風俗通》、《人物志》、《典語》、《文心雕龍》諸書既竟，此處又總言固已納諸胸中，曾無慊芥。以明《史通》之作，乃繼諸家而起。綜觀《史通》全書，大抵勇於糾謬，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與《論衡》爲近。而論列史法，揚榷體例，則胎襲於《文心雕龍》者尤多。若《採撰篇》，揭鑒察傳求是之義；《浮詞》、《敘事》諸篇，指斥崇華少實之弊；皆由《論衡》“疾虛妄”之旨引申而出。至於《史通》之有《六家篇》，猶《文心》之有《原道》、《徵聖》也。《史通》之有《二體》、《雜述》諸篇，猶《文心》之有《宗經》以下，至《書記》諸篇也。《史通》之有《載言》以下三十一篇，猶《文心》之有《神思》以下諸篇也。《史通》之有《敘事篇》，猶《文心》之有《體性篇》也。《史通》之有《煩省篇》，猶《文心》之有《鎔裁篇》也。《史通》之有《言語》、《覈才》諸篇，猶《文心》之有《時序》、《才略》諸篇也。《史通》之有《鑒識》、《忤時》諸篇，猶《文心》之有《知音篇》也。《史通》之有《直書篇》，猶《文心》之有《程器篇》也。《史通》之有《自敘篇》，猶《文心》之有《序志篇》也。可知其撰述是書，實在在模擬《文心》。宜兩書所言，多相符合。且《文心·史傳》一篇，論列舊史源流得失，至爲詳盡，乃史評之前驅。其中所云：“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若此四語，所以啓牖知幾者爲尤大。知幾蓋卽據其義，引申推演以成是書耳。然上下千載，綜括靡遺。雖與奪褒貶之際，或傷偏激；而發凡起例之處，彌見圓通。凡唐以上史家流別中失，悉於此有所稽考。沾溉後學，至無窮盡。故得與《文心雕

龍》分途並駕，同爲縣諸日月不刊之書。

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卽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漣，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舜徽案：《鑒識篇》云：“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烟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與此段文意大同。皆知幾自負其才，恐無以見知於後世，故不惜一再道之。觀《史通》之爲書，固以識解取勝。然昔人病其掎摭前修，語多過激。《疑古》、《惑經》諸篇，尤爲俗儒所忌，故其書既成，而傳習者少，因之訛脫缺佚亦最甚。縣歷千年，僅免亡散。知德者希，傳書不易，固古今所同慨也。

又案：知幾鑒於昔人敍傳遠述世系之弊，故自撰此文，但敍一生爲學次第，及著書體要，而不詳其先人世系行事。考知幾從祖胤之，學行甚著，與李百藥爲忘年友。永徽初，累遷著作郎，宏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等，撰成《國史》及《實錄》，奏上之。從父延祐，進士及第，亦有文名，均見《舊唐書·文苑傳》。父藏器，高宗時爲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兄知柔，性簡靜。亦以善文詞知名。均見《新唐書·文藝傳》。知幾兄弟六人，俱以學行有名於時。鄉人敬異之，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見《兩唐書·本傳》）。六人者：曰含章，曰賁，曰居簡，曰知柔，曰知章，而知幾居第五。其家學淵源如此，宜其學問夙成，卓爾不

羣也。

## 外篇（卷五）

### 史官建置第一

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爲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爲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舜徽案：唐以前學者，率以史之爲用，不外兩端：一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義始發之《周易·大畜·象辭》。程氏《傳》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卽此旨也。其次，爲明習舊事以知政治之得失利弊。《周禮·地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鄭氏《注》曰：“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是其義矣。合二者而言之，則不外修己、治人，以古爲鑒耳。故古人讀史之法，亦不越一觀字。史之最早者，無踰《尚書》。而孔子告子夏讀書，但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見《尚書大傳》）其平日教門人以學《詩》爲亟，亦曰：

“可以觀。”（見《論語》）蓋《三百篇》所載，無慮皆西周列國之史跡。《漢書·藝文志》所謂：“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然則當時登諸簡策者，固以史料視之矣。《詩》之可以觀，與夫《書》之可以觀，其爲用固無不同。顏之推生當蕭梁、高齊之世，去古漸遠。而其論學猶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恐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箴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矜窮恤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藹爾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勵，不可懼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見《顏氏家訓·勉學篇》）顏氏言爲學之要，主於觀古人之美德善行，而行之效之。雖偏重於獨淑其身，而所以觀之之意，實與孔門之教，初無不同。先唐諸儒，大抵然矣。自知幾作《史通》，始於史籍義例，作縝密之分析，而後史部批判，始有專書；杜佑纂《通典》，始於典章因革，作系統之理董，而後歷代制度，可以類考；自此史之爲用，不止於修己治人，以古爲鑒矣。

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



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舜徽案：左史、右史之名，不見於《周官》。惟《禮記·玉藻》及《漢書·藝文志》有之。而兩書稱其分記言動，已各異辭，不足以爲典要。余已備論於《載言篇》平議中矣。蓋左史、右史，乃古者記事之虛號，非史官之實稱。當時之實官，則內史、大史是矣。以其常在入君之左右，故或稱左史、右史耳。《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內史、大史，左右手也。”證之《周禮》所云：“內史掌書王命。”則固記言之任也。“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則固記事之任也（古大太字通）。二者之相輔以成，如左右手之相須爲用。後人不解《盛德篇》左右手之義，乃據《玉藻》、《漢志》，以爲古代實有左史、右史之專官，誤矣。知幾舉此二名，與《周官》諸史比列並論，殆亦失考。

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爲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

舜徽案：此乃如淳引衛宏《漢儀注》之說，《史記集解》、《漢書顏注》並引之。而晉灼、顏師古、司馬貞、宋祁均已駁斥其謬。考《漢書·百官公卿表》，有太史令。無太史公。而《律歷志》及《兒寬傳》，亦但稱司馬遷爲太史令。且其俸秩僅六百石，又去食祿萬石之丞相已遠。而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亦自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之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則所謂位丞相上者，乃子虛烏有之事。諸

家駁斥之言，不爲無據。論者或謂遷自序已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可知當時自有此名，故遷得自稱之。不悟官制雖有定名，而口語常行通號。太史令乃官制之定名，太史公乃口語之通號。史遷行文之便，卽據當時口語之通號以自名耳（《史記》中喜用當時流行之名以名其人，如稱趙佗爲尉佗，英布爲黥布，石奮爲萬石君，皆是）。後人不察，遽以“太史公”三字爲當時官名，誤矣。太史令職掌記注，有時在人君左右，較丞相尤爲密通至尊。若據此遽謂秩位在丞相上，則亦誤矣。知幾此處，論列漢世史官本末，自宜首正其名，不合沿用衛宏、如淳之說也。至於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云云，則以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故令郡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司馬貞《史記索隱》言之已明。良由職守使然，亦不得誤謂其位在丞相上也。

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爲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

舜徽案：此處云：“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而《六家篇》開首便云：“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可知《史通》分爲內篇外篇，實同時撰述，故相互注明，以避重複。《四庫提要》謂先有外篇，乃撷其精華以成內篇，殆不然也。

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備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

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

舜徽案：古今史籍，至爲浩繁。大別之，不外二類：一則屬於歷史資料；一則屬於成家著述耳。學者必洞明斯旨，然後對汗牛充棟之史部羣書，不致望洋興歎，而有以處之。就漢以前而論，若《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以及羣經諸子，皆歷史資料也。至司馬遷取羣書加以剪裁熔鑄，自出別識心裁，編述爲百三十篇之書，則成家著述也。就今日見存之史籍而論，則所謂《廿四史》、《九通》、《正續通鑒》、《五紀事本末》，以及歷代文集、筆記，旁逮羣經、諸子，無非歷史資料也。而吾人迫切企待之《中華通史》，則成家著述也。二者截然有辨，不容淆混。知幾所謂當時之簡，即吾人今日所謂歷史資料也。故必資乎博聞實錄。所謂後來之筆，即吾人今日所謂成家著述也。故必貴乎博識通才。其後鄭樵《寄方禮部書》有曰：“有文有字，學者不辨文字；有史有書，學者不辨史書。自司馬以來，凡作史者，皆是書，不是史。”鄭氏所謂“書”，則歷史資料也。所謂“史”，則成家著述也。鄭氏汲汲纂修《通志》，以上紹司馬遺規，則固以著述自任矣。至章學誠，乃益發揮“記注”與“撰述”二者不同之趣。記注，猶夫史料也。撰述，猶夫著作也。《文史通義·書教篇》曰：“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章氏此言，視劉、鄭二君益爲明切。皆非研窮乙部，深造有得者，不能道。

## 古今正史第二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

舜徽案：正史之名，或謂昉於梁阮孝緒《正史削繁》一書。今雖不傳，然其為“正史”二字標題之最早者，固無疑義。余則以為目紀傳體史籍為正史，實始於《隋書·經籍志》。《隋志》錄阮氏《正史削繁》入雜史類，而不入正史類。則阮氏所稱“正史”，殆未可與紀傳體史籍相混雜也。《隋志》所標題之正史，明明是唐初設館修史以後，朝廷將此類書，定為修史楷式，因名之曰正。猶之唐初修《五經義疏》，而名之為《正義》也。自此歷代相沿，率以官修之紀傳史為正史。唐以前無此稱也。阮書標題，蓋別有取義耳。知幾論史，以正史與雜述並舉。凡紀傳、編年之書，足以記載一朝大政者，皆屬正史。其所包羅，視《隋志》專以《史》、《漢》以下諸紀傳體之書為正史者，固已宏濶。而敘述源流，必沿用《尚書·偽孔傳序》之說，上溯伏犧、神農太古無稽之世，則又鄰於荒誕。我國古史記載，以《尚書》為最早。後世考鏡原流，但當溯此而止。何必上攀皇古，高言三墳五典耶？且《尚書》、《春秋》，實為紀傳、編年二體之祖（詳《二體篇平議》）。第以二書冠首，而分舉歷代之史於下，即已有條不紊，若網在綱矣。

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爲世範。

舜徽案：此處敘述《尚書》源流，全本《經典釋文敘錄》，惟稍有刪節耳。其時《尚書》辨僞之學，尚未萌芽。故唐人言及《尚書》，悉以梅本爲主。至宋吳棫、朱子，始疑之。明梅賾，繼致攻訛。自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崔述《古文尚書辨僞》諸書出，於是晚出《古文尚書》及《孔傳》之僞，乃成定讞。丁晏《尚書餘論》，且定爲王肅所造。雖近人亦有謂不必定出肅手者，要其爲魏晉間人所僞作，則固灼然無疑。以其時去漢猶近，舊聞尚多遺存，足以資其拾掇。又旁搜賈、馬諸家說義，總純成文，時有善言。六朝隋唐間人，謂其辭富而備，義弘而雅，尊之爲西京舊傳。清儒既明其僞，則又鄙棄屏絕，以爲不足寓目。抑揚過當，其失均也。平情論之，魏晉傳注，行世者希。此本雖僞，尚完具無闕，固學者所不能廢也。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

舜徽案：《書志篇》曰：“周撰《世本》，式辨諸宗。”《雜述篇》亦曰：“《世本》辨姓，著自周室。”而此處乃謂爲楚漢之際好事者所爲。其不同乃爾者，蓋彼二篇第就其書之原本言，而此處乃就後世增修之本言也。《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家》，有《世本》十

五篇。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司馬遷傳贊》亦云：“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班《書》兩處明云：“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則其書原本，必非楚漢之際好事者所爲可知。《史記集解序索隱》引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也。”劉向此言，乃《別錄》中語，又班《書》之所本。凡劉、班所言，皆其書之原本。《史通》書志、雜述兩篇已涉及者，亦謂此耳。《世本》傳世既久，自有後人續纂之筆。《顏氏家訓·書證篇》，已言其書有燕王喜、漢高祖，皆由後人所孱，非本文。然則《世本》傳至六朝，已大非兩漢時之舊本。下逮隋唐，又必迭有增附。知幾此處謂爲楚漢間人所錄，殆亦指當時士林通行之增附本言也。

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

舜徽案：《模擬篇》已言：“譙周撰《古史考》，書李斯之棄市，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可知其書，不第考正周秦以上事跡已也。知幾此處所言，全據《晉書·司馬彪傳》。文字大同，無所改易。遂忘其與《模擬篇》所已道及者相牴牾矣。

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敍。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

舜徽案：《後漢書·列女·曹世叔妻傳》曰：“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又曰：“《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續漢書·天文志》曰：“孝明帝使班固敍《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敍及班固作《漢書》事，亦稱：“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據此諸文，可知孟堅未竟之業，《八表》實出妹昭手。馬續所成者，僅《天文志》耳。《後漢書·馬援傳》，稱續善《九章算術》，則其精於天文，審矣。知幾此處，統謂《八表》及《天文志》，多是馬續所作，殊不然也。

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爲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

舜徽案：《史記索隱後序》曰：“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衆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據此，可知遠在東晉，爲《漢書》注解者，已二十四家。知幾此處言自漢迄陳注家二十五，蓋第就唐初見存之書言耳。《隋書·經籍志》稱：“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劉孝標《注》一百四十卷，陸澄《注》一百二卷，梁元帝《注》一百一十五卷，並亡。”可知此類書傳至唐初，散佚已甚。故顏師古作《漢書注》時，所列注家名氏，見於敍例中者，自荀悅至崔浩，亦僅二十三家也。《漢書》

之學，至乎陳隋，已臻極盛。《隋書·經籍志》稱其書師法相傳，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儒林傳》亦稱大業中《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可知當日講肄之盛，自不下於傳經也。知幾所云：“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非誇飾矣。

泰始中，祕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典十，列傳七十，譜三，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往，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

舜徽案：三國兩晉時人理董俊漢史實者，尚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薛瑩《後漢記》六十五卷（本一百卷），謝沈《後漢書》八十五卷（本一百廿二卷），張瑩《後漢南記》四十五卷（本五十五卷），袁山松《後漢書》九十五卷（本一百卷）。均著錄於《隋書·經籍志》。而《文心雕龍·史傳篇》曰：“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疏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知幾論列後漢史書，蓋已囿於《文心》之說。故此處於范《書》前，亦但舉司馬彪、華嶠兩家耳。

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



舜徽案：三國時紀傳史，自王沈《魏書》、韋曜《吳書》外，尚有廣漢郪人王崇所著《蜀書》。其書與陳壽頗不同，見《華陽國志·後賢志·王化傳》（崇乃化之季弟）。而《隋志》不載。《史通》此篇，亦缺而不書。蓋未傳布於外也。考《宋書·五行志》序，稱王沈《魏書》，志篇缺如。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律歷志序》，亦言《魏書》闕志。而《吳志·韋曜傳》，載華覈連上疏救曜之辭，復稱《吳書》雖已有頭角，敍贊未述云云。可知曜之《吳書》，實未成之作。《敍贊》之篇，且無其稿，更何有於志。《華陽國志》但言王崇著《蜀書》及詩賦之屬數十篇，亦未言其書有志。然則其後陳壽刪集三國之事，但有紀傳而不克作志者，蓋緣於前無所承耳。

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多。

舜徽案：三國時編年史，自此數家外，著錄於《隋志》者，尚有環濟《吳紀》，陰澹《魏紀》，孔舒元《魏氏春秋》。而《魏書·張彝傳》，稱彝子始均，嘗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儒林·梁祚傳》，稱祚撰並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大抵諸家皆國別為書，惟梁祚之作，乃就陳壽原著，合三國之事，改撰為編年史。惜其不傳於後，莫由知其義例何如耳。

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

乃勅史官，更加纂錄。

舜徽案：浦起龍《通釋》曰：“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也。編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孫盛、劉謙之、王韶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產也。據《志》，蓋十九家。豈緣習氏書獨主漢斥魏，以爲異議，遂廢不用歟？”浦氏此說，乃臆測之辭，不足據也。大抵史志著錄之書，未必無漏；而當日所指目之十八家，又未必盡在史志之中。知幾所云，貞觀中《修晉書詔》，今載《唐大詔令》卷八十一。詔中舉列諸家弊短，有名氏可考者，亦僅十四家。其中所云：“行思勞而少功。”乃謂謝沈《晉書》也（沈字行思）。沈有《晉書》三十餘卷，見《晉書》本傳，而《隋志》不載。可知當日所指目之十八家，有在史志著錄之外者矣。此外，若荀綽有《晉後書》十五篇，沈約有《晉書》百一十卷，皆《隋志》所未著錄，而見之本傳者。今繹當日修書之詔，尚有四家不得主名。究何所指，已不可知。疑事毋質，奚必盡求其人以實之乎？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爲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爲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

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爲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爲《宋略》二十卷。

舜徽案：沈約《宋書自序》，載其《上書表》有曰：“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于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沈氏此段文字，敘述《宋書》撰述本末，最爲詳盡。知幾此處，實全取之（稍有刪節）。所不同者，惟加入裴松之、孫冲之二事耳。《梁書·裴子野傳》，稱其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云云。斯又知幾敘事所本。孫冲之，太原中都人。晉祕書監盛曾孫。事見《宋書》臧質、鄧琬傳。以事伏誅，即嘗有撰史之請，亦必無成書也。此外若《齊書·劉祥傳》，稱祥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武帝銜而不問。《陸澄傳》稱澄欲撰《宋書》，竟不成。而著錄於《隋書·經籍志》者，自沈約、裴子野兩家外，紀傳類尚有徐爰、孫嚴《宋書》，各六十五卷。

古史類尚有王琰《宋春秋》二十卷。可知《宋史》撰述，亦復多門。知幾此處，特取其通行於世者言之耳。

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

舜徽案：《文史通義外篇·讀史通》曰：“凡有推獎於人，不難屈己，凡欲求知於人，不嫌炫己；人之情也。有所爲而言之，不必遽爲定論，聖人所不免也。而炫己者，人情所易，故聞者不甚取平。屈己者，人情所難，故聞者多據爲實。而不知其不盡然也。世傳沈休文與齊明帝賭徵栗典，故少三事，退爲後言，以明己之出於故讓，是非不好勝者也。其著《宋書》，雖不敢希蹤班、馬，而文辭典雅，頗具別裁，抑亦范氏之亞匹也。史稱裴子野刪《宋書》爲《宋略》二十卷，約見之歎曰：‘吾不如也。’《史通》因飾之曰：‘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此豈情理之言哉？裴《略》今已不傳，前人錄入編年部次，是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之屬也。是與紀傳之史，絕不相蒙。前史謂刪約《書》，固已謬矣。荀氏之《紀》，不盡出於班《書》。袁氏之《紀》，不盡由於一史。假而易編年於紀傳，而止憑一書，刪繁就簡。乃荒陋者所爲，通人不出此也。裴氏之書，未必至是，而史顧侈爲美談，何其陋歟？約之歎服，大抵取其翦裁簡當。至謂己所不如，不過一時推獎之辭。且亦明知己之撰述，足以流傳，不致爲所掩也。故不妨爲假藉。而史氏錄之，則未察其本矣。劉氏斟酌羣言，揚摧史品，自宜知所別擇。乃又從而實之曰：‘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前人不見裴書，而因劉氏之

言，以謂裴《略》實勝沈《書》，有定品矣。姑無論子野史筆文才，未聞可駕休文而上。正使其書不愧荀、袁，亦與馬、班諸書，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劉氏二體之篇，明言班、荀二家，缺一不可。未聞言漢事者，以荀《紀》爲上，班《書》次之；言東漢之史，以袁《紀》爲上，范《書》次之。何則？短長優絀，必以其類相形。體制各不相蒙，短長何自見哉？”（下略）章氏此論，信爲通核，足以匡知幾之失。大抵知幾論人論事，多誤信史傳，而漫不經心。沈約推美裴書之言，始見《梁書·裴子野傳》，《南史》亦仍而不改。知幾遽據其言，以定兩書之高下。亦猶前人謂陳壽挾私嫌以貶諸葛之說，始見於《魏書·毛脩之傳》。唐修《晉書》，復有類似之記載。知幾遽信其事，以衡史筆之曲直。皆由好異嗜奇，思考未周故也。全書中類此者猶多。不煩悉數，自可反隅。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爲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

舜徽案：齊史撰述，始於檀超、江淹。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淹共掌其任。所具條例，多爲王儉所駁。既與物忤，史功未就。超徙交州，于路見殺。淹所撰，凡十三篇。見《南史》超、淹二傳。而當日所立條例，具載《南齊書·檀超傳》。書雖未成，固猶可考見其體製也。《隋書·經籍志》云：“梁有江淹《齊史》十三卷，亡。”與《南史》本傳所謂十三篇者合。《梁書·淹傳》，稱淹所著《齊史·十志》，行於世。而《南史·淹傳》之末，又稱凡所著述，自撰爲《前後集》，並《齊史》傳、志，並行於世。然則《十志》之外，又自

有傳數篇，故合稱十三篇耳。證以知幾所云：“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既言先著，則其後必續有所述，明矣。後所述者，蓋傳也。

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起昇明之年，盡永元之代。爲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

舜徽案：《序例篇》曰：“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敍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亦序例之美者。”據此，可知蕭書原有《敍錄》一篇。其略猶存《南史》本傳中。《梁書》本傳稱所著《齊書》六十卷，與《隋志》合。蓋皆並《敍錄》計之。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祕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蕩。

舜徽案：《梁書·沈約傳》，稱約所著有《高帝紀》十四卷。《隋書·經籍志》有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三卷，云：“記武帝事。”又有謝昊《梁皇帝實錄》五卷，云：“記元帝事。”《唐書·藝文志》有鮑衡卿《乘輿飛龍記》二卷（《史通》作鮑行卿，乃傳寫之誤）。然則諸家從事之始，皆第有《帝紀》。相承撰述，迭有增益。百篇之書，自非謝氏所獨成。《隋志》著錄謝昊《梁書》四十九卷，云：“本一百卷。”《隋志》作謝昊，而《史通》作謝昊。“昊”與“昊”，形近易淆，未知孰是。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已言之矣。

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

舜徽案：浦起龍《通釋》曰：“《陳書》何之元、《周書》劉璠二傳，各言撰《梁典》三十卷。隋、唐二《志》，亦皆分載二典。而《史通》以爲二人合撰，則《梁典》祇是一書耳。足正二志之歧出。”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曰：“考劉璠卒於周武帝天和三年，其書未就。子休徵爲寫定之。休徵卒於周靜帝大象二年，是其書成於大象之前。行於北朝，或未及於江左。其父子皆終於周代。與南朝何之元，亦風馬牛不相及。之元之書，始作於陳後主卽位之歲。因始興王叔陵行弑伏誅，之元爲其官屬，幸而得免。故屏絕人事，一意著書。其時在周大象後三年，隋文帝開皇二年。劉璠《梁典》，已早成書矣。實非合撰。《史通》‘合’字，當是‘各’字之誤。浦氏云云，不足爲據。”姚氏此段考證，至爲審密。足以訂是篇傳寫之誤。浦氏讀誤本書，而未及上稽當時史實，輒作論斷，疏舛甚矣。

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知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舜徽案：陳初杜之偉、許亨，大建時顧野王，並知《梁史》。亨書成者五十八卷（《隋志》作五十三卷）。皆見《陳書》本傳。亨子善心，《隋書》有傳。稱其父嘗撰《齊書》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一時亡散。陳初爲史官。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

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禎明二年聘隋，而陳亡。其書存者六十八卷，又並缺落失次。善心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云云。此皆善心序傳自述之辭，而《隋書》全載之（原文甚繁，今但節取其辭如上）。《序傳》末自述制作原委既竟，且條列卷帙篇第甚悉。可知亨書雖未畢功，而善心續加補綴。最後刪併而成之七十卷書，實定本也（《序傳》所列篇卷，實止六十卷，與所云七十卷不合。姚振宗謂其中或有子卷。是已）。善心自云“略成七十卷”者，謂刪略其書，成七十卷耳。且《隋書》本傳明云：“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是唐初諸儒，已許此七十卷之書為完帙矣。《隋志》未見著錄，自是一時失載。知幾乃謂紀傳之書，未有其作，則嫌疏漏矣。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為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稿，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為《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舜徽案：兩唐《經籍》、《藝文志》，均有顧野王、傅縡《陳書》各三卷。《隋書·經籍志》有陸瓊《陳書》四十二卷。此三家之書，當即姚察所本。知幾言：“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證以今之《陳書》篇帙，《高祖（武帝）紀》二卷，《世祖（文帝）紀》一卷，適合顧、傅兩家書三卷之數。蓋察修是書，於二帝本紀，



卽仍顧、傅原文，無多改易。惟於篇末，各增一段論贊耳（兩紀之末，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等字，乃思廉補題）。至於陸《書》四十二卷，知幾稱其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云云，則其整齊潤色，用力於陸書者爲多。察在梁、陳二代，皆知史職，究悉舊事。兼修二史，力有未周。且以當世之人，述當世之事，采訪宜詳，考核須審，黽勉從事，亦難期於速就。豈如知幾所言，依違荏苒云爾哉？察於二史雖無成書，而大端已具。思廉特繼志述事，重加補苴耳。《陳書·察傳》亦云：“梁、陳二史，本察所撰。其中序、論、紀、傳有缺者，臨歿時，以體例戒其子思廉，博訪撰續。”此思廉自撰其父之傳，宜可保信。後人但據《陳書》僅高祖、世祖二紀，有“察曰”二字。其餘紀傳之末，則皆稱“史臣曰”，遽謂思廉之功，遠軼其父，亦失之矣。

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正始元年，鳩集稽備。而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十卷。鴻歿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祕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

舜徽案：“勒爲十卷”四字，乃承“始於江東購獲”一語而言。謂得蜀事後，所增卷數也。浦起龍輒改爲一百二卷，失原文之意矣。鴻所撰《十六國春秋》，本有一百卷。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凡一百二卷。見《魏書》及《北史》本傳。《隋志》著錄一百卷，但就本書言。兩《唐志》作一百二卷（兩《唐志》

“二”字下衍“十”字)，連《序例》、《年表》計之耳。知幾此處，如必言及鴻書總卷數，則當在“都謂之《十六國春秋》”句下，承以“凡一百二卷”，其意自完。不合忽於下文求得蜀事之後，始云勒爲一百二卷也。浦氏所改，非是。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唯爲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䴥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爲三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書敘述國事，無隱所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

舜徽案：崔浩之誅，非盡由於史事。《魏書》本傳稱：“浩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又稱：“太宗嘗問之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卽此二事，可知浩素憚魏威刑之峻，故平日言論行事，莫不謹小慎微，其於全軀遠禍之計，固已周矣。豈肯於修史之際，顯觸其忌，以自蹈死地？可疑一也。況傳中明言：“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郗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並勒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使其書果觸魏忌，則恭宗何得稱善？閔、郗亦安敢請刊於

石？可疑二也。傳又稱誅浩之時，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使果僅以史事得禍，何為旁及姻黨，悉遭滅門？可疑三也。《高允傳》稱：“浩之被收，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然則鄧、高二人之罪，不減於浩。鄧淵雖以他事賜死，其子穎，實又與浩同撰《國書》，後竟官至散騎常侍，進爵為侯，加龍驤將軍，榮樂而終。高允亦壽至九十有八，尊寵有加。使果以史事興獄，則同作者何得置而弗問？可疑四也。《允傳》又稱：“世祖勅允為詔，自浩以下，僅吏以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然則浩之得禍，實別有隱情。魏主既諱莫如深，允亦未便直指，惟直辭以面折之，可疑五也。《允傳》又稱：“允後遷中書監，雖久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續崔浩故事。”可知浩雖被誅，其書固未嘗廢。使其書果觸北人之怒，安得任之流布當時，聽人續述耶？可疑六也。有此六端，乃謂浩實以修史獲罪。將誰信之？考《宋書·柳元景傳》云：“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按柳氏河東解人，在今山西境內，即因浩事而被夷族之河東柳氏）。索虜以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據此，可

知浩之所以見戮，河東大姓之所以連坐，悉昭著矣。當時魏興大獄，特託之修史以爲名耳。始浩仕魏得志時，朝事大小，靡不見詢。言聽計從，寵信無二。觀浩乘間進諫，勸魏弗遷鄴，不伐宋。辭意懇切，至再至三。至於用兵柔然及北方諸國，則又贊成其事。蓋欲引其力以外向，使不蹂躪於中國。所以爲江南計者，信爲周盡。可知浩身雖仕北，心實附南。則其潛蓄異圖，俟機而動，欲鳩合北方志士，以謀大舉，固亦勢所宜有。《宋書》所言，自是當時實錄。卒以機事不密，身陷極刑。拓跋氏不卽以叛逆之罪昭告臣下者，蓋恐因此以激攜貳之心，動其國本，故借史事而殺之。後之論者，不考情實，相與隨聲附和，則亦厚誣古人矣。知幾此處，悉據《魏書》諸傳，率爾書之，而未詳究其事本末。至於原詔所云：“自浩以下，僮吏以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知幾乃改“僮吏”爲“同作”，尤爲失考。若高允、鄧穎諸人，俱以善終。將何以爲解耶？

齊天保二年，敕祕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陸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斃於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嘗訪諸羣

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爲穢史。至隋開皇，敕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

舜徽案：知幾評論諸史，深惡魏收。《稱謂》、《書志》諸篇，已數數道之。收書之多曲筆，固有無可解免者。然考《北齊書·儒林·刁柔傳》云：“天保初，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魏收撰《魏史》，啓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常所嫌憚。”又云：“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深爲時論所譏。”據此，可知當時同修諸子，皆各有所阿私，不必收一人然也。特收總裁其事，故全書之穢悉歸之耳。至於改修是作，則齊後主武平四年五月，已詔史官更撰《魏書》（見本紀）。又不始於隋開皇時矣。

隋祕書監王劭，內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原注：其序云二十卷，今世間傳者，唯十六卷焉）。

舜徽案：《隋書·王劭傳》，稱劭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而知幾此處，竟不言劭有紀傳之書。蓋劭當日已寫定者，實止編年體之《齊志》。而百卷之書，終未繕成。不然，知幾於王劭素所褒崇，《敘事篇》既稱其長於敘事，無愧古人。《雜說篇》又許其論述戰爭，不減左氏。使其紀傳之書，果已撰有清本，知幾論列齊史源流，不容置而不言。以其書未成，故《隋志》亦未

著錄也。《隋志》著錄《齊志》止十卷，與知幾所云十六卷者復異。

至隋開皇中，祕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略敘紀綱，仍皆牴牾。

舜徽案：知幾於牛弘《周史》，深致不滿，每取與魏收《魏書》並論。《言語篇》云：“收、弘撰《魏》、《周》二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華而失實，過莫大焉。”《浮詞篇》云：“若乃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然則知幾此處所云牴牾，蓋病其書既尚虛文，復多曲筆耳。《隋志》正史類著錄牛弘《周史》十八卷，注云：“未成。”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

舜徽案：王劭《隋書》，本擬《尚書》而作，非當時正史之體也。《隋書·王劭傳》曰：“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無聞。”據此，可知劭書在唐初，已有定評。知幾亦深知其弊短，《六家篇》已言其書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謂爲畫虎不成反類犬矣。且其書之體製，於編年、紀傳，兩無可歸，此處自可置而勿論。

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

事具於上。仍使祕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議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並《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唯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廷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

舜徽案：浦起龍曰：“初閱舊書《職官志》，貞觀年修《五代史》。五代二字殊鶻突（原注：晉、後唐前，唯有南北各四朝無五代之名也）。及閱是篇，翻檢令狐德棻等傳，乃始爽然。蓋其時八史唯南之梁、陳，北之齊、周、隋，是唐修故也。”浦氏此言甚陋。考《昭陵碑錄》卷上，所載《房玄齡碑》有云：“晉、梁、周、齊、陳、隋《六代史》，合三百二十七卷。”《舊唐書·孝友·趙弘智傳》有云：“武德初，授詹事府主簿，又預修《六代史》。”然則當時又有“六代史”之名，蓋連《晉書》計之，本不限於五也。《四庫提要》據知幾此處所言，乃謂當時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本連爲一書。《十志》卽爲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云云。不悟知幾所云：“合爲五代紀傳並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實承上文“魏徵總知其務”而言，謂徵所主修之五代紀傳，共有若干卷耳。非謂通爲一書也。《十志》之所以必通括五代者，由於典章制度，前後相聯。而五代享國短淺，儻各自爲書，則重叠複出，於文爲煩。故當日修五代之史，《紀傳》可分，而《十志》不必分也。

## 外篇（卷六）

### 疑古第三

及左氏之爲《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於世。又孔門之著錄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

舜徽案：《三傳》之爲書，其體不同。《公》、《穀》志在傳經，故說理爲詳；《左氏》例主述事，故紀實較廣。朱子嘗謂《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見《語類》八十三）。如此區分，庶免清混。兩漢崇尚經學，故《公》、《穀》首立博士，二傳所以大行。正賴附經而彰，經固記事之書也。此豈輕事重言之明效乎？至於《家語》由後人偽造，尤不可取與《論語》並論矣。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

舜徽案：堯、舜之事，世遠難稽。非特經傳之言，不免誇飾。卽百家所論，亦多異同。《韓非子·顯學篇》



曰：“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韓非》此論，最爲通核。足箴先秦諸子爭言堯、舜之病。知幾斯篇，首疑經傳。所言堯、舜之美，多過其實，是矣。顧此處乃取證《山海經》、《汲冢書》等不可信之物，輒欲有所論斷，此韓非所謂無參驗而必之者，何足以服學者之心？故知幾以史家而言疑古，是也。其所據以疑之者，則非也（清儒黃本驥《痴學》第七卷《信古錄》，專駁是篇，亦取證不足以服人，且又近於佞古媚古矣）。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

舜徵案：經傳之述古史，多不可信，固矣。若諸子異說，又豈能盡據乎？觀韓非述舜、禹之事曰：“瞽叟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爲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爲義。”（《忠孝篇》）“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外儲說》）則舜、禹之所爲，曾狗彘之不若矣。然而又曰：“堯之王天下，茅茨不剪，采椽不斷。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禹之王天下，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

於此。”（《五蠹篇》）則古之王天下者，憂勞儉苦，復似上聖之所難能矣。一人之書，而前後所言，牴牾至此。良以諸子之書，多屬寓言，好借事以喻其意，而不必實有其事。不足取信，固明甚。

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

舜徽案：上世之事，著之竹帛甚晚。十口相傳，不能無增飾之言。五方殊語，不能無譌變之辭。是以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貢已致其疑。《武成》之“血流漂杵”，《雲漢》之“靡有孑遺”，孟子亦糾其謬。其後《呂覽》有《察傳》之篇，史公有考信之說。至王充《論衡》出，多抨虛妄，論述益廣。若《語增》、《儒增》、《藝增》、《書虛》諸篇，言之甚備。然則疑古之風，孔門實發其端，漢儒已暢其說，其所由來舊矣。《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楊倞注云：“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然則學貴善疑，古有明訓。知幾所論，容有失之偏激，而取證或不可據。固由考證之業，未臻精密，猶多未厭人意。然其識力之銳，發例之周，實為後世史家，開一新徑。降至有清，遂開崔述考信一派。讀書求是之風，超越往代；而古史考證之業，乃成專門。論者不察其得失，遽詆知幾此篇為作俑之始。皆由囿於世俗倭古尊經之見，牢不可破，相與短之，豈通識哉？顧疑古之事，亦非易言。非學博識高，自未容置喙其間。知幾以取證不足服人，而遺後世之譏。更何論於俗

士昏昏？且致疑之中，又當有所別擇。使舉遠古之事，概目爲子虛烏有。則必墮入惡道，無異於自毀其史矣。《朱子語類》有曰：“學者講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語類》卷百廿一）朱子此言，足以發人深省。抑亦疑古者之藥石已！

#### 惑經第四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

舜徽案：伯于陽者何云云，乃《公羊傳》文。何休《解詁》曰：“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寧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氏此解，深得仲尼尊重舊文、不輕改字之意。後之考史及校書者，皆當以此爲法。必絕於意、必、固、我之見，而後可以言考史、言校書也。知幾乃反以不加刊改爲譏，失之遠矣。善夫朱子之言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

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見《大全集》卷三十《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朱子此論，與何休《公羊解詁》義實相發。可知先儒讀書慎重，不輕改易舊文，固漢宋學者所同也。

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出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殫說矣。

舜徽案：仲尼尊重舊文，不輕改字，已具論如前矣。至於《春秋》全書，亦非一無所改。如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彗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公羊傳》云：“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何休《解詁》曰：“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星實如雨，明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據此，可知脩《春秋》時，於修辭用字，固不妨有所潤色。至紀實述事，則不敢苟爲增損，慎之至也。仲尼非特於舊事無所增損，且能存故書之闕文。不逞私意，爲補一字。清儒盧文弨嘗論之曰：“夏五之下，其爲月也無疑矣。而聖人不益者，謂其文或不盡於此也。益之以月，將謂‘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爲五月之事，所書僅

此，無復更疑其上之容有脫文者矣。”（《抱經堂文集》卷八《春秋尊王發微跋》）盧氏此言，實有獲乎古人之心。蓋仲尼傷學者之不善闕疑，嘗慨：“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故於修定魯史之時，不妄增一字，隱然示人以理董舊文之法，意至厚也。知幾以史家尚論古事，乃不知闕文之可貴，殊失之疏。

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爲詳之。

舜徽案：以知幾此言觀之，知《史通》疑古、惑經之所由作，乃遙承王充《論衡》之緒，而續有發明。其後清儒崔述作《考信錄》，復自言推廣《史通》之意而作（詳崔氏《考信錄釋例》）。可知《疑古》、《惑經》二篇，實上紹王充，而下開崔述，一脈相沿，不可掩也。徒以自唐逮清，以科舉取士，代聖賢立言。論人者憚聞周公、孔子之非，說經者懼言《尚書》、《春秋》之失。於此二篇，共相詬病。則亦拘墟之見，未可與語乎通方耳。

### 申左第五

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

舜徽案：孔子嘗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吾欲託之空言，不

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太史公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據此諸論，可知《春秋》之爲書，所重在義。闡明其義者，以《公》、《穀》爲備。《左氏》則述事爲詳，明義爲簡。故漢儒治《左氏》者，若鄭衆、賈逵、服虔之儔，皆引《公》、《穀》之例以釋之。至晉杜預，始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乃謂左氏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見《春秋經傳集解序》）。杜氏此言，實亦有爲而發。蓋以其既爲《左氏》作《注》，又爲《釋例》以明其義。於是《左氏》一書，始離《公》、《穀》而獨立。杜氏深恐後人輕蔑己作，故必推尊《左氏》原書，謂爲姬、孔遺教。揚之已高，意固有在。自唐初撰定《五經正義》，《左氏》始專用杜義。故知幾論及《左氏》，亦但本杜氏一家之言。遽謂筆削發凡，皆得周典，鮮不爲古人所欺矣。要之，《左氏》之可貴，在能備《春秋》之本事。凡所記載，雖不必事事皆實。而在後世欲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遺事者，必徵之於是書。故論其功用，非特與二傳不同，卽與《春秋》亦復異體。蓋《左氏》爲史，《春秋》爲經。《春秋》之義，不存於《左氏》。《左氏》之事，足以考《春秋》。自可相輔而行，不必強合爲一也。

### 點煩第六

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

舜徽案：古人著書，有以朱墨分寫者，不外區別品類，標識古今，使無淆混耳。知幾所舉《本草》、《七錄》二例外，又有用之於製繪輿地圖者。《舊唐書·賈耽傳》，稱耽繪有《隴右山南圖》及《海內華夷圖》，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云云。蓋此法施之製圖，尤爲醒目。由來亦舊，當不自賈耽始也。顧自唐宋以降，雕板術行，而尚無套印之法。故刷墨時，混爲一色。若陶弘景所修《本草》，初本以朱字墨字爲別。《開寶重定序》，所謂“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者也。然據其序所言，當時已以朱字、墨字無本得同爲苦。重定之後，改用黑白文爲別。唐慎微《證類本草》，猶沿其例。而幾經傳刻，又復混淆。清四庫著錄此書，謂當時所得，凡有二本：一與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著錄之本同，黑白之別尚存。一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著錄之本同，則其別不可復覩矣。其明徵也（近世由印刷術日新，故地圖尚可用朱墨並書之法）。至於不施朱墨，而仍求區辨分明，則莫如於著書之時，自注同異。若《隋書·經籍志》，凡《七錄》原有之書而已佚，或未佚而卷帙不同者，皆注明梁有云云，其法最善。又若《說文解字》每部之末，注明文幾、重幾，故後來新附，只得錄在其尾，而不致雜入正文。雖至今日，猶能一覽了然。苟能推此法而擴充之，則自注之例，爲用宏矣。

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煩上。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撫實而談，非是苟誣前哲。

舜徽案：《爾雅·釋器》：“減謂之點。”郭璞注云：“以筆減字爲點。”是古者本有點減冗字之法也。知幾所標點煩之義，謂刪除舊史煩冗之字句，以存其簡要之辭耳。惜其所點爲何，今不可得見矣。顧史家之點煩，猶有大於此者。其着力之處，蓋當於史實之應載與否推求之，而不止於回易數字，加足片言已也。太史公之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殊語”。而點煩之功，卽寓乎其中。漢獻帝以《漢書》文煩難省，命荀悅改編爲三十卷之《漢紀》，此非點煩而何？下逮司馬光之修《通鑑》，先有長編，後始刪爲正本。《唐紀》長編，出范祖禹手。原有六百卷，後竟刪爲八十卷。其點煩之力大矣！朱子嘗稱《南北史》除溫公所採，絕似一部好笑底小說。可知刪煩歸要，本不限於摘句尋章而已。知幾揭櫫點煩之義，蓋欲示人以讀史之法，學者可擴充其意以求之。

### 雜說上第七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

舜徽案：仲尼所云：“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乃比喻之辭，非謂葵果有自衛之智也。猶之後世言人之毀其才以自全者，亦恒言象折其牙，雉毀其尾。豈象雉之智，果知牙與尾之足以取禍乎？特因事連類，託物以爲言耳。諸子百家書中，此類尤多。何可一一責實？知



幾此論，殊失之拘。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案齊密邇海隅，鱗介性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殽。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殽，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爲菲食。著之實錄，以爲格言。非惟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舜徽案：古者惟貴而在位與夫年老之人，乃得食肉。而魚爲賤者少者之食物，初不以地域而異。《左氏》載齊師伐魯，魯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注》云：“肉食，在位者。”孔《疏》云：“大夫以上，乃得食肉。”是惟貴者食肉之證也。《王制》言：“六十非肉不飽。”《孟子》言：“七十可以食肉。”是惟老者食肉之證也。《詩·小雅·無羊篇》：“牧人乃夢，衆惟魚矣。大人占之，衆惟魚矣，實惟豐年。”鄭《箋》云：“魚者，衆人之所以養也。”《孟子》亦言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與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並言。是皆賤者少者食魚之證也。趙盾以晉國重卿，而食魚殽，故勇士歎其儉。此亦情所常有，不足怪也。知幾以爲惟濱海之齊，以魚爲賤。而不達於古代習尚，所在皆然。乃謂《公羊》所記，爲乖於物理，失之遠矣。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史公

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若以古方今，則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爲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

舜徽案：司馬氏世司典籍，自言：“天下遠聞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自序》）又謂：“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報任安書》）則當日撰述之初，凡所馮依，已極廣博。又況浮江淮，涉汶泗，至空峒，過涿鹿，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訪古探奇，考證遺軼，其所搜羅尤富，又非書卷所能範圍。班彪嘗謂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見《後漢書·班彪傳》）。此則立論有準，較爲平實。蓋以一人之身，整齊其事。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容有失之疏略牴牾者。殆亦力有未周，勢所難免。此在後世，何可苛責前人？知幾乃取唐修《晉書》之蕪雜，以況《史記》，已爲比擬不倫。未又評斷其書，甚爲膚淺，無乃詆斥太刻矣！自知幾有斯論，至宋鄭樵從而和之曰：“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通志總序》）此亦自逞筆鋒，以快一時之意。固未足視爲定論耳。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行於講

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舜徽案：趙岐《孟子題辭》曰：“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據此，可知《論語》在漢初，已與《五經》並重。而孔子一生言行，多在其中，故學者尤尊信之。觀史公嘗言：“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孔子世家》）又謂其：“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太史公自序》）則其推尊仲尼至矣。故特列之《世家》，而不與諸子齒，意固有在。史公多採《論語》舊說以撰《孔子世家》，適所以表章儒學也。若謂其書既行於講肆，列於學官，爲學者所習知，不合采以入史。則《尚書》、《春秋》，亦早置博士，日在人間，史公掇取其辭，分載本記、世家，學者奚爲不病其煩費耶？至於百家之言，叢雜猥多，非可盡取。故史公論列諸子，但敘其行事以爲之傳，又不第管、晏爲然。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迹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舜徽案：“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與前後所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臚脚，兵法脩列。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語意相近，比列並論。皆以喻昔人身廢書行之意，非謂身廢乃始著書也。誠如知幾此解，則必謂左丘失明之後，乃成《國語》；孫子臚脚之後，始脩《兵法》；韓非囚秦之後，方有撰述；均與事實不符矣。《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曰：“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據此，可知韓非著書在前，入秦在後。他書之成，皆可類推。知幾於此等處，不細繹古人辭意，而着重推敲。無異於吹毛索癢，已不免舍本逐末。全書中此例甚多，又未暇一二數也。

### 雜說中第八

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迹；令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僞。知而故爲，罪之甚者。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敍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擇其瑕疵。僞迹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舜徽案：《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淮南·齊俗篇》亦曰：“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

不以爲民俗。”觀此諸論，可以得論人述事之要。故許由、務光之行，信超絕矣，而不見稱於孔、孟；屈原、嚴光之事，信清遠矣，而不見載於《通鑑》。昔人取舍權衡，要必自有其故。史之不宜廣記詭異，由來舊矣。至於《高士傳》、《搜神記》之流，例同小說，自當別論。若臨川《世說》，昔人雖列之子部小說家，而實爲記事之作。乃乙部之支流，諸史之羽翼。得劉孝標爲之注，闕者補之，誤者訂之。或闡述其理，或疏論其事。而《世說》之用益宏。唐修《晉書》，采掇過多，容有失於甄別者。若謂一無可取，不當以入史，則非也。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觀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儋，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此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毗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弘益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牆於近

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舜徽案：浦起龍曰：“知幾論史，黜飾崇真，偏於里音。不惜紙費，可云有質癖矣。”浦氏此言，似矣；而不盡然也。知幾果黜飾崇真，獨奈何詆《公羊》言多鄙野乎？三傳中，以《公羊》所存方言爲夥。《顏氏家訓·音辭篇》所謂：“《春秋》標齊言之傳”，是也。其後王應麟，嘗舉“登來”之類，凡十三例，載《困學紀聞》卷七。閻若璩諸人，又剽取王氏所未及者以益之。其文皆見《公羊傳》中，而何休《解詁》並訓爲齊人語，皆當日之質言也。知幾於《申左篇》，既詆《公羊》：“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雜說上篇》，又稱《左氏》：“腴辭潤簡牘，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此皆非黜飾崇真之言也。大抵知幾內存成見，故語無定準。舉之可使上天，按之欲令入地。論春秋三傳，則崇《左氏》而貶《公》、《穀》；評六代諸史，則美王劭而斥魏收。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但馮愛憎，豈盡公平？自是通人一蔽。

### 雜說下第九

夫自古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又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

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爲？”其斯之謂也。

舜徽案：知幾此論，最爲通達！前段揭但專不博之弊，後段明徒博無識之害。箴育起廢，信乎其不易矣。自漢儒承秦火之餘，抱殘守缺，各治一經。不合不公，道術乃裂。見之《史》、《漢》儒林傳者，皆經師也。王充《論衡》有曰：“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別通篇》）又曰：“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超奇篇》）王氏此言，有爲而發；實所以救當時專固之失耳。魏晉以降，學者又推治經之法，以專精一史。而《漢書》之學，尤盛於梁、陳、隋、唐。《隋書·儒林傳》，稱其時：“《漢書》學者，以蕭該、包愷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舊唐書·儒林傳》又稱：“秦景通與其弟暉，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稱景通爲大秦君，暉爲小秦君。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采也。”然則唐初專史之學，又不亞於漢人之專經。及其末流所屆，必使古今隔閡，莫由觀其會通。知幾此論，蓋亦有其放矢矣。夫道術本廣，史實尤繁。說經者專守一家，則無以窺義理之純；治史者但明一代，則無以總古今之要。故學必期乎通貫，方足以言致用。至於有學無識，則難底於大成。如知幾所譏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者，徒以書簞見稱，固無以易其鄙陋也。歷觀自古儒士，成就之大小，實決於識解之高下。惟有卓識者，爲能致廣大而盡精微。學之淺深，又其次也。故知幾論史，揭鑒三長，而識爲尤要。此處末段所云，可

以窺其旨趣。

###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案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舜徽案：“史記”二字，在漢世本為古代史籍之通稱。太史公之書，不名史記。余已詳辨於《六家篇平議》中矣。《漢書·藝文志》，但著錄《太史公》百三十篇。知班氏本不以“史記”二字名史公之書也。《五行志》中所稱史記，猶云古史記載耳。知幾不達斯旨，遽據後起之標題，以駁古人之別有取義。是豈作者所及知乎？浦起龍《通釋》乃謂：“《史記》成公以下十三字，為班《志》自撰之文，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也。”則亦誤矣。

### 漢書·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舜徽案：知幾素主史志之中，刪去《五行》。以為：“每敍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又謂：“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老生常談，徒煩翰墨。”持論甚通，其識甚卓。《書志篇》既已暢發斯旨矣。揆以此義，則駁訂《五行志》之文，皆可不作。上篇與此篇，雖辨



證極詳，力駁董、劉諸家之說。然居千載之後，推究災祥，亦何由知己之所見必是，而古人之所見全非？《書志篇》論及五行，嘗引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以結其尾。陳義甚正！獨奈何此二篇之中，斤斤爭辨，強聒不舍耶？

## 暗惑第十二

舜徽案：此篇意在求真，以訂傳說之失。實仍自王充《論衡》語增、儒增、藝增、書虛諸篇，引申而出。訂古書記載之謬，卽所以立後世撰述之準。故篇尾結以“凡爲國史，可不慎諸”二語。尤見語重心長！知幾此書議論，多爲修史而發，又不第本篇然也。顧篇中所言，亦有失之臆斷者。如《史記》所載瞽叟使舜穿井，有若狀似孔子二事，最初見于《孟子》。雖所述不如《史記》之詳，然安知司馬遷之時，不別有所據乎？此考訂之事，所以貴乎有實證也。知幾論證舊事，多以推理明之，此最不足以服人處。雖然，自王充以後，敢於掎摭前人，力抨虛妄。遙遙千載，纔見此君。雖論斷未必盡是，而識解固有過人處，故其言卒不可廢。

## 忤時第十三

舜徽案：此篇知幾自道其志行，實《自敘》一篇之補述。而所載《與蕭至忠書》，斥設館修史之有五不可，又與《辨職篇》相表裏。余既申述其旨於《辨職篇平議》中矣。知幾揭櫫隋唐以來官修諸史之弊，昭若發蒙。下迄明清，莫由釐革。史家如萬斯同，嘗亟論其事

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有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區馮；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料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語載錢大昕《潛研堂文集·萬先生傳》）萬氏斯論，深中肯綮。而潘耒言修史之要，則曰：“搜訪欲博，考證欲精，職任欲分，義例欲一，秉筆欲直，持論欲平，歲月欲寬，卷帙欲簡。”（見《遂初堂文集》卷五《修明史議》）此蓋懲於舊史之失，而翻然思有以釐革於其間者。惟清初諸儒，慎圖之於經始，故《明史》修成，較歷代官修諸書均爲翔實。其能力法積弊，稍勝前人，要亦知幾斯論有以啓之。

## 通志總序平議小序

二千年間，論史才之雄偉，繼司馬遷而起者，則有鄭樵，雖其所修《通志》，未能臻於預期之完善，要不可以成敗論得失也。鄭氏論史要義，多在《通志總序》。讀其文，可以想見其爲人，固卓犖不羣，千古振奇士也。雖持論不免失之偏激，然而志量弘遠矣。固非一曲之士所能測其淺深也。余籀繹是篇，略有箋記，顏曰《通志總序平議》，期與及門諸子詳之。初但記于書眉，近乃彙錄成爲一卷。

張舜徽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五日

## 通志總序平議

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

舜徽按：鄭氏志在“集天下之書爲一書”，通貫古今，纂述通史。名曰《通志》，志卽古史之異名也。故總序開端，卽揭櫫會通之義。觀其《上宰相書》有曰：“水不會於海，則爲溢水；途不通於夏，則爲窮途。”又謂“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之書。散落人間，靡所底定，安得爲成書？”取彼證此，益足以明會通二字施之著述之意。

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前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按：此乃沿孔子刪《詩》、《書》，訂《禮》、《樂》

之舊說，而歸其功於一人也。不悟仲尼未生，已有《詩》、《書》、《禮》、《樂》，仲尼自道，但云述而不作。後人必謂經籍出于聖手，是猶言八卦者，必推本於伏羲；言本草者，必溯原於神農；皆荒遠不稽之辭耳。鄭氏大張會通之義，必上援古人以自重，故不得不引仲尼之事以佐證說。此與《上宰相書》所云：“仲尼之爲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書而爲一。舉而推之，上通於堯、舜，旁通於秦、魯，使天下無遺書，三代無絕緒，然後爲成書。”可知其推尊仲尼，意固有在。所以明己之編述通史，乃上承聖緒，不得已而作。

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紀繫。

按：仲尼未生，已有立言之書。百家之興，非在其後。其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者，惟儒家思、孟之流耳。其他諸子之書，多由後人輯述，非取法《論語》者也。周末列國分爭，各有其史以紀實迹。迨秦焚書，明令非《秦紀》皆燒之，則六國之史俱燼，可知列國非無紀實之書，特不傳於後耳。

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

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

按：《太史公》百三十篇，開紀傳史體之先。將漢武帝以前社會變化及自然變化，皆總結以成一書，遂爲通史之前驅。鄭氏編述之業，實規倣之，故推尊此書甚至。揆之情實，無溢美也。王鳴盛嘗謂：“司馬遷創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體例，後之作史者，遞相祖述，莫能出其範圍。”（見《十七史商榷》卷一）卽鄭氏所云“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也。然自班固以降，斷代爲書，具體而微。未有能繼司馬氏之志以續修通史者。千載之下，惟鄭氏私淑龍門，引爲己任。故於史公之書，服膺尤至。

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

按：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已謂文帝時“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廣立學官，爲置博士”。而《七略》亦稱：“武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見《文選注》引）可知漢初崇文，圖書大備。史遷著書之時，所可馮依者爲不少矣。遷亦自謂：“天下遺聞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又謂：“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報任安書》）可知其見書之廣，搜采之勤，又非常人比矣。鄭氏承班彪、班固父子遺論（見《漢書·司馬遷傳贊》及《後漢書·班彪傳》），謂史遷踟躕於七八種書，此乃輕

率之辭，非其實也。今觀太史公書中所引若《謀記》、《歷術》、《甲子篇》、《禹本紀》、《秦紀》之屬，叢雜猥多，其未稱引者尤夥。至於游覽四方，實地考察，得之於耳聞目見者，又非書本所能限矣。鄭氏乃謂史公取材，未足言博，夫豈其然！

凡著書者，雖采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采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

按：《太史公自序》已云：“成一家之言。”嘗操此以衡其書，實亦能副所言。蓋從其全書之結構言，有完整周密之體系；從編述內容言，有翦裁鎔鑄之能力；從寫作形式言，有推陳出新之筆調。使來自不同時間與不同空間之材料，一變而爲用漢代語言文字撰成之新書。此乃司馬遷絕大本領，亦即所謂“成一家之言”也。所責乎有編述之業者以此耳。《漢書·藝文志》論《尚書》有曰：“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爾雅》者，故訓也。蓋惟古文《尚書》多古字古言，必貫通故訓，以今語解古語，而後能通其意。《太史公》所采《尚書》，率以訓詁代經文，猶今日之翻譯。在當時固盡人能知，至今日猶淺明易了，爲功於天下後世甚大。今觀《太史公》所采《尚書》文字，如《五帝本紀》之用《堯典》，《夏本紀》之用《禹貢》、《咎繇謨》，《殷本紀》之用《湯誓》、《高宗彤日》、《錢耆》，《周本

紀》之用《牧誓》、《甫刑》，《周公世家》之用《金縢》、《毋逸》、《多士》、《盼誓》，《燕世家》之用《君奭》，《衛康叔世家》之用《康誥》，《微子世家》之用《微子之命》、《鴻範》，《晉世家》之用《文侯之命》，莫不代奇辭以淺語，易古文爲今字。其於《左傳》、《國語》、《禮記》、《論語》之屬，靡不皆然。盡取前人之書，施以翦裁鎔鑄，並翻譯爲淺明易懂之文字，其不可沒之功在是也。至於取材之際，亦復慎於別擇，於荒遠無稽之事，去取尤嚴。所謂“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五帝本紀贊》）則其於俚俗傳言，多所屏棄矣。遷作《刺客列傳》，如“天雨粟，馬生角”之說，及“荊軻傷秦王”之事，皆以爲太過或不符於實而不之取（見《刺客傳贊》）。則其筆削之功，亦豈可泯！鄭氏謂史公著書，未足言雅，亦失之輕率矣。

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

按：《史記》會通古今，故最爲鄭氏所推重。班氏斷代爲書，不見會通之義，故鄭氏貶抑之無所不至。有所立必有所破，亦各言其志耳。下文醜詆班固之辭，有爲而發，皆未足視爲定評。

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



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儻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

按：班固家世淵源，學有根柢。《後漢書》本傳稱其“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而承制作《白虎通義》，撰集衆師經說，是豈浮華無學之人所能爲？肅宗問改定制禮之宜，固但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事見《後漢書·曹褒傳》）亦博采羣言、集思廣益之意。夫豈不能對答而爲此推卸之辭哉？至于重崔駰而輕班固，乃人主一時愛憎之言（事見《後漢書·崔駰傳》），抑亦非當時之公論也。

《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斜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

按：《漢書》斷代爲史，而有《古今人表》，宜爲後世所譏。如張晏、劉知幾、呂祖謙、羅泌、楊慎之流，皆糾彈之。知幾嘗謂“《人表》上有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史通·表歷》）。以爲斷限不明，自亂其例。與鄭氏所指責者，足以相發也。然而如顏師古、黃履翁、何焯、錢大昕、章學誠、梁玉繩諸家，則又稱許其體。學誠嘗謂“固以斷代爲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事蹟，但畫

西京爲界也。向令其去九等高下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其標題，且明著其說，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爲後世通史一定科律”（《亳州志·掌故例議上》）。章說甚通，足解諸家之惑。惟鄭氏所訾“彊立差等”，實中其病，故學識亦謂宜“去其九等高下之名”耳。

班氏自尊本朝，據載籍以祖帝堯。故《漢書敘傳》曰：“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此乃承其父彪《王命論》“劉氏承堯之祚，唐據火德而漢紹之”之餘論耳。不悟《史記》通古今爲一書，唐堯之後，累世相承，以至於秦，項羽起於秦末，誅項以定天下者爲漢高，統緒相因，自應如此。誠如班氏之論，將置百王秦、項不載，直以漢承唐耶？斯則鄭氏之所以斥班者不爲過。

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耻。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

按：《史通·正史篇》曰：“《史記》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

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敍。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則《漢書》之成，多資衆力。王充《論衡·別通篇》又謂：“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絕。”然則大儒賈逵，亦嘗躬與其事。鄭氏所言“資於賈逵、劉歆”者不誣也。

鄭氏詆譏班固“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其言非也。蓋編述之業，重在義例，本不以因襲前文爲病。前乎班《書》者，若《太史公》百三十篇所采，自《六經》外，旁逮《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之類，至爲繁夥。盡取前人之書，施以翦裁鎔鑄，成一家言。良以編述之書，與立言垂訓者殊途，苟義例精善，原不嫌於因襲。鄭氏徒責班固多竊遷書，而不知太史公之取《尚書》以撰五帝三王本紀，取《左傳》以撰列國《世家》，取《論語》以撰《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傳》，得謂之非因襲舊文，可乎？下觀鄭氏所爲《通志》，紀傳多用諸史，禮制半遵杜氏，必如其說，將亦何以自解乎。

後世衆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

按：自唐以後，設館修史，率於開國之初，撰集前

朝之事。既斷代爲書，勢不得不沿班例。歷代相因，遂成定式。劉知幾意主斷代，故論及《漢書》，謂其“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史通·六家》）。與鄭氏所主不同，宜其持論異也。

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闡奧矣。

按：《後漢書·班彪傳》曰：“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而《論衡·超奇篇》稱“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史通·正史篇》復稱“司徒掾班彪作《後傳》六十五篇”；雖所言篇數不同，要以《史通》之說近是。其大部固存於今《漢書》中，惟不易區辨耳。鄭氏謂所可見者，惟元、成二帝《贊》，蓋以《贊》中所云“臣外祖兄弟”，“臣之姑”，皆班彪自稱之辭耳。其實此外尚有韋賢、翟方進、元后三《傳》，其文皆有“司徒掾班彪曰”六字，視元、成二帝《贊》尤爲昭顯。顧三《傳》之《贊》，未能於本傳之外，“別記所聞”，故鄭氏不之及耳。

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

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按：《左傳》之稱“君子曰”，未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未必盡史之外事；要不可一概論也。至於“太史公曰”而寓褒貶者，悉目爲褚少孫所加，尤嫌武斷矣。《史通·論贊篇》謂篇有一論，自司馬遷始。雖理有非要，猶強生其文。是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不知史書之大體。鄭氏之論，蓋本於劉而暢發之。惟寬於史遷，而劇論班固，不免以好惡定是非矣。雖然，史學重在事實，不尚以空言立論，則固不易之理也。

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

按：鄭氏才高氣盛，論人論事，每好騁議論以抑揚之，故評騭多失其準。班固事實憲，爲中護軍。及憲敗，固坐免官，死獄中。范曄作《後漢書》，宋元嘉時，以謀反誅（陳澧有《申范》一篇，事得昭雪）。斯並禍非由己，何損撰述。必如鄭氏所論，則司馬遷下蠶室，受腐刑，罪辱已甚，又安得謂爲“《六經》之後，惟有此作”耶？至於班固諸子不遵法度，爲吏所苦；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和藥，爲時所譏；此又家規未肅、飭行

不謹之所致。古今類此者多，何獨班、陳爲然。若必因此而輕其書，則天壤間寧復有可傳之作耶？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爲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淩、諸葛誕、毋邱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泉。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

按：鄭氏大張相因之義，力主會通古今以成一史。故於斷代爲書之弊，概括數端：紀傳重復，一也；前後隔絕，二也；異則相攻，三也；同則相與，四也。甚至是非顛倒，莫辨賢奸。奴爲主言，無足怪者。誠欲振救其弊，惟通史足以矯之。故章學誠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復，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文史通義·釋通》）六便之中，

以免重複爲最要。故章氏又曰：“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無徵，新王興瑞，卽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卽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爲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復也。《通志》總合爲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同上）章氏斯論，實亦由鄭氏“豈勝繁文”之指引申而出。

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

按：《文史通義·釋通篇》曰：“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爲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包羅衆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蓋自梁武帝時，吾國學術史上，始有“通史”之名。武帝嘗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梁書·蕭子顯傳》）可知“通史”二字，實武帝所命名也。考《梁書·吳均傳》：“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畢，惟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又《武帝紀》：“太清二年《通史》成，躬製《贊》、《序》，凡六百卷。”據此，則均奉敕撰述之書雖未完成，然續其事者，竟於均卒後二十八年，終畢其役。故《隋書·經籍志》題曰梁武帝撰也。《史通·六家篇》稱：“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

及拓跋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至其卷數，《梁書》作六百卷，《史通》云六百二十卷，《隋志》則云四百八十卷。徒以卷帙浩繁，傳寫不易，其時蓋惟館閣僅有其書，外間不得而見。遭值變亂，書遂散亡。故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竟未成。事載《陳書·陸瓊傳》、《南史·陸繕傳》。良以茲事體大，不易爲力耳。

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饗殮，專鼓脣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按：此所指斥者，乃歐陽修《五代史記》也。李方叔《師友談記》謂修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文獻通考》百九十二引）。修亦自言：“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直齋書錄解題》引）以其處處模倣《春秋》義法，以一字寓褒貶。有時模倣太過，甚至文理有不通處。錢大昕云：“歐陽公《五代史》，自謂竊取《春秋》之義，然其病正在乎學《春秋》。如唐《廢帝紀》，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案《春秋》‘衛人立晉’，晉者，公子晉也；立者，立其人也。此紀石敬瑭事，當云：‘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方合史例。今乃襲用‘立晉’之文，此《史通》所譏貌同而心異者也。”（《十駕齋養新錄》卷六）此種指責，切中其病痛。歐陽修撰



《五代史》，復與宋祁修《唐書》列傳相似，喜用散文改造唐代駢文。有時用字造句，至晦澀而不可通。亦即鄭氏所云“徒相尚於言語”之過也。後于鄭氏而以《春秋》書法寓褒貶之意修史者，則有朱熹之《通鑒綱目》。鄭雖不及見之，而已逆觀其弊矣。大抵文章之士，理學之儒，皆不能與修史之役。歐陽雖以文章名于北宋，而道學意味甚濃，敘述五代史實，慨歎世情，纏綿反覆，幾乎每篇皆用“嗚呼”二字發端，尤人所厭苦也。

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人，皆能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

按：非特作表、志難，讀表、志亦難。良以志之爲書，事必稽古，辭必數典，非可以空言立論。表之爲體，旁行斜上，非經緯分明，無以見意。是以《後漢書》、《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北史》，皆但有紀、傳而無表、志；《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新舊《五代史》，則但有志而無表；宜鄭氏言之有餘慨也。讀史者亦貪紀、傳易於理解，而畏表、志難於爬梳。故每讀一史，紀、傳幾可成誦，而表、志多未寓目。甚者徒歎慕紀、傳文辭之美，流於爲學文而讀史，離乎史學固已遠矣。

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

之義。

按：《爾雅》之爲書，首三篇專釋故訓。自《釋親》以下十六篇，則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遠而天地山川，近而宮室器用，庶物畢載，人事悉顯。總括萬殊，而皆以類相從，因物爲號，蓋類書之始也。鄭氏謂志之大原起於《爾雅》，是已。劉知幾謂“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史通·書志》）。章學誠亦言“書、志之原，蓋出官禮”（《亳州志·掌故例議上》）。揆之其實，皆不然也。《三禮》之爲書，《周禮》爲官名總簿，《儀禮》乃繁文綜錄，《禮記》則論說之文耳。史部書、志，究何所承乎？故知鄭言爲不可廢。鄭氏又嘗品次歷代史志高下曰：“《隋志》極有倫類。而本末兼明，惟《晉志》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爲班固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通志·藝文略》）此所評彈，亦卽“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之意。

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

按：二十略，卽《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諡》、《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等二十門類，

共五十二卷。《氏族略》標題下按語有云：“諸史通謂之‘志’。然‘志’者，古史之名。今改曰‘略’，‘略’者，舉其大綱。”此鄭氏命名之義也。二十略中，惟《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五略，多本前人，故曰：漢唐諸儒所得而聞。《氏族》等十五略，出自新創，故曰：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然如《天文》、《地理》、《藝文》、《災祥》之屬，亦多馮依舊史。至於取《六書》、《七音》、《昆蟲草木》等以入史志，則自鄭氏始耳。

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並六國，姓氏混而爲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諡、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而聞，故作《氏族略》。

按：鄭氏推尋氏族演變之迹，歸納爲三十二類。卽以國爲氏（如唐、虞、夏、商、魯、晉、宋、蔡），以邑爲氏（如蘇、毛、樊、單、崔、盧、鮑、晏），以鄉爲氏（如裴、陸、龐、閻），以亭爲氏（如麋、采、歐陽），以地爲氏（如傅、蒙、嵇、勞），以姓爲氏（如姚、姜、姬、嬴），以字爲氏（如林、方、吉、施），以名爲氏（如伏、宓、金、青），以次爲氏（如孟、仲、叔、季），以族爲氏（如昭、繁、左、景），以官爲氏（如史、席、師、錢），以爵爲氏（如皇、王、公、侯），以凶德爲氏（如莽、聞、兀、黥），以吉德爲氏（如老成、考成），以技爲氏（如巫、屠、陶、卜），以事爲氏

(如兒、車、蒲、苻)，以諡爲氏(如莊、武、桓、文)，以爵系爲氏(如王孫、公孫)，以國系爲氏(如滕、叔、蔡、仲)，以族系爲氏(如叔孫、季孫)，以名氏爲氏(如士丐、士蔦)，以國爵爲氏(如夏侯、息夫)，以邑系爲氏(如原伯、申叔)，以官名爲氏(如師、宜、尹、午)，以邑諡爲氏(如臧、文、丁、若)，以諡氏爲氏(如共叔、尹文)，以爵諡爲氏(如成公、成王)，代北復姓(如長孫、獨孤)，關西復姓(如莫折、夫蒙)，諸方復姓(如夫餘、鳩摩)，代北三字姓(如侯莫陳)，代北四字姓(如自死獨膊)，是已。依類以求，綜錄頗備，前此所未有也。然上溯之漢人書中，如《風俗通·氏姓篇》，已言“或氏於號，或氏於諡，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太平御覽》卷三六二引)。則於左氏所言五者之外，早有補充，鄭氏特沿舊說而益推廣之耳。

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子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爲武，不識諧聲；反正爲乏，又昧象形。《左氏》既不別其源，後人何能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蠡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

按：鄭氏解說六書，不必盡是。而辨析獨體爲文，合體爲字，與夫象形、指事之別，則甚明白。《六書略》中如謂形可象者曰象形，非形不可象者，指其事曰指事。又分象形爲十種：有天地之形，有山川之形，有井

邑之形，有艸木之形，有人物之形，有鳥獸之形，有蟲魚之形，有鬼物之形，有器用之形，有服飾之形。卽此分別門類，已足啓示後人研究文字之法。王筠《說文釋例》與《文字蒙求》，分析象形、指事最爲清晰，實多得之鄭氏。

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成緯。皇韻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爲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爲主，耳學以子爲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間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

按：四聲，謂平上去入；七音，謂宮（喉音）商（齒頭、正齒）角（牙音）徵（舌頭、舌上）羽（重唇、輕唇）半徵（半舌）半商（半齒）也。四聲者，疊韻之事；七音者，雙聲之事。聲韻合而成音，所謂天籟之本，自成經緯也。有疊韻而後人因有二百六部，有雙聲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雙聲之理，關繫于造字用字之理爲尤弘。故鄭氏於《六書略》之後，繼之以《七音略》。

天文之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爲《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

按：舊傳丹元子《步天歌》，依三垣、二十八宿躔次位列，綴成七字爲句之歌括。學者默誦歌辭，即可仰

觀天象。誠如鄭氏所云：“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胸中。”（《天文略序》）故昔人重之，非偶然也（《史記·天官書》）。多用甘、石《星經》。阮孝緒《七錄》云：“甘公，楚人，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作《天文》八卷。”（《史記正義》引）然不見於《漢志》，故論者疑世所傳《星經》，乃後人偽託晉隋二《志》之文成之。辭旨淺近，非先秦書（錢大昕有此說）。鄭氏棄而不取，可謂有識。

地理之家，在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理》，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變遷，方隅顛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爲之創始，致此一家俱成謬舉。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

按：鄭氏言地理，主於山川。以爲“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地理略序》）。其說是也。《漢書·地理志》雖以郡國爲主，然其“考迹《詩》《書》，推表山川”（《地理志》中語）；“略表山川，彰其剖判”（《敘傳》中語）；亦何嘗專言郡國？鄭氏蓋以後世志地理者，專言郡國，列出於班，故不得不劇論固耳。

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艱考。臣上稽三皇五

帝之形勢，遠探四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爲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爲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

按：《史通·書志篇》謂正史之中，都邑可以爲志。此議創始於劉，而鄭氏因之作《都邑略》。蓋歷代建都之地，爲政治文化中心，苟有專篇紀之，自可覘一時之盛衰，考百王之因革。古無今有，亦其宜也。

諡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諡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於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諡太王、王季、文王，此諡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僞作周公諡法，欲以生前之善惡，爲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諡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爲皇顓制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諡略》。

按：古書之言諡法者，莫早於《逸周書·諡法解》。其文有曰：“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於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諡。諡者，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逸周書》第五十四）鄭氏言後世僞作周公《諡法》，殆卽指此。如其中所謂“壅遏不通曰幽，殺戮無辜曰厲，辟土服遠曰桓，亂而不損曰靈”，卽鄭氏所云“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諡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者也。言諡之書，至北宋時，蘇洵

撰《皇祐諡法》而集其大成。鄭氏原就蘇書增損，得二百十諡以著於篇。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如《諡法》所謂“施而中理曰文，經緯天地曰文”，鄭則削去引辭，但錄“文”字；所謂“克定禍亂曰武，保大定功曰武”，鄭則削去引辭，但錄“武”字。如此之類，明白易曉，亦條舉大綱之意。

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於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形制既乖，豈便歆享。夫制器尚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壺，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雞鳳。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頂及背，以出內酒。惟劉杳能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爲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

按：古者壺彝尊爵之類，用之生人，爲飲食之器；用之死者，則爲祭器。祭器敝，則葬之；亦有用爲明器以陪葬者；故祭器出土於地下者爲最廣。劉杳事，見《梁書·文學傳》。其文云：“劉杳，字士深，平原人。少好學，博綜遺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劉杳依據出土實物，竟駁倒漢代經師之臆說曲解，可謂有識，故鄭氏亟稱道之。惟此《略》亦



兼及冠冕、首飾、服章、車輅、旌旗、鹵簿之屬，故總名《器服》，而所該甚廣。此序但言祭器，不及其他，殊嫌疏略耳。

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爲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爲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魚麗》之三，笙間《崇邱》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者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爲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爲此也。今取篇目以爲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也，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卽文舞，武卽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猶傳於後世。良由有節而無辭，不爲義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

按：《墨子·公孟篇》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而《漢書·食貨志》亦稱：“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然則古詩無不入樂者矣。此卽鄭氏之說所本也。顧《禮記·王制》曰：“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是詩之與樂，仍有不同者在。蓋以聲音干戚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教人，是詩教也（義本《禮記·經解》孔《疏》）。觀於孔子言《詩》，既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皆言其義也。故以義言《詩》，不自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始矣。故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史則著以爲異（詳《漢書·藝文志》）。世在樂官而不能言其義者，卽《荀子》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父子相傳，以侍王公”者也。降至漢末，卽謹守其數者亦已不多。《晉書·樂志》曰：“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迨晉泰始五年，中書監荀勖，又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古樂始亡。並見《晉志》，卽鄭氏所本。

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詁訓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

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符籙，有吐納內丹，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渾爲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炙，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而渾爲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

按：《隋書·經籍志·簿錄類論》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此言簿錄羣書，必賴有序釋而後可考鏡得失也。然書目之體，亦有三途。自向、歆《錄》、《略》，下逮荀勗、王亮臣等，皆因校書而敍目錄，此朝廷官簿也。班氏刪《七略》以入《漢書》，爲《藝文志》，歷代史志因之，此史家著錄也。若晁、陳之總錄家藏，各歸部類，則私家之書目耳。三者義例雖近，而爲用殊。班氏修《藝文志》時，所以毅然刪去《七略》解題而不顧者，誠以史之爲書，包羅甚廣，《藝文》特其一篇，勢不得不翦汰煩辭，但記書名而已（《漢志》著錄之書，多於《七略》，而爲書祇一卷。《隋志》載《七略》單本，爲書七卷。可知其書名之下，皆有簡略解題以釋之）。若夫朝廷官簿與私家目錄，意在條別源流，考正得失。其所營爲，既爲專門之事；其所論述，則成專門之書。考釋務致其詳，亦勢所能爲。劉、班二家編目之職志既有不同，則體制亦無由強合。鄭氏深明修史之不同於他書，故獨遵班例，不爲序釋，其識已卓。論者或援《隋志》之言以詆斥之，非也。

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讎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讎略》。

按：校讎之名，雖昉於劉向校書之時。而其成為專門之學，則實始鄭氏。鄭氏此《略》雖簡，舉凡儒學之興廢，編次之類例，書籍之存亡，求書之方法，則言之甚悉。雖然，前賢造端，亦僅發凡而已。至於揚推利弊，剖析以窮根原，固仍有待於後人之補苴也。愚不揣樸昧，嘗廣其體，續有論述。乃就著書、序書、注書、引書之流別得失，以及簿錄體例、部類分合，旁涉搜輯佚書，審定贗品，復綜論二千年來儒學大小淺深之故，都為百篇，命曰《廣校讎略》。自知無裨弘深，亦聊述所聞，以與學者共討論之耳。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即其書為《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而隳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今立為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

按：圖書二字連稱，則圖與書宜並重。鄭氏亟言圖之為用甚弘，其識甚卓。《圖譜略·明用篇》有曰：“今總天下之書，古今之學術，而條其所以為圖譜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宮室，四曰器用，五曰車旂，六曰衣裳，七曰壇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築，

十曰田里，十一曰會計，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名物，十六曰書。凡此十六類，有書無圖，不可用也。”此言可謂概括得要矣。後世治水道者，爲《水經注圖》；治禮經者，爲《羣經宮室圖》；治器物者，爲《考工記圖》；而《本草綱目》尤以圖多取勝，皆鄭氏此論有以啓之。

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

按：金石考證，雖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已發其端，而綜錄歷代金石之目，列入史志，與藝文並重，則固自鄭氏始也。徒以此《略》僅史志之一篇，不可過長以豐卷帙，故但錄其目，而不可一一爲之考釋。此又與《藝文略》之但錄書名，爲例正同。清乾嘉時，王昶推廣其體，纂成《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綜錄歷代金石文字，臨摹原物，考釋詳明。其所營爲，既屬專門之事；其所論述，則成專門之書。考釋不厭其詳，亦勢所能爲。固未可執後起詳贍之編，以上議鄭氏《金石略》之簡也。

《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子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

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爲此說，本於《春秋》牽合附會。後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

按：鄭氏直詆《洪範五行傳》爲巫瞽之學，又指斥五行之謬妄，可謂有識！《漢書·五行志》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氣相傷謂之沴。沴，言臨莅不如意也。”鄭氏所云“一蟲之妖，一物之戾”，卽《志》中所謂妖孽兩類。鄭氏因摘舉漢儒說《春秋》災異之無當以深斥之。若《春秋》昭公二十五年書鸛鵒來巢，《志》以爲木沴金。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志》以爲金沴木。皆其事也。至於晉厲公視遠步高，單襄公謂晉將有亂，見成公十六年《左傳》；單子視下言徐，叔向謂其將死，見昭公十一年《左傳》；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衣之偏衣，狐突諸人謂虜涼冬殺，命可知也，見閔公二年《左傳》；鄭子臧好聚鵠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見僖公二十四年《左傳》。《志》則以爲貌之不恭，時則有服妖，唯金沴水。此皆牽合附會，以欺天下，鄭氏以作俑之罪，歸諸董仲舒，可謂擒賊得其王矣。自王充、應劭不信五行，至劉知幾抨擊尤烈，皆昔人之不受籠罩者。鄭氏益大聲疾呼以攻其謬妄，有裨於明學正俗尤大也。

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

按：《昆蟲草木略》云：“臣結茅夾漈山中，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爲之會同。”又云：“物之難明，爲名之難明。名之難明，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是以此書尤詳其名焉。”此種實際考察研究之精神，信非死守書本之儒生所能及。其以昆蟲草木錄入史志，又前此所未有也。

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

按：《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五略，前文皆未序及之。至謂“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則有不盡然者。馬端臨嘗論之曰：“禮及職官、選舉、刑法、食貨五者，古今經制甚繁，沿革不一。故杜岐公《通典》，五者居十之八。然杜公生貞元間，故其所記述，止於唐天寶。今《通志》既自爲一書，則天寶而後，宋中興以前，皆合陸續銓次，如班固《漢書》續《史記》武帝以後可也。今《通志》此五略，天寶以前，則盡寫《通典》全文，略無增損。天寶以後，則竟不復陸續。又以《通典》細注，稱爲己意，附其旁，而亦無所發明。疏略如此，乃自謂雖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諸史之文，不亦誣乎！”（《文獻通考》二百一）馬氏此評，信非誣罔。即使鄭氏復起，亦必無以自解。蓋鄭氏編述之初，本欲就前人之書施以翦裁鎔鑄，成爲己作。

未及致力於此，卽已病困不起。故倉卒鈔輯以充篇幅，遂遺後人之譏耳。

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爲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

按：《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曰：“《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又：“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注》云：“若魯之《春秋》、晉《乘》、楚《檮杌》。”可知“志”乃古史之通稱也。《禮記·禮運》：“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注》云：“志，謂識古文。”劉台拱曰：“志，識記之書。”是“志”與“識”同，故凡著之竹帛，有所記識，皆得謂之志矣。志既爲古史舊名，鄭氏名其書曰《通志》，猶云通史耳。

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爲“表”。今復表爲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爲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歷》，上極三皇。譙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年爲正，故其年始於共和。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據，況其年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於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今之所譜，卽太史公法。既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於公也。若廟



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諡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準唐舊。

按：此言改表爲譜，以及紀年、避諱諸端，乃鄭氏自道其著書之例所不同於前人者。

夫學識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人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迹，自有成規。不爲智而增，不爲愚而減。故於紀傳卽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人之正書，則據實事；真之別錄，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

按：此言《通志》之爲書，有獨得於己、不用舊文者，有整齊故事、宜用舊文者，以及全書起訖之例。顧鄭氏爲書，既以貫通古今爲職志，則敘事應及當代，訖於北宋之末。非特紀傳宜爾，卽禮樂政刑，亦必詳今略古。斯乃司馬之規模，通史之義例。鄭氏窮老盡氣，藉曰力不逮此，有志莫遂，斯固可見諒於天下後世者也。乃謂唐五代事，爲本朝大臣所修，非微臣所敢議。以此塞責，轉成自飾之遁辭矣。

嗚呼！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且百年

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況祿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皇顓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音韻，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離，何時反本！道之汙隆存乎時，時之通塞存乎數。儒學之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謹序。

按：文尾慨歎儒學末流弊病。以振興儒術、期諸本朝爲結。鄭氏之志量，信弘遠矣！其所規爲，則自司馬遷後一人而已矣！觀其考訂名物，疏證山川，稽撰禮樂，觀察象緯，論述校讎，搜錄圖譜，山居之時，皆有述造。自謂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籍。竹頭木屑之積，將一旦而用之。蓋其一生，於百家皆討其原，而將大湊於修史。此志此事，曠千載而罕儔。雖稟命不融，齋志以沒，然而修書義例俱在，足以啓牖後人途徑者至遼闊矣！徒以茲事體大，非學問淵博、識斷精審、而又濟之以雄才毅力者，則固無以任此。近人柳詒徵嘗曰：“自鄭漁仲而後，罕有議修全史者。作述相沿，不外數事：踵修一朝之史，一也；改造某朝之史，二也；補綴志、表，三也；校注考證，四也；賡續編年，五也；綜析紀事，六也。史才之降，于茲可觀矣。”（《通史敘例序》）柳氏斯言，足以概近數百年間史學式微之狀而無遺。仰視鄭氏弘識孤懷，如在天際，今安得有其人哉！

# 文史通義平議小序

《文史通義》，始刻于道光十二年壬辰。乃誤以《方志略例》爲其外篇，蓋姚椿等不識體例者之所爲也。晚近吳興劉氏嘉業堂所刊《章氏遺書》，以《方志略例》獨爲一種，復釐定《文史通義》內篇六卷，外篇三卷。此本最足，在諸本之上。今所箋記，以此爲準云。

張舜徽

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

# 文史通義平議

## 內 篇 一

### 易 教 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舜徽按：王守仁《傳習錄》，已昌言《五經》皆史。其後王世貞嘗言：“天地間無非史而已。六經，史之言理者也。編年、本紀、志、表、書、世家、列傳，史之正文也。敘、記、碑、碣、銘、述，史之變文也。訓、誥、命、冊、詔、令、教、劄、上書、封事、疏、表、啓、牋、彈事、奏記、檄、露布、移、駁、諭、尺牘，史之用也。論、辨、說、解、難、議，史之實也。頌、贊、銘、箴、哀祭，史之華也。”（《弇州四部稿·藝苑卮言》）李贄亦曰：“《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

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焚書·經史相爲表裏篇》）可知六經皆史之說，早已發於明人，不自章氏始也。推此數家之言，以觀古代著述，則何一不可統之於史乎？龔自珍嘗言：“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古史鈎沉論》）非過論也。況時移世異，事業不必同。古人所目爲典謨經訓者，今且易爲土牛窮狗矣。舉凡六籍所言，可資考古，無裨致用。六藝經傳以千萬數，其在今日，皆當以史料目之。

## 易 教 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

舜徽按：以變化釋易，實發自鄭玄《六藝論》，其言有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三者之中，以變易爲尤要。故鄭氏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並見《周易正義》引）大抵一名三義，莫大乎變易。故漢人著論，多以變易賅《易》義之全。《釋名·釋典藝》云：“易，易也，言變易也。”是已。孔氏修《正義》時，特本漢人舊說而爲言耳。

## 書 教 上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

於後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

舜徽按：章氏此言是已。《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藝文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此自其大體言之耳。《春秋》雖記事，而《左傳》中所載當時名卿大夫之辭令，何莫非言？《尚書》雖記言，而二十八篇所錄，大抵皆一時大事。如《堯典》、《皋陶謨》，敘君臣事也；《禹貢》，述治水功也；《湯誓》、《牧誓》，行征誅也；《盤庚》，謀遷徙也；《康誥》、《酒誥》、《梓材》，封親屬也；《召誥》、《洛誥》，營陪都也；《多士》、《多方》，曉羣民也；《無逸》、《立政》，訓嗣王也。推之其他各篇，莫不分言一事，固未可徒目爲記言之書矣。蓋古之人君，左右有史，言行悉由記載，未必各有專尸。左史記言，亦兼記事；右史記事，亦兼記言。故後之稱之者，錯舉互辭，皆無不可。所以必設兩人者，資對勘，避漏誤耳。當時所記之策，未必卽傳世之《尚書》、《春秋》，後之論者，必舉此二書以實之，非也。

## 書 教 下

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

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

舜徽按：《尚書》所載，包容至廣。劉知幾所謂“《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故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於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史通·六家篇》）。然則《尚書》自敘人事外，旁涉禮文，兼詳典制，因事名篇，自爲經緯。若以紀事本末方之《尚書》，僅得其一體耳。大抵宋人治學，好勤動筆，每遇繁雜之書，難記之事，輒手鈔存之，以備觀省。其於羣經諸子，莫不皆然。袁氏之鈔《通鑒》，初無意於著述，及其書成法立，遂爲史學開一新徑亦盛業也。要之著述多門，其體非一，固有因襲前修者，亦有自爲義例者。宋賢史學，大抵步趨漢儒。司馬《通鑒》，衍荀悅之例者也（宋神宗謂其書賢於荀悅，可知屬稿之初，實承《漢紀》體例而作）；鄭樵《通志》，衍太史公之例者也。若紀事本末之書，則實古無是體，而宋人創之。禮以義起，爲用尤弘。何必遠攀三古，謂爲《尚書》之遺教乎！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即有之矣。

舜徽按：編年之體，創自《春秋》，固矣。自隋魏澹以來，論者多謂紀傳之體，出於《尚書》，其言亦自有故。若典、謨、誓、誥，無異紀傳之篇；《禹貢》、《洪範》，不殊書志之體。特大輅椎輪，不如後來踵事增

華之審密耳。然則上溯紀傳、編年二體之源，必推本於《書》與《春秋》明甚。又考《陳書·文學傳》載何之元《梁典自序》有云：“《尚書》述堯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爲優。”據此，可知六朝舊義，固以紀傳之體，源於《尚書》。

## 詩 教 上

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有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中略）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僞託也。

舜徽按：時代愈荒遠者，其書愈不可信。司馬遷所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者是也。蓋後世好事者每有述造，嫁名古人，由來已舊。淮南王書嘗論之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于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脩務篇》）淮南此言，不啻爲僞託遠古者揭櫫一通例矣。推之儒家經傳，多謂爲出自周公、孔子，皆當援此理繩之。章氏乃言戰國時人述黃農之說，實非有所僞託，非是。



## 經 解 上

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

舜徽按：《說文》：“經，織從絲也。”（今本脫“從絲”二字，依《御覽》所引補）織布帛以經爲主而緯從之，故經字引申有綱紀義。《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之大經也。”《疏》云：“經者，綱紀之言也。”是已。古人言綱紀，猶今語稱綱領也。古之爲道術者，各有其記載理論綱領之書，如《管子》有《經言》，《墨子》有《經說》，醫家有《內經》，數術家有《算經》，藥物家有《本草經》之類皆是，初不限於儒家始有經也。大抵綱領之書，言簡理奧，非解說不明。解說之書，曰傳、曰訓、曰注、曰說，名異實同，皆所以發揮本書之旨也。因推尊本書曰經，言其爲傳、訓、注、說之綱領也。章氏謂因傳而有經之名，猶因子而立父之號，斯言得之。其後龔自珍爲《六經正名》，數論尤暢，足以羽翼章說。

## 經 解 下

漢魏而下，做《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諸家《陽

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或避其名而擬其實，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尚書》者也。

舜徽按：《太史公自序》述其先人之言有曰：“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然又不敢自居以示謙，故曰：“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比之於《春秋》，謬矣。”蓋司馬氏之作《史記》，嘗比於孔子之修《春秋》。嘗謂“仲尼厄而作《春秋》”，亦自喻就極刑而發憤著書之意。其所以繼軌《春秋》者，在此也。至於編述體例，則取諸《尚書》者爲多。觀夫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而造帝紀之法悉在。《禹貢》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斯又書、志之所由昉也。至於列表之法，旁行斜上，並效《周譜》，皆非《春秋》之所固有。蓋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遠聞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史記》一書，左右采獲，其所承受者甚廣。章氏乃謂其上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尚書》，失其實矣。

## 內 篇 二

### 原 道 中

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

舜徽按：《詩》、《書》所言，不外則古稱先敬天法祖之意而已。如《詩·大雅·假樂篇》云：“不怨不忘，率由舊章。”《孟子》嘗引此詩而申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種說教，實為政治家除舊布新之一大障礙。故商鞅教秦孝公，即以燔《詩》、《書》為亟。其後李斯踵行之，乃偶語《詩》、《書》者棄市。當日禁書之令，此為最嚴。蓋不除其復古守舊之根，則無以言革新，故嫉《詩》、《書》為尤甚，此在當日力行新政不得不然之一大舉措也。清人錢泳嘗曰：“大凡處事，不可執一而論。必當隨時變通，斟酌盡善，乃為妙用。余嘗論‘率由舊章’一語，不知壞盡古今多少世事。”（見《履園叢話》卷二十三）錢乃文士，而此論至為通達。舉此一語，自可推及其餘。學者可以恍然有悟於《詩》、《書》之言，為秦所忌，不為無故矣。章氏持世俗之見，目為悖古，非通識也。

## 原 學 上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斥以為佞者，蓋以子羔為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舜徽按：循子路所言以求之，可知周末言學，本不限於讀書。在書本未興之前，先民即於實事實物中學耳。昔人所云“皋陶、禹、稷讀何書”，一語道破矣。清初大儒，猶多明於斯理。廖燕嘗曰：“上古無兵書，而孫武子與吳起皆善行兵。後世家挾孫、吳，而用兵多不及古人萬一，理豈盡在書者！孫、吳因善行兵而著兵

書，非因多著兵書而始善行兵。”（《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三《易簡方論序》）又曰：“燕昔者亦嘗有志於學矣，於古人書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糟粕，無所從入。退而返之心而有疑焉。意者其別有學乎？然後取無字書而讀之。無字書者，天地萬物是也。古人嘗取之不盡，而尚留於天地間，日在目前，而人不知讀。燕獨知之讀之，終身不厭。”（卷九《答謝小謝書》）此言學之範圍至廣，天地萬物，無乎不在，初不必死守書本而後謂之學，議論甚通。與顏元、李塨教人從實事實物中學，皆足以興起人。章氏嘗言“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古人之學不遺事物”，又謂“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足與言夫道矣”。於此編中數數道之，信有與諸家之言相似者。然而爲學之趨向，固自不同也。

## 原 學 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

舜徽按：此處所云“諸子百家”，謂自宋以來言心談性之理學家也；所云“世儒”，謂乾嘉中考禮說字之經學家也。章氏察及其末流之弊，故兢兢於解蔽救偏。若《原學中篇》所云：“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其事者也。”此對前者而言耳。《與汪龍莊書》所云：“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此對後者而言耳。平正通達，信足以矯末流之枉。

## 博 約 上

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譬如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

舜徽按：章氏論及治學，貴能自成家數，與《博約下篇》所云：“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其旨一也。其平日與人論學有曰：“大抵文章學問，善取不如善棄。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於不朽之業，宜度己之所長而用之，尤莫要於能審己之所短而謝之。是以與薪有所不顧，而秋毫有所必爭，誠貴乎其專也。”（文集七《與周次列舉人論刻先集》）又曰：“學人必有所以自恃。如市廛居貨，待人求索，貴於不匱，不貴兼也。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米粟；市陶冶者，不必愧無金珠。是以學欲其博，守欲其約。”俱足以發明斯義。與章氏生同時而稍前者，若戴震亦嘗自言：“學貴精不貴博，吾之學不務博也。”又言：“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見段玉裁所編年譜）此識此論，似與章氏相近，然而學不同方，意不必盡同也。

## 博 約 中

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

舜徽按：所謂“博而能約”，即治學能博觀而約取也。如治一經，則凡涉及此經之書皆徧覽之，所謂博觀也。於是去粗取精，擇善而執，所謂約取也。推之專治一學，皆應如此。不博觀，則形其褊陋；不約取，則必致泛濫；故由博返約之功，必不可少。

### 浙東學術

世推顧亭林氏爲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舜徽按：浙東學術，以史爲盛。自黃宗義、萬斯大、斯同兄弟，以迄全祖望、邵廷案，至於章氏，確有淵源，故作《浙東學術》一篇以張大之。章氏嘗言：“浙中自元明以來，藏書之家不乏，蓋元明兩史，其初稿皆輯成於甬東人士，故浙東史學歷有淵源，而乙部儲藏，亦甲他處。”（外集二《與阮學使論求遺書書》）可知浙東史學之盛，其來有自。大抵浙東諸儒，於朱、陸無所專主，而得於陸者爲多。故章氏平生持論，亦多從陽明出。六經皆史之說，即本之《傳習錄》也。

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

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原注：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舜徽按：章氏謂史學主於經世，自浙東諸儒論之，亦惟陽明能以事功自見耳。黃、萬、全、邵，慮猶不足以語乎此，其他更不足數也。章氏取法乎上，故縣鵠甚高。至於謂史纂、史考，皆非史學，則達本之言，確不可易。故其言又曰：“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耳。唐宋以來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爲史學，則未之聞矣。”（《文集補遺上·朱大司馬論文》）名論不刊，足與此篇相發明也。

## 朱 陸

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人亦不自知也。（中略）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峯，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中略）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卽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歷而貶義、和也。

舜徽按：此篇實爲鍼砭當時樸學經師而作。時戴震徒友散天下，勢張甚。章氏嘗與之遇，病其好爲大言欺人，因作《朱陸篇》以正之。余嘗廣其意以推尋之，則有清一代學術，無不賴宋賢開其先。乾、嘉諸師特承其遺緒而恢宏之耳。校定《說文解字》，自徐鉉始；爲

《說文解字》作傳，自徐鍇始；昌言右文，自王聖美始；考論古韻，自吳棫始；爲《爾雅》作疏，自邢昺始；此清代小學出於宋也。攻《僞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始；斥河圖、洛書，自歐陽修始；爲《禮經》作圖，自聶崇義始；尊信《詩序》，自呂祖謙、馬端臨始；搜輯漢人舊注，自王應麟始；此清代經學出於宋也。他若金石考證，歐、趙肇其端；目錄解題，晁、陳啓其緒。自鄭樵有《校讎略》，而校讎之學始號專門；朱子爲《韓文考異》，而考異之體方臻精密。至於史部考訂之學，不外辨正異同，勘改譌失，則吳縝《新唐書糾繆》、《五代史記纂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亦已導夫先路。其旁涉諸子爲之詮釋者，以疏說老、莊之書爲最多（詳見《道藏目錄》）。然如陸佃之解《鶡冠子》、杜道堅之釋《文子》，謝希深之注《公孫龍子》，錢佃之校《荀子》，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之注《孫子》，至今猶有存書，固已卓然不廢，斯又清代諸師校理周秦諸子之前驅也。若夫《困學紀聞》、《黃氏日鈔》諸編，包羅羣書，考覈精審，後之《日知》、《養新》諸錄，實其嫡嗣矣。由此觀之，有清一代之學，莫不淵源於兩宋。後之從事實事求是之學者，數典忘祖，反唇相譏，多見其不知量也。

## 文 理

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舜徽按：文章之事，與學問之功有所不同。顏之推所謂：“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已足爲人；苟乏天才，無強操筆。”蓋以詞翰之美，多由天至，非盡關人力也。故曹丕《論文》有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可知行文之妙，父不能教其子，兄無以喻其弟，況旁人乎？循輪扁答齊桓問而推論之，則可以言傳者，文之粗也；不能以言傳者，文之精也。桐城姚氏論文，概括爲“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格律聲色，可以言傳；神理氣味，不可以言傳者也。世俗不解爲文，乃競取古人之文漫施標識評點。近世坊間選本如《古文觀止》、《古文析義》、《古文筆法百篇》之屬，批注文法，最是惡道。鄉塾競相仿效，而文格益窳。甚至有朝夕揣摩而文理不通者。章氏此言，亦足以警俗也。

## 古文公式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扑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中略）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徇，則“臣扑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舜徽按：蕭穆《跋文史通義》有云：“章氏所論，有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真爲千古名言，後著作之家所當奉爲嚴師之訓也。乃今觀其論蘇文忠公《表忠觀碑》，則又有大不其然者。彼曰：‘臣抃言’，‘制曰可’，爲秦漢時之制，宋時陳奏之制必不如是。夫必先明宋時陳奏之制畢竟何者爲是，方能議彼之所以不是也。乃於宋時陳奏之制，漫無發明，而曰：與其用‘臣抃言’，何不曰‘岳曰於’；‘制曰可’，何不曰‘帝曰俞’。舍三代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此真盲人道黑白也。其實此制自漢至宋，歷代相沿，並未更改。蘇公此文，卽當時陳奏原式，唐宋名臣之集，奏議所載，一一可考。姑以杜、韓兩集言之：杜公《上三大禮賦表》曰：‘臣甫言’，韓公《論佛骨表》、《潮州刺史謝上表》，均曰：‘臣愈言。’宋代諸名公集所載奏議，莫不如是。其最昭晰顯見者，莫逾於司馬文正公《進資治通鑒表》，宋元刊本均載之，一依當時陳奏原本格式。章氏既以一代史學自負，博覽羣書，豈於歷代陳奏之制尚無稽考，並唐宋名人之集及司馬公《進資治通鑒表》本格式概未之見邪？抑已各有所見，概以爲諸家皆謬爲倣古，尚未暇一一斥駁，特於蘇氏此碑前後不遵時王之制，反覆闢之以概其餘邪？善讀章氏書者，凡有所疑，未見實據，尚應細爲決擇，參考之可也。”（見《敬孚類稿》卷五）可知掎摭古人，亦殊不易。章氏書中議論雋快，而考證疏舛者往往而是，學者宜審辨之。

## 古文十弊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

《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與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舜徵按：章氏指斥當時爲古文辭者之弊凡十：事本無病，而敘事者妄加雕飾以成其病，目之爲“剜肉爲瘡”，一弊也；人本無疵，而述德者欲其左右前後之人俱無小疵，目之爲“八面求圓”，二弊也；臨文摹古，遷就重輕，目之爲“削趾適屨”，三弊也；藉人炫己，自作品題，目之爲“私署頭銜”，四弊也；處吏治整肅之時，而盛稱其人之清廉，目之爲“不達時勢”，五弊也；記無可稱述之人，乃影附同鄉名宦，目之爲“同里銘旌”，六弊也；敘人之事，不厭其詳，目之爲“畫蛇添足”，七弊也；述人之言，務求其雅，目之爲“優伶演劇”，八弊也；操塾師啓蒙見解，上擬古人，目之爲“井底天文”，九弊也；用時文評選方法，刻意追仿，目之爲“誤學邯鄲”，十弊也。揭櫫十弊，意欲以救當時文格之卑。

考袁枚《小倉山房尺牘》中載有大興朱珪所舉古文十弊云：論心論性，頗似宋人語錄，一弊也；俳詞偶語，學六朝靡曼，二弊也；記序不知體裁，傳志如寫賬簿，三弊也；優孟衣冠，摩秦仿漢，四弊也；謹守八家空套，不自出心裁，五弊也；鉅釘成語，死氣滿紙，六弊也；措詞率易，頗類應酬尺牘，七弊也；窮於邊幅，有文無章，如枯木寒鴉，淡而可厭，且受不住一個大題目，八弊也；年弱敷衍，襲時文調，九弊也；鈎章棘

句，以艱深文其淺陋，十弊也。袁氏又增三弊云：徵書數典，瑣碎零星，誤以注疏爲古文，一弊也；馳騁氣力，甘作粗才，二弊也；寫《說文》篆隸，教人難識，字古而文不古，三弊也。然則“古文十弊”之名，實首發之於朱氏。章氏固嘗從朱筠學爲古文辭，聞其兄弟緒論熟矣，故得沿用斯名復爲一篇耳。

## 內 篇 三

### 繁 稱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校讎，卽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校讎，卽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校讎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尚新奇，爲弔詭也。

舜徽按：著述文字，不外抒情、說理、紀實三門。抒情之什，情發輒書，故古人詩歌，初無篇題。說理之文，主於垂教，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故《論語》、《孟子》，但取《學而》、《爲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區分篇目，而不別製小題，此悉由編書之人或承學之士摘字名篇，而非作者所自題也。惟紀實之書，或經之以事，或緯之以人，或總之以物。事有斷限，人有終始，物有醜類。勢不得不分篇敍載，自具首尾。古書自爲篇題，蓋起於此。其名篇之例，復分三科：有舉事以爲題者，《尚書》是也；有因人而立號者，《春秋》是

也；有據物以標目者，《爾雅》是也。大抵古書非摘字名篇。而必別爲標目者，不越如斯三途。要皆循名可以知實，顧題可以達旨，質樸無華，但取提挈綱要而已。若夫諸子自著之文，競立美題以相炫耀者，又未可相提並論也。今以莊周之書論之，自外篇以下，或舉事名篇，或以義標目，或借物立名，或因人爲號，陸氏《釋文》逐篇注明，例固可曉。獨內篇之文，論者謂爲周自著，而七篇皆別立三字爲題，與往世名篇之例絕殊。其意蓋欲立異標新，以震赫天下之耳目。行文既華夸若彼，名篇宜奇詭如此矣。斯又著述升降之機也。

## 內 篇 四

### 言 公 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

舜徽按：六藝經傳，多不知作者主名，下逮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悉無由考定出於誰手。上世質樸，羣視道術爲天下公器，人惟期於明道，非若後世文士，欲暴其才，有所作必繫以名氏也，其立言可謂至公矣。《漢志》於六藝本經，率不標作者主名。至於周秦諸子，不必親自著書，今所稱某子、某子者，率後人所補題也。此皆足以發明言公之旨。

劉師培《文史通義言公篇書後》曰：“《論語》立

言，恒本古語；大戴集《禮》，半出賈、荀，前人論之已詳。又古器銘文，語多相似；起止之詞，述而不作；則又同體之文，沿襲承用，略事竄點，便成新裁。即詩歌之體，亦復旨別語同，觀《柏舟》互見於《邶》、《鄘》，《揚水》疊賡於《周》、《鄭》，蓋發端之詞，遞沿成語，故不期其符而自符。厥後孟德作歌，或采《鄭風》之語，或斷《小雅》之章。蓋言以明志，義各有當，不必詞盡已出也。又即漢人之作觀之，‘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樂府兩見其詞；‘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艷詞疊沿其句；此由矢口而成，取習見之詞入己作。若夫漢碑之文，立詞多同；又以文有定製，相沿已久，與鐘鼎銘文同例。後世之文，亦恒類此。（中略）此非古人不以雷同爲耻也，古代文有定製，詞有定施，雖沿襲前作，苟詞得其宜，固不啻若自己出也。”（見《左龔集》卷八）劉氏推本言公之旨，以上論古人文辭不避雷同之故，從而補充章說，爲古書揭櫫一通例矣。

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原注：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耻（原注：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

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人者矣。

舜徽按：史部羣書，職在記事，與夫以立言爲宗之羣經諸子有所不同，此編述之業所以不同於著作也。記事必前有所承，苟義例精審，原不嫌於因襲。前乎司馬氏者，若呂不韋輯智略士，纂八覽、六論、十二紀，自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然校其所錄，舉凡道、墨、兵、農諸家之言，與夫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甄采甚廣，而不言出自前人。與太史公之取《尚書》以撰《五帝》、《三王本紀》，取《左傳》以撰列國世家，而不明標出處者，爲例正同。蓋編述之業，實寓有筆削之意，既刪羣籍之要以成吾書，則原書皆可土苴視之。又吾所裁取者，悉天下之所共有，世人之所公知，不煩稱舉而自明，又何庸一一條列以爲之注。推求作者之用心，亦必如此。以其綜輯排比，整鍊而有翦裁，故能自成一家之書。論者徒病《史記》、《漢書》鈔襲陳篇爲多，而不知《春秋》、《尚書》，亦皆前有所承，悉本舊文。唐以來設館修史，無不根據實錄，整齊排比而後成書，亦猶之鈔輯也。下觀宋世史學，則非特《文獻通考》爲鈔，卽《通志》亦鈔，《通鑑》亦鈔。然則總史部之書，鈔輯者居其大半矣。以其爲編述之業，與立言之書本自不同耳。

## 知 難

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閤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舜徽按：此篇乃章氏自明獨立寡和不遇於時之意。既博引史實暢發於前，復於篇尾作此數語以抒其憤懣，足以規其當日處境之艱困也。抑荀卿有言：“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見汙；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不見用。是以不諂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非十二子篇》）又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修身篇》）又曰：“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天論篇》）凡有志之士，必具此胸襟，而後可以卓立不拔，能爲人之所不爲也。章氏器局未弘，固不足以語此。

## 釋 通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

舜徽按：《太史公書》，通貫古今，包羅萬有，實創通史之體。自班固以下，斷代爲書，雖紀傳之法上效史遷，然亦具體而微矣。其後惟梁武帝有志廣修，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該括衆史，史籍標“通”，斯爲最朔。終以卷帙浩繁，不傳於後。迄乎南宋，鄭樵慨然以“集天下之書爲一書”，引爲己任。所述《通志》，卽通史也。終以稟命不融，美志莫遂。今所存二百卷之書，非其定稿，論者遽據此以譏其短，



而不知其義例之精。章氏出，乃作《申鄭篇》以張之。若此《釋通》一篇，亦所以表章鄭學，故兢兢以修通史爲亟。顧茲事體大，自鄭樵以後，靡有嗣音。千載之間，無敢着意於此者。近世若章炳麟、梁啟超，皆嘗有志爲之。今可見者惟存其例目而已。吾湘陳鼎忠、曾運乾，亦曾合撰《通史敘例》，粗具條目，書未屬稿。以迄於今，仍爲闕典。非有博學高識之士，而出之以雄心毅力，固未敢以此自任也。

## 申 鄭

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爲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映乎！

舜徽按：鄭氏《通志》，規效《太史公記》，實爲通史體例。與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專詳典制者不同。後世取此三書，強被以“三通”之名，已失其實。《四庫總目》錄《通典》、《通考》入史部政書，錄《通志》入別史，頗知鄭氏之書截然與杜、馬異例。然論列得失，乃病鄭之泛雜無歸，又謂《通考》詳贍非《通志》所及，斯皆隨俗浮沉之談，未足以爲定論。章氏深知《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與杜、馬兩家之書截然不同。且謂“《文獻通考》之類，雖仿《通典》，而分析次

比，實爲類書之學，書無別識通載，便於對策敷陳之用”（《釋通》自注）。此論雖未免太過，要之三家之書，判然異趣，固如章說不可易也。其後鄭獻甫論及“三通”，亦謂“《通志》當單行，不當與《通考》合刻。今有博洽之士，藏書插架，易爲《通考》之學；非淹貫之才，諸史羅胸，亦難成《通志》之書。以義例言，《通志》最善”（詳《補學軒文集外編》卷一《書三通序後》）。此論此識，足以羽翼章說，解俗論之惑也。

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爲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爲者而爲之。立志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疏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舜徽按：鄭氏既志在“集天下之書爲一書”，以成其巨著通史，故必先從事各種學問之研求以積累知識。嘗自稱“十年爲經旨之學，三年爲禮樂之學，三年爲文字之學，五六年爲天文地理之學，爲蟲魚草木之學，爲方書之學，八九年爲討論之學，爲圖譜之學，爲亡書之學”（見《夾漈遺稿》卷上《獻皇帝書》）。可知其潛修之功，積三十年。自以爲閉門造車，聞見孤陋，復負笈出游者十年。跋涉山川，采訪遺佚，游罷歸來，既老且病。雖有凌雲之志，莫之克伸。故其所纂二百卷之《通志》，除《二十略》外，餘皆短時雜鈔而成，自不免粗

疏漏失。若論其治學著書氣魄之雄偉，規模之龐大，艱苦卓絕，千古罕儔。其不可及處，全在存通史之義例，示後人以楷模。惜乎千載悠悠，未聞繼軌。史才之難，固古今所同慨也。

## 答客問中

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

舜徽按：章氏區羣書爲三科，所見甚卓。若以《通典》、《通志》、《通考》三書衡之，則《通志》乃獨斷之學，《通典》見考索之功，《通考》直比次之書耳。高下淺深，於斯可觀矣。昔王充《論衡》始成，或頌其可謂作者。充則曰：“非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論衡·對作篇》）王氏之所謂作，非有獨斷之學者不能爲也；所謂述，則考索之功其先務也；所謂論，卽比次之事耳。論者，論之借字也。於文，亼、冊爲論，蓋卽比次羣言之意。《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然則《論語》之名，實取義於纂輯。比次之書，

斯爲最朔矣。蓋載籍極博，無踰三門，蓋有著作，有編述，有鈔纂，三者體製不同，爲用亦異。章氏所謂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比次之書，亦卽此意。

## 內 篇 五

### 史 德

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中略）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舜徽按：昔劉知幾嘗謂史家應有三長，卽史才、史學、史識。章氏復益之以史德。梁啓超亟稱之，而以史德冠首，目爲四長。且謂史家第一道德，莫過於忠實。所以不能臻於忠實者，其病有三：一曰誇大，二曰附會，三曰武斷（說見《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二章）。夫史籍所載，求其忠實可信，斯亦難矣。上世之事，著之竹帛本晚。十口相傳，不能無增飾之言；五方殊音，不能無譌變之語。是以“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貢已致其疑；《武成》之“血流漂杵”，《雲漢》之“靡有孑遺”，孟子亦糾其謬。可知古史之可信者已寡，是以昔人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歎也。班固嘗謂劉向、揚雄皆以《太史公書》爲實錄，實錄二字蓋史家所尚。然自唐以來設館修史，欲求微實不誣甚難，唐宋學

者類多知之。如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李翱《百官行狀奏》、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諸篇所言，尤爲明切。故自設館修史之制立，則因緣請託之風行，而好惡是非之準失。史之離於忠實愈遠，復何史德之足云。故在今日而言理董舊史，其中可信之史料固甚少也。

## 史 注

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

舜徽按：《太史公自序》乃敘述身世及所以著書之意，亦所以繫全書之篇目，不得目爲自注之權輿也。至其自注之辭散見於百三十篇中者則有矣。《史記·田叔傳》敘田仁事云：“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上文既云“坐太子事”，下文又云“坐縱太子”，語意有若複沓。其實正文僅“坐太子事，下吏誅死”二句八字，“時左丞相”以下三句，乃注文，所以注明“坐太子事”四字者也。又《封禪書》云：“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而“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十二字，亦“五在中國”之注文。如此類例，存於《史記》中者猶多，今亦不能悉舉也。班《書》自注，亦不限於《年表》與《地

理》、《藝文》二志，其見於列傳者，如《項籍傳》云：“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在民間爲人牧羊”七字，乃注明所求得之處。又《鮑宣傳》云：“拜宣爲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云云，“時哀帝”以下二句，所以注明司隸二字者也。古人自注之語見諸史籍者，所在多有。若不解此理，則必反疑古人行文之贅復，失作者之意矣。近人楊樹達已發其例於《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學者可參攷。至於《史》、《漢》在敘事之際，每遇彼此有關聯處，輒云：“事見某篇”，“語在某篇”，散見全書，不可勝數，亦史家自注之辭也。

## 詩 話

今之爲詩話者，即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學識矣，濟之以心術之傾邪，斯爲小人而無忌憚矣。何所不至哉！

## 婦 學

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真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土然，何至爲所惑哉！

## 婦學篇書後

若夫婦學之廢，人謂家政不甚修耳。豈知千載而後，乃有不學之徒，創爲風趣之說，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

舜徽按：此三篇皆所以斥責袁枚者。乃至目爲“無行文人”，“不學之徒”，漫罵醜詆，無乃已甚。平心論之，枚雖以詩文名於當時，而學問淹博，識見堅定，今讀其《文集》、《尺牘》、《隨筆》、《詩話》諸書可知也。觀其論學之語，實有與章氏不謀而合者。其言有曰：“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禮》、《樂》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隨園文集》卷十《史學例議序》）此非卽章氏所揭櫟六經皆史之論乎？其言又曰：“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願肯爲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其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見聖人，然後拾其遺文墜典，強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爲，非聖人意也。”（《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書》）此與章氏所言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與古人本學問而發爲文章之意，無勿同者。至於指斥當時考據家之流弊則又曰：“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遵明誤康成八寸策爲八十宗，曲說不已，一闢之市，是非麻起，煩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於彼乎？於此乎？如尋鬼神，搏虛而已。”（《答惠定宇書》）此與章氏平日救弊之言，亦復相似。然則枚所持論，實足箴育起廢，其書具在，何可掩乎！袁、章二人在乾隆中，實同能對當時經學考證之流弊施以有力之攻擊者。袁年輩較早，言論文字，流播在前。論者或疑章氏識大之言，容有竊取於袁，而故爲詆袁之文以減其因襲之迹者。以無的據，今亦未可質言也。

## 內 篇 六

### 文 集

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相如詞賦，但記篇目。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哀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自摯虞創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昉於晉代。

舜徽按：古人文不徒作，不得已而後屬辭。自周秦以迄於漢，說理之文，統歸諸子，遠自晏子、孫卿，下逮陸賈、賈山、賈誼、董仲舒、公孫弘以及劉向、揚雄所序，見錄於《漢志·諸子略》儒家者皆是也。記事之作，附於《春秋》，自《秦事》、《楚漢春秋》以及《漢大年紀》之屬，《漢志》皆入之《六藝略春秋類》矣。抒情之篇，最爲繁雜，《漢志》悉收錄於《詩賦略》矣，本無所謂集也。在劉向校書以前，書之部類未立，舉凡記事、說理、抒情之文足以傳世者，多見錄於《史》、《漢》列傳。故在今日讀《史》、《漢》列傳，無異讀總集也。自劉向哀屈宋諸賦，定名《楚辭》，是爲總集之始。曹丕《與吳質書》，傷徐、陳、應、劉之早逝，“撰其遺文，都爲一集”，亦猶總集體也。其後南齊張融，哀所爲文，名曰《玉海集》，是爲自編文集之始。《隋書·經籍志·別集類》所錄《荀況集》、《宋玉集》、《漢武帝集》、《淮南王集》



之類，名目繁多，皆後人所補題耳。自別集之體出，人自爲集，家各一編，於是篇章繁富，而文體斯濫矣。

## 答 問

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

舜徽按：此言極是！非特治學爲文乃爾也，卽語書畫之微，亦莫不如此。道州何紹基以書法名于晚清，其一生臨池之功，至老不廢。摹漢碑每種至數百通，晚年乃無一相似，神明變化，自成一體。蓋臨摹之初，惟恐其不似；及其專力致精，惟恐其似。入而能出，惟大家爲然。近日齊白石作畫，對客揮毫，頃刻立就。或以粗獷爲病，而不知其年少學畫，自工筆始。摹古之功深，故化古之力大。世之論者，徒校其成器所至，而不窺其致力所由，固無從測其高下淺深也。

## 篇 卷

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讎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爲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卽爲後世幾卷，其大較也。

舜徽按：兩漢竹帛並行，故篇卷無分。《漢志》著錄經籍，或稱卷，或稱篇，而每種之後，各題上事云，

凡若干家若干篇。至末復總結其數曰：“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明徵也。惟古書篇幅長短不齊，故編書之人於篇幅甚短者，恒合數篇以成一卷。《詩》三百篇，每篇文字最簡，《漢書·藝文志》著錄魯、齊、韓三家經文爲二十八卷，《爾雅》十九篇，《漢志》著錄爲三卷，是其例也。若夫篇幅過長者，又每分爲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漢書》爲百篇，而應劭注本作一百一十五卷，顏師古注本作一百二十卷，是其例也。蓋自簡策既廢，易篇爲卷，太長則卷舒不便，過短則不能自成一軸，故編次者輒依文辭繁簡，有所進退離合於其間，自是爲書目者，若阮孝緒《七錄序》後所附《古今書最》及唐初諸儒修《隋書·經籍志》，皆但計卷數，無復稱篇者矣。

## 外 篇 一

### 立 言 有 本

江都汪容甫，工辭章而優於辭命。苟善成之，則淵源非無所自。（中略）汪氏晚年，自定《述學》內外之篇。余聞之而未見，然逆知其必無當也。蓋其平日談經論史，燦然可觀，甚有出於名才宿學之所不及。而求其宗本，茫然未有所歸，故曰：聰明有餘識不足也。（中略）今觀汪氏之書矣，所爲內篇者，首解參辰之義，天文耶？時令耶？說文耶？次明三九之說，文心耶？算術耶？攷古耶？其言有得有失，其攷有是有非。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別名詁義訓，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也，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

然叢出者，亦當列於雜篇。不但不可爲內，亦並不可謂之外也。而況本無著書之旨乎？

舜徽按：汪氏嘗欲博考先秦古籍，及三代、兩漢學制，旁涉文字、訓詁、度數、名物之有繫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稿未成，乃取平日讀書所得及所論撰之文，都爲一集，而被以《述學》之名，非其初志也。觀其子喜孫所爲《年譜》，稱汪氏撰《述學》一書，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學制廢興，使知古人之所以爲學者。凡虞、夏第一，《周禮》之制第二，列國第三，孔門第四，七十子後學者第五，又列通論、釋經、舊聞、典籍、數典、世官、目錄凡六。其略有云：“古之爲學士者，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誦者，《詩》、《書》而已。其他典籍，則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間無有也。苟非其官，官亦無有也。”又謂：“古之學出于官府，人世其官，故學世其業；官既失守，故專門之學廢。”此外如劉台拱所爲《汪君傳》，徐有壬所爲《述學故書跋》，薛壽所爲《汪氏遺書後序》，皆言之甚詳。可知汪氏原欲撰成之《述學》，其規爲至浩大矣。而其平生持論，與章氏所言古者官師流變、政學分合之意，若合符契。兩人嘗同遊皖，又嘗同客武昌。汪既恃才傲物，章又性好譏彈，故詆斥之辭，多失其準。今觀《述學》內外篇，雖爲裒集平生論著之文，書止數卷，而包羅甚廣，卓然可傳。綜其撰述，足以裨益來學，可啓後世涂轍者，約有四端：一曰講明古書通例，如《釋三九》、《明堂通釋》是也；二曰糾彈宋、元以來理學諸儒之謬，如《講學釋義》、《大學平義》是也；三曰表章周、秦諸子之學，如《荀卿子通論》、《墨子敍》是也；四曰駁斥

當代諸儒論學之外，如《婦人無主答問》、《古玉釋名》、《廣陵曲江證》、《石鼓文證》、《墨子後序》是也。至於辭旨之美，尤非並時諸儒所能及。若以章氏所爲文辭與汪相較量，則又有雅俗之辨矣。

### 論文辨僞

舜徽按：此文長至三千三百餘字，所以痛罵袁枚者也。始《小倉山房尺牘》刊布于世，其中敍及與朱珪論古文十弊事，於朱氏所舉十弊之外，又益以三弊。章氏見之，詆爲無耻妄人。反覆辱罵，有如悍婦之門口舌，一何嫉忌之至於此極乎！亦由此可見章氏心胸之未能廣也。況章氏嘗從朱筠學爲古文辭，習聞其兄弟緒論，已別撰《古文十弊》以張己說矣。偶見他人論此道者則詬厲之，是豈論文之語，但可出之於己，而不可出之於人，天下必無是理也。學術天下公器，是非自有公論。何可專恃一己之好惡以品優劣，但馮一時之喜怒以定去取耶？章氏論人刻覈，流於輕薄，自是通人一蔽。

### 史學例議上

太史遷以十二本紀，隱法《春秋》。一書之中，再三致意。余別有專篇討論甚詳，茲不具論。

舜徽按：司馬遷整齊舊事，詳近略遠，事多則篇幅長，一篇不足，便分爲數篇；事少則篇幅短，不足一篇，便合數篇爲一。所以五帝合爲一紀，夏、殷、周各成一紀；秦代事實較多，既有《秦本紀》，又有《始皇

本紀》；降及漢代，史迹更豐，故自高祖以至武帝，每帝各爲一紀；詳近略遠之例適然耳。本紀共十二篇，恰與《春秋》十二公之數偶合。豈司馬修史之時，卽已奉《春秋》爲準式，規仿十二公之編年，必爲十二本紀以上應之乎？吾知其必不然也。昔人論史，每爲“史源於經”一念所桎梏，必謂某體出於《尚書》，某體出於《春秋》，某體源自官禮，某體源自《爾雅》，則自漢以下史部羣書，但有因而無創，二千年間，烏覩有所謂史學乎？此其說必不可通也。章氏論史，蓋不免於斯累。

### 史篇《別錄》例議

《別錄》之名，昉於劉向。乃是取《七略》之書部，撮其篇目，條其得失，錄而奏上之書。以其別於本書，故曰《別錄》。今用其名以治紀傳、編年二家之史，亦曰《別錄》，非劉氏之旨也。蓋諸家之史，自有篇卷目錄，冠於其首，以標其次第。今爲提綱挈領，次於本書目錄之後，別爲一錄，使與本書目錄，相爲經緯，斯謂之《別錄》云爾。蓋與劉氏之書，同名而異用者也。

舜徽按：昔劉向校書祕閣，每一書已，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謬誤，隨竟奏上，載在本書。後又哀集衆錄，謂之《別錄》，蓋卽後世目錄解題之始。名曰《別錄》，謂纂輯羣書之敍錄，都爲一集，使可別行云爾。今就所存管、荀諸子《敍錄》觀之，知其撰述之體，特致詳於作者生平。蓋古之敍錄羣書，義例固爾。或謂在書爲“序”，入史爲“傳”，劉向校書，則謂之“錄”，名雖不同，體固無二。揆之古初，實亦如此也。若夫章氏自道爲《史篇別錄》之體則曰：“紀傳苦於篇

分，《別錄》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於年合，《別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矣。蓋枉欲矯而直欲揉，歸於相濟而已矣。”又曰：“於紀傳之史，必當標舉事目，大書爲綱，而於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於其類附注篇目於下，定著別錄一編，冠於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挈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於此也。”又曰：“今爲編年而作《別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勳戚、將相、節鎮、卿尹、臺諫、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別其名，注其見於某年爲始，某年爲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分品目，注其終始年月，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則也。至於兩國聘盟，兩國爭戰，亦可約舉年月，繫事隸名，是又於編年之中，可尋表歷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爲終始者，則於其始見也，注其終詳某帝；於其終也，注其始詳某帝可也。其有更歷數朝，倣其意而推之可也。”（俱見本篇）可知章氏之所謂《別錄》，實屬史篇標注之書，以此檢尋事目，得彼此參稽之用。謂之《史篇系目》或《史篇標注》均可，不必名爲《別錄》也。

## 外 篇 二

### 鄭學齋記書後

戴東原云：“鄭學微，而始以鄭氏名學。”其說洵然，時文興，而文辭始有古文之名，同一理也。戴君說經，不盡主鄭氏說；而其

《與任幼植書》，則戒以輕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約學者於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當墨守師說。及其學之既成，會通於羣經，與諸儒治經之言，而有以灼見前人之說之不可以據，於是始得古人大體，而進窺天地之純，故學爲鄭，而不敢盡由於鄭，乃謹嚴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學者，喜言墨守，墨守固專家之習業，然以墨守爲至詣，則害於道矣。昔人謂“寧道周、孔誤，勿言馬、鄭非”，墨守之弊，必至乎此。

舜徽按：戴氏嘗云：“鄭康成之學，盡在《三禮注》，當與《春秋三傳》並重。”（見段玉裁所編戴氏《年譜》）其推尊鄭學，可謂至矣。然其自爲之書，亦有不盡遵鄭義者。則以深造自得，入而能出，不墨守，不曲從，惟求其是而已。雖偶與鄭違，無傷也。即康成偏注羣經，亦多前後不同，何嘗固拘一義乎？其於前人之說，勘駁復廣，可知不尚墨守，惟是之從，斯固鄭氏治經家法也。昔人嘗云：“書讀百遍，其義自見。”此言惟精熟始能自得新義，夫豈淺嘗浮慕入而不深者所能爲役哉！故戴氏《與任幼植書》有曰：“震彝病同學者多株守古人，今於幼植反是。凡學未至貫本末，徹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載籍極博，猶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戴東原集》卷九）蓋規其讀書始基未立，不可遽言高遠耳。古之善治學者，不尚墨守。故向歆說經，彼此立異（劉向及其子歆說經之語不同）；勝、建傳書，各自名家（夏侯勝及兄子建同傳《尚書》，各名一家）。小同、康成之孫也，其注《孝經》，卽有異說。一門之內，尚不可以強同；況後人之於昔賢，遙隔千載，而可相尚以墨守乎？章氏極言墨守之弊，是也。至于今日，則墨守之病，又甚于昔。每見守一先生之言者，暖暖姝姝，

不敢越尺寸，篤信謹遵，以終其身。究之學無自得，惟寄人籬下以討生活耳。戴氏嘗謂“大國手門下，不能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教得出大國手”（見《年譜》）。此真千古名言！良以大國手有盛名于當時，出其門者，但墨守師說以爲名高，即可擁皋比以矜式多士。不必自求進益，別開門庭，故終不能自成大國手也。此亦墨守之害已。出于二國手、三國手之門者，以其師說不足取重于時，乃奮厲不懈，博攬兼綜，反而求之於己，實有所得，卒以此發名成業，智過其師，而自爲大國手矣。此則不尚墨守之效也。故治學而不免於墨守，則不啻畫地自限耳。

### 讀《史通》

沈休文著《宋書》，雖不敢希蹤班、馬，而文辭典雅，頗具別裁，抑亦范氏之亞匹也。史稱裴子野刪《宋書》爲《宋略》二十卷，約見之歎曰：吾不如也。《史通》因節之曰：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此豈情理之言哉！裴《略》今已不傳，前人錄入編年部次，是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之屬也，是與紀傳之史，絕不相蒙，前史謂刪約《書》，固已謬矣。荀氏之《紀》，不盡出於班《書》；袁氏之《紀》，不盡由於一史。假而易編年於紀傳，而止憑一書，刪繁就簡，乃荒陋者所爲，通人不出此也。裴氏之書，未必至是，而史顧侈爲美談，何其陋歟？約之歎服，大抵取其剪裁簡當。至謂己所不如，不過一時推獎之辭，且亦明知己之撰述，足以流傳，不致爲所掩也。故不妨爲假藉，而史氏錄之，則未察其本矣。劉氏斟酌羣言，揚摧史品，自宜知所別擇，乃又從而實之曰：“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前人不見裴書，而因劉氏之言，以謂裴《略》實勝沈《書》，有定品矣。姑無論子野史筆文才，未



聞可駕休文而上；正使其書不愧荀、袁，亦與馬、班諸書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劉氏《二體》之篇，明言班、荀二家，缺一不可。未聞言漢事者，以荀《紀》爲上，班《書》次之；言東漢之史，以袁《紀》爲上，范《書》次之。何則？短長優絀，必以其類相形。體製各不相蒙，短長何自見哉？

舜徽按：《史通·古今正史篇》稱：“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此史家之率筆也。觀其言及荀悅《漢紀》，但云“其言簡要，亦與紀傳並行”；言及袁宏《後漢紀》，但云“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是皆二體並稱，靡有軒輊。裴《略》之與沈《書》，亦猶是耳。不云並行於代，乃以上次品第，失其實矣。考之《隋志》，自沈約、裴子野兩家外，紀傳類有徐爰、孫嚴《宋書》各六十五卷；古史類有王琰《宋春秋》二十卷。可知宋史撰述，亦復多門，《史通》特就通行於世者言之耳。《梁書·裴子野傳》稱“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可知其留心宋事，實有家學可承，而非子野一人之力也。《史通·雜說》篇云：“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然則知幾之於裴《略》，亦未嘗目爲至美盡善也。大抵知幾品人論事，多誤信史傳而漫不經心。沈約推美裴書之言，始見《梁書·裴子野傳》，《南史》仍而不改。知幾遽據其言以定兩書之高下，亦猶前人謂陳壽挾私嫌以貶諸葛之說，始見《魏書·毛脩之傳》，唐修《晉書》，復有類似之記載。知幾遽信其事，以衡史筆之曲直。皆由偏信傳聞，未暇深考故也。

## 外 篇 三

### 報黃大俞先生

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爲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但爲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爲良者也。

舜徽按：章氏論及修史，亟言比類與著述之辨，亦猶其平日兢兢於功力與學問之不同耳。比類之事，謂纂輯資料以供采摭也；著述則自爲義例，撰成一書矣。以司馬《通鑑》論之，始爲《長編》，乃比類也；既已去粗取精，刪繁存簡，以成二百九十四卷之書，始可謂之著述也。比類之事，多能爲之；著述之業，則非具史才者，不克引以自任。故章氏嘗謂“史家有著作之史，與纂輯之史，途徑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還，絕不多見”（《方志略例一·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可謂慨乎其言之矣！試就鄭、馬兩家之書而論，鄭氏《通志》，乃有志於著述之業而未竟全功者也；馬氏《文獻通考》雖爲完書，而終不失爲比次之事也。學者必具此識，而後可以分別史書之高下。

## 爲畢制軍與錢辛楣官詹論續鑒書

舜徽按：司馬《通鑒》，終於五代。有宋以下，久待續修。南宋李燾，踵《通鑒》之例，備采北宋一祖八宗一百六十餘年之事蹟，起太祖建隆元年，訖欽宗靖康二年，成《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述高宗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續《長編》，成《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李之書，皆不得謂之《續通鑒》。明人王宗沐、薛應旂，雖皆撰《宋元通鑒》，然其所見之書甚少，卽如二李之書亦未寓目。於遼、金正史，存鄙夷之心，所采尤寡。荒陋如此，奚足以言續鑒！清初徐乾學，毅然以此自任，撰《資治通鑒後編》一百八十四卷。雖有萬斯同、閻若璩、胡渭襄其事，然參稽羣籍，仍甚局隘。其時如李燾《長編》足本之在《永樂大典》者，以及元人文集說部之散存于《大典》中者，均未輯出，莫由綴緝而補苴之。且於遼、金事不甚措意，與明人同。則其書之不能臻於完善，理勢然也。乾隆時，畢沅總督湖廣，一時名士，多致之幕府。其以史學名家者，自章氏外，則邵晉涵也。畢氏乃於此時發願續修《通鑒》，屬僚友就徐氏《後編》加以損益。閱二十年，書乃脫稿。其時錢大昕以精于史學，負海內盛望，故畢氏屬章氏爲此書以自明續修《通鑒》之意。

此文篇幅雖長，然括其大旨，不外四端：史實以宋、遼、金、元四史爲正本，不惟詳於宋事，遼、金大事亦無所遺，元事則多采文集、筆記補苴之，一矯前人詳宋而略遼、金、元之弊。一也。所采《長編》爲足本，並據《繫年要錄》及熊克《中興小紀》、《宋季三朝政要》諸書，以補徐本之未備。而寧宗嘉定以後之闕

略，尤注意補其遺聞佚事。二也。別作《考異》散入本書正文之下，其例略同徐本。三也。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苟無卓識弘裁，無庸附綴空論。故不用徐本之例，繫以“臣某曰”。四也。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其所以勝於諸本者，亦不外此數端耳。余平生喜誦司馬《通鑑》，治之三反。因亦涉覽畢氏續編，喜其有綜輯之功，而病其乏鎔裁之力。觀涑水之書，融會羣籍，歸一家言，悉變而爲當時之語言文字，此是何等本領！編述之業，斯爲最上矣。畢氏《續通鑑》，於宋、遼、金、元四史及二李之書，多錄原文，未施點竄。良以事出衆手，徒勞鈔撮，無剪裁鎔鑄之才，不能追蹤古人，與《通鑑》媲美也。今檢《潛研堂文集》，竟不見此札答書；《十駕齋養新錄》中亦不涉及《續通鑑》事，蓋錢氏於斯編不甚愜意，故置之勿論耳。

### 與史餘村簡

知德者鮮，知文亦豈易易！通人如段若膺，見余《通義》有精深者，亦與歎絕；而文句有長排作比偶者，則曰惜雜時文句調。夫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卽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爲哉！使彼得見韓非《儲說》，淮南《說山》、《說林》，傅毅《連珠》諸篇，則又當謂秦、漢人惜有時文之句調矣。

舜徽按：此章氏護短之言也。文章之事，非其所長，不特當時早有定評，卽在今日亦自有公論也。彼雖嘗從朱筠學古文辭，朱氏亦非擅長文辭者也。文章之事，半賦於天，非盡由人力所能奏功。顏介所謂“但成學士，自足爲人；苟乏天才，無強操筆”。真名言也！與章氏同

時而友善者如邵晉涵，卽積學能文之士。余嘗謂乾嘉諸儒能爲考證之學，多不能爲考證之文，能兼之者，殆不數人，晉涵實其中之佼佼者。章氏雖不爲考證之學，顧以史識爲長，而行文爲短。觀其屬辭比事，亦特文從字順而已，非可語乎高遠也。然其書中恒指斥當時文弊，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固賢者所難免耳。

### 與汪龍莊書

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

舜徽按：章氏指斥當時學弊，譬如蠶之食葉而不能抽絲，可謂妙喻。此卽指乾嘉學風，但有功力而無學問，不能自抒所得以成著述也。夫著述之業，亦豈易言！必須刊落聲華，沉潛書卷，先之以十年廿載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廣攬披檢之學，反諸己而有得，然後敢著紙筆。況讀書有得，非文不宣。樸學經師，大抵長於考證，拙於屬辭，不能有所述造，亦固其所。自古有才、難之歎，徵之治學著書，莫不皆然。

### 報孫淵如書

愚之所見，以爲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爲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此種議論，知駭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

舜徽按：章氏此識甚卓，足以開拓學者眼界。《說文》：“史，記事者也。”此“者”字指物言，與“粉，傅面者也”，詞例正同。記事之物，端惟文字，故漢人即謂文字爲史。班氏《漢書》，揚子《法言》，皆稱字書爲“史篇”，其明徵也。史字本義既指文字，則凡用文字記錄之材料，皆可稱爲史料。龔自珍《古史鈎沉論》云：“史之外無有文字焉。”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亦云：“凡以文字形諸記錄者，蓋無一而不可於此中得史料。”皆與章說相發明。至於經、史、子、集四部之分，乃由後世圖書日繁，爲便於編目，以類相從而已。然其中之所載，固無一而不可目爲史料也。

## 家 書 二

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爲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裨續見長，考訂名物爲務，小學音畫爲名，吾於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咨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爲著述，以趨時尚，此吾善自度也。時人不知其意而強爲者，以爲舍此無以自立，故無論真僞是非，途徑皆出於一。吾之所爲，則舉世所不爲者也。

舜徽按：此章氏自述學術趨嚮之辭，其自負甚高，謂平生所議在一家著述，以別于劉知幾之所議在館局修書。其實劉氏亦主張一家著述者。其反對館局修書甚力，《史通·忤時篇·上蕭至忠書》中已明言之矣。若以章氏比之劉知幾，一則揚摧利病爲先，一則闡明義例

是務。惟以揚權利病爲先，故詳於批評，亦兼及體要；惟以闡明義例是務，故挈其綱領，而略於節目；此兩家不同之大較也。章氏論學之語，悉薈萃於《文史通義》中。彼嘗自言“《文史通義》專爲著作之林校讎得失”（見《與陳鑒亭論學》）。可知此書所言，本不限於史學。今觀內篇之純論史學者，不過《史德》、《史釋》、《史注》、《傳記》、《釋通》、《申鄭》、《答客問》（凡三篇）共九篇而已。卷一凡十一篇，專明六經皆史之義，其餘皆文史兼論。《通義》中有泛論學術者，如《朱陸》、《浙東學術》諸篇是也；有專論文學者，如《文德》、《文理》、《古文公式》、《古文十弊》諸篇是也；有指斥時人者，如《鍼名》、《砭俗》、《詩話》、《婦學》諸篇是也；然則其所論及者，亦甚廣矣。清末李慈銘嘗謂：“實齋識有餘而學不足，才又遠遜。故其長在別體裁，覈名實，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則讀書鹵莽，糠粃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變，況持一切高論，馮臆進退，矜己自封，好爲立異，駕空虛無實之言，動以道眇宗旨壓人，而不知己陷於學究雲霧之識。”（《越縕堂祥琴室日記》）此殆非李氏一人之私言也。文廷式亦言：“章實齋《校讎通義》，立一書互見及載篇別出之說，目錄家頗謂創獲，余閱明祁承燾《書目略例》實開其端。章氏與祁氏近同里閭，不容不見其書。乃遠述弱侯，而近遺夷度，殆不欲著其相襲之迹乎？若然，則《文史通義》特重史德，實齋爲有愧也。”（見《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然則其所自爲之書，亦不必事事皆出於己矣。雖然，當舉世沉酣於窮經考禮、審音說字之際，章氏獨究心乙部，出其弘識孤懷以救末流之弊，而卓然有以自立，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 後 記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決定出版《張舜徽文集》，醞釀已久。在學校百年華誕之際，這項計劃得以付諸實施。出版社經過考慮，將整部文集的籌劃與整理工作交付給我。我感到這是出版社對我的信任，也感到這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張舜徽先生的著作，生前大多已出版。此次作為一個系列推出，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組合即先後次序問題。第一輯所收七部著作，偏重於文獻學方面，是文獻學界急需之書。第二輯所收，偏重於思想文化與學術史，《愛晚廬隨筆》是一部難得的筆記，也收入此輯中。第三輯則將收入餘下的重要著述。

對於所收之書，我們做了不少引文核對工作。而像《清人文集別錄》這部書，則還需重加標點。對原文我們一般不作改動，只對極個別地方進行過略微的調整，以保持著述原貌。當然，為統一各書版式，加之橫排時標點與初版時的差異，工作量還是不小的。

現將前二輯諸書所據版本介紹如下：

《廣校讎略》，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版；

《漢書藝文志通釋》，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清人文集別錄》，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版；

《清人筆記條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中華書局（上海編譯所）一九六二年版；

《中國古代史籍舉要》，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中國文獻學》，中州書畫社一九八二年版；

《周秦道論發微》，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史學三書平議》，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鄭學叢著》，齊魯書社一九八四年版；

《清代揚州學記》，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顧亭林學記》，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版；

《清儒學記》，齊魯書社一九九一年版；

《愛晚廬隨筆》，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作為張舜徽先生的弟子，我對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領導、各位編輯、排版校對人員，以及所有關心這部文集出版的人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整理者：周國林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日